屈萬里先生全集⑰

屈萬里先生文存

第三册

金石器物學

目次

跋舊拓本大王莊二郎廟碑

日前淸明節，張姑屯大會。予因市驢赴會，於冷攤上無意中得此品。歸來燈下把玩，深宵忘倦。書生結習，思之亦自笑也。

是碑建於淸咸豐二年，次年，有車過此，馬驚，車觸於碑，至損二十六字。更三年，黃河北徙，大浸稽天，碑爲洪濤盪碎。水退後，無知村民，或取以爲屋礎，以是益殘缺不完。故今日欲覓一完整墨本，至不易得，而此本則金甌無缺，且楮墨精良，椎搨亦出於高手，信乎其可貴也。

碑身高四尺二寸，寬二尺五寸，凡十六行，行四十字，增生李振瀛撰文，監生劉金榜書丹。文藻書法，並極佳妙。一時有珠聯璧合之譽。

李字步洲，大王莊人，以文名邑中。所作「牛何之，先生何之」制藝，有「先也者，牛之撒腿者也；生也者，牛之坐蓐者也」等警句，至今猶膾炙人口。此碑文尤平生傑構，非大手筆莫能望其項背。劉字題名，少有儁才，尤擅書法，凡顏柳歐趙諸碑帖，幾遍習之。惜命途多舛，竟未獲一靑衿。文章憎命達，古今才士，所同慨也。

憶客歲鄰家穿井，出售陶虎子一品，予以賤價得之。今年獻歲之初，又得光緒間石印莊農雜字一册，寶如拱璧，玆復得此墨本。擬顏予室曰「三寶齋」，以誌其盛。古人云；「物常聚於所好」，其信然矣。

民國三十有五年清明後三日識。

原載「首都晚報」「寒山寺」專刊，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九日以筆名「學者」發表。

兕觥問題重探

在詩經裏，提到兕觥的，共有四處：

我姑酌彼兕觥。（周南、卷耳）

稱彼兕觥。（豳風、七月）

兕觥其觩。（小雅、桑扈；周頌、絲衣）

卷耳篇毛傳說：「兕觥，角爵也。」孔氏正義說：「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周禮地官閭胥鄭注也說：「其爵以兕角爲之。」說兕觥之形狀的，現今所能見到的資料，以毛傳爲最早。但，毛傳所謂角爵，究竟是像角形的爵？抑是用眞兕角當作爵？我們很難斷言鄭康成和禮圖以爲是眞兕角（朱子的詩集傳，就採用了這一說），先師以爲是木製的像兕角形之爵，這兩說以及孔氏的調停之說，有無一說和毛傳符合？這裏且不討論。但他們的說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種酒器的形狀，是像兕角的樣子。

宋人（不著撰者姓名）所作的續考古圖，著錄了兩個兕觥，其一作牛形，有三足，似匜。另

一個形狀也似匜，但沒有足而有蓋，蓋作牛首形（附圖一）。把這種器物當作兕觥，和唐以前人所說的兕觥的形版，大不相同。

到了清代，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五）裏，著錄了一個「子燮兕觥」。阮氏說它的形狀，「如爵而高大，蓋作犧首形，有兩角。」又說：

> 毛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毛說蓋以兕觥爲似角之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於角，有三足同於爵。詁訓甚明，非謂以兕角爲之也。

是阮氏把形制似爵、而蓋作犧首狀的酒器，叫做兕觥。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例不載器形圖。但阮氏所謂「子燮兕觥」，見於商周彝器通考的圖版四三〇，它的形狀如本文附圖二。王國維作「說觥」一文（觀堂集林卷三），認爲阮氏釋毛傳非是，而贊同續考古圖作者的意見。他說：

> 案：自宋以來，所謂匜者有二種：其一，器淺而鉅，有足而無蓋，其流斜而長。其一，器稍小而深，或有足（原註：「惟博古圖之文姬匜有之，他器則否。」），或無足，而皆有蓋（原註：「其無蓋者，乃出土時失之。」）；其流侈而短，蓋皆作牛首形。博古圖十四匜中之啓匜、鳳匜、三虁匜……七器，西清古鑑三十匜中之司寇匜、祖匜、伯和匜……十一器，及端氏所藏諸女匜、賁弘匜、甫人匜三器，皆屬此種。余以爲此非匜也。何以明之？甲類之匜，其銘皆云某作寶匜，或云作旅匜，或云作媵匜，皆有匜也。而乙類三十餘器中，統無匜字。此一證也。匜乃燕器，非施之鬼神。而乙類之器，銘多云作父某寶尊彝：其爲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可知。此二證也。古者盥水盛於盤洗，匜惟於沃盥時

一用之，無須有蓋。而乙類皆有之。此三證也。然則，旣非匜矣，果何物乎？曰：所謂兕觥者是已。何以明之？曰：此乙類二十餘器中，其有蓋者，居五之四。其蓋端皆作牛首，統無他形：非如阮氏兕觥，僅有一器也。其證一。詩小雅周頌皆云：「兕觥其觩」。毛於觩字無訓：鄭惟云觩然陳設而已。案：觩，說文作觓，當與朻木（原註：「今詩作樛木。」）之朻音義同。觓者，曲也，今詩作觩，又假借作捄。以詩證之，則大東云有捄棘匕，又云有捄天畢，良耜云有捄其角，泮水云角弓其觩。凡匕與角與弓，其形無不曲者：畢之首有岐，亦作曲形。則兕觥形制亦可知矣。今乙類匜器蓋皆前昂後低，當流處必高於當柄處若干，此由使飲酒時酒不外溢而設。故器蓋二者，均觩然有曲意：與小雅周頌合。其證二。詩疏引五經異義述毛說並禮圖（里案：此乃詩疏引禮圖說，非五經異義述禮圖也。）皆云觥大七升，是於飲器中爲最大。今乙類匜比受五升若六升之斝尤大：其爲觥無疑。……其證三。立此六證，乙類匜之爲兕觥甚明。

王氏此說一出，大家都信從他。我在作詩經釋義時，也採用了他的說法。容庚雖然也用了王氏之說；但，他在商周彝器通考（四二六頁）裏，卻提出了一些疑問，認爲王氏之說，並非「至當不易」他說：

然余尚有疑問者；則守宮作父辛觥中藏一勺，則此類器乃盛酒器而非飲酒之器，與「稱彼兕觥」及罰爵之義不合也。宋人稱此爲匜，王先生以爲匜皆無蓋，而不知䰯叔匜、鳳蓋匜之亦有蓋。甲乙兩類之匜，實有其相同之點，其分別則乙類屬早期，甲類屬晚期；乙類盛

酒，甲類瀉水。觶觚爵角斝之形制，皆與三禮圖不合，惟續鑑之兕觥獨與禮圖合。中央研究院發掘安陽，得一器與續鑑兕觥同而有蓋，則王先生所定兕觥之名，或須更定。

從這段議論看來，容氏雖然沒作肯定的斷語；但，他似乎認為西清續鑑著錄的和中央研究院發掘所得的角形器，才是眞正的兕觥。孔達生先生，可能由於容氏之說的啟示，作了說兕觥一文，刋載於民國五十三年出版的東海學報第六卷一期，認為西清續鑑把角形酒器定為兕觥，是確當而無可疑的。現在看來，孔先生之說，應是至當而無可復易。只是他惜墨如金，對於王氏之說，不肯多作批評。因此本文再就孔先生的意見，加以申論，以證明其說之確鑿可信。

王氏所謂乙類之器不是匜，所舉的三個證據，除了第一項——有匜字和無匜字之分——外，其餘兩項，前面所舉的容氏之說，已足以釋王氏之疑。至於說甲類的器銘有匜字，而乙類的沒有；這固然可以說，由於甲乙兩類的時代不同，用途不同，而認為它們不是同一種器物。可是，它們是否同一種器物，是一個問題；即使乙類另是一種器物，而它們是不是兕觥，又另是一個問題。

至於王氏所舉用以證明乙類器當是兕觥的三個證據，也都有問題。從第一個證據——蓋作牛首形——來說，所謂牛首形，是不錯的。但牛首和兕首不同，因為牛首是左右兩角並列，而兕首則只有一角（兩角的犀，其角則一大一小；且一上一下，而不是左右並列。）。乙類器的蓋子，分明是牛首形，而不是兕首形。由此可知，它們不應該是兕觥。第二個證據——乙類器觩然有曲意，與小雅周頌合——，王氏把觩字解釋為彎曲之義，是很精確的。但，就王氏所舉詩經中用觩

（或捄）字形容的物事言，有棘匕、天畢、角弓等。這些東西的形狀，都確乎是彎曲的。而前昂後低的乙類器，說它前後不平則可；說它「觩然有曲意」，畢竟與器形不相符合。至於第三個證據——於飲器中爲最大者，則更難成立。因爲乙類器有的有勺，容庚據以斷定這類器物是盛酒的，並不是飲器；其說甚確。由此看來，王氏所舉的三個證據，都不足以證明乙類器就是兕觥。

按：成公十四年左傳、引小雅桑扈的詩句，作「兕觵其觩」。周禮春官小胥，鄭注引這句詩，觥也作觵。是觥和觵同。說文說：「觥，俗觵從光。」又說：「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是許君的說法，和周禮鄭注，以及詩正義所引的禮圖之說，完全相同。從這些早期之說看來，毛傳所謂角爵，很可能也是指用作飲器的眞正兕牛角而言，而不是角形的飲器。

周頌絲衣說：「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毛傳說：「黃牛黑脣曰犉。」捄，和觩同義，是彎曲的意思。王國維氏已經說過。有捄，等於捄然，說見拙著詩經釋義周南桃夭篇。這兩句詩是說：所殺的這個黃色黑脣的公牛，它的角是捄然彎曲的。這裏用捄字形容牛角，和他處用觩字形容兕觥，對照着來看，可知兕觥的形狀，必定是像角形的樣子。

先秦的飲器，的確有像角形的；即容氏通考所說續鑑所著錄的，和中央研究院所收藏的。西清續鑑（卷十二）著錄了一個這樣的銅器，就定名爲兕觥（附圖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安陽所得的一個角形器（附圖四），其形狀和續鑑所著錄的相同，只是多了一個蓋子。它們的形狀正像兕角，觩然而曲；它們才眞正和小雅及周頌符合。孔達生先生認爲這種飲器才是兕觥；他肯定地說：

> 驗之實物，徵之文獻，可無疑矣；西淸所定是也。

我完全同意孔先生的這個論斷。但，這類的器形，既然出現於殷墟，可知在殷代已有銅製品。常用的器物，往往是最初用實物，後來才仿照實物的形狀，制成陶器或銅器；譬如最初用葫蘆盛水或盛酒，後來就仿照葫蘆的形狀，製成陶質或銅質的壺（詩七月：「八月斷壺」。毛傳訓壺為乾瓠。鶡冠子學問篇：「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也當是瓠的意思。瓠，就是葫蘆。），便是一例。兕觥在最初，可能是用眞正兕牛的角，後來才有青銅製品。因此，周禮鄭注，以及許君和禮圖之說，似乎並不錯；只是他們不知道還有銅製品。至於有沒有木製的兕觥，現在還不能斷言。

以上是說兕觥的形狀；下面再談它的容量和用途。詩卷耳正義說：

> 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詩毛說：觥大七升。

正義並引許愼的案語說：

> 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

又引禮圖說：「觥大七升。」可見關於兕觥的容量，從漢以來，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現在拿傳世的先秦酒器來看，同一種器物，它們的大小，並不一致；常見的爵、觶、觚等器，最大的和最小的比起來，相差可能不止一倍。漢人已很少能見到先秦的彝器，自不免傳聞異辭。而且，韓詩

說把每一件酒器的名稱，都穿鑿附會地加以詮釋。而對於觥的解說，則全從罰爵的觀點推論，更成問題。關於罰爵的問題，前引許叔重五經異義，固然和韓詩說相同；鄭康成箋詩，也有這類的說法：

觥，罰爵也。（周南、卷耳）

兕觥，罰爵也。（小雅、桑扈）

他們所以把兕觥說成罰爵，大概都是根據周禮。卷耳孔氏正義說：

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注云：「觥撻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爲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

按：周禮這兩處的觥字，雖然可以解釋爲兕觥（當動詞用）；這樣的解釋，不惟在其他古書裏找不到證據，即從周禮兩處的上下文來看，也有使人不能信於理而厭於心之感。國語越語下：「觥飯（飯，一本作飲；據韋註，作飯者是。）不及壺飧。」韋註：「觥，大也。」這個意義，用在周禮裏也不適當。除了詩經、周禮、和國語之外，在其他先秦古書裏，都沒有見到這個觥字。比較的資料旣少，因而周禮這兩處觥字的意義，就很難確定。但，鄭氏這兩處的周禮注，究竟是一個可疑的問題。

從先秦典籍中說到兕觥的資料看來，沒有一處可以證明用兕觥作罰爵的。周南卷耳，是描寫家人懷念征夫、想像着征夫借酒消愁的情形。豳風七月，是敍述農民們共飲於豳公之堂，爲豳公祝壽的情形。桑扈是頌美天子之詩（毛傳說是刺幽王，朱子的詩序辯說，已斥其非是。）；絲衣

是繹祭賓尸的樂歌。在這些詩中，絕沒有把兕觥當作罰爵的。而鄭康成卻把它們多說成罰爵，或根據毛傳說是爲「誓眾」用的。害得孔氏正義，想盡了辦法替他們圓說，但究竟不能自圓其說。

又春秋昭公元年左傳：

>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辭，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這是在燕禮的場合用兕爵，自然也沒有懲罰的意思。

宋人陳祥道的禮書（卷九十九）曾根據這些資料、以及周禮的記載，說明兕觥的用途。他說：

> 其用則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觩」，是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舉兕爵，是燕有觥也。閭胥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

陳氏所說，除了周禮閭胥掌比觥（也就是被鄭康成說成罰爵的）一點，還有問題外，其餘似乎都可信。那麼，兕觥這種酒器，可以用在許多場合裏，它不但不專門用作罰爵，甚至它是否作罰爵之用，也成問題。

卷耳既說「我姑酌彼金罍」，又說「我姑酌彼兕觥」。罍是盛酒的器物；酌字一般的解釋，是從容器中取出流質的東西來。也許有人據此而懷疑兕觥是盛酒之器，而不是飲器；從而以爲兕

附圖一：續考古圖（卷三）著錄兕觥





附圖二一：阮氏所謂子夒兕觥（見商周彝器通考圖版四三〇）



附圖三：西清續鑑（卷十二）著錄兕觥



附圖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殷墟所得角形器

觥不應該是兕角形的飲酒之器。關於這一點，孔先生在說兕觥一文中，有較詳的解釋。他說：

七月：「稱彼兕觥」，稱訓爲「舉」。……左傳亦稱「舉兕爵」。爲飲器，故言舉也。……但，說文云：「酌，盛酒行觴。」段玉裁注：「盛酒於觶中以飲人曰行觴。投壺云：『命酌曰：請行觴。』觶實曰觴。」（原注：「按：盛酒飲人皆可曰行觴，不必專指觶言。」）觶亦飲器也。「酌彼金罍」，可作爲取酒于彼金罍中。「酌彼兕觥」，則應訓盛酒飲人，以彼兕觥也。則觥爲飲器，與爵、觶等用同。其非容器，彰彰甚明。

從這些論證看來，可知卷耳的兩個酌字，用法雖然相似，而意義並不相同。兕觥是飲器而不是盛酒之器，七月之詩，和左傳之文，都顯示了明確的證據。

現在，我們可以肯地說：兕觥是像兕角形的飲器（可能有用眞兕角的）；它的用途很廣，不但不專作罰爵之用，乃至是否用作罰爵，也還是問題。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三本，第四分（民國六十年），五三三——五三八



張懷瓘原名「張懷素」說質疑

「書斷」，是一部評論書法很著名的書。它的著者是張懷瓘，也是大家所共知的。近來有人把這書的著者題爲張懷素；那是根據元吾衍（筆者按：卽吾丘衍。）的周秦刻石釋音。吾氏說：

唐處士張懷素，作「書斷」三卷，開元中，敕改名懷瓘。

筆者按：此說當本於宋翟耆年的籀史。籀史「石鼓碑」條下翟氏說：

懷瓘，本名懷素，開元二十二年，敕改名懷瓘。

翟氏言之鑿鑿，似乎是可以相信的資料。然細核之，卻大有問題。問題如下：

一、自新唐志以下，所有著錄「書斷」這部書的公私家書目，都題張懷瓘撰，沒有一家題張懷素撰的。

二、張氏此書，著成於翟氏所謂改名以前（詳下），如果張氏原名懷素，他應該自題「張懷素撰」。但，現在所能見到的「書斷」各種刻本和鈔本（包括宋刋本的百川學海），著者都是題張懷瓘，沒有一本題張懷素的。

三、書斷卷下「評」篇說：「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懷素以爲：『杜草蓋無所師，鬱鬱靈變，爲後世楷，則此乃天然第一也。』……懷瓘恨不果遊目天府，備觀名迹。」前面引了懷素的話，後面著者又自稱其名曰「懷瓘」。可知懷素另有其人，而不是懷瓘的原名。

四、同上篇末懷瓘自述云：「開元甲子歲，廣陵臥疾，始爲草創。……歲在丁卯，存筆削焉。」甲子是開元十二年；丁卯是十五年。開元十五年，張氏已自稱懷瓘，自然不須到開元二十二年才「敕改名懷瓘」。

五、唐竇蒙注解述書賦說：「懷瓌，懷瓘弟。」又：唐故宣義郎侍御史內供奉知鹽鐵嘉興監事張府君墓誌銘（見陶宗儀古刻叢鈔）說：「宜春生盛王府司馬翰林集賢兩院侍書侍讀學士諱懷瓌，有文學，尤善草隸書，與兄懷瓘同時著名。」是瓘、瓌兄弟，都是以從玉的字取名。由此看來，懷瓘的名子，也不像是後改的。

翟耆年是南宋紹興間人，距唐開元約四百年。別的資料且不談，單就「書斷」的自述來說，它乃是第一手的資料；而翟氏之說，則是四百年後的傳述資料。按理說，自以「書斷」之說爲可信。但翟氏之說是否確有所據、足以推翻張氏的自述呢？抑張氏的自述，可以另作其他解釋呢？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三日
以筆名「尺蠖」發表。

晚清齊魯學者對於金石學方面的貢獻

齊魯人士，對我國文化、學術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至聖孔子、亞聖孟子，都是山東人；他們的學說，兩千年來不但成爲國人思想的主流，而且舉凡政教禮俗，無不以孔孟的學說爲準則。它陶鑄成了國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性，它同化了古代許許多多的邊疆民族。它的光輝，歷久而彌盛。

從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坑儒之後，繼之以秦二世，繼之以劉項八年的戰爭，繼以專溺儒冠、鄙棄詩書的漢高祖，再繼之以潑悍無知的呂后，經學經過了這三十多年的摧殘，眞已到了不絕如縷的地步。後來，幸而有齊國的田何、楊何，傳授易經；濟南的伏生，傳授尙書；齊國的轅固生、魯國的申培公，傳授詩經；魯國的高堂生，傳授禮經；齊國的胡毋生，傳授春秋。於是這維持我民族命脈的經學，才得起死回生。如果沒有這些齊魯人士的傳經，我國從漢以後的歷史，也許都整個的改觀了。這是山東人士，繼孔孟之後，對於學術文化方面的又一重大貢獻。

以上所說，都是人們所熟知的史事。現在所要談的，是晚清時代山東人士在金石學方面的貢

獻。這，在學術方面，也有它重大的價值；但，除了研究先秦學術的若干學者較爲熟悉之外，一般人士是很少知道的。本文就專在這方面，作一番簡略的介紹。不過，這裏所謂金石，是廣義的；舉凡陶器、磚瓦、封泥，乃至於甲骨文等，都包括在內。這是應該首先聲明的。

在晚清時代，山東人士對於金石的愛好，似乎成了一種風氣；而首先以收藏及傳佈這門學問著名的，當推諸城的劉喜海。喜海，字燕庭，是太子少保、戶部尙書劉鐶之的兒子，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劉墉的從孫。他是嘉慶二十一年的舉人，累官至浙江布政使。他既是書香世家，又是累代仕官，所以收藏的金石，甚爲豐富。記載他收藏鐘鼎彝器的書，有嘉蔭簃藏器目（見靈鶼閣叢書）；傳刻他所收藏之鐘鼎彝器的書，則有劉氏自編的淸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卷，和陳介祺編的東武劉氏款識一卷。他編刻的其他金石書籍，則有金石苑六卷，長安獲古編二卷，海東金石存考一卷，海東金石苑八卷，和嘉蔭簃論泉截句二卷（其子虡采等注）。另有古泉苑精拓本十餘册，沒有印行，稿本曾藏在濰縣陳家，現在是否還在人間，就不得而知了。

收藏金石最富，鑑別最精，傳佈拓本又最廣的，是濰縣的陳介祺。介祺，字壽卿，號簠齋。他的父親官俊，官至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他是道光二十五年的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他的性情不樂於作官，因而請假回家居住。當咸豐十一年捻匪竄到濰縣時，他自出巨款，辦民團，因而保護了濰城。光緒二年，濰縣大饑，他又設立粥廠，賙濟飢民。所以他在地方上，有崇高的德望。

簠齋的收藏，幾乎各類都有：鐘鼎彝器、鏡鑑、璽印、錢幣、陶器、封泥等，既多且精。重器如最著名的毛公鼎（現藏外雙溪中山博物院）、十鐘（楚公鐘、井人鐘等），皆經他收藏過。

他收藏的璽印、和有銘文的陶器更多：璽印在萬件以上，所以他收藏璽印的地方，叫做萬印樓。有文字的陶器和陶器殘片，估計可能也在萬件左右。他鑑別古器物之精，當時國內的收藏家，沒有人不佩服他。他又善於剔除銘文中的土銹，精於傳拓；著有傳古別錄一書，專門敍述保護古器和傳拓銘文的方法。葉昌熾曾經說他：「集金石大成；卽旃墨裝褾之事，亦無美弗臻，洵爲古今所罕覯」（見簠齋藏古目陳文會跋）。確乎不是溢美之辭。

簠齋關於經學的著作，有易、書、詩、禮記、左傳、大學、中庸等經的訓釋，和詩經論文，但都沒有印行。關於金石方面的書籍，計有簠齋藏器目一卷，簠齋藏古目三册，簠齋金石文考釋一卷，簠齋吉金錄八卷，簠齋所輯金文二十册（未印行），簠齋藏鏡二卷，簠齋藏陶百餘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拓本，未印行），十鐘山房印舉十二册，簠齋尺牘十二册，陳簠齋文筆記（一卷）等。這些書，有的是陳氏自著或自編的，有的是別人輯編的。從這些書籍看來，可見簠齋在金石學方面的貢獻了。

以考證古錢幣著名的，是利津的李佐賢。佐賢，字竹朋，道光十五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後來做過福建汀州府知府。他也是喜歡收藏古器物的人，靈鶼閣叢書中有石泉書屋藏器目一卷，所記載的就是他所收藏的古物；他並且著有石泉書屋金石題跋一卷。但他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是他的古泉滙一書。這書有六十四卷，後來又和鮑康合編了續泉滙十四卷。他這二部書共收了古錢幣六千多品，每一品都繪有詳圖，並加以考證。搜羅之富，鑑別之精，不但前無古人；卽到現代爲止，似乎還沒有能超過它的。

海豐的吳式芬，則以編刻攈古錄和考證封泥著名。式芬，字子苾，道光十五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浙江學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官職。他收藏的古器物，見於雙虞壺齋藏器目（一卷）。他收藏的古印也不少，有雙虞壺齋印存八卷（鈐印本）行世。他編刻的攈古錄二十卷，著錄金石目錄，多達一萬八千餘種；古今金石目錄之書，沒有比它更完備的。他又編刻攈古錄金文三卷，摹刻古代銅器的銘文，多而且精；每一銘文後面，並附列各家的考證。直到現在，研究金文的人，還不能不參考它。但他的功力所萃，尤其在封泥考略一書。原來，古代的圖書，多用竹簡寫成；古代的公文，則多用木簡（木質長條薄片）來寫，這木片叫做牘。漢代的制度，天子的詔令，用一尺一寸長的牘；一般的公文，用一尺的牘。後人把信札叫做尺牘，就是由此得名。一件公事，經常需要好多片牘；送達公事的時候，就必須用繩子把若干片牘捆紮起來。而公文又多半是機密性的，因而捆紮公牘時，在繩子打結的地方，用膠泥封牢，趁膠泥還沒乾的時候，鈐上發出機關的印信，叫做泥封；這正是和現在用火漆封信件的情形相似。收受公文的機關，驗明泥封沒錯，就知道公文的內容沒被洩露。這些鈐有機關印信的膠泥，就叫做封泥。封泥，在陳簠齋和吳子苾以前，從來沒有專書著錄過。到了吳子苾，才和簠齋合編了封泥考略十卷，著錄封泥的印文，並加以考證；於是這部書就成了這門學科的開山之作。

近七十年來，我國發現的古代文物，最重要的是甲骨文；而第一個發現甲骨上面所刻的是古文字的，乃是福山的王懿榮。懿榮，字廉生，光緒六年進士，做過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等官職。拳民之亂，他奉派作團練大臣。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八國聯

軍進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走，他決意自殺，先吞下了錢幣，又吃下毒藥，都沒有死；最後乃投井自盡。他的夫人謝氏，和他的長子婦張氏，同時殉難。一門忠烈，人們一提到他時，都肅然起敬。

他之發現甲骨文，乃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據說，光緒二十五年的某月某日，他家裏有人生病，在北京（那時不叫做北平）菜市口達仁堂買藥，其中有一味藥叫做龍骨。當他檢查各包藥物的時候，發現「龍骨」上面有刻劃的痕跡；經過仔細的察看，他認定那些痕跡是古代的文字。他於是託了濰縣的古董商人，打聽這「龍骨」的來源，知是從河南來的。他就開始出高價收買。到他死難時，已收買了一千多片，共化掉三千多兩銀子。由於他的收購，才提醒了金石家們的注意，也爭相購藏，因而蔚成了風氣。由認字而研究，七十多年以來，甲骨文已成了顯學；而王氏這一功績，將是永傳不朽的。他殉難後，所藏的有文字甲骨，大部分歸了劉鐵雲（即作老殘遊記的劉鶚）。關於甲骨文的第一部書——鐵雲藏龜，其中的資料，就有一部分是王氏的舊藏品。

此外，如日照的丁麟年，著有移林館吉金圖識一卷，濰縣的王石經，編有古印偶存二十册；同邑的高慶齡，編有齊魯古印攈四卷，續一卷；又同邑的趙允中，編有印揭八册；魚臺的馬邦玉，編有漢碑錄文四卷；諸城的尹彭壽，編有石鼓文滙一卷；黃縣的淳于鴻恩，著有漢碑經義輯略二卷；高唐的田士懿，編有山左漢魏六朝貞石目一卷，續一卷再續一卷；曲阜的孔昭薰，編有至聖林廟碑目一卷；同邑的孔祥霖，著有曲阜碑碣考四卷；濰縣的高鴻裁，編有上匋室專瓦文攈十册（計磚二百三十種，瓦二百六十種，陶器三十六種，都是高氏收藏的。此書係拓本，抗戰前

藏於燕京大學圖書館）。這些學人，在金石學方面，雖然都不如上舉劉、陳、李、吳、王諸氏貢獻之大；但，人數如此衆多，也可見晚清時代山東人士從事金石學的風氣之盛了。

也許有人會問：金石器物，不過是古董，供人清玩而已；在學術文化方面，究竟有什麼價值？這可以分作以下幾點來說：

㈠關於文字學方面的：二千年來，講文字學的，都根據許慎的說文解字。但說文所載的是小篆，而小篆是秦始皇時代才制定，乃是就大篆省改而成的。經過改定而後，許多文字，已經失掉原形。許慎根據已失掉了原形的小篆，來推究造字的本義，自然難免許多錯誤。先秦古器物的款識，都是沒改小篆以前的文字（尤其是甲骨文，時代更早）；有了這些文字，可以糾正許君錯誤的地方很多。

㈡關於經學方面的：由於比較研究的資料不够，以致從漢代以來，說經的人對於經文有很多誤解。自從古器物大量出土，金文被學者注意利用之後，就有不少人利用這些資料，來糾正古人的錯誤。譬如尙書大誥等篇的「寧王」、「寧武」、「前寧人」等辭，歷代的經學家，都把寧字講成「安」的意思，以致各文句都無法講通。到了吳淸卿（大澂），才由於金文中的「文」字和「寧」字相似，從而證明上述各寧字，乃是文字之誤。這麼一來，「寧王」就是「文王」，「寧武」就是「文武」（文王、武王），「前寧人」就是「前文人」。於是這些句子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㈢關於史學方面的：古器物銘文中所載的史事和典章制度，可以糾正和補充傳統古史說的地

方很多；甲骨文在這方面的貢獻，尤其重大，它訂正了史記所載殷先公的次第（如：史記殷本紀中的微——即上甲、報丁、報乙、報丙，據甲骨文應該作上甲、報乙、報丙、報丁。）；它也訂正了史記若干殷王的廟號之誤（如史記的庚丁，應作康丁；史記的大丁，應作文丁等。）；它記載了古書中從來沒記載過的戰爭、祭祀、狩獵，以及關於方國、農業……等資料；有了這些資料，不但塡補了殷史的若干空白，甚至幾乎使全部殷史爲之改觀。其關係之大，可以想見。至於印璽、封泥、陶器的銘文等，可以補充古史所載的職官和地理之缺；錢幣可以考證古代經濟和貨幣的情形，也都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資料。

㈣關於美術方面的，也是就屬於「清玩」這一方面的。在一般人心目中，這些物事，只不過供有錢有閒的人清玩，至多也不過可以怡情悅性而已。殊不知卽在這一方面，也有它重大的意義。因爲美術品，可以表現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文化水準。譬如我們見了殷代的石刻和象牙雕刻，殷代和西周時代的靑銅彝器，面對着這些距今三千年前後的古物，看見它們鑄造之精、雕鏤之巧，不僅可以使我們發思古之幽情，更可以使人們增長了傾慕自己民族文化的情緒，因而加強了人們愛護自己民族的力量。如此說來，豈曰小補之哉！

說到這裏，讓我再附一段贅言：照上文看來，孔子、孟子，這兩位聖人不必談了；當秦火之後到漢代初年，經學不絕如縷之時，由於我們鄉先賢的傳經，使我國文化的命脈——經學，才又繼續流傳下來。淸代晚年，在金石之學方面，我們的鄉先賢又有那麼輝煌的成績。當今赤匪正在瘋狂地毁滅我固有文化，我政府正在積極地提倡復興中華文化的時候，我們山東人士，也應該振

臂而起，在學術文化方面貢獻一些力量了。

當然，一談到學術研究，首先要解決經費問題。近年來有識之士，已經紛紛慨解義囊，捐助給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作爲學術文化獎金。盡人皆知的嘉新水泥公司，它捐款之多，發揮效力之大，不必說了；較小數額的獎金，單是設在臺灣大學的，就有二百種上下之多（多是鼓勵學生從事研究工作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二百種上下的獎學金，沒有一種是山東人捐助的。據我所聞，山東籍人士，不乏多財好義的工商界領袖，他們也很願意在文教方面貢獻一些力量。只是沒有人提倡，也沒有人替他們計劃。以筆者的愚見，他們似乎可以捐出若干款項，交給具有規模的大學，作爲研究經學、小學、金石學、乃至於山東文獻等方面的獎助金。這樣，不僅在復興中華文化方面盡了力量，也不僅繼承了鄉先賢努力於學術文化的輝光；而且捐款人的大名，也將永垂不朽了。

原載「春秋」，九卷五期（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一日），頁四——六

木屐

十多年前，臺灣剛剛光復；那時候的臺籍同胞，還大多數穿着木屐。現在，在都市裏，着木屐的人雖已少見；但鄉下仍然風行着。從大陸上初到臺灣的人們，——除了兩廣和福建的人士之外，幾乎沒有人不認爲這是日本人所遺留下的風俗。其實，木屐乃是我國的「國粹」，而不是舶來品。到過日本的人，必能感到在我國久已失傳的風俗和器物，而在日本還被保存着。由於木屐在我國淵源之古，和古代日本傳播我國的風俗器用之廣泛看來，可知日本人之穿着木屐，必然是承襲我國的文化。「禮失而求諸野」。這在臺灣和日本今天還風行的木屐，雖然在中原已經絕跡，卻是地道的大漢衣冠哩！

木屐在我國創始於何時，雖然沒有確切的記載。但自先秦以來即已有之，是毫無問題的。太平御覽（卷六九八）引異苑說：

介子推辭祿隱跡，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製屐。每懷割股之功，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將始於此。

同書同卷又引論語隱義注說：

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如果這兩條記載所說的事可信，那麼，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木屐了。不過，異苑是劉宋時劉敬叔作的，論語隱義注是蕭梁時代的作品。這兩部書的著成時代，都去春秋太遠。我們只能把它們所說的這些故事，當作一種傳說看待，而不能便把它們當作信史。

莊子天下篇論學術源流，還沒有漢人的氣味。梁任公說這篇書的著成時代，當在戰國末年。這說法是可信的。天下篇裏，曾有這樣的話語：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屐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爲極。

經典釋文引李注說：「木曰屐，麻曰蹻。」又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三蒼說：「屐，木屩也。」可見屐就是木屐；它至遲在戰國末年便已行世了。

此外南齊書（卷二十一）文惠太子傳裏，還有這樣的記載：

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

這事又見於南史王僧虔傳。而南史把「屐」改爲「履」，恐怕只是隨便臆改，而非別有根據的。這相傳的楚王塚，當地人以爲是楚昭王墓。雖然同治十二年所修的襄陽縣志，已經辨明此墓不屬於楚昭王。但和玉屐同時出土的，還有古文（科斗）簡書考工記。可知，它是先秦的墓葬無疑。那時既有玉屐，則木屐必已流行，也是毫無疑義的。

由於上述的證據，我們可以說：至遲在兩千二百年前(這時，日本的歷史，還在傳說時代。)我國已有人穿着木屐了。

自漢代以下，關於木屐的文獻就多了。但從許多記載中看來，知道木屐乃是一種儉樸的便鞋，而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那情形，也正和現在臺灣的情形相似。太平御覽（卷六九八）引東觀漢記說：

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昇于華轂。

後漢書戴良傳：

良五女並賢，籍有求姻，輙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

說文解字義證引（當是據類書轉引）義熙起居注說：

兼黃明郎徐應禎，出爲散騎，著屐出省閣，有司奏免官。

南齊書（卷三十四）虞玩之傳：

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時爲少府）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蒵斷以芒接之。問曰：「卿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從以上的記載裏，可知木屐只是燕居時的便鞋。用來嫁女，便顯得寒酸。着入公堂，便有被免官的可能。

至於木屐的形狀，據搜神記（卷七）說：「婦人圓頭，男子方頭。」晉書（卷二十七）五行志也說：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太康初，婦人屐乃方頭，與男無別。

孔叢子（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

孔叢子是王肅作的僞書，它所說子高著方屐見平原君的故事，雖未必可信；但可以證知三國時代的男子是穿着方屐的。這也可以替搜神記和晉書五行志的話作一個旁證。古代的木屐和現在一樣是有齒的。晉書（卷七十九）謝安傳說：

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不過，臺灣現在的木屐，屐面和屐齒，是用一塊整個的木料剜削而成的；而古代的木屐，則是另作屐齒，而以枘鑿的辦法裝在屐面上的。因而，古代的屐齒，可以任意取下，也可以任意裝上。所以南史謝靈運傳說：

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而安裝屐齒的鑿孔，在早期是透過齒面的；到泰元（晉武帝）時代，才不再透過齒面。太平御覽（卷六九八）引晉中興徵祥說云：

> 舊爲屐者，齒皆達，名曰露卯。泰元中，忽不復徹，名陰卯。亦服妖也。

至於屐齒的形狀，前齒大約也是上寬下銳的；這由王述的故事，可以推知。晉書（卷七十五）王述傳說：

> 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壞而吐之。

用屐齒踏雞子而不得，可見屐齒的著地面是較薄的，所以不容易踏着。但大概只有前齒如此；因爲後齒也薄而銳的話，走路就不方便了。

但是，古代的木屐，也有平底無齒的。晉書（卷一）宣帝紀說：

> 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輭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

這平底木屐是有特別作用的。至於那時一般的人們，是否也有着平底木屐的，就不得而知了。（石勒曾作鐵屐，以釘爲齒，爲兵士爬城之用。因非一般俗尚，此不具述。）

木屐既是一種儉樸的服着物，在古代，一般的人們似乎都不加油漆和彩畫。後漢書五行志說：

>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人始嫁，至作漆畫，五彩爲系：此服妖也。

後漢書此說，當是採自風俗通。作漆畫，以五彩爲系，至被斥爲服妖。那麼，一般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在晉代，木屐有打蠟的。晉書（卷四十九）阮孚傳：

孚性好屐。……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

世說新語也載此事，「幾量」作「幾兩」，卽「幾雙」之意。上述兩書記載此事的目的，是爲了阮孚有「自己蠟屐」的雅興，而不是強調「蠟屐」的罕見。可見屐上打蠟，在晉代已不是一件頂罕見的事了。

在臺灣，有時看到特別寬大的木屐；這在日本是比較常見的。此種大屐，也是於古有徵的。北史熊安生傳說：

宗道暉好着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

拜於屐上，是跪在地面，雙手不拊地而拊在木屐上。其屐之大，可想而知了。

唐宋時代，木屐仍然盛行。見於詩人吟咏的，其材料之多，不勝枚舉。而唐時的屐齒，有用金屬做的。李太白浣紗石上女詩：

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這在木屐史上，是值得注意的文獻。而周密齊東野語（卷二十、隱語條）所載的木屐隱語：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柔則沒齒無怨。

更是一則有趣的談助。

到了明代，在北方，木屐似乎已不大通行了。留青日札（卷二）說：

今廣東婦女，雖晴天白晝，亦穿木屐。

從這種口氣看來，可知田藝蘅所到到過的別的地方，除了廣東以外，似乎只有雨天才有人着木屐

了。

現在，據筆者所知，除了兩廣和福建、臺灣之外，其他各省，似乎都已沒有穿着木屐的習慣。而臺灣同胞，大多數是從福建和廣東遷徙而來的，所以還保持着這種風俗。

但，也許有人會說：「着木屐雖是我國的古俗；但臺灣同胞之着木屐，未必便是從大陸上帶來的習慣，它很可能還是受了日本人的影響。」關於這點，筆者可以斷然的說，這種推想是不對的。因爲胡鐵花先生（胡適之先生的父親）在代理臺東知州的時候，曾作過八首和王蔀畇孝廉臺灣秋興詩（見臺灣日記卷四）。其第二首的開頭兩句是：

犬聲如豹吠村尨，蹴踏街頭木屐雙。

這詩作於淸光緒十九年；那時日本還沒有佔據臺灣。可見木屐之在臺灣，確實是「故家遺俗」，而不是受了外來的影響。

那麼，這不登大雅之堂的木屐，如果推究起它的源流，在文化傳播史上，它乃是一個重要的物證。如此說來，當你聽到屐聲橐橐，或看到屐痕處處的時候，也許會油然的發起了思古之幽情哩！

原載「大陸雜誌」，二十一卷十期（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頁一——三



瑚璉質疑

一、舊說簡述

論語公冶長篇：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集解引包咸注說：

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之貴者。

朱子集註說：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朱子之說，顯然是根據的包咸註，而又加添了「飾以玉」和「華美」等字樣。

包氏的註解，乃是根據禮記的明堂位篇。明堂位說：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連，唐石經作璉；疑因論語而改），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包氏之註，當本乎此。但，㈠明堂位說夏曰連，殷曰瑚；而包氏則說夏曰瑚，殷曰璉。㈡明堂位只說周代的簋；包氏卻加了一個簠字。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關於第㈠點，鄭康成註論語（見明堂位正義引），賈、服、杜等註左傳（哀公十一年），也都和包氏之說相同。邢氏的論語疏，說他們：「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倪士毅說：「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四書大全引）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則以爲是漢人所據的戴記不同。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也懷疑是今本明堂位之誤。按：禮記的漢本，我們已不能見到；現在所能見的最古之本——唐石經，則和今本無異。經典釋文中，也沒提到這裏有異文。可見傳本不同之說的可能性不大。而論語是人人熟讀的書，包咸註又是東漢末葉以前最有勢力的註解。賈逵的年齡，比包咸小了三十一歲，服虔、鄭玄、杜預，更遠在賈逵之後。由此說來，賈、服、鄭、杜等承包咸之說的可能性很大。大概包咸註雖是根據明堂位，因爲夏在前，殷在後；而論語的瑚在前，璉在後，於是一時大意，張冠李戴。倪氏之說是比較可信的。

關於第㈡點，簠和簋是兩種器物。明堂位所說的虞敦、夏連、殷瑚、周簋，只是每代各舉了一種類的物事；包氏加上一個簠字，以周代的兩種東西，來比擬虞、夏、殷的一種器物，顯然和明堂位的原意不合。因爲簠和簋雖同是盛黍稷之器；而實際上瑚就是簠（說詳下文），所以簋上就不能再加簠字了。

歷來解釋瑚璉二字的人，絕大多數都不出上述包、朱兩家的範圍。只有段玉裁的意見，與眾不同。說文裏有槤字而沒有璉字。許君註槤字說：「瑚槤也。」段氏的註解說：

璉，當依許從木。據明堂位音義，本作四連。周禮、管子，以連爲輦。韓勑禮器碑：「胡輦器用。」卽胡連也。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疑胡輦皆取車爲名。

他是把瑚璉讀作胡輦，以爲胡和輦都是車名。這是一個最特別的解釋。

二、明堂位中的四器

歷代註解論語「瑚璉」二字的人，旣多本於包氏註，而包註又根據明堂位。因此，在討論論語的「瑚璉」是否卽明堂位的「連」「瑚」之前；關於明堂位的敦、連、瑚、簋四器，有併合討論的必要。

鄭康成註解明堂位，關於這四種器物，他說：「皆黍稷器，其制未聞。」但，他註儀禮少牢饋食禮：「凡設四敦，皆南首」句，郤說：「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象龜形。」註周禮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句，又說：「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則是他於敦簠簋三器的形制，也頗有所聞。只是他所說的並不完全正確就是了。

自宋以來，古器物出土的日多，著錄考證之書，漸漸出現；許多人們對於古物的知識，也漸比漢唐人豐富。到現代，傳世的古器，已達五千件左右；於是人們對於古器的認識，也更爲精確。明堂位中的敦、瑚、簋三器，現在都知道它們的確實形制；只有「連」是什麼，至今還不能弄得清楚。現在分別說明於後。

敦，金文作錞。它的器和蓋都是半圓形的，合之成球狀。因爲像圓形的西瓜，所以俗叫作西瓜鼎。有兩耳的，有四耳的，也有無耳的。有三足的，也有無足的。耳和足都作環狀。但絕無飾象龜形的。聶崇義的三禮圖，把敦畫成高筒茶杯的樣子；又據上述鄭氏說，蓋上作成龜形。眞是謬以千里。這種器物，從春秋時代才有，到戰國時代還流行着。

瑚，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裏以爲就是簠；這是很正確的。簠的金文作𠤳、匩、𠥍等形，說文的古文作医。胡字，可能是𠤳字變成的；而又作医、作𠥍，可知簠、夫、胡聲音相通。哀公十一年左傳：「胡簋之事。」（潛夫論讚學篇也有此語）胡簋，就是簠簋。更是瑚即簠的顯明證據。簠是長方形的飯器，有蓋，四足；通常的有兩耳，但也有無耳的。鄭康成說它是方形，相差還不太遠。凌曙典故覈所引的三禮圖（不是聶崇義的三禮圖），說：「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不知是根據什麼說的。但，其誤則可以斷言。簠從西周晚期才有，流行到戰國時代。

簋字的金文作皀，宋人把它誤釋爲敦；因而把所有的簋，都稱爲敦。到了淸代晚年，錢玷作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時，才知道皀應釋爲𣪘；也就是簋字。簋是圓形器，有蓋。有兩耳的，有四耳的，也有無耳的。通常的是圈足，但也有三足或四足的。這種器物流行的期間很長久，從殷代直到戰國時代。

只有璉是怎樣的器物，現在還不知道。

由上述的情形看來，包氏所謂夏曰瑚、殷曰璉，固然和明堂位不合。而明堂位說虞敦、殷瑚，也同樣不合事實。因爲在虞、殷時代，敦和簠還沒出世。至於朱子「飾以玉」之說，更是因

陳祥道的禮書而誤；這點，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已經說過了。

三、論語裏的瑚璉究竟是什麼器物

洪氏隸釋（卷一）載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說：「脩造禮器，胡輦器用。」胡輦就是瑚璉，這是清代學者已經證明了的。漢孟郁脩堯廟碑，瑚字作𤫶。周禮地官鄉師之職：「與其輂輦。」鄭註說：「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足證連和輦二字相通。說文木部槤字下，許君說：「瑚槤也。」「可知瑚一作𤫶，又作胡；璉，一作槤，又作輦。也就是說，瑚璉二字都從玉旁，未必就是論語的原來面目；而瑚槤、𤫶璉、胡輦三者之中，也可能有一種符合了論語的原文。

假若明堂位的連瑚，就是論語的瑚璉，則明堂位就不應作連瑚，或論語不應該作瑚璉。而且，明堂位的瑚，既和敦、連、簋等黍稷之器並稱，則瑚必然是簠。在孔子的時代，簠簋二器正在流行，簠簋二字連用已成了習慣。假若瑚是黍稷之器的簠，則依照當時的習慣用法，論語應當說瑚簋，而不應說瑚璉。如果說璉不是黍稷之器，而另是一種別的器物，則它和瑚既不同類，就不合「汝器也」的原則。

從上述的情形看來，論語裏的瑚璉，似乎不是黍稷之器。

再從論語中所載與子貢有關的資料來看。孔子說：「君子不器」。這裏說子貢是「器」，乍看起來，似乎子貢還不到君子的程度。但，孔子因人施教；由於說話的場合不同，有時難免有不

完全一致的言論；這是應當注意的。譬如宓不齊的造詣，未必超過了子貢；而孔子卻說他：「君子哉若人！」又如管仲，孔子雖說他是器之小者；卻又讚美他「如其仁！如其仁！」由此看來，孔子雖說子貢是器，卻無礙於他的賢能。

子貢的聰明，雖不如顏淵。（他讚美顏淵能聞一知十；自己謙稱能聞一知二。）但孔子曾讚許他「可與言詩」，讚許他「方人」，讚許他善於「貨殖」；把列在「言語」之科，說他「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而且，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斯可謂之士矣。」這些話實際上也是讚美子貢。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記載看來，他勸齊停止伐魯一事，不但說動了陳成子，同時還說動了吳王，說動了越王，並且說動了晉君。這不但說明了他的語言天才，也可知他眞能通達時務，能够任重致遠。

孔子對季康子之問，說「由也果」，「求也藝」；以爲他們都可以從政。對孟武伯之問，說：「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換句話說，這些人也都是宗廟之器；但各有其特長。而子貢的特長是「達」。如果把瑚璉解釋爲宗廟黍稷之器，則子路、冉有、公西華，也都可以比作瑚璉。如此說來，這個比喻，就不能表現出各人的特性，豈不是太籠統了？

因此，我以爲論語裏瑚璉的本字，可能是胡輦；是一種任重致遠的車子。段玉裁的意見，大致是可取的。輦，是天子和諸侯所乘的車，也是載重的大車，都是用人力挽行的。宣公十二年左傳：「丙辰，楚重至於邲。」杜註說：「重，輜重也。」孔氏正義說：

輜車，載物之車也。……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

周禮鄉師之職：「與其輂輦。」鄭註說：「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鄭氏並引司馬法說：

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

司馬法（同上鄭注引）又說：

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可見這種大車，由人挽行，既安穩，又可以載重致遠，且可以當作屏藩。把以達著稱、又能一出就足以保住魯國、而動齊吳越晉之兵的子貢當之，似乎是很恰當的。

戰國至西漢間人，喜歡談三代制度；但多根據傳說，常有誤處。明堂位所說虞曰敦，殷曰瑚，便是一例。前述段氏說文注所引司馬法，謂「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雖不敢說「余車」和「胡奴車」；眞是夏殷時代的車名；但可知古代確有以此爲名的車子。胡奴二字的合音仍是胡，胡奴是胡的長言，胡是胡奴的短言。那麼，胡奴車實際上就是胡車。胡是大的意思（見周書謚法、及廣雅釋詁），是形容詞。車可以用胡字來形容，載重的輦，自然也可以用胡字來形容。如此說來，韓勑碑的「胡輦」，必有所據，而所據又必是論話的一個別本。然則，張禹所沒採用的這一個別本，說不定正合論語的原文。也就是說，論語的瑚璉，可能是胡輦；是人挽的大車，而不是黍稷之器。段玉裁的意見很可取；只是他把胡字當作名詞，也說是一種車名，似乎不太適當。

以上所述，只是個人的猜想，不知有無是處。敬請方家賜正。

楊一峯先生

剛纔到聽屈先生講瑚璉，說「瑚」應是「胡」字，胡有「大」義。「璉」字採段玉裁說，認「璉」與「輦」通。瑚璉卽是「大輦」。眞是「聞所未聞」，新穎之至！

輦，據古說，車上裝載許多器物，用途甚廣。我們知道，子貢是一位聰明練達，遺大投艱的通材。孔子拿「輦」來形容他，倒有點近似。似乎比舊說謂子貢爲「宗廟貴器」還要切合。

只有一點懷疑，想要請教。卽胡有「大」義，比較少見，至少在論語中沒有見過。孔子不是不曾說過「大車」的，爲什麼不說是「大輦」，而說是「胡輦」呢？

再有左傳哀十一年載孔子答孔文子底話，說是「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胡與簠同韻通訓，則「胡簋」正是「簠簋」。「胡簋」如果是「簠簋」，「胡簋」卽不便再作「大的簋」解，更不好作「大的輦」解。究竟「胡」字作何解釋，似乎還有商量餘地。屈先生是當代有名的小學家，還希望對此再加說明！

敬答楊一峯先生

承楊先生惠予指教，本人非常感激。

「胡」作「大」解，見於周書的謚法篇和廣雅釋詁篇，本講稿已經提到。這在古代似乎並不是很罕見的意義。

至於說「璉」如果應作「輦」，則論語裏既有「大車」，這裏也應該說「大輦」、而不應該說「胡輦」。關

於此點，似乎也不能執一而論。因爲有些同義字，人們可以隨便用；如論語既說「殺雞」，又說「割雞」；既說車，又說輿等。也有些同意字，只可以用於此，而不宜用於彼。譬如沽酒市脯，雖然沽和市都是買的意思，但很少有人說沽脯。又如：水之大者曰大水，浪之大者曰巨浪；但很少有人說巨水。其他如碩果、岑樓之類，隨舉卽是。這些都是習慣用法，在文法上說，並沒有非如此不可的道理。胡輦之不作大輦，若就上舉的例證看來，似乎也不足異。

雖然如此，我並不是說「瑚璉」非講作大的輦不可。它可能還有更好的講法，這是本人所殷切地盼望着方家們指敎的。

末了，我再度誠懇地道謝楊先生樂於指敎的雅意。

原載「孔孟月刊」，五卷七期（民國五十六年三月），頁二五——二八

編者按：本文爲民國五十六年二月五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先生在孔孟學會第三十九次論語研究會之講稿。



「鄭冢古器圖考」

關葆謙著　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中華書局印行
線裝四册　定價國幣十元

民國十二年八月，新鄭南門內李氏園中，出土大批古物，由駐豫陸軍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主持，歸河南省方保存，當時編有新鄭出土古器圖志三編，但有圖錄，不著考證；其書印行無多，傳布未廣。關氏此書，卽就是次出土諸器物，繪其圖象，更著爲考證者也。

書凡十二卷，前十一卷爲圖考，末卷爲發見鄭冢源流記。著錄器物，除殘器六百七十一件，骨甲（非龜甲）三百四十五件外，計鐘及鼎鬲之屬各廿二器，甑鬲之屬十，錡鍑之屬三，尊彝之屬十八，敦簠之屬十四，盤洗之屬八，兵器之屬五，陶器之屬五，玉器之屬九，雜飾之屬八：都凡千一百餘品，所收不爲不富。惟有銘文者僅二器，其一鼎中款識，復漫蝕不可識，是可憾耳。

吾國考釋鐘鼎彝器之書，囊多從事於銘識之研討，而不措意於圖象之著錄。其兼著器形花

紋，若博古圖、考古圖、西清古鑑類者，直寥寥無幾。是書獨能注意於此，凡器形花紋之不同者，皆一一精繪爲圖，且詳其尺度，權其重量。雖圖繪未如椎搨及照像之眞，然作者之用力，亦至辛勤，此其可述者一也。凡所考證，必博稽羣書，詳其體制，正其名稱，而明其用途，如言鏞鎛之別，鼎鬲之辨，甑甗形制之不同，與盥盤盟盤冰盤之異用等，咸能參稽衆說，抒論允當。執是編以讀三禮，助益當不在少：此其可述者二也。

雖然，書中亦頗有可議。如言長短，則未注明所用係何尺度；語重量，亦未注明所用係何權衡。似此末節，而關係殊巨，此著錄方面之偶忽也。傳世金文字體，惟齊楚兩國，別具風格（許子妝簠，蓋染楚俗）。書中僅有之周王子方器銘文，字體秀長，風神散朗，似齊楚而不類王朝。作者乃以爲王子頮器。不惟字體未合，卽其釋頮之字，亦類「嬰」不類「頮」（王靜安謂係楚王子嬰齊器，以爲鄢陵之役，楚師宵遁，遺於鄭地者，蓋近是。）此考釋方面之未諦也。至於由一下顎骨之已有智齒，及琺瑯質尙未損壞，遂遽斷爲鄭厲公遺骸（該顎骨並非發掘時出土，而爲發掘後所拾得者。是否冢中物，尙難遽定）。則又失之證據太孤，而結論過早矣。

原載「圖書月刊」，一卷二期（民國三十年二月二十八日），頁四五——四六
以筆名「尺蠖」發表。


圖書文獻學



文物資料和圖書資料之關係

一般人稱呼文物資料，最常聽到的有兩個名詞：其一，叫做「古董」；另一，則叫做「文玩」。從這兩個名詞看來，在一般人心目中，這些物事，都不過是些高雅的陳設品，具有欣賞的價值，或昂貴的商品價值而已。

但，一些有識見的學者，則利用文物作爲學術研究的資料。而且，早在漢代就有人從事斯業了。許叔重的說文解字，收了很多的籀文。這些籀文，就是從當時出土的鼎彝中採錄的。用文物資料，從事考史工作，更早在西漢的宣帝時代已有。漢書郊祀志下說：

是時（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爲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于豳，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于豐鎬。由此言之，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

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廟也。……」

從這段記載看來，遠在二千年前，這位以「畫眉」和「五日京兆」著名的張敞，就已利用文物資料，作考證史事的工作了。

用古器物糾正經說，在南朝時代已有。梁書（卷五十）劉杳傳記載着一個故事，大意說：劉杳和沈約談起宗廟的犧尊，沈約說：「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劉杳說：「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靑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劉杳已利用出土的器物，糾正了鄭玄的臆說；可惜，宋人所作的三禮圖，依舊在尊彝的腹上，畫些鷄鳥虎蜼犧象之形，當作犧尊；以致到現代，還有不少談經學的人相信三禮圖之說。

也在南朝時代，已有專門記古器物的著作，現今還能見到的，則有梁陶宏景的刀劍錄，和陳虞荔的鼎錄。到了宋代，收錄金石等物，著成專書，成了一時的風氣。不但著錄器物，而且根據這些資料，來糾正經說、和史事記載的錯誤。歐陽修的集古錄跋尾，旣利用石刻，以證史記、後漢書、和三國志記載的不確實（詳下文）；呂大臨的考古圖，也能依據眞實器物的形狀，以明羣經中所載彝器的原貌，「於是一洗漢唐諸儒臆說之陋。」（見籀史「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六款識跋」）

元明兩代，在這方面沒有多大的貢獻；淸代乾隆以後，蒐集、傳佈、硏究古器物的風氣，又復興起來；而且這種風氣，越來越盛，到現在已達登峯造極的狀態。大抵在淸末以前，大家所重

視的，是古代的青銅器、石刻、玉器，以及有文字的陶器、錢幣、璽印等物；近幾十年來，由於考古學、民族學的興起，研究的範圍，愈來愈廣，蒐集的和發掘的文物，其種類之多，幾乎不可勝數了。

文物幾乎全部是原始資料，圖書大部分是傳述資料。在學術研究方面來說，原始資料自然遠勝於傳述資料；這是文物勝過圖書的地方。但，文物資料，很多是沒有文字的；有文字的，也多是簡略地記述某些特定的事項；而這些記載，則遠不如圖書資料之詳備：這是圖書勝過文物的地方。因此，文物和圖書，適足以相輔相成，而不可偏廢。

可惜的是以前雖已有不少學者，利用文物資料，創下了一些輝煌的成績；但直到現在，還有很多的學人，不肯、甚至於不知道利用文物資料，來從事研究工作；以致因循陳說，難有創見。同時又有些人，只固執着文物資料，而不肯、甚或沒有能力利用圖書資料；以致只能作報告式的文章，而不能有互證式的著作。本文的目的，就在舉出一些例證，來說明文物資料和圖書資料的相互關係，以見二者之所以相輔相成，而不可偏廢之故。

甲骨文資料與圖書資料

甲骨文的發現，是震驚學術界的一件大事。從發現到現在，才不過七十年，由於學者研究的結果，在文字學方面，已使向來被奉爲寶典的說文解字，黯然失色；在經學方面，已糾正了許多先儒的舊說；尤其在古史方面，使兩千多年來大家信而不疑的史記殷本紀之說，很多地方爲之改

觀。茲但就關於殷代帝王名號和世系的問題，略舉幾個例子如下：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王國維利用甲骨文資料和圖書資料互證，作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兩篇重要的文章（見觀堂集林）。在這兩篇文章裏，他利用甲骨文、山海經、楚辭的天問、呂氏春秋、漢書古今人表……等資料，證明了「王亥」確是殷代的先公。由於羅振玉在古文字學方面的造詣，認識了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等字，王氏從而證明了史記殷本紀、和漢書古今人表之誤。因爲史漢兩書所載這四代殷先公的次序，是：上甲、報丁、報乙、報丙；而甲骨文的次序，則是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他利用甲骨文和太平御覽（卷八十三）所引竹書紀年的資料，證明了殷中宗是祖乙，而不是大家公認的太戊；並且證明了祖乙是仲丁之子，而不是河亶甲之子，或河亶甲之弟。此外，關於殷代帝王的世系，他根據甲骨文資料，並且證明了凡是史記殷本紀和漢書古今人表不同的地方，都是古今人表之誤。他這些重要的發現，自然不能不使學術界吃驚。

此後，王氏和後來的甲骨學者研究的結果，對於殷代史事的糾正和補充的地方，不勝枚舉。單就帝王的名號和世次來說，如：

仲壬　甲骨文作南壬。

雍己　甲骨文作㗊己；他的世次，是在大戊之後，仲丁之前。

河亶甲　甲骨文作戔甲。

沃甲　甲骨文作羌甲。

陽甲　甲骨文作彖甲。
庚丁　甲骨文作康丁。
大丁　或作文丁，甲骨文作文武丁。

單就殷代帝王的名號和世次來說，甲骨文可以糾正圖書之誤的，就有那麼多；其餘如方國、祭祀、曆法、農業、漁獵、官制、戰爭……，足以糾正和補充圖書資料的地方很多，這裏姑且不論。由於上舉的例子可以知道：如果不利用甲骨卜辭的資料，固然不可能有這麼多的驚人的創獲；但，如果不熟習圖書資料，那就連甲骨卜辭的文字，都不能認識，自然更無法利用這些資料去作考證的工作了。

青銅器資料與圖書資料

阮文達說：鐘鼎彝器的重要，和九經相同[1]。清代中葉的人，已經有這樣的見解，眞是難能可貴。宋人著錄鐘鼎彝器的書，如考古圖、博古圖、薛氏鐘鼎款識……等，共收了約六百件彝器。這些彝器的實物，雖然絕大多數都已經失傳了；但，由於這些書籍的存在，我們大致還可以當作實物的資料來利用[2]。現在傳世的有文字的青銅器，約計有五千件左右，既有博物館陳列這些器物，又有精良的印刷術把它們印成圖錄，對於從事學術工作的人來說，眞是十分方便。因

1　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商周銅器說上篇。
2　宋代的金文書，後世摹刻的多不精緻；有石刻本的，也已失傳。故說大致可作實物資料利用。

而，從晚清以來，利用這些器物資料，從事經學、文字學、和史學等考證的人們，也有很多重要的貢獻。現在且舉兩個例子如次：

譬如尚書的康誥篇，左傳（定公四年）、書序和史記，都說是周成王平定了武庚之亂以後，把康叔封在殷的舊地，建立了衞國；這篇康誥，就是成王封康叔於衞時的誥辭。歷代的經師們，大都相信這個說法。在清末以前，只有宋代的胡寅[3]、和蔡沈[4]，懷疑它是周武王誥康叔的書。但，康叔封於衞時，武王早已死了，怎能再誥康叔？所以一般人很少相信胡蔡兩氏的說法。可是康誥裏誥康叔的人，既說：「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自稱「寡兄」。成王是康叔的侄兒，即使他做了君王，也絕不應該爬高輩分，把叔父叫做弟弟、叫做小子，而自己冒充大哥！說經的人，以爲這是周公的口氣，所以他可以稱康叔爲弟。但，康誥明明地說「王若曰」；周公雖然攝政，當時只把他叫做「公」，而不稱他爲「王」；這情形在各篇周誥的資料中，表現得很清楚。因此，這篇西周初年的重要文獻，究竟是何王封康叔於何地而作，便成了二千多年來不能解決的問題。

傳世的青銅器有「康侯鼎」，它的銘文只有六個字，就是「康侯丯作寶障」。清末的金文學家劉心源，認識了丯（丰）就是「封」字，是康叔的名子。他又根據宋忠註解世本的說法，知道康叔初封於康，後來才徙封於衞。因爲他曾被封於康，所以稱爲康侯[5]。顧頡剛由於劉氏這一說

3 見簡朝亮的尚書集註述疏（卷十五）引。
4 見蔡氏的書經集傳。
5 見劉氏的奇觚室吉金文述。

的啟示，曾說康誥是武王誥康叔之書，其事當在康叔封康之後；並且證明周易晉卦卦辭的康侯，也就是康叔[6]。我在作尙書釋義時，由於兩家的啟示，從而悟到康誥乃是周武王封康叔於康時的誥辭，並非在封於康之後。因爲是封於康，所以標題叫做康誥；武王是康叔的哥哥，所以誥辭中稱康叔封爲弟，而自稱爲寡兄。這樣，前面所說的那些矛盾，就都不存在了。這一解說如果能够成立，則應歸功於劉氏以古器物資料和圖書資料互證的成績。

宋代以來，著錄鐘鼎彝器的圖書，所記載的器物，常見敦、彝、簋等名稱。在這些書裏，都是把圓形、兩耳、圈足，用以盛黍稷之類的銅器，叫做敦。和「敦」形相似，但沒有兩耳的，叫做彝。和「敦」形略似，但器形是橢圓的，叫做簋。到清代晚年，陳介祺才知道「彝」是彝器的通名[7]；因而在簠齋藏器目中，把以前所謂彝的器物，都改稱爲敦。所以把這器名叫做敦的緣故，是因爲原器的銘文，說這器物物是𣪕。此字和𣪘（卽敦）字相似，所以自宋以來就把它隸定爲敦字。但，𣪕字從皀從殳，而敦字原作𣪊，隸書作𣪘，兩字左右的偏旁都不相同。所以稍早於陳介祺的錢坫，在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中，就證明𣪕字的楷書，應寫作𣪕，也就是簋字。自然，這一類的器物，也應該叫做簋，而不應稱爲敦。後來黃紹箕的說𣪕（見翠墨園語），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三二三頁），更加以疏通證明，於是成了定論。而以前所謂簋的，實際上是個盨字；這點，容氏通考裏，也已經予以證明了（見三六〇頁）。

6 見顧氏所作「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載古史辨第三冊。
7 見簠齋尺牘卷十二，與吳雲書。

說文：「簠，黍稷方器也。」詩秦風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簠。」釋文說：「內方外圓曰簠，以盛黍稷。」現在簠的實物既經證明，可見從許叔重以來，就都把簠的形狀說錯了。

至於眞正的敦，它的本字當作錞，是一種器身和器蓋的大小相同，器蓋都有三足，器蓋相合即成球狀的銅器（如陳侯午敦等）；它和𣪘的形狀，大不相同。由上舉的例子看來，更可以看出文物資料和圖書資料相輔相成的情形。

石刻資料和圖書資料

利用石刻資料，來糾正和補充圖書資料，宋以來的學者，在這方面所作的貢獻很多。清代李遇孫的金石學錄（卷三）說：「葉夢得取古碑所載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可惜葉氏這書，現在已經失傳。但從歐陽修的集古錄跋尾以後，以迄現在，用石刻資料和圖書互證，而有所創獲的著作，除了已經失傳的金石類考外，還有很多。現在先以歐陽修跋魏受禪碑爲例，以見石刻和圖書的相互關係。

宋代出土的詛楚文，是秦王禱告神靈詛咒楚王的石刻。所詛咒的楚王，名子叫熊相。但，史記楚世家所載楚王的名子，沒有叫做相的。歐陽修的集古錄跋尾，認爲詛楚文的「熊相」，不應該錯誤。而史記說楚頃襄王名橫，楚懷王名槐；歐氏認爲這「橫」「槐」二字，必定有一個是「相」的誤字[8]。

8 集古錄跋尾（卷一），以爲「相」是「橫」（楚頃襄王名）之誤；但，集古錄別本，則以爲「相」是「槐」（楚懷王名）之誤。

又：後漢書的獻帝紀，說魏王（曹丕）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三國志的魏志，則說這年十一月庚午，魏王升壇受禪，癸酉奉帝爲山陽公。而魏受禪碑，卻說：「十月辛未，受禪於漢。」歐氏的集古錄跋尾，參考各家的說法，證明了魏王受禪的日期，應當是十月二十九日辛未，後漢書和魏志都錯誤了。

現在，再以我個人的經驗爲例：我曾用宋代和近代出土的漢石經殘字資料，作過兩本小書，一本是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在周易方面，證知漢石經的經文，是用的梁丘賀本。它分爲十二篇，和呂祖謙復原的古本相同。用來和今本比較，今本多了「彖曰」、「象曰」、「文言曰」等一千零二十個字；此外，今本多了大約七十個字，脫掉了十多個字；章節的次序，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尙書方面，知道漢石經是用的小夏后本。經文和後世傳本不同的地方很多；單就盤庚篇來說，和唐石經互校的結果，證知唐石經有衍文十六個字，有脫文四個字，另有不同的字二十一個。唐石經本和今本大致相同；尙書本來就難讀，又加上這麼多的衍文、脫文和異文，自然就增加了更多的困難。

以上所舉的例子雖然不多，但也可見石刻資料和圖書資料的相互關係了。

其他文物資料和圖書資料

文物資料的類別，多得不能勝數；而這些資料，絕大多數都可以和圖書互證。前文所述的三類，只是資料最豐富，而又爲學者最常用的物事。以下再就甲骨、銅器、和石刻以外的文物，略

舉幾個例子。

璣組　尚書禹貢說荆州的貢物，有「厥篚玄纁璣組」。傳統的解釋，說璣是不圓的珍珠，組是佩帶玉器等物用的絲繩，是兩種東西。胡渭的禹貢錐指，和江聲的尚書集注音疏，雖然都根據周禮，說璣組是貫串着珍珠的絲繩，但卻很少人採用他們的說法。王氏的經義述聞，以爲依照禮書的規定，篚中所盛的，只限於絲帛一類的東西，並不盛玉石等物；因而把璣字讀爲「曁」，說禹貢這句話，應該是「厥篚玄纁曁組」。這個說法，博得不少人的信從；我在作尚書釋義時，也曾採用了它。

但，由近代研究民族學的人，調查所得的資料看來，臺灣和東南亞許多地方的山地民族，大都有作爲裝飾用的貝珠串，就是用細繩把貝珠貫串起來的東西；張光直先生，認爲這就是禹貢的璣組[9]。有了這些實物的證據，可知胡、江兩氏之說，確實可信；而經義述聞之說，則是智者千慮之一失了。

織貝　揚州的貢物，又有「織貝」。鄭康成說織貝就是詩經小雅巷伯篇所說的「貝錦」[10]，是織有貝殼形花紋的絲織品。一般的解釋，則認爲織是布帛之類，貝就是貝殼，織貝是兩種東西。甚至有人說織貝是織的吉貝[11]。但，臺灣和東南亞的山地民旅，有些工藝品，是用絲線穿貫

9　見張氏所著「臺灣土著貝珠文化叢及其起源與傳播」，載中國民族學報第二期。
10　見孔氏尚書正義禹貢篇所引。
11　見東坡書傳，蔡沈書集傳略從之。

上細小的貝珠，然後織成衣服或裙子等物。日本的尾崎秀眞，以爲這就是禹貢的織貝[12]，那顯然是確當的解釋。

由於上述兩種文物的實證，不但可以解決了兩千年來禹貢中沒能解決的問題；而且由於文物和圖書的互證，也顯示了這兩件物事在文化傳播方面的重要意義。

清明上河圖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一幅人所共知的名畫。但，這畫的摹本，卻非常之多，以致眞僞難辨。臺北故宮博物院裏，藏有一幅清明易簡圖，有人曾經撰文，說它是張擇端的親筆。但，經過翁同文先生鑒定之後，證明它乃是明人的手迹。因爲畫中的榜額和招牌，有「奎章閣」和「新安程氏……」等字樣。奎章閣是元代才有的；而新安程氏在商界著名，乃是明代以來的事。張擇端是宋人，怎能預畫後代的事物？卽此一事，就可以說明，對於繪畫的鑑別，除了繪畫本身的風格之外，還須具有豐富的圖書知識。

案　「舉案齊眉」，孟光的這個著名的故事，至今還膾炙人口。一般人都認爲孟光所舉的案，就是類似桌子的東西。但，孟光雖然「力舉石臼」[13]，而給她丈夫送飯時，又何至於把桌案舉到齊眉，作這種毫無意義的動作呢？宋代的呂少衞，覺察到一般之說的不合理，於是把案解釋成「椀」[14]。但，這一解釋，實在找不到證據[15]。到了明代的陳繼儒，和淸代的戴震，才都知道

---

12 見注9張文所引。

13 見後漢書逸民傳。

14 見曾肇的耳目志。是書今無傳本，此據康熙字典引。

15 陳繼儒的枕談，和我作的「案」（見書傭論學集），曾都評論過。

這案字並不是桌案，也不是椀，而是送飯用的托盤。

陳繼儒的枕談，根據楚漢春秋：「漢王賜臣玉案之食」一語，證知「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段氏說文解字注（案字下）引戴震說：「案者，棜禁之屬。」段玉裁更申明之，說：「今之上食木盤近似。」陳、戴、段三氏所說的，才眞正是舉案齊眉的案。這種案，在中國一般的家庭中，已經很少使用；只有飯館裏、或家中大規模宴客時，還用它作爲輸送菜肴的工具。可是，在保留中國文化較多的日本，無論在家庭間、或餐館裏，在送飯時，還常用一種約半公尺見方的木盤（也有長方形的），盛着一人份的飯、菜、碗、筷等，送到食者面前；食者就用這木盤就食，如有散落的飯屑或湯水之類的東西，就都落在這木盤裏。食畢，將木盤連同賸餘的飯菜碗筷等撤去，既乾淨，又俐落。日本人把這木盤叫做御膳（ゴゼン）；而這物事和用法，還保留着中國古代的習俗。在東漢時代，人們還是席地而坐（現在日本人還是這樣），房間裏只有矮几，而沒有高桌。孟光送飯時，一定和現在的日本人一樣，雙手端着案，跪在席上，把案送給梁鴻，爲了表示恭敬，就把案舉得高與眉齊。如此說來，「舉案齊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禮失而求諸野，見到日本的御膳，才能確切地瞭解案字的意義。

結語

王國維曾經提出了「二重證據」之說，以明文物和圖書互證的重要。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強調文物的重要，曾喊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的口號。他在「史學方法導論」[16]中也說：

> 我們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後可以超越前人；我們要能使用新得材料於遺傳材料之上，然後可以超越同見這材料的同時人。

他認爲以下兩條路是不可走的：

㈠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把他應用到流傳的材料中。例如玩古童的，刻圖章的。

㈡對新發現之直接材料深固閉拒的，例如根據秦人小篆，兼以漢人所造新字，而高談文始。

……

所謂「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和「新得材料」、「直接材料」，絕大部分是文物資料；所謂「遺傳材料」、「流傳的材料」，則大都指圖書而言。這些話語，對於從事中國文史研究的青年來說，不啻是一個指示方向的南針。

原載「南洋大學李光前文物館文物彙刊」，創刊號（民國六十一年五月），頁一——五

---

16 見傅孟真先生集。



漫談本國文史研究

——關於本國文史研究工作的一些問題

近年來，由於在臺大中國文學研究所開過幾門課程，也指導了若干研究生的論文；又因爲屢作他校校外考試委員的關係，閱讀了不少各校研究生關於本國文史方面的論文，發現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和研究工作——尤其是撰寫論文，有重要關係的。現在拉雜的寫下來，以供研究文史之學的同學們參考。不過，我個人的意見未必正確；不但希望方家們多多指教，並且希望已畢業或未畢業的同學們予以批評。

研究工作和學習的目的不同

學習的目的，是希望把古人和今人已具有的知識而和自己的興趣有關的，都學了來，以供自己應用。自然，學到的知識愈豐富，應事接物的能力也愈優越。這一階段，雖然是爲研究工作奠立了基礎，但學習究竟不是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是具有了基本知識之後，更進一步去從事「創新」的工作。譬如：前人所沒發現

的理論，經過研究工作而被你發現了；前人沒解決的問題，被你解決了；前人的錯誤，被你糾正了。……諸如此類的情形，都是從事研究工作所希望得到的成果。

由此說來，學習工作，是要知人所已知；而研究工作，則是要發人所未發。這是兩者不同的地方。

選擇論文題目時應有的準備工作

由上述的情形看來，可知別人已經有的理論，如果沒有更新的意見，自然就不必重述了。別人已經解決的問題，如果沒有更新的意見，也就不必再說了。……因爲如果再作，只是人云亦云。不過是傳述性的作品，而不是研究性的論文。所以，要決定論文題目時，首先要知道和這論文有關的「行情」。

要瞭解「行情」，也並不難，因爲有很多的圖書目錄和索引，足資參考。圖書目錄方面，最常見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續修四庫提要，自不必說；中外各公私圖書館的藏書目錄，乃至各書店的出版目錄，最好也能檢閱一下。論文索引，容易找到的，有清代文集篇目索引、國學論文索引、史學論文引得、臺大圖書館所編的中文期刊論文分類索引、中央圖書館所編的中國近二十年文史哲論文分類索引，日本京都帝大出版的東洋學文獻類目（初名東洋史研究文獻類目，後改名東洋學研究文獻類目，最後改爲今名。）包括中文、日文、西文等專書和論文，更便於參考。以上所說的書目和索引，只是最常見的；而此類書刊，多得不勝枚舉，在決定論文的題目之前，應

當儘可能地多參考一些，以免後悔。

如果要作的論文，別人已經作過，就必需把別人的作品找來閱讀。假若別人的結論已很正確，自己不可能再有超越別人的見解，就必須另改論文題目。倘若不閱讀別人的著作，乃至不檢閱圖書目錄和論文索引，自己隨便找一個題目，貿然作去，化費了幾年的功夫，完成了一篇論文，可是自己所得的結論，別人早就說過，而且論證比自己的文章還更充實。那麼，你這幾年的氣力豈不是白費了？所以，在決定論文的題目之前，必須先有一番準備工作，而這準備工作，最重要的是檢閱圖書目錄和索引。

新出資料和新知識

由於我國歷代文史資料的豐富，所以從事文史研究的學生，絕大多數都在古代文獻中找題目。而經學、小學、史學、諸子、文學中的重要問題，前人多已討論過。尤其清代近乎三百年間，那些飽學之士，稽討某一個問題，凡是和那問題有關的古代圖書資料，他們大都已用過了。以今人在古書方面的根柢、以及在雜務方面的繁簡而言，今人決不可能和清儒相比。因此，不少人只好找前人沒作過的冷僻題目去做。如果再作前人已作過的題目，而且還只是利用前人已經用過的資料，沒有新資料可用，那麼，所得的成果，又怎能超越前人呢？所幸我們的眼福，實在超過了古人，孔子所沒見過的殷代重要史料——甲骨文，出土的已超過了十萬片；清代中葉以前的學者還無機會大量利用的古代銅器資料，現在多已印行出來；單就有銘文的而言，約模在五千餘

上下。此外，出土的漢簡，約近兩萬片；敦煌卷子，三萬餘卷；內閣大庫舊藏、後經散出的明清檔案三十多萬件；以及陶文、玉器和石器刻辭、璽印、錢幣，乃至無文字的考古學資料，民族學資料等，大多數都是前人沒利用過、或僅用過些微的資料。如能利用這些資料，和流傳的古書資料，互相參證，必能發前人所未發、或補前人所未及，乃至糾正前人的失誤。這樣，才容易有創見，才是有價值的論文。

學術的進步，日新月異，許多前人所沒有的知識，我們已具有了。利用新的知識，來整理或解說舊有的學術資料，就可以有許多創見。譬如孟子所提倡的井田制度，就是平均地權；但孟子生在農業社會時代，不可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論。到了　國父，時代旣和孟子不同，又有了經濟學的知識，就進而提出節制資本的理論。這就是發前人所未發。又如詩經說：「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是桑蟲，蜾蠃是土蜂。相傳土蜂把桑蟲負進土蜂的窠裏，禱告說：「像我！像我！」七天以後，桑蟲就變成小土蜂，成爲土蜂的兒子。所以今人還把領養的義子叫做螟蛉子。而實際上土蜂把桑蟲負進窠裏，是作爲小土蜂的食糧；並非桑蟲變成了土蜂。這也是國父曾經說過的。因爲有了昆蟲學的知識，就可以糾正兩千多年來經學家解經之誤。這只是舉兩個大家所習知的例子。由此說來，兼有理工科新知的人，就可用古代的圖書資料和實物資料，作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兼有經濟學知識的人，就可作古代經濟學史的研究。其餘可以類推。這樣，便可以推陳出新，不至於老是在古窠臼中兜圈子了。

圖書資料的鑑別

從事研究工作，所根據的資料如果是正確的，所得的結論雖然不一定正確（因爲人們的識見不同）；但，所用的資料如果不正確，就很難得到正確的結論。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就必需鑑別他要用的資料。研究工作所需的資料，固不限於圖書；但一般說來，究以利用圖書的人爲最多。這裏，只談圖書的鑑別問題。

㈠**眞僞問題** 有很多古書是後人僞作的。常見的經學方面的書，如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孟子外書等，都是明代人所僞作。如果根據這些僞書，去研究子貢、申培、和孟子的學說，所得的結論，當然是荒謬的。這類的僞書，子部最多；史部和集部也有些。全僞的書，固然不可用；半僞的書，用時也要特別小心。譬如尙書流傳最廣的是五十八篇的本子。而這五十八篇中，就有二十五篇是東晉人僞作的。僞作的各篇中，雖然也有些眞資料（是從其他古書中撫拾來的）；但作僞者，用自己的話，把零星的眞資料連綴起來，不但加枝添葉，而且張冠李戴。因此，這類資料，就不能無條件的取用了。所以，辨別古書的眞僞，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㈡**注意成書的年代** 原始資料和傳述資料，其價值是大不相同的。當時的人所記述的當時的事，雖然不一定都正確，但比起後代的人根據傳聞所記載的古事，其可信的程度究竟大得多了。以商紂的罪惡爲例，尙書周書中所記載的，不過是酗酒、好逸樂、聽信婦人之言，不重用賢良的大臣等數端。後代迭有增益，到魏晉時代，商紂的罪惡，竟達七十條之多。誠如子貢所說：「紂

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舉此一例，就可知傳述資料之不可盡信。戰國以來的著作，不少是託古的，如漢書藝文志所載黃帝四經、黃帝銘、神農、鬻子說之類都是。非託古的先秦諸子中，也很多非其本人所自作，而爲後人根據各家的傳聞之說編錄而成的，如管子、晏子春秋、墨子等。也有本來是後代的作品，而被更後的人誤認爲前代作品的，如周禮之類。上述的這些情形，如果不分辨清楚，而誤以後世傳述之說，當作前代可靠的史實，從而作成論文，就很不容易得到正確的結論。

㈢**圖書版本的優劣**　圖書版本的優劣，相差很遠。最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兩點：（甲）全本和節本。明代以來所刻的書，常常經過大量的刪節，而並不注明刪節的字樣，致使一般人都誤以爲全本。例如陸放翁的家世舊聞，明代以來的刻本，都只有七條：而中央圖書館所藏的舊抄本，卻有一百多條。又如權德輿文集，明代嘉靖間刻本，只有十卷；清初發現了宋刻本，才知此書原有五十卷。朱珪根據宋本重刻，五十卷本才又流傳人間。再如留青日札，通行本只有四卷，而隆慶間原刻本卻有三十九卷。諸如此類的情形很多。蒐集資料時，如果不見全本，則必然是遺漏了很多有用的資料。（乙）誤字的多寡。沒有誤字的書很少，而誤字很多的書，卻比比皆是。有些關係不大的誤字，影響還小；但關係重大的，即使一二字之誤，也會有嚴重的影響。尙書盤庚序「將始宅殷」，訛爲「將治亳殷」；太史公根據這個誤本，便把盤庚遷都的史事弄錯了。又如水經注一書，戴東原以永樂大典本，校勘明刻本，發現明刻本脫掉的字有二千一百二十八個，妄增的字一千四百四十八個，臆改的字三千七百一十五個。一部地理書有七千多個錯誤的字，若據此

誤本，從事古代地理研究，又怎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呢？

從上述的情形看來，就可知鑑別圖書的重要了。

餘說

以上所說，雖然都是老生常談；但筆者確知，還有很多研究生（包括博士班的）沒注意到這些問題，所以特別提出來說一說。至於蒐集參考資料應當豐富（不限中外），對於資料的瞭解應當正確，基本資料應當熟習等，這些人所共知的道理，在此就不再贅說。

原載「中央月刊」六卷十二期（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一一五——一一八



讀書須求甚解

「讀書不求甚解」，陶淵明的這句名言，爲千古傳誦。但，它只是名言，卻並不是至理。因爲對於以讀書作消遣的人們來說，誠然不必抛卻心力去探賾索隱。至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就必須實事求是，絲毫都不能馬虎。拿文史方面的書籍來說，如果囫圇吞棗的讀過，而不求甚解，常會把假的史料當作眞的史料，或者把甲的史實誤入乙的名下。站在學術的立場來說，這是非常嚴重的錯誤。

誠然，能不能發現問題，要看人們對於書籍瞭解的深淺，而對於書籍瞭解的深淺，要看各人的學力。但是更要緊的，還要靠讀者能够細心，能持着懷疑的態度，能於無字句處讀書。否則，卽使讀書破萬卷，也不免人云亦云，衍訛踵謬。以下單就論語、詩經和尙書（這些都是兩千多年以來讀書人所必讀的書）裏，舉幾個例子，用來提醒「讀書不求甚解」者的注意。

論語陽貨篇，有這樣一段紀載：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費，是魯國的一個邑。公山弗擾，是季氏的家臣。他以費邑來反叛魯國，而招呼孔子去和他合作；孔子便樂意去作「幫兇」，惹得子路大發脾氣。孔子還自己解嘲，說要幫助公山氏，作成個「東周」。這個記載如果屬實，那麼，「至聖」的頭銜，孔子實在是當之有愧了。

然而，從戰國以來，直到清代中葉，兩千餘年間的經生們，從沒有人討論過這段記載的眞假問題。直到崔東壁，才替孔子辯了誣。他在洙泗考信錄（卷二）裏說：

余按春秋傳云：「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然則，是弗擾叛而孔子伐而敗之耳。初無所爲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弗擾旣以費叛，是亂臣賊子也；孔子肯輔之乎？……又按：費之寇，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時孔子方爲魯司寇，聽國政。弗擾季氏之家臣耳，何敢來召孔子？孔子方輔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棄國君而佐叛夫；舍方興之業，而圖未成之事，豈近於人情耶！費可以爲東周，墮之大反不可以爲東周乎？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然則，是主墮費之議者，孔子也。弗擾不肯墮費，至帥費人以襲魯，其讐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擾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輔弗擾以爲東周，一何舛耶！……總之：此乃必無之事也。

我們看了崔東壁的這些議論，可以斷定公山弗擾決沒有召孔子而孔子欲往的事。只因論語是大家

公認的記載孔子言行最可靠的書，所以沒人敢懷疑它。以至於孔子受了誣衊，經過了二千多年，竟沒人替他洗白。如果沒有崔東壁，雖至聖如孔子，也不免寃抑難伸了！

此外，如「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和「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也都是不可信的史料，這裏不再詳說。原來論語的編定，可能已到戰國年間。梁任公說：「書中所記，如魯哀公、季康子、子服景伯諸人，皆舉其謚，諸人之死，皆在孔子卒後。書中又記曾子臨終之言，曾子在孔門齒最幼，其卒年當更遠後於孔子。」按：論語說：「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名捷，是孟武伯的兒子。魯哀公二十七年左傳：「（哀）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武之衢。」這時是孔子歿後的十一年，孟武伯還在着。那麼，他的兒子孟敬子之卒，自當遠在哀公二十七年之後。論語已稱他的謚號；可見論語編定時，至少也在孔子故去的三四十年之後，甚至已到戰國年間。因此，論語裏固然大部分是可信的史料；但也有些是後人的傳說。而這些傳說，就不盡可信了。

現在，我們再談詩經的載馳之篇。毛詩鄘風載馳篇的序說：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衞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詩序說：「思歸唁其兄」。它所指的許穆夫人之兄是誰呢？鄭康成的箋說：

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衞之遺民渡河，處於漕邑，而立戴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

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

依照鄭康成的解釋，則詩序所謂許穆夫人之兄，是指衞戴公而言。

載馳之詩的第一章是：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從這章的前四句看來，知道是唁問衞侯；而此衞侯這時是在漕邑。從末二句以及後文看來，知道此詩的作者沒能親自去唁衞侯，而是派了大夫去的。可知此詩的作者，如果不是國君，也必定具有和國君相差不遠的地位。下文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根據上下文來看這四句詩的意思，知道這位女子（即此詩的作者），是在許國。她要去唁衞侯，而許國人不讓他去。據毛傳和鄭箋（二者都是據閔公二年左傳），知道衞失國，戴公流亡在漕邑。而許穆公的夫人，是衞戴公的妹妹。如此說來，這首詩是許穆夫人所作；她因為不能親往漕邑，而派了大夫去唁問戴公。這似乎是沒有什麼問題，所以歷來的詩學家，很少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

但是，這首詩裏，有「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和「我行其野，言采其蝱」的句子。這些句子所表現的，都是春深或夏初時的景象。而衞戴公之立，是在魯閔公二年的十二月，在位只有一個月就死掉了。如果是唁戴公，那麼，在冬天的時候，怎麼會見到「芃芃其麥」？又怎麼能「言采其蝱」呢？

因此，清人范家相和胡承珙，都提出了新的意見。胡氏的毛詩後箋（卷四）說：

范氏詩瀋曰：「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衞。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廬于漕。是年戴公

卒；立甫一月耳。文公繼立。夫人之思歸，當在此時矣。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詩：芃芃其麥，言采其蝱，豈十月所有乎？蓋唁衞或在次年，或戴公未立之前。」承珙案：戴公未立以前，不容有唁。況狄滅衞，在二年冬，亦非麥蝱之候。考定之方中，文公營室詩也；在夏之十月，爲周之十二月——此蓋魯僖公元年之十二月。至僖二年，諸侯乃城楚邱而封衞焉。則當僖元年春夏之間，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無寧居，許穆夫人所爲賦載馳以弔失國歟？揆之情事，衞侯似指文公爲近。蝱邱、麥野，雖皆係設詞，亦不直取非時之物而漫爲託興也。

范氏和胡氏，是根據閔公二年和僖公二年左傳以及杜注而作了上述的論證。現在，我們歸納范氏和胡氏的論證並參照左傳，列一個簡表如下：

魯閔公二年十二月　狄入衞，衞懿公敗死。

同月，宋桓公立衞戴公以廬于漕。戴公旋卒。

魯僖公元年正月　衞文公立，居於漕。

十二月　營室於楚丘。

魯僖公二年正月　城楚丘。

從上表看來，許穆夫人當芃芃其麥的季節，派人去唁問居住於漕的衞侯；這衞侯一定是文公，而決不是戴公。時間一定是在魯僖公元年的春夏之間。

末了，我再舉一個尚書中的例子：

尚書費誓篇開頭說：「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從這些話裏，知道這是某國的國君將伐淮夷和徐戎時的誓師之辭。又從後文「魯人三郊三遂，峙（跱）乃楨榦，……」等語，知道這個誓師的人必是魯國的國君：這些都是不成問題的。但，這魯君是誰呢？書序說：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史記魯周公世家也有類似的說法（史記「費」作「肸」）。於是二千年來，沒人不認爲費誓是伯禽伐淮夷和徐戎時的誓師之辭。

近人余永梁，才開始懷疑這篇書不是伯禽時的作品。他作了粊誓的時代考一文（載中山大學語言研究所週刊一卷一號，轉載於古史辨第二冊上。）提出了兩個問題：㈠本篇文體和兮甲盤相似，不類周初作品，㈡戎狄蠻夷等稱，春秋時最盛；本篇稱徐戎不稱徐方，和春秋時的風尚相合。因而他認爲本篇是魯僖公時的作品。

王靜安的學生楊筠如，也認爲費誓是魯僖公時的作品；他所持的理由更充分些。他的尚書覈詁說：

竊疑西周諸侯，當承王命征伐，而此篇無一語道及王命。當是東周以後，諸侯自專攻伐時之作品。且其文字，與秦誓相去不遠。據魯頌閟宮：「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此確敘魯公征討徐戎淮夷之事。泮水：「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亦明爲克服淮

夷，獻功之事。則詩書所載，自屬一事。而閟宮有「莊公之子」一語，鄭箋以爲僖公時事，似尚可信。

按：余楊兩君的見解，都很卓越。除了他們所說之理由之外，還有兩個證據，足以證明費誓是魯僖公時的作品。

段玉裁的尚書撰異說：「考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左傳云：『費伯率師城郎。』後幷於魯，爲季氏邑。僖元年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是也。」費在春秋之初，還是一個獨立國。那麼，春秋以前的魯君，決不會跑到別的國裏去誓師。到了僖公時代，費已是魯國的一個邑。這費邑，又是接近徐戎和淮夷的地方，所以魯侯在這裏誓師。隱公以後，魯君有能力而且也確曾伐過徐戎和淮夷的，只有僖公。所以這費誓一定是僖公時的作品。

春秋僖公十六年經文說：「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傳：「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杜注說：「鄫爲淮夷所病故。」按照董作賓先生的中國年曆簡譜，僖公十六年（卽周襄王八年）十二月朔日是癸酉。次日（初十二日）便是甲戌。而費誓說：「甲戌，我惟築。」這日期和春秋經傳的記載正合。這又是費誓作於僖公時的有力證據。

由於上述的理由，費誓是僖公伐徐戎和淮夷時的誓師之辭，似乎可以論定了。

以上只就經書中舉了三個例子。論語、詩經、尚書，是二千多年以來千千萬萬的人讀過的

書；然而還有上述的問題，等待後人發現。這一類的情形，在其他古書裏還多得很。有些是被人發現了；而沒被人發現的，必定還很多。只因一般的讀書人總是滑口讀過，不求甚解，以致它們的眞象，還被埋沒着。這正像人人都看見過沸水揭掉了壺蓋，而細心的瓦特才能發明蒸汽機；人人都曾見過果實落地，而細心的牛頓才能發現地心吸力。所以，如果肯求甚解，必會有出人頭地的造詣。袁子才的詩說：「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俗話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謹以此二語，奉獻給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們。

原載「新時代」，一卷九期（民國五十年九月十五日），頁二九——三〇

古書的若干問題

——文史研究叢談之一

一、引言

研究工作的目的，在發現新的理論，或發明新的器物，或解決別人所沒注意到，以及雖已注意到而沒能解決的問題。自然，從事此項工作，都必需依據可靠的資料，才能作正確地判斷。研究本國的文史之學，當然也不例外。

傳說中在清代有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位南方舉子，到北京去趕考。路過兗州（那時還沒有鐵路），見到當地所賣的大燒餅，圓形，直徑在一尺以上；燒餅的周圍，有磨盤形的花紋。這位舉子，靈機一動，把這燒餅搨了一張拓片，帶到北京，送給一位當時著名的金石學家。經這位金石學家考證的結果，證明那是一幅晉磨的拓片。

這故事的眞實性如何，雖不得而知。但可以說明一件事實；就是，如果不能認清楚資料，而據以從事研究工作，則所得的結論，必然不能正確。

研究本國的文史之學，特別是屬於古代方面的，可以憑藉的資料很多，固然不單靠書本；但古書畢竟是用途最廣泛的資料。可是，古書的眞僞，著成的時代，以及板本的優劣，就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弄清楚了，雖然不一定能够得到正確的結論（因爲人們判斷的能力不同。）但如果不能辨別清楚，其研究的成果，則必然是不可信賴的。本文卽是就這些問題，作一簡略的敍述。

二、古書的眞僞問題

近半個世紀以來，辨僞書的風氣很盛。但，一般所謂僞書，是連管子、莊子、商君書……等都包括在內。嚴格地說來，這是不大正確的。因爲這些書都是後人所輯與某家的學說或史事有關的資料，原來並沒題明「管仲撰」「莊周撰」、或「商鞅撰」等等。那些書裡之有著者的題名，乃是後人加上去的。它們既出於後人所編集，書中自不免記載着管仲、莊周、商鞅等以後的事。讀者只可說書中的某些資料有問題，而不能說它們是僞書；因爲它們事實上是眞本。這意見楊聯陞教授曾說過，是很確當的議論。因此，本文所謂僞書，乃是後人有意造假，以冒充眞貨的作品。這可以分作三部分來說：

㈠ 本無其書，而由後人憑空杜撰的

例如子貢詩傳這部書，是我們常常見到的。此書所題著者的名子，是端木賜；卽是孔子的弟子子貢。但，從它的文體上看，既決不像春秋時代的文筆；它的內容，又常常抄襲朱子的詩經集

傳。而且，從它的傳本源流來說，由秦漢到明代中葉以前的記載，也從來沒說到有這一部書。直到明代中葉以後，它纔突然出現。可見這部書必然有問題。錢謙益所編的列朝詩集，收有豐坊的詩，並附有豐坊的小傳。傳中有這樣兩句話：

子貢詩傳，卽其僞作。

姚際恆所作的古今僞書考裡，也說子貢詩傳是豐坊假造的。由此可知，它不是春秋時代子貢說詩之書，而是明萬曆年間豐坊所作的贋品。

這類的僞書頗多，現在常見的如三墳書（題晉阮咸注，實係宋人僞作。），心書（說是諸葛亮作的，實是宋人張商英所作。）亢倉子（說是戰國時庚桑楚作的，實是唐代王士源所作。），於陵子（說是戰國時陳仲子作的，實是明代姚士粦所作。）天祿閣外史（說是漢代黃憲作的，實是明代王逢年所作。），雜事祕辛（說是漢代人作的，可能是明代楊愼作的。）等都是。像這類的僞書，如果把它們的記載，當作了眞的史料，則研究的結果，必定得到以燒餅爲晉磨的結論。

(二) 原書已佚，後人另作的僞書

例如：晉太康二年，汲郡有一個名字叫做不準的人，盜發了戰國時代魏安釐王的墳墓；墓裏邊，發現了很多用竹簡寫的古書（我國古代的書，大多數是用墨寫在竹板子上面，叫作簡。），其中有一部書叫做竹書紀年。原書凡十二卷，記載夏代以來到魏安釐王二十年時的史事，是一部很重要的中國古史書。可惜後來失傳了。到了明代，又出現了一部假的竹書紀年，現在所常見的

徐文靖注本、陳逢衡注本、雷學淇注本，都是這部假書。清代晚年，朱右曾把許多古書中所引的眞竹書紀年，一條一條地搜集起來，編成了汲冢紀年存眞二卷；後來王國維又把朱右曾所遺漏的資料，輯補了許多，另成了一部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現在有一位叫做范祥雍的，又把王國維所遺漏的資料輯補了一些，叫做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所以研究中國古史的人，最好是參考王國維和范祥雍的古本竹書紀年；今本（卽僞本）竹書紀年的史事，雖然是採自許多古書，拼湊而成；但它所載史事發生的年月，則大部分是杜撰的，那自然就沒有學術價值了。

又如蘇軾的兒子蘇過，曾經著有斜川集十卷。這書後來也失傳了。清代編四庫全書時所見的本子，乃是作僞的人把宋代劉過的龍洲集，又加上一些謝薖的詩文編集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經把它的眞象給揭穿了。乾隆年間吳長元得到抄寫的眞本斜川集一部分，又從許多古書裏輯錄了一些蘇過的詩文，編成了一部眞的斜川集。後來阮元又把它整理了一番，分成六卷，送到內府，列在宛委別藏裏。另外，周永年也從永樂大典裏輯出了眞的斜川集六卷。收在知不足齋叢書裏面的，就是周永年所輯的本子。後來法式善又從永樂大典裏輯出補遺二卷（補周本之遺。）如果有人要研究蘇過的詩文，當然要用吳長元的輯本和周永年、法式善的輯本了。

這一類的僞書很多，像連山、歸藏、子夏易傳、孔子家語、愼子（明萬曆間愼懋賞刻本）、鬻子、列子、鶡冠子等書都是後人假作的。

(三) 一部分眞，一部分假的

這一類的古書不很多，最顯著的例子是尙書。尙書是十三經之一，是二千多年以來中國讀書人必讀的一部經書，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中國古代史料。據說它原來有一百篇，由於秦始皇焚書的關係，到漢初這部書已不容易找到了。只有一位曾經做過秦國博士的伏生，當秦代焚書時，他偸偸地藏了一部尙書在他家的複壁裡。後來楚漢戰爭，天下大亂，伏生避亂到別處去了。戰事平定以後，伏生回到家裡，檢查他所藏的尙書，只賸了二十九篇。這二十九篇尙書，就是漢代通行的本子。

到了漢景帝初年被封在魯國（後來的曲阜）的恭王，他的王府靠近孔子的故宅。由於擴建他的王府，於是拆掉了孔子故宅的房屋。當拆掉孔子故宅的房屋時，發現了一批簡書。其中有一部尙書，比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本，多了十六篇（這十六篇，又可以分作二十四篇）。可惜這十六篇尙書，在東漢初年就失掉了一篇（武成）；其餘十五篇，到了晉懷帝永嘉之亂時，也全部失掉了。

到了東晉時代，又出現了五十八篇本的尙書。這五十八篇，是把伏生的二十九篇，分成了三十三篇，又加上僞作的二十五篇而成的。這部一半眞一半假的尙書，從東晉以後，經過隋唐五代，一直被人們傳誦着，而不知道其中有假的成份。到了宋代，吳棫、朱子等，纔漸漸地懷疑它；到了淸初，閻若璩作了一部尙書古文疏證，舉出了一百二十八個證據，證明了那二十五篇的確是僞書，於是纔成了定論。可是，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並沒讀過閻若璩的這部書，因而還不知道這五十八篇本的尙書中，有二十五篇是假的。眞是可惜。

此外，如淸代朱璘所編的諸葛丞相集四卷，其中的諸葛亮遺文一卷，心書五十條，和八陣圖、分野等，也都不是眞正諸葛亮的作品。

三、後人的述古之作

兩三年前風行一時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所描寫的是晉代的故事。但，劇中的房屋，是水泥台階；路，是柏油做的；書，是線裝本。尤其妙的，是廳堂裏懸掛着幾條屛幅；而屛幅上所寫的，竟是杜工部的秋興詩。這說明了故事雖是古代的，而編劇者是現代人，所以劇本中就不自覺地染上了著者的時代色彩。不但此也，梁祝的故事，在我國到處都傳說着；而各地的傳說則互不相同。再加以寫電影劇本的人，不免就自己的想像，加枝添葉。因此，梁祝影片中的故事，究竟能有多少符合當時的眞象，就大成問題，倘若千百年後，有人根據梁祝影片的劇本來寫梁祝戀愛史，而說晉代已有了線裝書、柏油路、水泥台階，乃至於杜甫的詩，豈非荒謬絕倫！

古書中也不乏後人述古之作。這些書，有些是根據文字的記載重述的，它們的記述，和原始資料相距還不太遠。但西漢以前，多是用竹簡寫書（帛書太貴），繕寫固多困難，保藏、携帶尤其不易。因而許多史事，常常靠口頭流傳。等到有心人把所聞的史事筆之於書，他所記述的只是他所聽到的傳說；也就是說，那只是許多傳說中之一。再加上記述者的時代色彩，以及加添的枝葉，自然和史事的眞象就有了距離。誠然，當時的人記載當時的事，也不一定都可靠；但，總比後人據傳說追述的記載，可靠的成份居多。如此說來，作硏究工作的人，就不能不注意古書著成

的時代了。

四、被誤認為全本的節本書

古書有很多是刪節的本子。一般的刪節本多標明了刪節的字樣，以示它不是全本。像呂祖謙的十七史詳節，就是最常見的節本書。但，也有些節本書並沒標明刪節的字樣，以致被人誤認爲全本的；也有把殘本書誤當作全本而重抄或重刻傳佈的。

例如唐代權德輿作的權載之集，從明代以來常見的是十卷本，四庫全書所收的就是這個本子。但清代初年，顧宸家裡有一部宋版的五十卷本，內容比十卷本多了好幾倍。於是就有人根據這五十卷本傳抄了副本。到嘉慶年間朱珪根據抄本重刻，因而五十卷本又流傳起來。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時，用了朱珪刻的五十卷本，又從其他書裡輯出了一些五十卷本所沒有的詩文附在後面。所以，如果研究權德輿的詩文，自然以商務印書館的影印本爲最完備了。

中國古書中這類的情形很多，這裏不能一一敍述。

五、錯誤多的本子和錯誤少的本子

中國圖書，最早的是寫在竹簡上或綢子上，後來寫在紙上。到了唐代發明了印刷術，纔有木刻本。手寫的書，固然容易有錯字和脫文；刻板的書，也同樣有錯誤的地方。加以明代萬曆以後，刻書的人，不但校對不仔細，又往往隨意改字，於是錯誤就更多了。這裡隨便舉幾個例子：

譬如水經注這部書，明代許多刻本都是錯誤很多。到了清代，戴震用永樂大典的本子來校對此書，證明了明刻本脫掉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個字，妄加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個字，亂改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個字。在這一部書裡，就錯誤了七千多個字。因此，我們如讀水經注，當然是讀戴震校訂的本子。

又如汲古閣所刻的北齊書，宣帝本紀和李繪傳，都脫掉了一葉，共計六百多字。又把高隆之傳中的文字，摻入李繪傳裡。眞是誤人不淺。

二十四史中，像北齊書、魏書、宋書、宋史、明北監本、汲古閣本，以及清代的武英殿本，都有脫葉和錯誤的文字。比較好的，則是商務印書館影印的本子。

六、結語

古書的問題很多，以上所談，只是最常見，而且是對於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問題。如欲略知僞書問題和古書的著成時代問題，可看張心澂的僞書通考。如欲選擇較好的版本，可參考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實際上是繆荃孫作的）；這書臺北有翻印的范希曾訂補本，更有用些。不過，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單憑這兩部書是不够的。因爲僞書通考出版於民國二十八年。在那年以前的資料，它既有些遺漏的；而且二十八年以後，到現在將近三十年，又有很多新的資料，散見於各書刊中，就必須耐着心去找尋了。書目答問中所列的書，既都是常見的；它所列的版本，也是比較通行的。因而，比較生僻的書，和不常見的版本，都不能在其中找到。何況它是書目體，每書只簡

單地舉幾種版本；而不像書識那樣，把各版本的優點列舉出來，以供人參考。所以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必要時就不能不參考各公私家的藏書志，讀書記之類的書，甚至於自己從事校勘工作，那自然是很麻煩的事。

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對於辨別資料是不能怕麻煩的；相反的，所遇到的麻煩越多，所得的成果越有價值。

原載「中華日報」，二版，民國五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寫本、稿本和校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善本圖書，共有十二萬餘册；其中單是寫本就近乎二千六百部，稿本有四百八十多部，批校本也有四百多部。對於研究中國文史的人們來說，這眞是一個寶庫。關於刻本部分，昌彼得先生曾在「自由談」第十六卷第一期撰文介紹過了。本文是就寫本、稿本和批校本，作簡單的敍述。

卷子本

卷子本是繼承了帛書的系統的。在我國古書裏，常看到「竹帛」的字樣。竹，是指簡册說；帛，是綢。簡册和綢子，都是古人用以寫書的工具。不過綢子的價值太貴，不是一般人所能常用的；因而古代的書籍，用簡册寫的最多。古代的帛，長約四丈，寬約二尺二寸。如果用它寫書，寫完後把它捲起來，就成了一捲。這一捲，古人叫作一卷；卷，就是捲的意思。

到東漢時代，蔡倫發明了紙；於是人們就用紙來寫書，簡册和帛書，才漸漸地廢掉了。紙的

長度，雖然比綢子短得多；但人們可以用漿糊把它們一張一張的連接起來，結果它的長度也相當於一匹綢子；或者更長一些。寫成書後，也是把它捲起來，成爲一卷，和帛書一樣。

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卷子本有一百五十多卷，大部分是敦煌石室出來的。其中最早的，是六朝時代的人所寫的；距今約有一千四五百年了。它們的紙張，都是黃色，這是用黃蘗樹汁染成的；因爲用黃蘗汁染過後，就可以避免蠹魚的蛀蝕。古人形容夜讀，常用「黃卷青燈」一語。我們看了這些黃色的卷子，一定會格外地感到這句話的親切。我們又常聽說：「雌黃」這個名詞。雌黃是一種黃顏色的礦物。古人寫書時，如果寫錯了字，就用雌黃把錯字塗掉，然後再把要改正的字寫在雌黃上；正像我們畫水彩畫，畫錯了塗上鉛粉，然後另畫一樣。晉代的王衍，在談話時隨口引書，引錯了就隨口改正，當時的人說他「口中雌黃」。我們現在形容人隨便亂說，說他是「信口雌黃」。這話的意思，雖然和古人有點不同；但追究它的根源，卻是從雌黃校書來的。

用長紙捲成卷，必需用軸。軸，一般都是木做的。講究的人，有的用玉裝在軸的兩端。一卷，也叫做一軸，就是這個原因。

大體說來，唐代晚年以前的書，除了簡册之外，都是卷子本。從唐末以來，圖書有了「葉子本」和「旋風裝」，宋代有了「蝴蝶裝」，卷子本才漸漸的被淘汰。到我們現在，只有裱字畫的還有卷子本，再沒有人用卷子本寫書了。

著名的寫本

我國圖書最著名的寫本，要算唐代吳彩鸞女士所寫的書了。據傳說，吳彩鸞是吳猛的女兒，她在路上遇到一位名文簫的青年，就嫁給了他。但文簫家裏很窮，無以維生；彩鸞就寫「唐韻」來賣。據說她寫得很快，每天可以寫一部，每部可以賣到五千銅錢。她繼續寫了一年，後來就和她的丈夫隱居在新越王山。後人就說他們夫婦都成仙了。她所寫的「唐韻」流傳頗多，從宋代到清代，常見於各家的記載。現在故宮博物院裏還藏有一部。

明清兩代著名的鈔本，據葉德輝「書林清話」所記載的約有五十家左右。其中特別著名的，如無錫的姚舜咨（咨）、吳縣的柳大中（僉）、俞叔寶（穀）、陸敕光（貽典），山陰祁承㸁的淡生堂，常熟毛晉的汲古閣，同邑的馮已蒼（舒）、定遠（班）兄弟、以及錢曾的述古堂，蘇州黃丕烈的士禮居，海昌的吳槎客（騫），歙縣的鮑廷博（以文），昭文張蓉鏡夫婦的小琅嬛仙館，清初某親王的穴硯齋。以上各家的鈔本，中央圖書館都有收藏。

除了卷子本以外，中央圖書館最古的鈔本，是宋理宗時館閣寫的「宋太宗皇帝寶錄」；最著名的鈔本，是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的「永樂大典」，和清乾隆間寫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最有學術資料價值的，是舊鈔本的「家世舊聞」（詳下）；最精緻的，是汲古閣影宋鈔本盤洲樂章一書，不但文字的筆畫，和宋本沒有絲毫不同；就連邊闌也畫得一筆不苟。尤其紙張潔白如玉，開卷使人心目俱爽。眞可以說是書中的尤物了。

稿本

稿本是最原始的資料，後來的鈔本和刻本，總不免有鈔錯或刻錯的字句，都應當取正於稿本，這是人所共知的事。何況有些稿本，根本沒有傳鈔過或傳刻過，世間惟此孤本，其在學術資料上的價值可知。又：有些稿本，雖然另有鈔本或刻本，但鈔本或刻本，僅爲原稿的一部份，並未全部傳鈔或傳刻。因而這稿本在學術資料上的價值來說，是僅次於孤本的。中央圖書館所藏的稿本共計四百八十餘種，大部份是明清兩代的著作；其中有許多是沒有傳鈔或傳刻過的，也有許多是被傳鈔或傳刻過一部分的，這自然是從事研究工作者的絕好資料。何況一個著名的學者，經過數百年後，我們還能看到他的手蹟，還能看到他著書時改訂推敲的情形，這也是後代讀書人的一大快事。所以收藏家們更看重稿本。

中央圖書館所收藏的稿本書，像明代王穉登的手稿「南有堂集」，王思任的手稿「王季重詩文稿」，文俶女士彩繪的「金石昆蟲草木狀」，淸代錢謙益和季振宜合編的「唐詩」，翁方綱的手稿「復初齋文稿」，焦循的手稿「雕孤樓經學叢書」；除了學術的價值以外，更兼備美術的價值。尤其是以書法著名的翁覃溪，他手寫的「復初齋文稿」計二十卷，詩稿六十七卷，筆記稿十五卷，札記稿不分卷，總計達一百三十八册之多。堆積起來，豈止盈尺？眞可以說是洋洋大觀了。

校本

把自己的意見，寫在所讀的書上，叫做「批」：把別本不同的字句，過錄在所讀的本子上，

叫做「校」。讀名家的批本，既可以看到他們（名家們）的事蹟，又可以見到他們沒發表過的見解。讀校本，則可以證知各種版本的優劣。照圖書流傳的情形看來，是校本比批本流傳得多；照學術的價值來說，校本也往往比批本價值大。

抱朴子說：「書三寫，魯爲魚，虛爲虎。」孔子家語也載有「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說三豕是己亥之訛的故事。所以我們常用魯魚亥豕來形容書中的錯字。寫本書流傳得不廣，如有錯誤，它的影響還比較小些。自從圖書有了刻本之後，一個版子可以印千萬部書；所以，書版如果有了錯字，影響就大了。大體上說，宋版書除了麻沙本校勘稍微粗疏些外，其他本子校刻都很仔細。元代到明代初年的刻本，也還不太馬虎。明代中葉以後的刻本，就有些胡鬧了，錯誤的字句常常可以見到，甚至把原書任意刪節。像這種惡劣的本子，如果不予校正，則謬種流傳，眞是貽害無窮。由此可知藏書家所以重視校本的緣故了。

中央圖書館收藏的名家批校本，共有四百多部。較著名者如明唐寅手校、清黃丕烈手跋的「宦游紀聞」（宋張世南撰），馮舒手校的「封氏聞見記」（唐封演撰），清盧文弨手校的「鬼谷子」、和「契丹國志」（宋葉隆禮撰），孫星衍和嚴可均合校的「春秋分紀」（宋程公說撰）。此外，如惠棟（「呂氏春秋」等），錢大昕（「皇元聖武親征錄」等），黃丕烈（「南唐書」等），顧廣圻（「劉賓客文集」等），孔繼涵（舊五代史」等），鮑廷博（「帝範」等）等。看了這些批校本，即使不論其在校讎學上的價值；單從校勘的精細來看，古人那種讀書不苟的精神，也很值得我們景仰了。

寫本、稿本、和校本的重要

大體上說，寫本、稿本、和校本的功用，都是在校勘方面；不過，寫本和稿本的功用，還不止此。因爲前面已經說過，有些稿本，根本沒經過傳刻或傳寫；或雖有鈔本和刻本，而鈔的和刻的只是原稿的一部分，像這類的稿本，天壤間只此一份，其可貴自不用說。又如：有些書雖然曾有刻本；但後來刻本都失傳了，只賸下一個孤伶伶的寫本；自然這寫本也和孤本的稿本同樣可貴。以下，隨便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寫本、稿本、和校本的重要：

先就寫本來說，譬如衆所週知的「永樂大典」，在清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時，從它裏邊輯出來四百九十二種已經失傳的古書；後人陸續蒐輯，又輯出來很多佚書。又如明鈔本「國朝典故」（明朱常㵾編）、和「萬曆邸抄」都是沒有刻本流傳的。宋陸游作的「家世舊聞」，「說郛」和「五朝小說大觀」雖曾刻印過，但只刻了七條；明人所刻的「宋人百家」，雖有其目，而實際上所刻的乃是二程子的家世舊事。舊鈔本卻有一百餘條之多。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對於這些稀見的本子，又怎能不視爲至寶呢？至於寫本在校勘方面的價值，我們且舉「永樂大典」本的「水經注」爲例：戴東原用「永樂大典」所引的「水經注」來校對明刻本，結果，補了明刻本所脫漏的字計二千一百二十八個，刪掉妄加的字計一千四百四十八個，糾正妄改的字計三千七百一十五個。一部書中，錯誤的字竟有七千多個。如果沒有鈔本的「永樂大典」來校對刻本，這「水經注」就簡直地使人不堪卒讀了。

其次，再說稿本。譬如人人都讀過的崔顥的黃鶴樓詩，開頭四句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但是，宋人的某一筆記，曾說見到崔顥的手稿，標題下有一句小注，說：「黃鶴，人姓名。」詩的第一句，則作「昔人已乘白雲去」。由此可知，乃是黃鶴乘白雲仙去，所以人們才建了黃鶴樓來紀念他。而且第一句的黃鶴如依照原稿作白雲，則第一句和第四句呼應，第三句和第二句銜接，才顯出原詩結構的美妙。而通行的本子，不但開頭三句都有黃鶴字樣，顯得疊牀架屋；而且第四句的「白雲」二字，也上無所承。可見相傳黃鶴樓得名之故，或說因費禕仙去，又乘鶴返此；或說因仙人王子安曾駕鶴過此。這些話恐怕都有問題。這是校勘方面的例子。又如像王穉登的「南有堂集」、孫承澤的「元朝人物略」，似乎都沒有刻本流傳。翁覃溪的集子，雖有刻本；但中央圖書館所藏的這一百三十八册的稿本，其中有很多詩文是沒有刻過的。這自然都是從事研究工作者的珍貴資料了。

最後，再說校本。校本的重要，由上面所舉戴東原校水經注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一般說來，刻本的字句之誤，它的影響已經夠大了。而有些刻本，只把原書刻了一部份，就冒充全本。又有些書脫掉了若干葉，後人據以重刻，就永遠成了缺葉的書。譬如宋人王楙所著的「野客叢書」，商濬的「稗海」本，和陳繼儒的「寶顏堂秘笈」本，都只有十二卷；而中央圖書館所藏的明嘉靖間王穀祥的刻本，則有三十卷。如果不經過校勘工作，就不知道商陳兩家的刻本還不夠原書的一半。又如汲古閣刻的「北齊書」，在文宣帝紀裏，和李繪傳裏，各缺了一葉，共計六百多個字；又把高隆之傳的文字，摻入了李繪傳。不但史實殘缺，而且張冠李戴。如果不經過校勘

工作，眞是誤人不淺，由此就可以知道藏書家所以珍視校本的原因了。

原載「自由談」，十六卷二期（民國五十四年二月），頁三八——四〇

一個錯字的關係

一、引言

圖書板本的優劣，有天淵之別。這，在不研究板本學或不從事校勘工作的人，是往往不注意的。譬如同是一部權載之集，明刻本和四庫全書本只有十卷，而宋刻本和朱珪重刻本則有五十卷。同是一部陸游的家世舊聞，通行的叢書本只有七條，而中央圖書館所藏的舊鈔本卻有二卷一百零五條。同是一部蘇過的斜川集，清乾隆間刻本，乃是取劉過的龍州集和謝薖的詩文拼湊而成的；而周永年所輯、刻在知不足齋叢書中的本子，才眞正是蘇過的作品。同是一部水經注，戴震根據永樂大典校對明刻本的結果，證明了明本脫掉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妄加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臆改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由於圖書板本的不同，其內容的差異，竟如此之大。對於隨便看書而不求甚解的人來說，倒沒多大關係；可是對於從事研究已作、或傳授知識的人來說，那就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了。

一般不瞭解圖書板本之重要的人，常常諷刺珍視宋元刻本的人是玩古董。不錯，有些人是把印刷精美的宋元板書，當作美術品玩賞的，像明代的朱大韶以美婢換了一部宋板的後漢紀，而他並沒利用這部書從事校勘工作，便是一例。這正和收藏鐘鼎彝器的人一樣，固然有許多人只把它們當作古董玩賞，而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卻視它們爲重要的學術資料。收藏的人對於這些物事的觀念雖不相同，但它們本身的價值究竟是崇高的。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載有顧澗薲跋黃蕘圃所藏的蔡中郎集一文，說：

書以彌古爲彌善（按：這是指書的板本說。），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間有一等人（原注：「其人蕘翁門下士也。」）必謂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耶？欺人耶？

已故的名學者章太炎也認爲讀書不必求善本；他說他自己就專讀石印本的書。黃蕘圃是著名的圖書板本學家，竟有這樣的「門下士」；章太炎是著名的國學大師，竟有這樣的議論，不能不說是學林的憾事。

二、兩個有趣的故事

也許有人說：像前面所舉的權載之集、斜川集、家世舊聞、水經注等例，固然足以說明讀書不能不重視板本；但那些情形，究竟是少數的，不是常見的。一般的圖書，即使有一些錯字，也不至於有大妨礙。這一說法，雖也有些道理；但也有因一字之差，而發生嚴重影響的。下面且舉兩個有趣的故事：

宋陸游的老學菴筆記（卷七）有這樣一段記載：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官惶恐，乃謝曰：「某當罰。」卽輸罰改題而止。

明陸深的金臺紀聞下（儼山外集卷十二），也記載着一個有趣的故事：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酧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旣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錫」字耳。元禮急爲正之。嗚呼！不辨錫錫而醫者，世胡可以弗謹哉！

上舉的兩個例子，前者雖僅止於認罰，卻丟盡了教官的面子；後者則可能影響了人命。一個字的錯誤，其關係之重大，有如是者。

至於在學術研究方面，由於一字之誤，而發生重大影響的，也有很多例子。以下且舉兩事以見一斑。

三、尚書大誥和君奭兩篇中的寧字

尚書大誥篇，有以下這些句子：

寧王遺我大寶龜。
以于敉寧武圖功。
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天休于寧王。
寧王惟卜用。
爾知寧王若勤哉！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以上這些「寧」字，古代的經學家們，都把他們解釋爲「安寧」的意思。雖然用這一意義解釋經文都非常勉強；但，二千多年以來的學者，也只好安之不疑。直到清代明年，吳清卿（大澂）才

由於鐘鼎彝器欵識中的「文」字作𡧊[字形]等形，和「寧」字的形狀很相近，從而證明大誥中的這些「寧」字，都是「文」字之誤。在他所著的字說裏，有一專篇討論此一問題。和他同時的方濬益，在他所著的綴遺齋彝器考釋裏（卷一、吳生鐘），也因吳生鐘裏「前文人」的「文」字作「𡧊」，而悟出大誥的「寧」字乃「文」字之訛。他說：

前文人，卽周書大誥、君奭等篇之前寧人。……漢世尚書出於壁藏，學者罕識古篆。誤以𡧊爲寧，於是前文人之文均譌爲寧，而「文考」爲「寧考」，「文王」爲「寧王」矣。

我們試把上舉大誥中十二個例子裏的「寧」字都改作「文」字，於是「寧王」便成「文王」，「寧武」便成「文武」，「寧考」便成「文考」，「前寧人」便成「前文人」，「寧人」便成「文人」。文王、文武，不必說了；文考、文人、前文人，都是金文裏常見的字樣。這個錯字校正了之後，那麼，一向難解的這十二句書，就都可以文從字順了。

文字訛成寧字，在君奭裏的例子是：「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篇引下句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這是因爲割和害二字古時通用，而害字的金文作[字形]（格伯𣪘），所以訛成周字，中字中間的一畫，磨掉了上下的兩頭，於是變成了田字。寧、文互訛，自然就是吳清卿和方濬益所說的原因了。

從出土的三體石經殘字看來，君奭篇「我廸惟寧王德□」句，寧字的古文作[字形]，篆文和隸書都作寧。（按：此寧字應作文。），又，同篇「□□□□寧于上帝命」句的寧字也作[字形]。（按：此處應是寧字。）可是同篇中他處的「文」字以及春秋殘石中「文」字，它們的古文都作[字形]。三

體石經是據孔壁古文傳刻的，孔壁古文乃是先秦人所寫。和金文的「文」字比對着看，忞也確是「文」字。然而「寧于上帝命」的寧字，三體石經既作忞，可見在秦以前（約戰國晚年）就把「文」字誤認成「寧」字了。

四、因一個誤字而斷定舊雨樓所藏漢石經之偽

抗戰勝利還都之後，國立中央圖書館接收了偽內政部長陳羣在南京的「澤存書庫」。其中有一部題為「舊雨樓藏漢石經拓本」的書，是漢石經殘字的拓片，每行裁為一條，然後斷開，裱成冊頁。詩、書、易、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經的殘字都有，共計約一萬字以上。

那時我正服務於中央圖書館，看到這部拓本，驚疑不止。那些殘字的風格，和我以前所看到的一些漢石經殘字，非常神似。但，如果眞的有這樣一大批漢石經出土，應該是震驚學林的一件大事；然而，何以報章上既沒刋登這個消息？又何以沒聽到文教界的人士談起過？當時我曾請教過許多位鑒賞家，都認為它不是贋品。我想，這些殘石，可能是抗戰期間出土，所以後方的人們，沒聽到過它出土的消息。安於此見，就沒去深究。

民國五十一年，我作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一書時，曾用了這批資料。在字句、行欵方面，都沒發現它有什麼可疑之處。惟一的疑點，是他家所藏的漢石經周易殘字的字體，並不一律；而舊雨樓拓本的字體，則完全一致。

按：後漢書蔡邕傳，敍述修建石經事，說：「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隋書經籍志，

也說漢石經「皆蔡邕所書」。其實這些記載都是不正確的。宋洪适所著的隸釋裏，收了不少的漢石經殘字。洪氏發現了各石經殘字的字體不同，於是他說：

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

羅振玉的漢石經殘字集錄序，也說：「今日驗諸經殘字，果筆迹各異。」由此可知漢石經的字體並不完全一律；換言之，它並非出於一人手筆。而舊雨樓所藏的漢石經殘字，則無疑地全是一個人寫的；這就不能不使人懷疑它的眞實性了。然而，此外並無更可靠的證據以確定其僞。

後來，我又作漢石尙書殘字集證，除了發現舊雨樓所藏拓本的行款有問題，並發現一個決定性的證據，足以證明舊雨樓藏漢石經殘字確是僞刻。這證據就是一個錯字。

原來，尙書呂刑篇「度作刑以詰四方」的「詰」字，舊雨樓本石經作「誥」。漢石經是用今文家的本子上石的，那麼這個「誥」字，應該是今文家的本子如此。但漢代的今文學家引述這句經文的，都是作「詰」，並不作「誥」。只有清代孫星衍的尙書今古文注疏說：「詰作誥，今文尙書也，」孫氏這一說法，是根據困學紀聞來的，困學紀聞卷二：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誥四方，

「詰」字作「誥」，只有明萬曆癸卯莆田吳獻田刋本困學紀聞如此；此外如元刋本，明初葉刋本，清代刻本，以及各本周禮鄭注，都是作「詰」而不作「誥」。困學紀聞所以引這句書，是因爲周禮注比通行本的尙書多了一個「詳」字，並不是由於詰誥之異。孫星衍誤根據了萬曆吳氏刻本困學紀聞立說，僞刻舊雨樓藏本漢石經的人，又誤根據了孫氏注疏，結果弄巧成拙，露出了

破綻。所以，只這一個錯字，就足以斷定舊雨樓所藏的漢石經殘字，必然是僞刻的。

五、結語

從上舉的例子看來，對以讀書作消遣的人來說，板本的優劣，倒還無關重輕；對於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以及負有傳授知識之責的人來說，又怎能不注意圖書的板本呢？

原載「圖書館學報」，八期（民國五十六年五月），頁一——五

從目錄學的立場看中國古書的一些問題

從事學術工作，自然要憑藉資料。資料的範圍很廣，並不以圖書爲限；但，這裏所要談的，只是圖書的問題。中外古今的圖書，多得如恆河沙數，本人的學力淺薄，不能多談；這裏只談中國的圖書。如果探討圖書的內容，則每一部中國古書，都可以作一篇專文。這樣，固遠非筆者的學力所能勝任，而且也有不知從何處說起之感。現在所要談的，大致都是目錄學方面的問題，即：㈠圖書的眞僞問題；㈡圖書的著成時代問題；㈢圖書板本的優劣問題。

這三類的問題，除第二類外，其餘兩類，筆者在古籍導讀裏，都曾簡略地談到過。關於第二類，在拙著那本小書裏，也曾片段地涉及到一些。現在再總合這些問題，補充一些例證，草成本文，敬請方家教正。

一、圖書的眞僞問題

粗略地說，治學的人，可以分爲兩大階段。其一、是學習；其次，是研究。學習的目的，是

就自己所要學的範圍，把世人已有的知識學來，以備應用；一般的人，多是如此。研究的目的在創造；就是說：目的在發現新的理論，或發明新的器物，或糾正前人的、今人的錯誤等；這當然是才智之士，才能做到的。學習要求得正確的知識，研究要求得正確的結論；二者都必需憑藉資料。如果資料是假的，則學得的固然是錯誤的知識，而研究的結果也難得到正確的結論。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那麼，圖書的眞僞問題，就不能不注意了。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韓非子曾因儒墨兩家所說的堯舜，互不相同，而慨嘆着無法決定儒墨所說的堯舜，孰眞孰僞。司馬遷作史記，遇到可疑的史料，就「考信於六藝」。可見對於史料的辨別，中國的學者，早就注意到了。而目錄學家之辨僞書，則始以劉向的別錄。漢書藝文志，是劉歆（劉向之子）七略的化身，志中就有許多書注明是依託的。唐代柳宗元，已以辨僞書著名。宋代以來到現在，辨僞書的人更多。現在略舉幾個例子，以見僞書之不可不辨。

譬如人所共知的「十六字心傳」，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個字。宋代的眞德秀說這十六個字，是「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元明以來，絕大多數的學者，都認爲它是堯舜以來，直到孔孟所傳授的「心法」。但，這十六個字，是出於尙書的大禹謨；而大禹謨乃是一篇僞書。

原來，從東晉以來所傳的五十八篇本尙書，其中有二十五篇是僞作的。這二十五篇僞書，宋代的吳棫和朱子就懷疑它們；元代的吳澄作書纂言，就沒把它們列入書內；明代的郝敬和梅鷟，都曾提出了證據，證明它們是僞作的；到了清初的閻若璩，化了四十年的功夫，著成尙書古文疏

證一書，舉了一百多個證據，證明這二十五篇書確是僞作的；閻氏以後，也有不少人繼續舉列證據，以明其僞。於是這二十五篇是冒牌貨，就成了定讞。

這二十五篇僞書，多是摘錄古書中所引他書的文句，加以杜撰的句子，連綴而成。所謂十六字心傳的前兩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出於荀子所引的道經；末句——允執厥中，是從論語的堯曰篇取來的；再加上杜撰的「惟精惟一」一句，便成了「十六字心傳」。從哲理的觀點看，這十六個字，頗有精義；但，要說它們是「堯舜禹傳授心法」，那就絕對錯誤了。

再如晉代太康年間汲郡魏王墓中所出的竹書紀年，這書所記載的史事，比較其他書中的記載，正確得多。但，這書的原本，從南宋以後已經失傳了。到了明代，就有人作了一部假的竹書紀年。作僞者採錄了各書中所載片段的古史資料，胡亂地加上了年月，就成了現在所常見的本子。清代以來，不少學者就根據這書的資料，考證中國的古史。但，它所記載的史事，雖然有據；而那些史事發生的年月，既出於杜撰；某事屬於某王，又常常張冠李戴。這樣的書，怎麼能當作史料呢？到了道光年間，朱右曾才把許多古書中所引的眞本竹書紀年，輯錄出來，編成一部汲冢紀年存眞；後來，王國維又把朱氏所遺漏的資料，續加補輯，編成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書；近年范祥雍再加訂補，作成了一部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這些輯本，雖不是竹書紀年的全部；但，它們卻是眞本竹書紀年的殘餘。治學的人，自然要用王輯范補的本子，因爲它比朱氏的輯本完全些。至於徐文靖、陳逢衡、雷學淇等的箋註本，則都是假的竹書紀年。

又如雜事秘辛一書，記述漢桓帝選后的故事，一般人都以爲是漢代的作品。其中有「約縑迫

襪」一句，梁任公就曾根據這句話，說中國婦女纏足，始於漢代。但這書有楊愼的跋語，又有以作僞書著名的姚士粦，所作的跋，說它不是贋作。這眞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自露破綻。清代的姚際恆，說這書是王世貞所作；沈德符（敝帚軒賸語）、和今人張心澂（僞書通考），都說它是楊愼僞作的。後來梁任公已發現這書不是漢代的作品，也認爲是楊愼的僞作；於是只好承認自己的錯誤了。

以上雖然只舉了三個例子，已可見僞書影響之大。中國的僞書很多，僞書通考中就列舉了一千部以上。雖然這一千多部中，大部分只可說是有問題的書，而不能說是僞書；但，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又怎能不注意這個問題呢？

二、圖書著成的時代問題

一部書，或者一部書中的某些篇章，如果不能把它們著成的時代辨別清楚，則可能產生兩種後果：其一，是把史事（包括典章制度、思想史、文學史等）的發生時代弄錯亂了；其二，是把傳說資料當作了原始資料。把史事的時代搞亂了，固然是嚴重的錯誤；而傳說資料往往與史實不盡符合，自然不如原始資料之可貴。但，許多學者，往往不大注意這些問題，因而把甲朝的史事當作了乙朝，或把荒謬的傳述史料，當作了信史。因此，圖書資料產生在什麼時代，是不可以不辨的。

現在先談被認錯了時代的資料：

譬如周禮這部書，雖然漢武帝就以爲它是「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說它是「六國陰謀之書」，臨孝存甚至作十論七難來排斥它（以上並見周禮賈疏、序周禮廢興節）；宋代以來，懷疑它的人更多。但，一般學者，都還以爲它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是「周公致太平之書」。歷代談西周官制的著作，幾乎沒有不用周禮的資料當作史實的；常見的重要典籍，如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自然也不例外。可是，從周禮中所說的中國疆域（方萬里）、地望（兗州在河東）、稱謂（天子后稱夫人），以及五行、五帝、星野等詞彙看來，可知它的著成時代，決不會早到戰國以前；再從它所用的古字，如虣（暴）、䱷（漁）、飌（風）等，只見於先秦的鐘鼎文和甲骨文，而不見於漢代的書籍（包括說文）來看，知道它也決不是漢人的作品，更不會是劉歆所作。因而，現代的學者，已經斷定它是戰國時代的著作。而且，它所說的制度和官職，大部分是著者的構想；不但不是西周初年的史實，也不全是東周時代的法制。把它當成西周初年的史料，眞是謬以千里。然而，這個謬誤，竟延續了二千年；甚至現在還有不少學者，仍認爲它是周公的著作。

以上所舉，是整部書的例子；現在再以書中的一部分爲例。譬如詩經的商頌部分，在漢代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毛詩本國語（魯語）之說，以爲商頌是正考父從周太師那裏得來的；都是商代的作品。韓詩和史記，則都認爲是正考父所作，用以讚美宋襄公的；那麼，這些詩就都是春秋時代的作品了。王國維因爲這些詩的句子，多抄襲周頌和大雅；又因爲殷武篇說修建宮室的木材，是從景山採來，而景山是在商丘附近（卽宋國都城的郊外）；從而證明這些詩篇是西周時代宋人的作品。現在，我們從這五篇詩的風格來看，它們遠不如西周初年的周頌那麼古奧，卻和春

秋時代的魯頌相似；可知它們不但不會是商代的作品，也不可能是西周時代的產物。王國維說它們不是商代的作品，是很正確的；但以爲作於西周時代，就有問題。因爲除了上述的「風格」一點外，殷武篇所說「奮伐荆楚」的事，顯然是讚美宋襄公。如此說來，商頌一定是春秋時代宋人的作品。

商代有沒有詩篇，現在還不能肯定的說。但，有些講中國文學史的人，就把商頌當作了商代的作品。那就把中國文學的發展程序，給顚倒錯亂了。

茲更以書中的一篇爲例：尙書的文侯之命，書序說是周平王給晉文侯的命書，史記則說是周襄王命晉文公之辭。但，㈠晉文公不是晉文侯。㈡晉文公名重耳，和本篇所說的「義和」無關；而晉文侯名仇，則與義和有關。㈢本篇說：「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侵戎，我國家純。」這情形和周平王相合，和襄王不合。㈣本篇所載周天子賞給晉侯的物品，和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所載周襄王賞給晉文公的不合。從這些情形看來，文侯之命這篇書，一定是周平王命晉文侯的，而不是周襄王命晉文公的。我曾有「尙書文侯之命著成的時代」一文，辨證這事（見書傭論學集）。以太史公的淵博謹嚴，竟然也搞錯了。

以下再談傳述資料：

公羊傳說：「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一個事件的發生，在當時就有不同的說法；傳述的時代越久，距離事實的眞相就越遠。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以商紂的事蹟爲例：在西周初年的周誥裏，周人說商紂的罪惡，只不過是好安逸，不勤於政事，不好好地祭祀鬼神，沈湎

於酒，如此而已。到了春秋時代，商紂的罪惡，在傳說中已經增加了很多，以致引起了子貢的懷疑，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見論語子張篇）再到戰國，商紂的罪惡，竟增加到七十件（詳見古史辨第二册、顧某所作的「紂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一文）。如果商紂地下有知，一定會感到啼笑皆非了。

又如戰國策所載蘇秦對燕易王所說的故事，大意是：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之。這不過是假設的寓言，並不是眞有其事。到了劉向，就在列女傳中給這位烏有婦人(妾)立了傳，並且說她是周大夫周主忠之妾（這事史通雜說篇已說過）。像這種以寓言當信史、而又加名添姓的資料，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又怎能輕信呢？

中國古書中，傳述的資料很多，譬如尚書這部古經，從堯典到金縢，這開頭的十二篇中，除了禹貢和盤庚兩篇較早外，其餘都是戰國時人的述古之作；可是從漢代到民國初年（甚至現代還有很多人），談中國古史的，都毫不懷疑地採用了這些資料。但，如果拿考古學的資料和較原始的圖書資料對證之後，便知道這些述古之作，處處都是問題。先秦諸子中，雜有傳述資料的更多。自然，運用這些資料時，都應當特別小心。

上述尙書中的傳述資料，古人都把它們誤認爲原始資料，信而不疑，這是情有可原的。但，有些人明知是傳述的資料，卻當作原始資料一樣的來採用它們，理由是：傳述資料，也必定於古有據。這種見解，是值得商討地；試從前面所舉「紂惡七十事」、和「進藥酒」的故事，就可以證明所謂「必定於古有據」之說，是很不確實的。誠然，傳述的資料，也未必全不可信。不過，

要找到原始的、或比較原始的資料，加以互證後，才能決定它們的價值。

三、圖書板本的優劣問題

古書經過歷代的傳寫和傳刻，自然會發生很多錯誤。抱朴子說：「書三寫，魯爲魚，虛爲虎。」古人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大致說來，宋元以前的人，抄書和刻書，都還比較謹愼。到了明代，尤其萬曆以後，刻書的人，不但校對不仔細，並且任意刪節，於是錯誤叢出。概括地說，有下列兩個値得注意的問題，就是：㈠全本和節本的問題；㈡善本和誤本的問題。現在先談全本和節本的問題：

中國的古書，歷代多有節本。已經在書名中標明是節本的，人們可以一望而知它不是全本。但，有些刪節本，並沒標明刪節字樣，以致使一般讀者，都把刪節本當作全本。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如果不能辨別淸楚是全本或節本，對於運用資料來說，必然會發生嚴重的不良後果。

茲以陸游的家世舊聞爲例。現在所傳的家世舊聞，都是根據說郛本傳刻的。說郛所收的書，幾乎全都經過刪節，有些書被刪節得十不存一。家世舊聞這部書，說郛本只有七條；後來的刻本，自然也都是一樣；大家都不知道還有別的本子。但，現在臺北的中央圖書館，藏有一部舊抄本，其中的資料，卻有一百多條。如果有人硏究陸放翁的家世、故舊，以及有關的宋代史事，只能見到通行的七條本，而沒見到這一百多條的抄本，他所得到的結論，是否正確，雖難說定；而內容之不夠充實，則是必然的。

以上是刪節正文的例子；現在再舉一個刪節註文的例子。譬如史記三家註，是治學的人最常用到的一部書。在晚明到清初，大家常用的是「明監本」；清代乾隆以後，則公認爲武英殿本是最好的本子。而傳世的有宋代黃善夫的刻本，這個刻本曾經商務印書館予以影印；影印本後面，有近人張元濟的跋語，說他用黃善夫本校對監本和殿本的結果，發現三家的註文，在監本和殿本裏，都有刪節或脫漏的。尤其是監本，刪節的數量之多，着實驚人。茲據張氏校勘的結果，表列監、殿兩本所刪節或脫漏的三家註文之數量如下：

一、集解部分：

(1)明監本全刪的四九九條；刪掉一部分的三五條。

(2)清殿本全脫的三五條；脫掉一部分的七條。

二、索隱部分：

(1)明監本全刪的六一三條；刪掉一部分的一一二條。

(2)清殿本全脫的二五條；脫掉一部分的一九條。

三、正義部分；

(1)明監本全刪的八三七條；刪掉一部分的一五七條。

(2)清殿本全脫的五二條；脫掉一部分的四八條。

總計三家註被明監本全刪的共一九四九條，刪掉一部分的共三〇四條；殿本全脫的共一一二條，脫掉一部分的共七四條。由於板本的不同，其內容有這麼大的差異；讀史記三家註的人，又怎能

不注意板本的選擇呢？

至於善本和誤本的問題，這裏是指錯字的多少而言。現在就以水經註爲例：

明代各家刻本的水經注，經文和註文旣多混淆，錯字更處處都是。戴震用永樂大典本校對明刻本，除了改正經註混淆的地方之外，並且補入了明本所脫掉的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去明本妄加的一千四百四十八字，糾正明本臆改的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讀水經注的人，如果不用戴震的校本，必然會造成很多的錯誤。

再如明愼獨齋刻的文獻通考，是很著名的一個本子。但，這書的初印本，錯誤很多；經過建寧知府張氏、和邵武同知鄒氏的勘校之後，共計改正了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一個錯字（見本書卷末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愼獨齋主劉洪題記）。同一個刻本，初印本和後印本還有這麼大的差異；從事學術工作的人，對於圖書的板本的問題，就不能漠然視之了。

四、結語

以上所談的三點，只是「書包袱」的問題。但，這些問題，如果不能辨別清楚，則將成爲學術工作的絆腳石。而學術工作，千頭萬緒，勢不能每人都化上多年的功夫，從事這些問題的研討工作。爲了方便起見，有兩本書可供參考。卽：關於㈠、㈡兩點，可用張心澂編的僞書通考；關於第㈢點，可參考題爲張之洞著（實際上是繆荃孫作的）、而又由范希曾所訂補的書目答問補正。這兩部書，雖然不能把上述的問題，全部解決；但，對於不專門從事目錄學和板本學的人來

說，究竟方便多了。

原載新加坡「新社季刊」，三卷三期（民國六十年三月），頁四——八

編者按：本文係民國六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先生應新加坡南洋學會及新社之邀，所作之講演稿。越三日，新加坡南洋商報及星洲日報，均曾刋載；惟手民誤植頗多。



中文舊籍目錄板本項著錄舉例

民國三十年，余服役于國立中央圖書館，爲草擬善本圖書編目規則；時當抗戰堅苦之際，中央圖書館總辦公處僻處鄉村，參考書至感缺乏，故該稿殊多疏略。抗戰勝利後，中央圖書館藏書逾百萬册，爲急於應用起見，遂印行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此善本圖書編目規則稿，亦併入付印：書爲商務印書館出版，初版時日則三十五年九月也。爾時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已達十二萬册，余旣司善本圖書考編之事，因得徧窺全豹，遇有可以補訂舊稿之例，卽隨手劄記；如是兩載，所積頗多，因將該規則重訂一過，於三十七年秋蕆事。時中原戰事已急，京華騷動，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旋卽東遷，余亦浮海而東；斯稿藏之行篋，忽忽已三歲矣。竊念吾國舊籍之目錄，於板本項須求其詳，務在使人見其目卽確知爲何本，始能盡其用。而各公私家舊籍目錄，於此項往往著錄至簡，如云：「宋刋本」、「明刋本」等，固太簡略；卽如「元至元刋本」、「明嘉靖刋本」之類，亦未能著其特徵使人見其目卽知其書也。筆者有感於此，曩與中央圖書館特藏組同仁，曾發弘願，矯此舊習；顧以中原板蕩，斯業未竟。迄今思之，猶有餘喟焉。善本圖書之目錄，於板本項，固應詳悉著錄；卽普通本漢籍，亦應爾爾，此理易明。爰將斯稿之述板本部分，略加釐訂，用求正於方家。以其皆例證也，故以舉例標題。倘因此稿之刋布，而引起圖書館界之注

意，則企予望之矣。四十一年二月十四日附記。

一、板本之著錄，首朝代、元號、紀年，次處所，最後著板本之類別（如刋本、活字本、抄本等）。各項如有未具，且無法考知者，闕之。

例一　如明江西布政司刋蘇文忠公全集，可題云：明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刋本。

例二　如明茅元禎刻玉臺新詠，可題云：明萬曆己卯（七年）吳興茅元禎刋本。

例三　如會通館活字本文苑英華辨證，可題云：明正德丙寅(元年)錫山華氏會通館活字本。

例四　如小山堂鈔本唐闕史，可題云：淸雍正丙午（四年）仁和趙氏小山堂鈔本。

二、凡雕板之書，通稱「刋本」。

三、凡據舊本影摹上板，行款悉如原式者，曰「覆刋本」。其所據之祖本，應表著之。

例一　如明郝梁覆刻宋本太玄經，可題云：明嘉靖甲申（三年）郝梁覆刋宋兩浙茶鹽司本。

例二　如明袁褧覆刋宋本文選，可題云：明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吳郡袁褧覆刋宋廣都裴氏本。

四、凡確知爲覆刋宋本或元本，而不能詳其祖本刻於何年何處者可依其半葉行數，題云：某年某處覆刋宋幾行本、或元幾行本。

例　　如明正德間覆刋宋十行本孝經註疏（非修補舊板者），可題云：明正德六年覆刋宋十行本。

五、凡書板年久漫漶殘損，經後世修補印行者，曰「修補本」。其原刋及修補之年代與處所，應儘可能表著之。

例一　如明正德間修補元刋本金陵新志，可題云：元至正四年集慶路刋明正德十五年南監修補本。

例二　如明成化間修補宋本東萊集，可題云：宋嘉泰四年壽州呂氏刋明成化間修補本。

例三　如明弘治至嘉靖間遞修元刋本資治通鑑，可題云：元至元間興文署刋明弘治至嘉靖間修補本。

六、凡後人用舊板增刋評語或序跋等印行者，曰「增刋……本」。其原刋及增刋者之年代與處所，應儘可能表著之。

例一　如坊肆就宋本增刋評語之世說新語，可題云：宋寶慶三年劉應登刋宋元間坊肆增刋評語本。

例二　如明永樂間原刋正統間增刋序跋之守黑齋遺稿，可題云：明永樂十五年上虞葉氏刋正統五年增刋序跋本。

七、書有殘缺經抄補者，曰「抄補本」，或曰「配補……抄本」。其原刋者及抄補者之年代處所，應儘可能表著之。

例一　如藝風堂抄補元刋本草堂詩餘，可題云：元鳳林書院刋清江陰繆氏藝風堂影元抄補本。

例二　如配補舊抄本之宋刋麗澤論說集錄，可題云：宋嘉泰間壽州呂氏刋本配補舊抄本。

八、書有殘缺，以他本配補者，曰「配補……本。」其原本及配本之刋刻年代與處所，應儘可能表著之。

例一　如以元本配宋本之王狀元集註東坡先生詩，可題云：南宋末年建安萬卷堂刋本配補元盧陵書堂刋本。

例二　如以元彭寅翁刋本配補中統刋本之史記，可題云：元前至元二十五年安福彭寅翁刋本配補中統二年刋本。

九、凡名手寫刻之書，曰「某人寫刋本」。其年代及寫者，應表著之。

例　如元宋璲寫刋淵頴吳先生集，可題云：元至正二十六年金華宋璲寫刋本。

十、凡刻書人之地望，與刻書之處所非一地者（如書帕本等），應著其刻處。原題有用古地名者，應從其原題。其刻處可由刻者之官銜表現者，必要時得著其官銜。

例一　如詹事講刋緣督集，可題云：明萬曆癸未（十一年）詹事講宣城刋本。

例二　如孫甫刋直講李先生文集，可題云：明正德戊寅（十三年）南城知縣孫甫刋本。

十一、凡朝代元號已知，而刋板之年未詳者，可於元號下著一間字，曰「某代……（元號）間某處某氏刋本」。如並刋處未詳者，可但題云：「某代……（元號）間刋本」。

十二、凡朝代可定而元號年月未詳者，可題云：「某代某處某氏刋本」。如並刋處未詳，而能斷其爲某代初葉或中葉、末葉所刋者，可題云：「某代初葉刋本」，「某代中葉刋本」，「某

代末葉刋本」；或就其書口形狀及半葉行數，題云：「某代刋黑口（或白口、花口）幾行本」。

十三、凡朝代可定，而元號年月及刻處均未詳，但有刻板時編校人之題署者，可以編者或校者之姓名著錄之。

例一　如史朝富編刋之龍川文集，可題云：明晉江史朝富編刋本。

例二　如劉懋賢等校刋之海瓊玉蟾先生文集，可題云：明新安劉懋賢等校刋本。

十四、凡朝代可定，而元號年月及刋處均未詳，且無編校人之題署，但能審知爲官刻或坊刻者，可題曰：「某代官刋本」，或「某代坊刋本」。

十五、凡私家之齋室名，書坊之坊名，以及寺觀名號等，如原書中有題署者，應表著之。

例一　如沈辨之刻本韓詩外傳，可題云：明嘉靖間吳郡沈氏野竹齋刋本。

例二　如泰宇書堂刻本草堂詩餘，可題云：元至正癸未（三年）廬陵泰宇書堂刋本。

例三　如大明禪寺刻本天童覺和尚頌古集，可題云：元至正二年大明禪寺刋本。

十六、凡官刻之書，應著其官署名稱。如爲內府所刻而未詳其刻於何署者，可但題云：「內府刋本」。

十七、凡醵貲刻板之書，曰：「集貲刋本」。

例　如開元寺醵貲刻本之改併五靑類聚四聲篇，可題云：明萬曆二十七年晉安開元寺集貲刋本。

十八、凡叢書中之單本，曰「某某叢書本」；合刻書之單本，曰「某某合刻本」。

例一　如汲古閣刻本詩地理考，可題云：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刋津逮秘書本。

例二　如吳琯刋山水經合刻本之水經註，可題云：明萬曆十三年新安吳氏刋山水經合刻本。

十九、凡書板易主，新主用原板（未經修補）印行者，曰「某某印本」。原刋者及印行者之年代處所，應儘可能表著之。

例　如掃葉山房所印汲古閣刻本之十七史，可題云：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刋清初蘇州掃葉山房印本。

二十、凡以特殊墨色印行者，應依其墨色表著之。

例　如明內江蕭氏刋藍印本史鉞，可題云：明嘉靖二十七年內江蕭氏刋藍色印本。

二一、凡套印之書，朱墨二色者，曰「朱墨套印本」。三色以上者，曰「某某幾色套印本」。畫譜等書，以彩色印者，曰「彩色印本」。

例一　如元刋朱墨套印本金剛經，可題云：元至正初年資福寺刋朱墨套印本。

例二　如閔刻春秋公羊傳，可題云：明天啟元年烏程閔氏刋朱墨藍三色套印本。

例三　如彩色印十竹齋畫譜，可題云：明崇禎四年刋彩色印本。

二二、凡以公牘紙印者，應表著之。例如宋刋公牘紙印本北山小集，可題云：宋乾道淳熙間刋公牘紙印本。

二三、凡活字本，其活字以膠泥製者，曰「膠泥活字本」；銅製者，曰「銅活字本」；木製者，曰「木活字本」；不能辨識爲何種活字者，但曰「活字本」。

二四、凡著者手寫稿本，曰「手稿本」；他人清寫後經著者手自改訂之本，曰「手定底稿本」；他人清寫者，曰「清稿本」。

例一　如翁方綱手寫本復初齋集，可題云：清乾隆至嘉慶間著者手稿本。

例二　如桂馥手訂之晚學集稿本，可題云：清乾隆間著者手定底稿本。

例三　如沈炳巽續唐詩話清抄稿本，可題云：清乾隆間歸安沈氏清稿本。

二五、凡抄本之出於名家手筆者，曰「某人手抄（或寫）本」。

例　如王乃昭手寫本杜東原詩集，可題云：清初虞山王乃昭手寫本。

二六、凡藏書家倩抄手傳抄之本，應著錄藏書家之里籍姓氏及其齋室名稱。

例　如秦氏雁里草堂抄本廣川書跋，可題云：明嘉靖間錫山秦氏雁里草堂抄本。

二七、凡刋本或寫本卷子，曰「卷子本」。其寫本之傳寫年代或傳寫人未詳但能審其抄於何代者，可依其時代題云：「六朝人寫卷子本」，或「唐人寫卷子本」等。

二八、凡抄本之年月及抄者俱不能詳，但能審知其抄於何代者，可依其時代，題云「明抄本」或「清初抄本」等。如並時代亦不能確定，但能審知爲非近時傳抄者，可題云：「舊抄本」。

二九、凡抄本之年代及抄者俱不能詳，但能審知爲近時傳抄者，可但題云「抄本」。

三十、凡據舊本影寫而行欵無異者，曰「影鈔……本」。其所據之祖本，應表著之。

例一　如汲古閣影宋鈔本羣經音辨，可題云：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影鈔宋紹興壬戌（十二年）寧化縣學刋本。

例二　如小琅嬛福地影宋鈔本李羣玉詩集，可題云：清琴川張氏小琅嬛福地影鈔宋臨安府陳解元書籍舖刋本。

三一、凡據舊本影寫，但知原本之爲宋爲元（餘類推），而不能詳其爲何年何處刋行者，可題云：「影鈔宋幾行本」，或「影鈔元幾行本」。

三二、凡椎搨之本，以墨搨者，曰「墨拓本」；以朱搨者，曰「朱拓本」；以藍搨者，曰「藍拓本」；餘類推。椎搨之時代及搨者，如能審知，應依刋本例著之。

三三、凡鉨印鈐拓之本，曰「鈐印本」。鈐拓時代之處所，如能審知，應依刋本例著之。

三四、凡板式、書品等之特異者，應斟酌情形表著之。

原載「大陸雜誌」，四卷六期（民國四十一年三月），頁一六——一八

編者按：先生本文刋布後，昌彼得先生曾著「中文舊籍目錄板本項著錄舉例補訂」（大陸雜誌四卷十一期，民國四十一年六月，頁五）一文，訂補數條。後先生滙合兩文，略加修改，題曰「善本書目板本項著錄略例」，輯入與昌先生合著之「圖書板本學要略」中。

善本圖書之編目

什麼是善本圖書

從字面上看，所謂善本圖書，應該是它的本子比通行的本子好，因而才得到了這「善本」的嘉名。但實際上，一般收藏家所說的善本，乃是指罕見的本子而言；諸如宋元明等舊刻本、稿本、舊鈔本、批校本……之類。這些本子，固然多半比通行本好，但也有的並不及通行本。而且，無論是舊刻、舊鈔……等善本，它的影印本，即使和它的本來面目絲毫不爽，但收藏家也決不會把這影印本編入善本書目。如此說來，所謂善本圖書，正名定義，應該稱之為珍本圖書，才名符其實。只是善本圖書這個名子，沿用已久，本文姑且仍舊用它。

善本圖書，既然是難得的珍本，收藏家自然對它特別地愛護，而不肯使它受到些微的損傷。因此，收藏家或圖書館，對於善本圖書，總是專庫存放，而不讓它像普通書一樣無限制地任人借閱。借閱既受限制，收藏又有專庫，因而善本圖書，就需要另編目錄。

至於什麼本子才能够稱爲善本，實在沒有一定的標準。但大體說來，略如左列各類：

㈠唐、宋、元及明隆慶以前的刻本，或宋、元及明隆慶以前的活字本。

㈡明萬曆以後至近代的刻本或活字本之罕見者。

㈢朝鮮、日本之古刻本或古活字本。

㈣朝鮮、日本之近代刻本或活字本之罕見者。

㈤明以前鈔本，或近代鈔本之罕見者。

㈥名家鈔本。

㈦名家稿本。

㈧名家手批本，或手校本。

㈨名家手書題跋本。

以上所舉的九類，雖然不一定人人都同意；但，縱然有些出入，相差也不會太遠；這是可以斷言的。

善本圖書的分類與編目

㈠　分類問題

一談到編目，首先要解決的便是分類問題。所以在未談編目之前，先談一談分類。

就上面所舉的九類來看，它們通通是中國古籍（西文善本書，不在本文所論的範圍之內）。爲了編目者和閱覽者共同方便起見，以用四庫全書總目的分類法——卽經、史、子、集四部，部以下再分類，類以下更分屬——最爲適當。凡是需要閱覽善本圖書的人，他們大都具有四庫分類法的常識；因此，如果用四庫分類法，對於閱覽的人，自然方便些（此就分類目錄而言）。至於對編目的人來說，它的方便就更大。因爲一般的書，都已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因而關於某書應入某類，可以依樣葫蘆，不須更煩推敲。偶爾有上述兩目錄未收的書（多半是集部書），也可以比照其他已著錄的書分類；既然有所依傍，在分類上當不至於鬧大笑話。不過，自宋代已經有了叢書；到了明代，刻叢書的風氣更盛。所以，在善本書裏，叢書也佔着相當多的數量。四庫總目，是把叢書放在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裏。那是因爲許多刻在叢書中的書，四庫總目已個別地分著於各類；因而沒有再著錄那些叢書的必要。而所著錄的叢書，它的內容，多半是刪節之本。所以四庫總目中著錄的（包括存目）叢書特別少。我們要知道，圖書的分類，和學術的分類，雖然息息相關，而有時卻不盡一致。四庫全書是手抄的，各書或合或分，是可以任意的；因而四庫館臣可以用「類」來操縱「書」。收藏家或圖書館所收的書是定型的，分類就必須受書的控制。叢書的數量，在善本書裏既然也很多，自應把它從「附庸」中提拔出來，使它成爲大國。因此，我主張善本書應該分經、史、子、集、叢五部。

(二) 編目問題

善本圖書，應該備有三種目錄，卽：卡片目錄，書本目錄，和善本書識。而卡片目錄，至少也當備具三種，卽：分類片（或標題片）、書名片、著者片。茲分述如左：

一、卡片目錄

圖書目錄，是爲了閱書人檢查方便而設。而閱書人之尋找圖書，大致不外下述的三個目的：

（甲）找某類的書　譬如閱書人打算研究儒家的學說，他自然要想知道這個圖書館所藏的儒家類的書，究竟有些什麼。

（乙）找某一部書　閱書人所要找的書，只記得一個書名；他既不知道這部書是屬於何類，也不知道它是何人所作。

（丙）找某人的作品　閱書人希望知道某人的作品，在這個圖書館裏，究竟有些什麼。或者，閱書人要找的書，把書名給忘記了，而只記得它的著者。

閱書人之尋找圖書，不外上述三種情形。爲了應付甲種情形，就需要準備一套分類卡片或標題卡片；應付乙種情形，就需要準備一套書名卡片；應付丙種情形，就需要準備一套著者卡片。有了這三種卡片（附帶的卡片，如分析片、互見片等，自然愈完備愈好。）對於閱書人就可以應付裕如了。

善本書目的要點，是在板本項著錄的詳確（詳書本目錄節）。至於各種卡片的格式，則完全和普通本的卡片一樣，這裏不再敍述。

二、書本目錄

卡片目錄的好處，是因爲它是活動的，是隨時可以增減的。而書本目錄則是定型的，它的內容是不便隨時增減的。但卡片目錄，只能做一兩份，陳設在圖書館裏；而書本目錄，則可以大量印行，流傳遠方。善本書既都是罕見之本，又不能輕易外借；因而閱者爲了要看某一個本子，就常常不遠千里而來。那麼，遠方的人，要想知道某圖書館的藏書情形，就只有憑藉着書本目錄了。所以卡片目錄和書本目錄，不但是並行不悖，而且是相得益彰的。

同一部書，由於板本不同，它的內容往往有很大的差異。譬如宋人王楙作的野客叢書，本來是三十卷；中央圖書館所藏的明嘉靖間王穀祥刻本，還是如此。後來刻在稗海和寶顏堂秘笈裏面的，就只有十二卷了。又如二十四史裏的南齊書，從明北監本以後，所有的刻本，都缺了四葉；到了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才找到了較好的宋本，補上了兩葉。這類的情形，在古書裏很多。至於各個本子在字句上的差異，那就更多了。由於上述原因，所以善本書目的板本項，著錄得必須詳確；務必使人看到了書目就能够知道它們（善本書）是些什麼本了。

至於著錄板本的方法，可以參看昌彼得先生和筆者合著圖書板本學要略中的「善本書目板本著錄略例」節(又分見大陸雜誌四卷六期和同卷十一期)；這裏不再詳說。關於善本書目的格式，則有各藏書家和圖書館的善本書目，可供參考，本文也不必詳談了。

三、善本書識

善本書識，是善本圖書的個別小傳。關於該書的內容，和該書著者的生平，本來也應該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例，作一個大略的敍述。但因爲一般的善本圖書，雖然「本子」稀罕，而其「

書」則係常見的；它們的內容和著者的生平，多已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書。因此，一般的善本書識（或稱題識、題記等），除非遇到沒經過著錄的罕見之「書」外，就不再敍述書的內容和著者的生平了。善本書識，固然沒有一定的形式；但下列的幾點，最好能顧到：

(1)板式行款。（板匡寬長尺寸，邊闌情形，每半葉若干行、行若干字，每卷開首書名標題和著者標題等情形，板口形狀，魚尾形狀，書耳等。）

(2)牌記或題識。（刻書者每有牌記或題識，附刻於序文之末，或目錄之末，或各卷之末；應記其形狀及語辭。）

(3)刻工姓名。（應一一列舉其名）

(4)避諱字。

(5)收藏印記。（重要之收藏印記，應一一記明；並應著明其印記之爲方、爲圓、或其他形狀，以及印文之爲陽爲陰。）

(6)缺卷缺葉。

(7)批校題跋。（批校本，最好能略述其要點；題跋本，應附錄題跋的原文。批校者、題跋者之生平或軼事，如有敍述的必要時，也可以敍入。）

(8)校勘記或該本的優點。

以上所舉的八項，第(1)至(4)項，是記述該本的特徵；目的在使人藉以認識這個本子，並可據以推斷該本之出於何本。第(5)項是爲了可以推證該本的收藏源流。第(6)項是爲了使人知道該本可以利

用的程度。(7)、(8)兩項，是爲了使人知道該本在學術上的價値。此外如墨色的特異（如紅色、藍色等），裝訂的別緻（如蝴蝶裝、梵夾本等），以及購買的價格……等，都可以任意敍述；不過，在致用方面來說，這些就無關弘旨了。

考訂善本圖書應用的最低限度之參考書

考訂善本圖書，所需用的參考書，非常的廣泛。凡各史的藝文志、經籍志，補各史藝文志、經籍志，各公私家藏書目錄，各家讀書記、題跋記，影印的善本書，善本書影，乃至方志裏面的藝文志，都是可以供參考之用的。規模宏大的圖書館，關於上述諸書，自然可以兼收並蓄；編目的人，也自然可以取之左右而逢其源。但規模較小的圖書館，無力收買大量的圖書；那麼，關於參考書的選購，就要有個輕重緩急了。在圖書板本學要略裏，曾經列了一個考訂善本應用之最低限度參考書目錄（附有提要），即爲規模較小的圖書館而設；茲再將那個目錄，轉錄於此。不過，圖書板本學要略一書，已經出版；此時此地，又最容易買到，所以本文把它加了進去。至於原目錄裏面的提要，本文就從略了。

甲類（關於板本學常識的）

書林清話十卷　近人葉德輝撰　民國九年長沙葉氏觀古堂刋本，又上海掃葉山房影印本。

書林餘話二卷　近人葉德輝撰　民國十七年上海澹園排印本。

圖書板本學要略四卷　屈萬里、昌彼得合撰　民國四十二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排印本。

乙類（關於考訂書名、卷數、著者等項用的）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清黃虞稷編　適園叢書本，又上海中國書店影印適園叢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　清紀昀等編　傳本很多。民國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後附書名索引，便於檢閱。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卷　清阮元等編　民國二十年雙流黃氏濟忠堂刋本，又大東書局石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附錄本。
四庫全書總目索引四卷　今人陳乃乾編　民國十五年上海大東書局石印本。
販書偶記二十卷　今人孫殿起編　民國二十五年北平通學齋排印本。
禁書總目二卷附錄一卷　今人陳乃乾編　民國二十一年北平富晉書局排印本。
叢書大辭典不分卷　今人楊家駱編　民國二十五年排印本。

丙類（關於考訂本用的）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二十卷附錄一卷　清邵懿辰編　清宣統三年仁和邵氏家刋本。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　清莫友芝編　上海國學扶輪社排印本，又掃葉山房石印本。
宋元本行格表二卷附錄一卷　清江標撰　靈鶼閣叢書本，又民國三年上海文瑞樓石印本。

日本訪書志十六卷　清楊守敬編　清光緒間宜都楊氏刋本。
明吳興閔板書目一卷　近人陶湘編　民國二十七年陶氏排印本。
寶禮堂宋本書錄四卷附錄一卷　近人潘宗周編　民國二十八年排印本。
文祿堂訪書記五卷　今人王文進編　民國三十一年北平文祿堂排印本。

上列這個最低限度的參考書目，眞是低到無可再低。不過，本文的目的，是爲了在藏書較少的圖書館裏初習善本編目之人而作，實在不值得方家們一哂：這是筆者應當聲明的。

原載「主義與國策」四十二期，（民國四十四年一月），頁九——一一



子部雜家類之新的分類問題

一、前說

在我國圖書的分類史上，其歷時最長久、採用最普遍的，莫過於四部分類法了。清代四庫全書編成之後，關於四部的子類（四庫目錄所謂類和屬），分析得更詳密而精確；加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之廣泛的流傳，於是二百年來，這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對於編中國古書書目的人，幾無人不奉爲寶典。它的勢力，至今不衰。

可是，我們站在現代學術分類的立場來看，這四部分類法就大成問題了。尤其是經、子兩部，從它們的內容來看，實際上都相當於杜威十進分類法總類之中的叢書。因爲周易、論語、孝經、孟子，是屬於哲學類的；詩經是屬於文學類的；爾雅和說文等，是屬於語文類的；尙書和春秋三傳，是屬於歷史類的；三禮，則是屬於社會科學類的；這不是一部兼收並蓄的叢書嗎？再看子部：儒家，應當屬於哲學類；術數、釋家、道家，應當屬於宗教類（有些書也可入哲學類）；

兵家，法家，應當屬於社會科學類（有的書也可以入哲學類）；天文算法，應當屬於自然科學類；譜錄，應當分屬於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兩類；農家、醫家，則都應當屬於應用技術類；藝術，應當屬於美術類；小說家，應當分入文學類和雜史類。類書和雜家，則都應當屬於總類。這樣說來，若把子部當作一部大叢書，更是名符其實，而當之無愧了。

以上所說，是四部分類法之不合於現代學術分類的最顯見的地方。不過，這些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要談的主題。今天所要談的，是關於四庫書目中雜家類之新的分類問題。四庫分類法，雖然有很多地方和現代的學術分類不合；但，它於雜家類中所分的子類，卻仍當爲我們所取法。

二、四庫書目雜家的分類

雜家之名，在漢代就已經有了。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裏，著錄了雜家之書二十家；藝文志給予雜家的界說，是：「雜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從「兼儒墨，合名法」六個字來看，從漢志所著錄的那二十種雜家之書來看，知道那時所謂雜家，只不過相當於四庫書目雜家類的雜學之屬。從漢志以後，各史經籍志、或藝文志，以及公私家藏書目，在子部裏，無不有雜家一類。然而把雜家一類，再條分縷析的分出若干子類，而又非常確當的，則莫過於四庫全書總目了。

四庫總目，把雜家分了六個子類（叫做「××之屬」）。每一子類，並且分別給以界說。茲把這六個子類和界說，列述如下：

㈠雜學之屬　　立說者謂之雜學

㈡雜考之屬　辨證者謂之雜考

㈢雜說之屬　議論而兼敍述者，謂之雜說。

㈣雜品之屬　敍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品。

㈤雜纂之屬　類輯舊文、塗兼衆軌者，謂之雜纂。

㈥雜編之屬　合刻諸書、不名一體者，謂之雜編。

像呂氏春秋、淮南子一類的書，都屬於雜學之屬；困學紀聞、日知錄一類的書，則屬於雜考之屬；論衡、夢溪筆談一類的書，則屬於雜說之屬；雲烟過眼錄、遵生八牋一類的書，則屬於雜品之屬；意林、說郛一類的書，則屬於雜纂之屬；至於雜編之屬的書，就是通常所說的叢書。有了這六個子類，關於雜家的書，不但可以囊括無遺，而且也都能够各得其所了。

三、子部雜家類之新的分類問題

除了以國學爲主的圖書館之外，一般性的圖書館，對於各科圖書，都不能不兼收並蓄。四部分類法，固然不能够容納那些日新月異的圖書；而西洋的圖書分類法，也不是中國圖書之腳的合適的鞋子。想着鎔合中外圖書於一爐、而編成一部理想的圖書分類法，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幾十年來，已經有不少的人在這方面賣力氣。他們的方法，不外兩途：一種是削中國之足，以就西洋之屨；再一種辦法，便是修理西洋之屨，以適中國之足。而這兩種辦法，不但可以並行不悖，並且是相得益彰的。譬如前述的經子兩類，如果用新的分類法去編目，就不能不削足適屨；

而今天所要談的子部雜家類之新的分類問題，則一方面需要削足，一方面也要修理鞋子。

四部分類法，到了四庫總目，其細密精確，固然是前無古人；但我們以現代的眼光看來，那問題就很多，前面已經約略的說過了。關於子部雜家類，最顯著的兩個問題，便是：

(甲)雜學之屬，既然都是談哲理的書，就不能不把它們改入哲學類。

(乙)雜編之屬，既然都是叢書，就不能不把它們改入叢書類。(四庫書目所以不闢叢書類的原因，一則因爲那時叢書的數量比較少。再則因爲各叢書中所收的書，都已個別的散入四庫全書的各類，如果再收叢書，便是重出；所以只存叢書之目，而入於子部，叫作雜編之屬。今日的叢書越來越多；圖書館又不能像編四庫全書似的，把叢書拆散分入各類，所以必需另有叢書類。)

上述兩點，卽是所謂削中國之足以就西洋之屨者。至於其他四點——雜考、雜說、雜品、雜纂，就必需修理西洋之屨以適中國之足了。

西洋分類法，在世界上流行最普遍、而且爲我國各圖書館所最樂意採用的，莫過於杜威的十進分類法。我國人士所編的新分類法，幾乎無一不以杜氏的分類法爲藍本。在杜氏分類法的總類中，有一個中類，大家翻譯作「各科論文叢輯」或「各科論叢」……的，便是我國從事編目的人，放置雜考、雜說……等書的地方。

用「各科論文叢輯」這一園地，來堆積「雜考」、「雜說」……等類的書，在原則上說是可以的。但雜考、雜說、雜品、雜纂，其「雜」的外表雖同，其內容則各不相似。如果不分細類，

而只混入「各科論文叢輯」一名之下，那是不合於「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之道的。但，常見的分類法，往往都忽略了此點；開始注意到這一點的，以我個人所知，似乎以何日章先生的「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爲最早了。

在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的總類裏，有這樣一個中類和小類：

普通論叢；國學

070 普通論叢
071 雜　考
072 雜　說
073 雜　品
074 雜　纂
077 講演集
078 現代普通論文集
079 國　學

這樣把雜考、雜說、雜品、雜纂分別標出，使它們各佔一個小類，既合於「分別部居、不相雜廁」的原則；對於編目的人，尤爲方便。因爲一般編目的人，勢不能對於我國古書，人人都能够深切了解；而雜家類的書，尤其是不容易遽辨其內容的。有了這些依照四庫書目的類別，則遇到四庫著錄或存目的書，固然可以按圖索驥的依照着四庫總目分類；即使遇到不見於四庫總目的書，也可以參考四庫總目提要，而比照着分類了。

不過，這一中類的標題，用「各科論文叢輯」、或「各科論叢」、或「普通論叢；國學」等，

似乎不如只用「雜著」二字，比較混成些。至於「四雜」以外的其他小類，如何安排，自然也各有見仁見智之不同；那就不是今天所要談的問題了。

原載「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六期（民國四十五年八月），頁二——三

「中國目錄學史」

著　者　許世瑛
出版者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定　價　新臺幣拾陸元

吾國目錄之學，雖已有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但國人以專書的形態，作系統之敍述的目錄學史，卻不多見。以筆者所知，第一部是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姚名達的中國目錄學史，第二部便是許世瑛先生的這本書了。

本書共分十二章。十二章的標題，是：第一章、緒論；第二章、目錄之權輿；第三章、分類編目之創始；第四章、四部分類之嚆矢；第五章、七分法之目錄；第六章、四部分類法之確立；第七章、隋志以後之各史藝文志；第八章、隋志以後應用四部分類法官修目錄；第九章、隋志以後應用四部分類法私家所修目錄；第十章、四部分類法目錄之別派；第十一章、不守四部成規之

目錄；第十二章、專科目錄與特種目錄。章下分節，節下有的更分子目；綱舉目張，條理密察。在結構方面來說，比起姚書來顯得嚴謹而整飭。

本書除第一章緒論，係詮釋目錄、目錄學、目錄學史之定義外；自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則述歷代藏書目錄及史志；末章則擇要敍述專科目錄及特種目錄。而於歷代史志及藏書目錄之有承先啓後之功的，則敍述特詳。就體例說，大致是以時代爲綱，以史志及其他書目爲目：使讀者讀過本書之後，對於本國目錄學之流變和得失，可得一原原本本的知識。而姚書則以類別爲綱（如：溯原篇、分類篇、體質篇……），以時代爲目。用史書的分類來作比喻，則本書近似編年體，姚書近似紀事本末體：兩書在體例上的不同，大致是這樣的。

就內容來說，本書在敍述史志和其他目錄時，分類和體質並重，不像姚書的分門別類，各立專篇。至於姚書裏的校讎篇和宗教篇等類史料，本書則皆略而未收。本書著者在例言中說：「本書對於宗教目錄，以其性質特殊，且爲篇幅所限，致未能述及。」這是宗教目錄之未被敍入的原因。而校讎之學，和圖書板本學一樣；它們本來雖都是目錄學的近支。但到後來，卻都已由附庸而升爲大國；於是析產分居，另立了門戶。本書對校讎及板本兩方面，沒特別地加以敍述（姚書於板本學亦未專篇），當是這個原因。至於取材方面，則本書對於歷代私家書目的敍述，所據的材料，較姚書爲多。而在史實方面，則近年以來，吾國受西洋圖書分類法之影響而編輯的目錄，本書均未之及。不知道本書作者的意思，是敍述目錄史實，以清末爲斷呢？還是另有說法呢？

大抵本書之作，是眞能把握着了「史」的要點；和史無關的話語，如姚書中的：分類之原

理、類之字義、事物之分類……等枝蔓之語，本書一概沒有。所以筆者的觀感，以爲姚書近似中國目錄學概論，而本書纔是眞正的中國目錄學史。

至於本書裏有些細枝末節，也頗有可商之處，如第十二章第四節「特種目錄略述」裏，列有「解題目錄」和「敦煌寫本目錄」（姚書同）。前者和四庫書目提要及各家讀書志一樣，似不宜算做「特種」；而後者又可依其性質，將各種有關敦煌的目錄，分入各類，而不必專標與其他特種目錄不類的「敦煌」之名。此二者，還可以說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至於像行篋目錄、待訪目錄、鬻書目錄（如汲古閣宋元本書目之類）、辨僞目錄等，似乎都應當列在特種目錄裏，而本書則皆未之及（姚書有辨僞目錄——原本「僞」字訛作「譌」——）。但，這些都是無關宏旨的。

原載「學術季刊」，三卷三期（民國四十四年三月），頁一三六



擬拓片編目規則

前國立中央圖書館，於民國三十五年印有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一書（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附有拓片編目規則。言拓片編目規則而以條例之形式出之者，此其嚆矢也。顧其規則，在灌輸常識上之作用較大，而於實際應用上之作用較小。爰於三十七年十月，趁工作之暇，草擬此稿。屬稿纔畢，而戰亂已急，旋避地來臺。此稿投諸篋底，已淡忘之矣。頃者，圖書雙週刋索稿，爰檢出付印。甚望博雅君子，有以惠正之也。四十三年四月八日，時客臺灣逾五歲矣。

拓片編目規則

第一章　通則

一、本規則適用於不能編入圖書中之拓片，如單幅，卷軸，册頁等。

二、凡影摹、雙鈎、影印、石印之拓片，如爲單幅、卷軸、册頁等形狀，而不能編入圖書中者，

亦依本規則編目。

三、拓片應備卡片及書本兩種目錄。

第二章 卡片目錄

(一) 總記

四、卡片目錄，應備下列三種；

(1)名稱卡片

(2)作者卡片（包括撰文者、書畫者、題額者）

以上二種，用檢字法排列。

(3)排架卡片

右一種，依拓片分類法排列。

五、第四條(1)(2)兩項，遇必要時，得各編製分析卡片，引見卡片等。

六、卡片目錄，應著錄下列各項。各項如有未具者。闕之。

(1)拓片名稱。附數量。

(2)作者（包括撰文者、書畫者、題額者）。

(3)時代

(4)板本

(5)原器所在地，或出土處，或收藏者。

(6)附註

(7)號碼

七、卡片之行格仿圖書卡片之行格：拓片名稱，視書名；撰文者、書畫者、題額者，視著者、註釋者；時代，視出版時；板本，視出版處；第(5)項，視稽核項；(6)(7)兩項，悉同於圖書卡片。

八、名稱卡片之行格，仿圖書書名卡片；作者卡片之行格，仿圖書著者卡片；排架片之行格，仿圖書分類卡片。

(二) 拓片名稱（附數量之稱謂）

九、拓片以原器之名稱爲名稱。但如銅器之僅拓款識及器形，或造像之僅拓題記不及形像者，應盡可能於名稱中表現之。

一〇、甲骨文字僅殷代有之，名稱上可無庸著其朝代。其他器物，應儘可能表著之。如「周毛公鼎」「秦瓦鋸」「唐開成石經」等。

一一、凡拓片彙集成册，題有總名者，應就其總名著錄。其內容有分著之必要時，應作分析卡片。

一二、凡甲骨刻辭之單幅拓片，應就其文字之要點，定其名稱。
一三、凡銅器陶器等之有款識者，應就其作器之人，定其名稱。銘文中不著作器人名者，應就其銘文之要點，定其名稱。
一四、凡銅器陶器等之無款識者，應就其花紋或其他特異之點，定其名稱。
一五、凡石刻之有題額者，應從其題額；無題額而另有標題者，從其標題；有題額又有標題，而二者不一致者，應從其爲世人所習用之名稱，而註其另一名稱於附註項。
一六、凡有題額或有標題之石刻，應照錄其題署之全文。
一七、凡石刻之無題額又無標題者，應尋繹原文，定其名稱。
一八、凡石刻原有本名，而流俗相沿，又別立名稱者，應仍用本名，而註其俗名於附註項。
一九、凡題名、經幢、造像等之出於多人者，應以第一人爲代表，名下著一「等」字。
二〇、凡有蓋之器，於名稱之末，著「并蓋」二字；僅存器蓋者，於名稱之末，著一「蓋」字；器本有蓋，後世亡佚者，於名稱下加括號，著「蓋佚」二字。石刻之有題額者，其著錄之例仿此。
二一、拓片數量之稱謂，凡單幅者稱「幅」，裝訂成册者稱「册」，左右捲舒者稱「卷」，立幅稱「軸」。

(三) 作者

二二、凡撰文者，書畫者，題額者之著錄，姓名上並著其朝代。姓名下，於撰文者，題曰「撰文」；書者，曰「書」；畫者，曰「畫」；題額用篆字者，曰「篆額」，用隸書，正書等者，曰「題額」。

二三、凡原器不著撰文人、書畫人、題額人等姓名，但可以考知者，應據考定者著錄之。

二四、凡撰文人，書畫人，題額人之署名，係後人補刻，而實錯誤或誤否未定者，應仿圖書例，曰「題某代某人撰文」或「題某代某人書」等。

二五、凡書或畫之成於眾手，三人以內者，應全部題著其姓名；三人以上者，以第一人爲代表，其下著一等字。

二六、凡舊器已佚，後人重書付刻者，曰「某代某人重書」。

二七、凡後人集前人所書之字付刻者，曰「某代某人集某代某人書」。

二八、凡帝王之姓名，以其廟號代之。

二九、凡撰文人，書寫人，題額人，有二項出於一手者，題曰「某代某人撰文並書」，或「某代某人書並題額」等。三項具出於一手者，題曰「某代某人撰文並書兼題額」。

(四) 時代

三〇、凡金石等有元號年月者，應著錄之。

三一、凡銅器之僅有干支，而不能知其爲何王何年者，即不必著錄其干支。

三二、凡石刻撰文之年月與立石之年月不同者，以立石之年月為準。

三三、凡石刻之年月未詳，但能知其約略時代者，可但著元號，如「唐開元間」「宋元豐間」等。

三四、凡石刻於元號下但著干支者，應於干支下加括號註明其年數。

三五、凡碑帖等之重刻者，除著其當時年月外，並應著其重刻年月。

(五) 板本

三六、凡傳搨之本，通曰「拓本」。傳搨之年代及傳拓人，應仿善本圖書例，儘可能考證著錄之。

三七、傳搨之確實年月未詳，但能知其出於何代者，可依其時代，題曰「宋拓本」「元拓本」「明拓本」等。

三八、清代搨本，能審知其出於初葉或中葉者，可題曰「清初拓本」「清中葉拓本」。出於晚清至現代者，但題曰「拓本」。

三九、傳搨之年代未詳，但能審知其非近代所搨者，曰「舊拓本」。

四〇、凡以朱色或藍色等傳搨者，曰「朱拓本」或「藍拓本」等。

四一、凡鈎勒者，曰「雙鈎本」。墨填雙鈎本空處，使字呈白文如搨本狀者，曰「廓填本」。依原文形狀縮寫者，曰「縮摹本」。其年代及處所，如能審知，應仿影鈔善本圖書例著錄之。

四二、凡影印者，曰「影印本」。其影印之年代與處所及所據之祖本，如能審知，應仿影刻善本圖書例著錄之。

四三、凡石印本、放大本、縮印本，應各著其印製之年代及處所。

四四、凡彙集各種拓本為一編，其拓本不出於一時或一處者，應依拓本之要點，斟酌情形表著之，曰「彙集……拓本」

(六) 附註

四五、凡重刻，仿刻，或贋品等，其情形未能在名稱或作者兩項中表出者，應附註之。

四六、凡銘文字數或行款等，應附註之。

四七、凡釋文，題跋等，應附註之。

四八、凡曾經名人收藏，有印記可證者，應附註之。

四九、凡石刻之書體，為篆、為隸、為正書、行書、草書等，應附註之。

五〇、凡原器之出土處所及時日，或所在地，或收藏者，應各就其情形附註之。

五一、凡石刻之有立石人或刻字人者應附註之。

五二、凡殘缺不完者，應附註之。

(七) 號碼

五三、號碼寫於左上角，上層寫分類號，下層寫作者號，角下空一格寫登錄號。

第三章　書本目錄

五四、書本目錄，應著錄下列各項。各項如有未具者，闕之。

(1)拓片名稱，數量。以上兩項連書。

(2)撰文者、書畫者、題額者、書體。

以上各項，以小字雙行夾註於數量之下。

各項中間空一格。

(3)時代

於(2)項下空一格著之。

(4)板本

於(3)項下空一格著之。

(5)原器出土處，所在處，收藏者。

於(4)項下空一格著之。

(6)考釋者，題跋者。

於(5)項下空一格著之。

(7)殘缺

於⑹項下空一格著之。

以上凡不言小字雙行者，皆大字單行。

五五、第五三條⑴至⑺項之題著，依第二章至第六章中與此有關之各條定之。

五六、拓片次序之排列，先依分類表分類，再依拓片之時代，次其先後。

原載「中華日報」，六版，圖書雙週刊四期，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讀古書爲什麽要講究板本

一、引言

記得章太炎先生有幾句話，大意說：

讀書何必講究板本？我平生專讀石印本的書。

以太炎先生學問之精深博大，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眞不能不說是智者千慮之一失。黃蕘圃的學生某，也曾發過這種議論，顧澗蘋就給以很不客氣的申斥。顧氏跋黃蕘圃藏本蔡中郎文集（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云：

書（里案：此指板本說）以彌古爲彌善，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乃世間有一等人（原注：其人蕘翁門下士也），必謂書無庸講本子。噫！將自欺耶？欺人耶？

「書（板本）以彌古爲彌善」，這句話雖然不能說是不刊之論，但也確不是欺人之談。因爲古書傳到現在，不知道已經過若干次的傳抄和若干次的刻板，每一次傳抄和每一次刻板，都難免有錯

誤的地方。所以越古的本子，錯誤應該越少，這是很容易明瞭的道理。

但是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七）裏，記述着這樣一個故事：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惶恐，乃謝曰：「某當罰。」卽輸罰，改題而止。

這一段有趣的故事，曾經被不少人引述着，用以諷刺崇拜宋板書的人。以爲宋板書也還是有錯誤，而現在的通行本卻有很多是沒有什麼錯誤的。

是的，宋板書也還是有錯誤，而現在的通行本卻有很多是沒有什麼錯誤的。但是，這些沒有什麼錯誤的通行本，必然是根據着沒有錯誤的古本傳下來的。假若沒有不錯誤的古本，而易經這部書，只有那一個麻沙本的謬種流傳下來，那麼，元明以後的傳本，豈不都是「坤爲金」了嗎？所以，顧澗蘋的話，確不是欺人之談。

筆者並無佞宋之癖，也決不鄙棄沒有錯誤的近代刻本而盲目的推崇有錯誤的古本。本文的旨趣，乃在說明讀古書爲什麼不能不講究板本。這個道理雖不太繁難，但說來卻也一言難盡。

二、欲辨圖書真僞不能不講究板本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宋人眞德秀所謂十六字的心傳，是「

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這說法八百年以來深深地牢籠着人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著成後，到現在雖然已近乎三百年，但依然還有不少人，在信奉着眞德秀的「謠言」。其實，這十六字的心傳，正像兩位各自衒耀眼力好的近視眼者所爭論的關帝廟裏的匾一樣，不管他們怎樣地言之鑿鑿，而那匾壓根兒沒有掛。至於堯舜禹有無其人，那還是另外的問題。

因爲所謂心傳的十六個字，是出於現在還流傳着的古文本尚書中的大禹謨篇。這個古文本尚書，是晉人梅賾編定的。大禹謨這篇書，不是伏生所傳，漢熹平石經本尚書裏，自然也不會有它。它和其他的十幾篇古文尚書，同樣是梅賾僞造的冒牌貨。而這梅本的尚書，卻欺騙了學子一千多年，直到清初閻百詩才把它那秘密揭發。甚至於到現在還有不少人不知道它是僞本。

其次，像竹書紀年，他在史學書裏，佔有重要地位。但現在的通行本，卻不是晉太康年間，汲冢裏的眞貨，而是後人仿製的僞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曾列舉證據，證明現行的本子，不是後魏酈道元所見之本，不是唐劉知幾、李善、瞿曇悉達、司馬貞、楊士勛等所見之本，也不是宋王存、羅泌、羅苹、鮑彪、董逌等所見之本。因而四庫館臣疑心它是「明人鈔合諸書以爲之」。這話雖然還不成定論，但現在通行本竹書紀年是假書，不是汲冢眞本，卻是毫無疑義的。

因此，清人朱右曾便把古書裏所引的竹書紀年之文輯錄出來，編成了汲冢紀年存眞二卷；後來王國維先生又加以校補。編成了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刋入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更後，錢穆先生又把它校補了一番，列在先秦諸子繫年考辨裏。這些輯本，所收的竹書紀年原文，雖已無多，但卻是眞貨。所以，我們如果採用竹書紀年的史料，只有根據這些輯本。而輯本中如果見

到王、錢兩氏之本，那麼，朱本也就可以不讀了。

以上不過舉兩個爲人所熟知的例子，古書類此似的僞本多得很，假若不弄明白是什麼本子，那麼你所得到的知識，很可能都是假的；倘若你根據僞本的材料而有所撰述，那便是自欺欺人。這樣說來，讀書能不講究本子嗎？

三、欲知圖書有無殘闕不能不講究板本

眞正做學問的人，對於一部書，必定要讀它的全本，決不肯只讀殘本或節本，這道理是無庸說明的。但，如果不講究板本，就有很多殘本書和節本書而被人認做全本。

家傳戶誦的十七史，明以後所流傳的本子，就有許多闕葉。例如南齊書，清武英殿本於志第七州郡下，缺十八行。傳第十六，缺十四行又三十字。傳第二十五，缺十四行又四字。傳第二十九，缺十五行又七字。明北監本和汲古閣本，缺處和殿本完全相同。核計這四處的闕文，應當各佔宋本的一葉。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好容易找到一個宋本，補起了兩葉（州郡下第三葉和列傳十六第十葉）；其餘兩葉，仍舊沒能補起。

又如魏書，廣平王懷傳「廣平王懷」下，宋本就注了一個「闕」字，可見在宋時已有殘闕，但究竟闕了多少字，現在已無法知道。樂志劉芳上言「先王所以敎化黎元，湯武所以」下，明以後的本子，都缺了三百多字，恰合宋本的一葉。而這一葉的闕文，卻被陳援菴從册府元龜和通典裏分別找出來（詳見輔仁學誌第十一卷第一、二合期葉德祿君所作魏書缺葉補一文）。周書第六

卷本紀闕八十八字，也由陳援菴據册府元龜補足。

南齊書、魏書、周書，在明北監本以前所最流行的，是所謂眉山七史本。這個板子，從宋經元而到明代中葉，雖然把壞板補了又補，然仍有很多地方已經糢糊得不像樣子，所以有「九行邋遢本」之號。邋遢還不要緊，而又有全板壞掉的；壞掉了不補，就印刷流傳，於是乎繼承這三朝本衣鉢的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也就不能不一誤再誤了。

被人所重視的正史，尙且斷爛至此；其他短書小說，殘缺的就更多了。譬如唐人權德輿的權載之文集，四庫全書裏所收的是十卷本，是根據著明嘉靖二十年劉大謨序刻本著錄的。但此書全本是五十卷，王漁洋居易錄裏曾說過：四庫館臣也由居易錄而知道有五十卷本（但因居易錄的記載，不够詳明，以致四庫館臣又疑惑它有八十卷）。但他們卻沒能够見到。居易錄說顧宸藏有五十卷本，劉體仁的兒子名凡的曾抄了一部送給王漁洋。而現在中央圖書館裏藏有宋蜀刻本的殘卷（存卷四十三至五十），上面有劉體仁的印記，那必然是抄給王漁洋時所據的底本之殘餘了。這個五十卷本，既有傳抄本流傳；到了嘉慶年間，大興朱珪就據以刻板。於是這五十卷的足本，纔復行於世。現在來讀這部書，自然不能捨掉五十卷本而去讀十卷本了。

宋人江少虞著的皇朝類苑一書，記載着宋代的許多掌故。江氏的自序，說這書是七十八卷二十八門，可是四庫著錄之本和近代刻本，卻只有六十三卷二十四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說江氏自序「分二十八門」的話，是傳寫之訛。近年中央圖書館買到了一部日本元和七年（當明天啟元年）的活字本，這活字本是根據宋代的麻沙本排印的，它正是七十八卷二十八門，比四庫全書

本多了談諧戲謔、神異幽怪、詐妄謬誤、安邊禦寇四門。假使人們不見這個活字本，豈不是許多史料都被埋沒了嗎？

「明人刻書而書亡」，清代的校勘家常常有這種感歎。的確，明代萬曆以後的刻本，多半是一塌糊塗。他們任意改字，任意刪節，甚至任意改換書名。商濬所刻的稗海，陳繼儒所刻的寶顏堂祕笈，算是比較好一些的叢書了，然而仍舊免不了任意刪改的毛病。譬如宋人王楙作的野客叢書，本來是三十卷；可是稗海本和寶顏堂祕笈本，都只有十二卷，精核的地方，多被刪削。假若沒有嘉靖年間王穀祥的刻本存在着，人們就很少能知道這書是三十卷了。

以上也只是隨便舉幾個例子。但從這些例子看來，人們如果不好好的做學問則已，假若眞正治學，讀古書能不講究板本嗎？

四、欲免受錯字的欺騙不能不講究板本

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精校精刻的書，也難免有魯魚亥豕之訛；校勘粗疏的，甚至任意刪改的，那就更不必說了。譬如水經注一書，清初人所讀的都是明嘉靖以後的刻本，錯字多得幾乎沒法子讀。後來戴震用永樂大典本校對的結果，共補了明刻本所缺漏的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去了妄增的一千四百四十八字，糾正了臆改的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短短的一部水經注，竟有七千字以上的錯誤，叫人怎麼去讀！所以戴震的校本刊行之後，明嘉靖刻本，萬曆乙酉（十三年）吳琯刻本和萬曆乙卯（四十三年）李長庚刻本等，就都可以束之高閣了。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書

之多，說來眞是驚人。昔人誇耀汲古閣刻的書，不脛而走天下，實不是過譽之言。所以到三百年後的今天，汲古閣還負着盛譽。然而他所刻的書，卻多半校勘不精。毛氏收藏了很多宋板書，又影鈔了很多宋板書，他家是那麼喜好善本，然而他們刻書，卻不依據他家藏的善本校勘，眞是怪事。據說汲古閣刻本校勘最精的是四唐人集，而這部書卻流傳極少。原來毛晉有一位好吃茶的賢孫，曾經得到了碧羅春茶葉，而找不到美薪，因而把四唐人集的板子給劈燒了。現在很多人震於汲古閣之名，以爲他家刻的都是善本，那是錯誤的。

所以欲免受錯字的欺騙，也不能不講究板本。單看水經注那一個例子，就够人警惕的了。

五、怎樣知道板本的優劣

由上面所舉的例證看來，我可以決然地說：眞正讀書的人（特別是讀古書），不能不講究板本。

前面說過，筆者並無佞宋之癖，也決不鄙棄沒有錯誤的近代刻本而盲目的推崇有錯誤的古本。所以，就十三經注疏來說，與其去求那高貴難得的宋十行本，或者雖不太難得，而錯誤頗多的明李元陽本、北監本、汲古閣本，就不如讀阮元的刻本（雖然阮元刻本，也還需要再校勘，但他已具有諸本之長，是不可否認的）。二十四史，你既然很容易地買到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就不必勞神耗財地去物色三朝本的十七史，和北監本、汲古閣本的二十一史，甚至於淸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以上是「二者不可得兼」的說法，假若你有豐裕的財力，自然是收藏的本子越多越

好。

但是，古書浩如烟海，不專門研究板本的人，怎麼能够知道那些本子好或壞呢？說到這裏，有一部值得介紹的小書，那就是繆荃蓀幫張之洞編的書目答問。它分門別類地列着一般人所應讀的經籍，每一部書名下面都注着板本——錯誤比較少的本子。這書目裏所收的書雖然不多，但常見的書大致都有了。

近一二十年來，影印本的古書漸多，有很多善本是張之洞、繆荃蓀所不及見的。於是，在七七事變之前，南京國學圖書館，便把書目答問給補正了一番，題名書目答問補正，排印行世。「譬如積薪，後來居上」。現在來讀書目答問，自然以讀國學圖書館排印的補正本爲好。

至於生僻的書——書目答問所不載的，要知道它的板本優劣，就只好去查各家的藏書志、讀書記和校勘記，甚至於要自己去校勘，那就麻煩多了。

原載「大陸雜誌」，二卷七期（民國四十年四月），頁一五——一七

晚明書業的惡風

本文所謂晚明，是指嘉靖晚年到崇禎末年。所謂書業，是包括著作人和出版者而言。四庫全書總目、別本革朝遺忠錄提要（史部傳記類存目）說：

> 蓋明代刊書者，往往竄亂舊本，而沒所由來。諸版競出，混淆彌甚；其風熾於萬曆以後。今觀此本，則嘉靖中已有之矣。

這一段話，對於晚明的書業，作了很正確的評判。晚明書業，最常見的現象，則有：僞作古書、剽竊他人著作、冒充名人著作、以及以他家舊版冒充己刻新版、任意刪改原書等。這些情形，都可以表現出來對於學術嚴重的不良影響，以及當時出版界和著作人的惡劣風氣。現在依照上述的幾點，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一、僞作古書

託古之書，戰國時代就有，漢書藝文志裏，就著錄了一些這類的僞書。後世以作僞書著名的

人，前有三國時的王肅，後有隋代的劉炫。不知名的僞書作者，則代有其人。而作僞風氣之盛，僞作品之低劣，似乎無過於晚明士人和書業的。晚明僞作的古書，至今還流傳着的很多，如姚士粦的孟子外書和於陵子，王世貞的左逸、短長，及雜事秘辛，以及託名張九齡的千秋金鑑錄，和不知作僞者姓名的竹書紀年、心史等，都是人們所熟知的。而專門僞作經部的書，且產量頗多的，當以豐坊爲最著。他僞作的經部書，至今還流傳着的，有：

子貢詩傳　一名詩傳孔氏傳；有明刋廣漢魏叢書、津逮秘書等本。

申培詩說　有明刋百陵學山、漢魏叢書等本。

石經大學　有明刋百陵學山本。

據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以上三種，都是豐坊僞作的。但，周廣業的目治偶抄，則說前二種是王文祿所僞作。這一說似乎不如錢氏之說可信；因爲豐坊（或說是坊的父親豐熙）還僞作了箕子朝鮮本尙書、和徐市倭國本尙書（見日知錄），現在都已不傳。由此可知，豐坊是慣於作經部僞書的人，自然他僞作那三部書的可能性最大了。

二、剽竊他人的著作

晚明以來，剽竊他人著作的事件也不少，茲舉以下兩例：

其一，是籌海圖編（十三卷）。通行的籌海圖編，是天啟四年新安胡氏的刋本。這個刻本所題的著者是胡宗憲。因而各家書目（包括四庫全書總目），凡是著錄此書的，都說是胡宗憲作

的。

可是此書有嘉靖四十一年的原刻本，所題編校人的姓名，是：「崑山鄭若曾輯，男應龍、一鸞校。」有鄭若曾的自序和胡松、茅坤、唐樞三家的序文，以及盧鏜的跋語。盧跋作於嘉靖四十一年，跋語說：「……此開陽鄭君籌海圖編之所由作也。宜乎軍門之重而徵之，梓而傳之。」軍門，是胡宗憲。可見此書確是鄭若曾所作，胡宗憲給他刻行的。從上述這書原刻本的序跋看來，胡宗憲並沒攘竊此書爲己有的意思。隆慶壬申（六年）的重刻本，所題的著者還是鄭若曾（見書和人第二七三期梁容若先生所作「籌海圖編的板本」）。但，到了天啟四年，宗憲的裔孫重刻這書時，就把著者改題爲胡宗憲；又把胡松、唐樞、和鄭若曾的序文，以及盧鏜的跋語，統統去掉，只賸下了茅坤的一篇序文。於是大家就都認爲此書是胡宗憲著的了。

其二，是詩史。四庫提要史部史評類存目，著錄詩史十五卷。提要說：

> 舊本題明顧正誼撰。正誼，松江人，萬曆中官中書舍人。考錢希言戲瑕曰：「昔嘗於太原齋頭，見雲間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名也。余與王先生相顧驚嘆。王先生曰：『此豈虎頭公所能辦哉！』後余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目雙瞽，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嗟乎！唐生之文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白之冤，俟異世子雲者起，故當有定論耳。」云云。據此，則是書爲唐汝詢作，正誼乃買其藁而刻之耳。

按：唐仲言年五歲就雙目失明，聽他哥哥讀書而默記之，多年以後，記誦便很淵博。他自著的書，有編蓬集十卷，後集十五卷；編輯的書，有唐詩解五十卷，彙編唐詩十集四十一卷。他似乎

不至於以三十金賣掉自己的稿子。錢希言說顧氏「詭得之」；可見顧氏得到此稿，是用了不正當的手段，而未必是唐氏甘心賣掉的。

三、冒充名人著作

晚明時代的類書、詩文選集等，冒充名人編選的，多得不可勝舉。現在只舉兩個非類書，亦非詩文選集的例子：

例如疑耀一書，著者的題名是李贄。有張萱的序，說李贄把此稿交給張萱，經張氏校訂後刊版。如此說來，這書是李贄作的，似乎是沒問題了。但王士禎的古夫于亭雜錄卻說：

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贄所著，而其門人張萱序刻者。余嘗疑爲萱自纂，而嫁名於贄；以中有校秘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爲中書舍人，纂文淵閣書目，而贄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溫公一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

四庫提要，引述了王氏這段話之後，又列舉了更多的證據，以證明此書確出於張萱之手。提要說：

奉朝請一條云：「余今年五十矣，始爲尚書郎。」是萱官戶部時語，贄亦未嘗官六曹也。蘭香一條云：「此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蘇東坡一條云：「東坡寓吾惠最久。」文天祥一條云：「文璧蓋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是皆廣東人語，與萱之鄉貫相合。贄本閩人，無由作此語也。知此書確出於萱，士禎所言爲不謬。蓋以萬曆中贄名最盛，託贄

以行；而其中刪除不盡者，尚有此數條耳。相傳坊間所刻贄四書第一評、第二評，皆葉不夜所僞撰，知當時常有是事也。

張萱是萬曆壬午（十年）舉人，編有彙雅二十卷，續編二十八卷。彙輯爾雅、廣雅、小爾雅、方言、埤雅、爾雅翼等書，分爲兩編，正文後列舉前人的注釋，間附張氏自己的意見。四庫提要（經部小學類存目一）批評此書是畫蛇添足之作。可知這書沒被學術界重視。由此看來，張氏大概是因爲自己的名位不顯，作了疑耀一書，於是假託李贄的盛名，以廣流傳；而故意在書中留了些破綻，好讓讀者知道實是他的作品。其用心可謂良苦。嶺南叢書本疑耀，有張萱自作的疑耀新序，謂不知何人刻此書，借閩禿之名以行；且力辨與李贄無師生關係。此序作於李贄被誅之後，從那些自我辨白的話看來，更有欲蓋彌彰的嫌疑。

又如明天啟六年刻本諸子奇賞一書，共一百十一卷，卷首題陳仁錫評選。按：陳氏有古文奇賞八十二卷，著錄於四庫總目提要總集類存目，而沒著錄此書。此書有三徑齋主人所作發凡十則，其中一則說：

諸子中有數種，向係明卿先生摘選於古文奇賞，品評確當，海內久已欽服。

明卿先生，就是陳仁錫。從發凡的這幾句話看來，可知這部諸子奇賞中，僅有數種是採自陳仁錫的古文奇賞；也就是說：只有數種是陳仁錫評過的。可是全書的評選，就冒了陳仁錫的大名。這書的編輯，可能是出於三徑齋主人之手。幸而他還在發凡中說實話；否則，就不易揭發這冒名的眞象了。

四庫提要總集類存目，還著錄了陳仁錫編的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提要以爲是託名陳氏。其說當是可信的。

四、以他家舊版冒充己刻的新版

晚明書業，用別家的舊版，改刻出版處或校勘人，用以冒充自己新刻的很多。這類情形，多半是原版乃甲所刻，後來甲把書版讓給乙，乙就把原刻版人的堂號剜掉，而改爲自己的堂號；甚至於改換書名、著者、和校訂人。但，也似乎有盜翻他家書版，而改頭換面，冒充另一書的。這裏且舉兩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存目九、著錄了福壽全書六卷，題「明陳繼儒撰」。這書通行的是明崇禎間的刻本。同書同卷，又著錄了鄭瑄作的昨非菴日纂二十卷。這書常見的也是崇禎間刊本。大家向來都以爲這是兩部書，沒人懷疑過。

但，拿這兩部書互勘，才知道它們實際上是一部書。不但是一部書，而且還是同一版刻。原來所謂陳繼儒的福壽全書，乃是改變鄭瑄的昨非菴日纂而成的。它改了書名，改了卷數，把原來書口上「昨非菴日纂」的字樣剜掉，把顧錫疇所作昨非菴日纂序中的「鄭子」改爲「陳子」。於是鄭瑄的昨非菴日纂，就變成了陳繼儒的福壽全書。

陳繼儒在明末享有盛名，而且刻書很多，這事決不可能是他做的。顯然地是書賈翻刻了昨非菴日纂，於是改頭換面，冒題了陳繼儒的大名，以便推廣銷路的。

又如名山記選一書。這書共二十卷，是明崇禎間的刻本。有草衣道人序，序末刻着「王微之印」和「草衣道人」兩個印記，知道草衣道人就是王微，也就是編輯這書的人。這部書流傳得很少，四庫全書總目沒著錄。據筆者所知，只有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收藏了一部。按：晚明以記述名山勝蹟的書頗多，最早的似乎是何鏜的古今遊名山記，它是刻於嘉靖四十四年。崇禎間印行了一部名山勝概記四十六卷，附着圖一卷，和附錄一卷（沒有編輯人的名氏）；乃是就何鏜的書，增損而成。以這本名山記選，和名山勝概記對看，才知道名山記選是抽選了名山勝概記的原版，重編另印，並改題書名的。

五、任意刪減原書

選取各種古書中的若干章節，彙編成一部書，像馬總的意林，陶宗儀的說郛等，人人都知道它們所收的書都不是全本。又如十七史詳節、少微通鑑節要之類，其爲節本，大家也一望而知。而晚明以來，往往把全部書刪去大部分，而不著明是節本；或把注解刪掉很多，而不加以說明，以致使讀者誤以爲全本。這種作風，實在害人不淺。

關於前者，如宋人王楙所著的野客叢書三十卷，陳繼儒刻入寶顏堂秘笈，刪掉了十八卷，只存十二卷。精核之處，多被刪去。又如明人田藝衡作的留青日札，隆慶間原刻本，和萬曆間重刻本都是三十九卷，以後刻的本子，就只有四卷；刪去了十分之九。舉此兩例，可見一斑。

關於後者，茲以史記爲例。史記三家注，是從南宋以來流行最廣的本子。明萬曆間北京國子

監的刻本，是明代晚葉到清初最具權威性的本子。但，張元濟用南宋黃善夫本和北監本對勘的結果，知道北監本把三家注删掉了很多。據張元濟的跋語（見商務印書館影印黃善夫本史記），北監本删汰的三家注是這樣的：

集解　全删的四百九十九條，節删的三十五條。

索隱　全删的六百一十三條，節删的一百二十二條。

正義　全删的八百三十七條，節删的一百五十七條。

讀史記三家注的人，如果只用明北監本，而沒見到黃善夫本，就少得到二千多條注解的知識，這是多麼嚴重的損失呢？

六、餘記

以上所說，只是幾個簡單的例證；然已可見晚明書業惡劣風氣的一斑。至於妄改書名，臆校字句，也是那時書業常見的現象，這裏不再詳述。淸人曾說：明人刻書而書亡。這話說得雖然太過了些；可是就本文所舉的幾點看來，那些壞風氣，實在是無法使人原諒的。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那些情形，可以說明了那時的圖書，銷路很好，所以才有爭着出版的現象。這現象是不是顯示着那時讀書的人較以前增多了？或者顯示着民間的經濟力量頗爲富饒？對於硏究教育史或經濟史的人，這也許是一個小小的課題。

原載「國立臺灣大學三十周年校慶特刊」（民國六十五年三月），頁二六——二九

從信口雌黃說起

「信口雌黃」，是人人都懂得而且是人人都會用的一句習語；但我相信，有許多人是只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

晉書王衍傳：「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隨意更改所說的話，爲什麼叫做「口中雌黃」呢？這話說來卻一言難盡。

原來我國的圖書，最早是用竹簡，或者用綢子（帛）來寫，到東漢晚年以後，才用紙寫書。竹簡笨重，綢子價貴，收藏起來都不容易，那自然不用說了；就是有了紙張之後，在印刷術還沒發明之前，書籍全靠着抄寫，那依然是得來不易。因爲得來不易，所以就多方想辦法來保藏它。

有一種樹木叫做黃檗，俗名黃柏；它的葉汁可以用作染料，而且是可以避蠹的。藏書家便用黃檗來染紙寫書，以免蠹魚的蛀蝕，因此書卷多半是黃色的。在印刷術還沒發明以前，書籍都是卷子本，沒有方册的形式。我們試想夜讀的人們，在燐火似的油燈下展卷的情況，再回味「黃卷青燈」那足以使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古語，便一點也不覺得稀奇了。

寫錯了字，用墨塗掉另寫，是很難看的；用挖補的辦法，又太麻煩。於是古人便想出一種辦法：用和紙同樣顏色的粉子，把錯字掩蓋住，然後再把不錯的字寫在粉上，好像我們用鋁粉塗掉畫錯了的水彩畫一樣。這樣比起用墨塗改是整潔得多了。書卷既是黃色，粉子自然要用黃的，因此他們便選用了雌黃。

雌黃，是和雄黃同類的東西，是一種礦物。用水把雌黃粉調勻，塗在黃檗染的紙上，顏色既相似，又永遠不會脫落。所以校書的人，喜歡用它。我們現在所見的古寫本上，還有時能看到用雌黃校改的字句。顏之推說：「讀天下書未徧，不得亂下雌黃」。顏之推的時代，和王衍相去不遠；再證以上文所引晉書的那段記載，可知在王衍那時候已用雌黃校書。只是王衍用自己的嘴巴來校正自己的妄言，好像把雌黃用在口中而已。

「黃卷」用雌黃，帛書怎樣校，現在已不能詳；至於校簡書，那就更簡單而潔淨：因爲只用刀把錯字削掉重寫就是了。竹子的表皮滑而硬，寫上字很容易擦掉，所以寫時一定把它那青色的表皮剝去不用，這叫做「殺青」。又因爲竹子不乾，很容易生蟲，所以一定要把它烘乾。烘烤時水分蒸發出來，像出汗一樣，這叫做「汗簡」。之後，才用來寫書。沒有表皮的竹版子，寫字既然不會脫墨，刀削也極容易。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這裏所謂刺，就是用刀削去不用的字句（古時有一種小刀，叫做削）。我們只要看以册（集簡而成册）從刀的删字，就可以想像到古人校書的情形了。

原載「暖流」，一期（民國四十年五月），頁三〇——三一

我國古代的圖書——竹帛

「竹帛」這兩個字，是我們時常看到而且是時常用到的名詞。大家都知道這兩個字就是圖書的意思，但究竟竹是怎樣的，帛是怎樣的，似乎還有很多人不大明白。本文所說，就是竹和帛的形制，以及這兩種東西所流行的約略時代。關於這個問題，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和王靜安的簡牘檢署考，都曾考證過。本文取材，大部份是根據葉王兩先生考證的成果，間或附加了自己的一點意見，這是應當首先聲明的。

竹簡

我們現在攜帶一部木板大字的線裝書，便感到非常累贅；拿起一本瑞典紙印篇幅稍多的洋裝書，也感到非常沉重。那裏知道我們的先民，是用笨重的竹板子作紙；而且寫在竹板上的字，又不止「字大如錢」呢？那麼，它的累贅，笨重，可想而知了。

把一段竹筒，劈成單片，叫做簡，（也有木簡。但不很多）又叫做牒，或札。王充論衡量知

篇說：「截竹爲筒，破以爲牒。」說文說：「簡，牒也。」又說：「牒，札也。」左傳疏說：「一單執一札謂之簡。」是可以相互證明的。竹簡上的字，是用墨或用漆寫的。假使寫錯了，便用刀削去另寫。所以相傳孔子修春秋的時候，「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那就是說：孔子認爲可以寫起的就寫起，可以削去的就削去，別人是不能够給他參加意見的。但是，竹子的青皮太滑，寫上字去，很容易磨掉，所以必須把「竹青」剝去，這叫做殺青。又因爲竹子不乾，很容易蠹朽，所以必須把竹子裏的水分用火烘去。烘時，水分流出，和人發汗一樣，這叫做「汗簡」。劉向別錄說，「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就是這個意思了。

竹簡的長度，論衡以爲六經等重要的書籍，用最長的竹簡；不重要的書籍，則以次減短。通典所載許敬宗等奏文引孝經鉤命决說：「六經策長二尺四寸，孝經策長一尺二寸。」儀禮疏引鄭康成注論語序說：「詩書禮樂春秋，策皆長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其說和孝經鉤命决不同。但據左傳疏，知鄭康成之說，實出於鉤命决。又況依鄭氏說，孝經既比六經謙半之，則應該只有六寸；論語策又謙於孝經，那能會有八寸呢？因此可知詩書等一尺二寸之說，當作二尺四寸；儀禮疏所引，一定是後來傳寫之誤了。不過，二尺四寸之簡，也不止用於六經。晉太康年間，汲郡發魏襄王（或說是魏安釐王）冢，所出的竹書，有穆天子傳。據荀勗的序說：「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是史傳一類的書，其竹簡也有二尺四寸的。大抵各處的制度，不一定相同。所以劉向的戰國策敍錄，說國策的名稱：「或曰短

長。」那就是因爲戰國策一書，是集攏各處的史料而成。其竹簡的長短，不能一致，所以叫做短長書了。

史記說蕭何在秦時爲刀筆吏，刀筆二字前人或以爲是用刀作筆刻字，或以爲是用筆來寫，用刀來削，刀筆是兩件東西。關於這點，至今還沒有定論。但公牘容或有用刀刻的，而書籍則皆用墨或漆寫成。汲冢竹書穆天子傳荀勗序說：「以墨書。」後漢書杜林傳說：「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漢時的經師，又有賄蘭臺令史改漆書經文的故事。可見書籍都是用墨或漆書的了。至於每一簡的字數，最多的到四十個字，最少的只有八個字。汲冢竹書穆天子傳，據荀勗序所說，是一簡四十字，儀禮聘禮疏引鄭氏說，尙書三十字一簡。漢書藝文志說：「劉向以中古文（尙書）校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儀禮聘禮疏引服虔左傳注說：「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謂左傳）可見每簡的字數，是由八字到四十字不等，或者更的少及更多的。一簡有的只寫字一行，左傳疏說：「簡之所容，一行書耳。」有的寫作兩行，晉書束晳傳說；「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近年新疆發現的漢晉木簡，每簡有四行乃至十七行的。但此批木簡，多是官牘和歷表等類的東西，和寫書的竹簡，又不能一概而論。

把許多竹簡編集起來，叫做册（或叫做策。）册字說文作䒭，是象把許多竹簡用兩道繩子編集起來的形狀。甲骨和金文裏都有這個字，形狀和小篆大致相似。編簡的繩子，有的用絲，汲冢穆天子傳，用靑絲綸，見荀勗序。北堂書鈔引劉向別錄說：「孫子書以殺靑，簡編以縹絲繩。」

這都是用絲繩彙編的證據。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韋是柔皮，韋編三絕，就是說編竹簡的柔皮條，斷過三次。這可以證明竹簡也有用皮條編起來的了。把若干竹簡，編在一起，叫做一篇。篇的大小，雖沒一定，但由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書籍看來，也可以知道個大概。漢志著錄的書，凡是稱若干篇的，都是指簡書說。譬如周易卦爻辭，是分作上下兩篇。那麼，一篇的大小，可以想見。這就是我們把一段或一首文章叫做一篇的起源。我們試想，倘若一簡的字數，照三十個計算，像詩經這樣一部書，就需要竹簡一千片以上。那麼，讀起來，尤其是攜帶起來，够多麼痲煩！莊子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假使這五車書，都是竹簡，若改用新五號字，排在兩面印的紙上，恐怕不過薄薄的一小册而已。

簡册不知起源於什麼時候，但從殷朝就有，是可以斷言的。甲骨文有册字和典字，册字既是象編集竹簡的形狀，典字又像把竹簡放在几子上的形狀。尙書多士篇也說：「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見簡册之興，其歷史非常悠久。周秦兩漢，簡册都很盛行。近年新疆發現的簡書(木簡)，有晉時的，可見那時還沒完全廢掉。但從晉以後，就沒聽說再有用竹簡或木簡傳寫書籍的事情了。

竹簡之外，又有方版和槧。方卽是版，是一種方形的木板。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鄭注說：「方，板也。」儀禮聘禮記說：「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可見篇幅很長的是用策（卽册），因爲它可以編集竹簡至無限之多。木板是以一板爲一個階段的，所以不滿一百字的東西，就寫在板上。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鄭注說：「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一板既可以寫到九行，而每板又不超過一百字，那麼，每行的字數，也只在十個左右了。論語說：「式負版者。」何晏集解孔曰：「負板者，持邦國之圖籍。」疏說：「案周禮小宰職曰：聽閭里以版圖。注云：版是戶籍也。」戶口册子，每家當不會超過一百字，所以寫在版上。從以上兩條證據看來，方板的用途，可以略知大概了。

論衡量知篇：「斷木爲槧，析之爲板」。這是木材沒有析成版以前叫做槧。釋名：「槧，板之長三尺者也。」這又說板長三尺者叫做槧。西京雜記說：「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這樣看來，槧大概只是沒經過修治的板，用鉛寫在上面，作爲臨時記事用的，好像現在用拍紙簿一樣。我們常用的「鉛槧」兩個字，就是這個出處了。

帛

帛是古代最通行的絲織品，就是後來的綢子。古人本來用它作衣料，一方面也用它寫書。先秦時帛的長短寬窄，雖還沒有一定的說法：大致以寬二尺四寸長四丈之說，約略近是（王靜安先生有釋幣一書，考幣帛很詳，載在王忠慤公遺書內）。寫書的時候，是否卽以一匹帛之長爲準，抑或帛書的長度，也有規定，現在已不得而知。寫完之後，便把它捲起，叫做一卷（卷卽捲），這就是我們說一卷書兩卷書的起源。漢書藝文志裏著錄的書，凡是稱卷的，都是用帛所寫。每卷要有一個軸子，纔便於舒卷。隋書經籍志說：「煬帝卽位，祕閣之書，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

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這是關於書軸的紀載。不過隋代離周秦很遠，先秦時的卷子，是否也有軸，現在已沒法子考證了。

用帛寫書，起源於什麼時候，現在也沒法子確知。但墨子一書裏，說到竹帛的地方很多。尙賢篇：「古之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兼愛篇：「何以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以其所書於竹帛，……傳於後世子孫者知之。」此外天志、非命、貴義、魯問等篇，都有類似的說法。晏子春秋（卷七）說：「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韓非子安危篇也說：「先王致理於竹帛。」就這些紀載看來，他們所說的古之聖王著書於竹帛的事，縱然靠不住；但最遲在戰國初年，總已有用帛作書簡了。

但，帛雖然比簡册輕便，而價值太貴。孟子屢次說：「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又說：「五十者非帛不暖。」衣帛只是爲了比葛科的衣服暖些，然而五十歲以內的人，就沒有資格穿它。可見是因爲它的價值太高，所以只好不得已才給老年人穿。古代的文化中心，雖然在黃河流域，但那時北方是產竹的，自然竹子的價值很低。所以，用帛作書，雖然輕便，而終不及簡册流行的廣。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書，用篇計數的，比用卷計數的多，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了。

後漢雖然有了紙，然而用帛寫書的風尙，還沒有斷絕。史書記漢獻帝西遷的時候說：「圖書縑帛，軍人取爲帷囊。」可見那時還有帛作的書。大概這種帛書，從三國以下，紙張大量的應用之後，才漸漸稀少的。

附說——毛筆

以上關於竹帛的形狀，和它們流行的約略時代，已經說了個大概。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竹帛既都用筆寫，這筆是不是毛筆呢？相傳毛筆始於蒙恬，假使秦以前的竹帛，也是用毛筆寫的，那豈不成了「宋板的康熙字典」了嗎？其實，毛筆的歷史，非常悠久，並不始於蒙恬，宋時史繩祖的學齋佔畢裏，已經辨正過。莊子田子方篇說：「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他們的筆既能舐，其爲毛筆也，可以想見。田子方篇，雖然不一定是莊周作的，但也不會是秦以後的東西。那麼，蒙恬之前，已經有毛筆了。然而，猶不止此。近年中央研究院在殷墟發掘的卜骨，有一塊是朱色寫的。又有一塊白色陶片，上面殘留着用墨寫的一個祀字。據董作賓先生說，卜辭都是先寫後刻的；從筆畫上看來，寫字的工具是毛筆（詳見董作賓著殷人之書與契，及胡厚宜著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參觀記，兩篇均已收入滕固編的中國藝術論叢中）。是毛筆之興，已遠在商代，並且有朱墨兩種顏色。那麼，無論簡也罷，帛也罷，自然都可以大書特書了。

原載「讀書通訊」，四十八期（民國三十一年七月），頁二——四



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現況及其問題

一、近五十年中國圖書館簡史

我國開始認識圖書館的重要，始於甲午戰役以後。當時尚無圖書館的名稱，只有藏書樓或藏書院。如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一日時務報載：「官書局奏開辦章程」，文中有「……擬設藏書院，尊藏列朝聖訓欽定諸書，及各衙門現行則例，……其古今經史子集，有關政學術業者，一切購置院中，用備留心時事，講求學問者入院借觀。……」同月二十一日該報又載有「李侍郎端棻推廣學校摺」，其中首論設藏書樓。至光緒末年，湖南、湖北、直隸、浙江、江蘇和山東等省，均已設有藏書樓。

宣統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教育雜誌載有孫毓修撰之「圖書館」一文，共分七篇，這是國人首次對圖書館學作有系統的著述之始。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學部公布「京師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共二十條。這是我國第一次的圖書館立法。該章程第二、三條規定京師及各直省省治設圖書館。

於是次年八月成立京師圖書館，各省藏書樓亦紛紛改稱。而四川、廣西、雲南、陝西等省亦相繼創立圖書館。同年美人韋棣華創立文華公書林，爲我國第一所西洋式民眾化的圖書館。

民國成立，教育部內設社會教育司，掌管圖書館及通俗圖書館巡廻文庫等事項。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先後公布圖書館規程十一條，通俗圖書館十一條，爲以後圖書館設立之依據。九年夏北京高等師範開設暑期圖書館講習會，同年秋武昌文華大學創立圖書館科（卽後來之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此乃中國圖書館人才訓練之始。十八年九月一日北平京師圖書館與北海圖書館併爲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達三十餘萬卷。這是我國有現代式國立圖書館之始。

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各圖書館紛紛從事於圖書館學及目錄之研究和出版。如國立北平圖書館編印「國學論文索引」，嶺南大學圖書館編「中文雜誌索引」等。

二十二年四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開始籌備。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因抗日戰爭，我國公私立圖書館均受到極重大之損失，淪陷區之圖書館幾乎陷於停頓狀態。如國立北平圖書館於二十六年多裝箱封存四四七三册所謂有礙邦交的中西圖書，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年九月因經費無着，迄未購書。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被日軍佔領後卽充作病院，圖書分由軍部、新民會、近代科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取走。有些圖書館，爲避免館藏被燬，乃盡一切人力、物力，將圖書移到後方，如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浙江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圖書館。

勝利後，共匪叛亂，三十八年大陸淪陷，隨政府遷臺的圖書館，有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以及少數政府機關圖書館。

今據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及教育部之教育年鑑，將歷年全國圖書館數量列表如後，亦可看出我國圖書館事業進展之梗概。

年份	圖書館數
七	一七六
一四	五〇二
一七	八九六
一八	一一三
一九	一二七三
二〇	一三九三
二一	一四七九
二二	一六二四
二三	一四七九
二四	一五七六
二五	一八四八
二六	一一三
二七	一一七八
二八	一一〇三
二九	八九二
三〇	一〇六六
三一	一一三五
三二	九四〇
三三	七〇六
三四	七〇四
三五	八三

二、中國圖書館的現況

㈠臺澎地區圖書館數量

民國三十八年底政府遷臺以前，臺灣共有公共圖書館十七所，其中省立圖書館二所，卽省立臺北圖書館、臺中圖書館，縣立圖書館五所，卽臺北縣立宜蘭圖書館、新竹縣立圖書館、臺中縣立員林圖書館、高雄縣立圖書館、澎湖縣立圖書館。市立圖書館十所，卽基隆市立圖書館、臺北市立城北圖書館、臺北市立松山圖書館、臺北市立古亭圖書館、臺北市立城西圖書館、彰化市立圖書館、嘉義市立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中山圖書館、屏東市立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有六所，卽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省立師範學院圖書館、省立臺南工學院圖書館、省立臺

中農學院圖書館、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圖書館、省立行政專科學校圖書館，另有少數專門圖書館。至四十四年，臺灣共有國立圖書館一所，公共圖書館十九所，其中省立圖書館二所，縣立圖書館十三所，市立圖書館四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十五所。專門圖書館則急劇增加，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圖書館、革命實踐研究院圖書館，藏書最少的也在五萬册以上。藏書在五萬册以下圖書館亦有三十幾所。三十八年統計市立圖書館十所，四十四年減爲四所，因爲臺北市立四所圖書館於四十一年合併成立臺北市立圖書館，另彰化、嘉義、屏東三市立圖書館，亦先後改爲縣立圖書館。

五十六年五月，國立中央圖書館爲瞭解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情形，並配合聯教組織之統計工作，特擬定「五十五年全省圖書館（室）調查表」，分發各館調查。綜觀全表所列，以隸屬言，計：國立圖書館一所，省立圖書館二所，縣市立圖書館十七所，局立圖書館一所，私立圖書館四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六十九所，其中大學及獨立學院圖書館二十一所，專科學校圖書館四十八所。中學圖書館（室）五一四所。專門圖書館八十七所。總共全省共有圖書館（室）六九五所。如中學圖書館不計算在內，則全省共有一八一所圖書館。以所在地言，如中學圖書館不核計在內，則臺北市最多，共七十一館，臺北縣次之，計三十三館，臺中市又次之，計二十館。

(二) 各館的藏書與經費

1. 藏書　據五十五年十二月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十八期刊載，臺灣公私立圖書館，各大專

院校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七十七館，中西文藏書共三、六七七、一八四册。加上國立中央圖書館三十三萬册，共四、〇〇七、一八四册。據今年五月國立中央圖書館之調查，在可以統計的四百五十八所圖書館中，中西文藏書約六百五十萬册。以排架的長度計算，共有一二九、九七四·六六公尺。如以全省圖書館六九五所計算，中西文圖書估計可達七百萬到七百五十萬册。其中藏書數量較多者，計：

三十萬册以上者三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七十一萬册，國立中央圖書館三十四萬册，省立臺北圖書館三十二萬册。

十五萬册以上者四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二十一萬册。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十八萬册，國防研究院圖書館十六萬九千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十五萬七千册。

十萬册以上者四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圖書館十四萬六千册。省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十二萬册。國立政治大學、省立成功大學圖書館各十一萬餘册。

五萬册以上者九館：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各九萬餘册。私立淡江文理學院圖書館，私立輔仁大學文、法、理學院圖書館各七萬餘册。省立臺中圖書館，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各六萬餘册。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高雄市立圖書館，臺灣農業試驗所圖書館各五萬餘册。

三萬册以上者十七館：私立東吳大學圖書館，私立逢甲工商學院圖書館，私立中原理工學院圖書館，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圖書館，省立臺南師範專科學校圖書館，彰化縣立圖書

館，臺南市立圖書館，省立高雄中學圖書館，省立臺中第一中學圖書館等。其餘各館均在二萬九千冊以下。

於此可見藏書最多者爲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大學及獨立學院圖書館藏書平均在五萬冊至十萬冊之間，縣市立公共圖書館藏書則在五萬冊以下，二萬冊以上。中學圖書館大都在二萬至一萬冊之間。

又據此次調查，五十五年度四五八所圖書館共添置圖書八四〇、九八〇冊，其中國立中央圖書館佔二萬冊，二十所公共圖書館共佔三〇、四四五冊，各館一年平均添置一、五〇〇冊。三十七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共佔二三五、二一七冊，每館一年平均添置七千多冊。三七六所公私立中學圖書館佔四七七、七五八冊，各館一年平均添置一千三百冊。二十四所專門圖書館佔七七、五六〇冊，各館一年平均添置三千二百冊。一般說來，除國立中央圖書館外，以大專院校圖書館添置圖書最多。如再就十一所公私立大學圖書館去年添置的一〇八、六〇三冊而言，則各館一年平均約添置一萬冊。

關於善本書之冊數及庋藏處所，詳見拙著「臺灣現存的珍本圖書和重要學術資料」乙文（刊登於五十六年四月臺灣大學圖書館學會刊印之「圖書館學刊」，第一期，第一三——一九頁），此不贅述。

2.經費　除公共圖書館外，大專院校圖書館，中學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之經費均非獨立。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年五月間之調查，經費部分分爲經常開支及重要開支二項，前者包括薪給，書刊

購置費、裝訂費等；後者包括建築費及器材費。此項調查表，雖有少數圖書館未填，但仍可約略言之：

四五八所圖書館，經常費共新臺幣五〇、三五九、七〇八元。人事費一三、八九三、四七〇元，佔百分之二十八。圖書費三一、六八九、九三〇元，佔百分之六十三，裝訂費一、四一二、〇六六元，佔百分之三。其他三、三六四、二四二元，佔百分之六。重要開支項，共七二、八一八、五八九元。建築費五九、四三〇、二七五元，佔百分之八十一，器材費及其他佔百分之十九。

前述人事費所以只佔百分二十八者，因爲各中學及專門圖書館之職員大多數爲兼任，不支薪津。各公共圖書館之人事費，則均達百分之五十左右。

茲再將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到五十六年六月一年的經常費，就國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中學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分別予以說明：

(1)國立中央圖書館二、一五〇、三五二元。

(2)公共圖書館：

①一百萬元以上者二館：省立臺北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

②五十萬元以上者一館：省立臺中圖書館。

③二十萬元以上者五館：彰化、宜蘭、臺南、高雄、基隆等縣市立圖書館。

④十萬元以上者九館：澎湖、高雄、南投、新竹、桃園、屏東、臺北、嘉義等縣立圖書

館。

⑤十萬元以下者三館：臺中、苗栗二縣立圖書館，陽明山管理局北投圖書館。

(3)大專院校圖書館：

①一百萬元以上者五館：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私立東海大學，私立淡江文理學院，國立清華大學等圖書館。

②五十萬元以上者八館：省立成功大學，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省立師範大學，私立中國文化學院，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私立輔仁大學文理法學院，省立中興大學，私立逢甲工商學院等圖書館。

③十萬元以上者十三館：私立明志工業專校，私立中原理工學院，私立世界新聞專校，私立臺北醫學院，私立實踐家政專校，省立屏東農業學校，省立臺中商業專校，國立交通大學，私立大同工學院，省立臺中師範專校，省立臺北師範專校，私立中國醫藥學院，省立新竹師範專校等圖書館。

④十萬元以下者八館：省立臺南師範專校，省立臺北護士專校，省立嘉義農業專校，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專校，省立嘉義師範專校，省立臺東師範專校，省立花蓮師範專校等圖書館。

(4)中學圖書館：

①十萬元以上者二十一館：省立臺北第一女子中學，省立臺中第一中學，省立嘉義中學，

臺北市立女子中學，新竹縣立新竹第一中學，臺北市立大同中學，省立花蓮女子中學，省立高雄中學，省立臺北第二女子中學，省立師大附中，省立臺中第二中學，省立中壢中學，臺北縣立士林中學，高雄市立第七初級中學等圖書館。

②五萬元以上者八十三館。校名從略。

③一萬元以上者二三一館。校名從略。

④一萬元以下者三十二館。校名從略。

(5)專門圖書館：

①五十萬元以上者二館：國防研究院圖書館，臺電公司企劃處圖書室。

②十萬元以上者八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臺灣省文獻會整理組，國防醫學院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等。

③九萬元以下者十館：行政院圖書室，中國工程師學會圖書室等。

由上面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經常費最多者爲國立中央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次之，公共圖書館又次之。專科學校及中學的學生，一年來兩次繳納圖書費；如能以全部圖書費用於購置書刋，相信各校圖書館之經常費可再提高。

(三) 各圖書館之分類與編目

目前各館中文書籍之分類，以採用金陵大學圖書館之「中國圖書分類法」及賴永祥依上述分

類法之新訂本者最多。如據五十五年中國圖書館學會之統計，大專院校及專門圖書館五十六館，採用「中國圖書館分類法」者佔三十四館，採用何日章之「中國圖書館十進分類法」者佔十四館，採用王雲五之「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者佔三館，自訂分類法者亦佔三館。西文圖書大都採用「杜威十進分類法」。據上述中國圖書館學會統計，五十六館中，採用「杜威法」者共三十二館，採用「國會圖書館分類法」者共八館，「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分類法」者三館，自訂分類法者三館，「日本十進分類法」者一館，另有二館中西文圖書均採用「杜威十進分類法」和「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

編目方面，中文書籍幾乎全部採用「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西文圖書則採用「美國圖書館協會著者書名編目規則」(ALA Cataloging Rules for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規則」(Library of Congress Descriptive Cataloging Rules) 及愛克斯簡易編目法 (Akers' Simple Library Cataloging)。

關於目錄卡片，各館中文書籍均編有分類片，著者片，書名片等三種。有些圖書館爲詳細起見，並編有排架片、參見片、見片及各種分析片。目前因無中文主題表，所以尚缺主題片。西文圖書除上述中文書籍幾種目錄片外，國立中央圖書館，各大學圖書館及專門圖書館，另有主題片之編製，其採用的主題表有二，卽美國國會圖書館主題表 (Library ofCongress List of Subject Heading) 及西爾氏主題表 (Sears' List of Subject Heading for Small Library)。

(四) 各館之組織與人員

1.組織　圖書館之組織因其業務、歷史、經費和所藏資料之不同而互異。茲就國立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分別敍述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屬於教育部，現行組織是根據民國三十四年頒佈之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該館共分爲五組一處二室。表列如後：

教育部—館長
- 圖書館事業研究委員會
- 採訪組
- 編目組
- 閱覽組
- 特藏組
- 總務組
- 會計室
- 人事室
- 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臺灣省各公共圖書館之組織，係依據民國四十一年教育部公布之「各省市立圖書館規程」及

四十年臺灣省政府公布之「臺灣省各縣（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省立圖書館設三至五組，縣市立圖書館設二至四組。如臺北、臺中二省立圖書館，均設採編、閱覽典藏、研究輔導、總務四組。臺北市立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彰化縣立圖書館，屏東縣立圖書館等，亦設採編、閱覽、總務、推廣四組。其他各縣市，如嘉義縣立圖書館，高雄縣立圖書館，則設編覽、總務二組。今舉省立臺北圖書館之組織系統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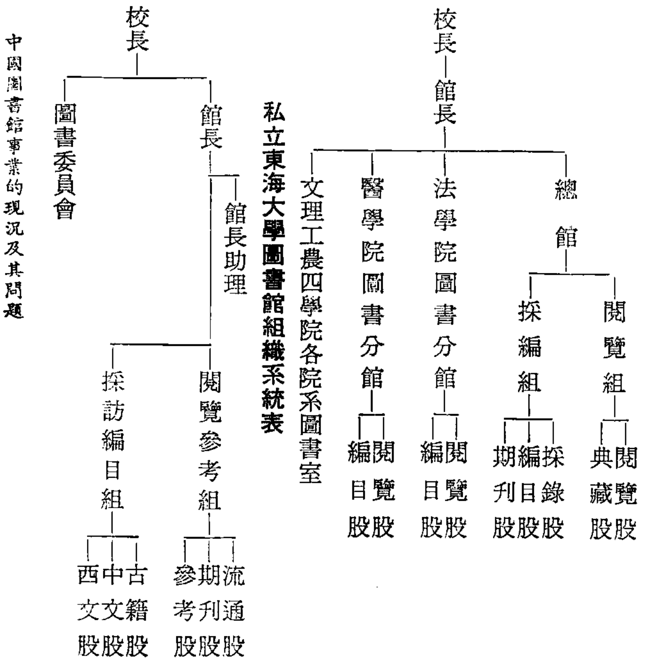
- 臺灣省教育廳
  - 館長
    - 採編組
      - 中文採編股
      - 西文採編股
    - 閱覽典藏組
      - 參考股
      - 閱覽股
      - 典藏股
    - 研究輔導組
      - 研究輔導股
      - 視聽教育股
    - 總務組
      - 文書股
      - 庶務股
    - 主計員
    - 人事管理員
    - 特種資料研究室

臺灣各大專院校圖書館之組織分二種，一種是圖書館直接隸屬於校長，如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東海大學等（師範大學改爲國立後，其圖書館亦直隸於校長）。

其他各院校均隸屬於教務處。茲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為例，表列其組織系統如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組織系統表

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組織系統表



中學圖書館均隸屬於教務處之設備組。亦有少數學校在校長之下設圖書委員會，以協助圖書館工作者。

專門圖書館之組織各館不同。有的分組辦事，有的不予分組。今舉較具規模之國防研究院圖書館爲例：該館設館長一人，秘書一人，下分採編、閱覽二組，各設組長一人。另有編審二人，館員三人，辦事員一人，僱員若干人。

2.人員　據國立中央圖書館今年五月間之調查，在四五八所圖書館中，共有職員一三七四人。其中國立中央圖書館七十八人。公共圖書館二五〇人，平均每館十三人。大專院校圖書館三八〇人，平均每館十人。中學圖書館五五三人，平均每館一．二人。專門圖書館一一三人，平均每館五人。在一三七四人中，受過專業訓練者三〇七人，佔百分之二十二。受過專業訓練比例最高者爲大專院校圖書館，三八〇人中，有一四〇人，佔百分之三十七。比例最低的是中學圖書館，五五三人中，佔七三人，比例是百分之十三。其次是公共圖書館，二五〇人中，佔四十人，比例是百分之十六。

茲將各館人員情形，分省縣立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圖書館，中學圖書館，略述如後：

(1)公共圖書館：

①三十人以上者三館：省立臺北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省立臺中圖書館。

②十人以上者五館：高雄市立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彰化縣立圖書館，宜蘭縣立圖書館，新竹縣立圖書館。

③九人以下者十一館：館名從略。

⑵大專院校圖書館

①一百人以上者一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②二十人以上者二館：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③十人以上者六館：省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私立淡江文理學院圖書館，省立中興大學圖書館，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圖書館，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圖書館。

④九人以下者二十八館：館名從略。

⑶中學圖書館：

①五人以上者二館：省立臺北第一女子中學圖書館，省立臺南一中圖書館。

②三人以上者十八館：省立臺中第一中學，省立高雄中學，省立建國中學，省立嘉義中學等圖書館。

③其餘三五六館均在二人以下。

㈤ 各館之出版事業

圖書館除蒐集整理圖書或其他資料外，還須編製各種目錄、索引、指南、專著和印刷館藏珍本，以便利讀者之研究參考。茲將各館出版之書刋，舉要分述於次：

1. 國立中央圖書館

專書類

臺灣公藏方志聯合目錄

臺灣公藏宋元版本聯合書目

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三冊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　二冊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

國立中央圖書館中文圖書編目規則

國立中央圖書館期刊目錄

美國圖書館學會著者書名編目規則

Directory of the Cultural Organiz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y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8–1959, 1959–1960,

期刊類

新書簡報（月刊）　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創刊，至五十六年六月，共出八卷六期。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季刊）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再復刊，已出一期。

2.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

目錄類

臺灣資料文獻目錄

南洋資料西文圖書目錄

臺灣各圖書館所藏書目聯合目錄

臺灣省光復後出版地方志書展覽目錄

期刊類

圖書月刊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創刊，至三十七年七月，共出二卷十二期。民國五十五年四月又出第一期，至五十六年二月，共出十一期。

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館刊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創刊，至五十四年九月，共出二期。

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敦煌秘籍留眞新編

校慶紀念圖書展覽目錄

國立臺灣大學紀念十週年校慶教員著述展覽目錄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品目錄

慶祝國父百年誕辰臺大廿週年校慶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著述目錄

中文期刊論文分類索引　共出五輯

4. 省立師範大學圖書館

近五年教育論文索引

教育論文索引　第二——四輯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出版品暨教職員著述目錄

5.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

專書類

學校圖書館　王振鵠

圖書館學術語簡釋　王征編

兒童圖書館　皮哲燕譯

歷代名人年譜總目　王寶先編

中文古籍簡明目錄

期刊類

圖書館學報　四十八年一月創刊至五十六年五月，共出八期。

6.國防研究院圖書館

目錄類

中華民國各軍事機構學校在臺出版的軍事圖書聯合目錄

期刊類

期刊論文分類索引（月刊）　民國四十九年創刊至五十六年五月共出八卷四期。

7.中國圖書館學會

專著類

圖書館經營法　藍乾章著

小型圖書館管理　羅秀貞編著

圖書館標準　中國圖書館學會訂

期刊類

圖書雙週刊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創刊至同年八月，共出十三期。

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　民國四十三年至五十五年十二月，共出十八期。

此外，如國民大會圖書室，立法院圖書室，省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中國生產力及貿易中心工業圖書館，均按期編印圖書目錄。

(六)　圖書館從業人員之培養與訓練

臺灣第一所培養圖書館專業人才之學校爲四十四年六月在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設立之社會教育系。該系下分三組，其中一組爲圖書館組，招考高中畢業生，予以四年之訓練，必須修滿五十二學分的專業科目，另實習一年，成績及格者授予學位。專業科目有圖書館學概論、中西文圖書分類及編目、目錄學、版本學、中西文參考資料、圖書採訪學、圖書館史等。從民國四十八年至五十六年，共有九屆畢業生一一九人。至五十六年七月爲止，該組畢業生在中央圖書館服務者三

人，在大學圖書館工作者二十八人，在專門圖書館工作者二十人，出國進修及工作者三十人，任大學教職者二人。

國立臺灣大學自民國五十年起設立圖書館學系，該系課程注重通材教育，除主科及有關科目必修五十三學分外，副主修科必選三十四學分以上，以期學生能對一專門學科有相當的認識。至五十六年七月，共有三屆畢業生九十餘人。第一二屆五十七人，在中央圖書館服務者一人，在大專院校圖書館工作者十三人，在專門圖書館工作者七人，出國進修及工作者十六人，任大專教職者一人。

五十三年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設立三年制及五年制圖書資料科。該科之課程以實用為主。必修專業科目十一種，共四十四學分。三年制的今夏已有畢業生。

此外，鑒於臺灣各圖書館從業人員十九皆未曾接受專業訓練，中國圖書館學會乃於民國四十五年七月開辦暑期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班，講習期間八週。到五十六年八月共舉辦十一屆，參加學員共計五八二人。結業後返回原單位，對於工作頗有改進。

民國四十九年臺北市政府假市立圖書館舉辦臺北市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會，講習期間凡四十天，市立圖書館及各級學校人員參加者共二十五人。

五十二年省立成功大學圖書館舉辦臺南縣立中等學校圖書館工作人員講習會，為期六天，參加人數十五人。

五十四年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舉辦教會學校圖書館人員講習會，會期五天。

五十五年十二月臺灣省教育廳板橋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舉辦國校教員圖書管理科研習，授予圖書管理之知識及技術，現已舉辦二期，預定調訓人員三百六十名。

五十六年三月臺北市政府假省立師範大學舉辦臺北市圖書管理人員進修班，上課時數共十週，每週六小時。市立圖書館、各級學校及機關圖書管理人員參加者五十餘人。

(七) 最近圖書館事業之進展

十餘年來自由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已呈現一片蓬蓬勃勃的氣象。從每年踴躍報名中國圖書館學會舉辦之講習會，各館藏書之急劇增加，以及各館對於國內外出版品交換工作之積極推進，可以窺見一般。現再就增建新館，閱覽業務之進步，及合作編目三項略述如下：

1. 增建新館　館舍是發揮圖書館功能的因素之一。最近幾年來，各圖書館如雨後春筍，紛紛興建。單就民國五十年以後到現在已建築完成的而言，即有下列諸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省立臺北圖書館，國立臺大醫學院圖書館，國立臺大法學院圖書館，文道紀念圖書館，私立東吳大學法學院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省立臺北第一女子中學圖書館，省立臺中師範專校圖書館，省立臺北工業專校圖書館，桃園縣立圖書館，私立輔仁大學理學院圖書館，立法院圖書館等。其建築費多者達六百萬元，少者亦有五十四萬元。

將竣工的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其設備費達一百五十萬元。除有冷氣設備外，另有顯微影片、卡片閱讀機及暗室，電動携書升降機等。正在興建中的，則有國立臺大研究圖書館，故宮博

物院圖書館，省立景美女中圖書館等。

2.閱覽業務之進步　從各館每日之閱覽統計及開放時數，可以看出自由中國閱覽業務之進步。中央圖書館五十五年度閱覽人數計二九八、七三六人，每日平均九百人；出納圖書二六、五〇七册，辦理閱覽證四、五四七人，每日開放時間達十四小時。廿所省縣市立公共圖書館每日閱覽人數一四、二〇二人。每館平均七百人。每日開放時數平均十一小時。

少數圖書館，如私立東海大學，私立輔仁大學法學院，私立淡江文理學院，則全部圖書均採開架式。爲了進一步使讀者能充分利用館藏資料，有的圖書館設立各種專科參考室。如國立中央圖書館設有綜合性圖書及人文科學圖書參考室，社會科學參考室，生物、數理科學參考室，音樂美術室，官書閱覽室，善本圖書閱覽室等。各參考室完全採開架式。其他如臺北市立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省立臺北圖書館，則闢有兒童閱覽室。

3.編製聯合目錄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議決編製國內各圖書館所藏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先從善本圖書聯合目錄開始，並委託國立中央圖書館主辦。該館乃邀請各有關圖書館負責人組成聯合目錄編輯委員會，開始工作。其工作程序，爲各館先就所藏善本圖書分別編爲書本目錄，另由中央圖書館編輯綜合性書名索引一種。此項工作，從今年一月開始，預定一年內完成。過去我國圖書館之缺點，卽各館之間缺乏聯繫，無聯合目錄；以致館際互借和合作採購等，當然無從談起。希望以後有更多的聯合目錄出現。

三、中國圖書館的問題

從上述幾點現況之說明，可以看出我國十幾年來圖書館事業之進步是過去所無的。惟仍可發現一些問題，如各館之間彼此聯繫不够，圖書館專業人才的缺乏，少數縣市迄未設置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經費不足，設備簡陋，現有圖書館法令多爲一二十年所訂頒，目前情勢改變，頗多不適用等。茲就下列五點，並分別提供淺見，以就教於方家。

㈠ 設置圖書館專管機構

以行政系統言，國立中央圖書館屬於教育部，公共圖書館屬於各縣市的社會教育部門，大專院校圖書館屬於各大專院校，中小學圖書館屬於中小學校及教育廳有關部門。各專門圖書館則隸屬於各該所屬之機構。沒有統一的專管機構，結果各館業務，如管理、採訪、編目等，各行其是，對於發揮圖書館之功能，有極大影響。因此建立一個具有高度效率的圖書館專管機構，是必要的。世界各國在其行政組織上，均設有圖書館專管機構和專門人員，以擔任圖書館事業之監督研究工作。如美國在中央衛生教育福利部下設有圖書館事業組，各州設有圖書館事業發展局。法國在教育部下亦設圖書館事業管理處。本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組織條例第一條，雖明定該館有輔導全國圖書館事業之任務，但實行起來，諸多困難。因此我們希望在教育部設置一個圖書館事業專管機構，負責全國圖書館事業之設計與監督事宜。

我們希望在這個機構下設置一個「書刊交換中心」，把各館不需要或複本書刊，送到該中心。該中心可以擬定最經濟及切實可行的交換原則。將收進之資料編寫目錄，按期寄發各館，以供採擇。這樣可以使某館所藏不全的書刊湊集齊全。在甲館是多餘的書刊，到乙館即可變成有價值之資料。對乙館之收藏及讀者借閱皆有裨益。

(二) 增設圖書館

本年六月七日教育部指示全省各縣市，應該普遍設立圖書館，各級學校的圖書設備也應充實，提高社會人士的讀書風氣。其指示共分四點：

1. 全省尚未設置圖書館的縣市，應請設立圖書館。
2. 條件許可的縣市，應設置鄉鎮（區）圖書館。
3. 學校圖書館（室）的業務，請各公共圖書館派員指導。
4. 各公共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購置圖書，最好能請專家指導，以免浪費。

這是一件明智而適時的措施。圖書館是提高社會文化水準，供應民眾精神食糧的主要機構。在歐美等國家，圖書館是社會結構中必要的成分之一。據統計，美國居民一億九千萬人，共有四萬八千多所種類不同的圖書館。平均四千人即有一圖書館。反觀我國，臺灣人口八月底之統計共一千三百一十八萬人，設若以四千人有一圖書館之比率計算，則應有三千二百九十五所圖書館。如照中國圖書館學會所訂之公共圖書館標準，凡滿二萬人之社區，應設一社區圖書館，則應有六

百五十九所社區圖書館。現在各省縣市圖書館之總數，距離此數遠甚。目前，臺南縣、雲林縣、臺東縣、臺中市，尚未設置圖書館。希望政府對於未設置圖書館之縣市，令其從速設立。至於社區圖書館之設置，如經費拮据，可以暫把每一鄉鎮（區）之民眾服務站撥出一部分房舍，充做圖書室之用，俾全體民眾，都能有多讀書刊的機會。

㈢ 圖書館員之教育問題

我們檢討今日圖書館員的教育，發現二個問題：

1. 師範大學圖書館組，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的學科，不盡能適應專門圖書館的業務。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雖然副主修科可以選修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但選修人文學科的人究佔大多數。師範大學圖書館組，更是偏重人文學科。因此，畢業生到專門圖書館服務，如醫學圖書館，農業圖書館，工業圖書館，大學理學院圖書館，電子研究所圖書館等等，對於書刊之採購、徵集、分類編目頗感吃力。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2. 應設立圖書館學研究所。師範大學圖書館組有百分之廿五畢業生、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有百分之三十畢業生出國深造或工作。除工作者不計外；由於我國對於圖書館員之培養，只停留在大學本科階段；所以要想深造只有出國一途。

在美國自一九四八年即停辦大學制的圖書館學校。現在的圖書館學校都是在大學畢業得了學士學位後，再進研究所，攻讀圖書館學碩士學位。英國的圖書館學校亦招收大學畢業生。今日世

界各國的圖書館教育，都是先在大學接受基礎學科訓練，得到一種專門知識後，再授以圖書館學之經營方法。

參酌外國對於圖書館員之訓練，並針對我國當前情勢，我們認爲應於大學中設圖書館學研究所，招收大學畢業生，研習年限最少二年，畢業後授予碩士學位，以便擔任高級館員及專門圖書館館員，從事圖書館中監督設計及研究參考工作。

四 公共圖書館的問題

今日公共圖書館的問題是很多的。先聽聽三位公共圖書館負責人的心聲。一位省立圖書館長說：「……甚至超過編制員額數倍者，如臺北市立圖書館編制員額爲八人，而現有人員則爲三十二人，超過四倍，宜蘭縣立圖書館編制員額爲四人，預算員額爲二人，現有人員爲十七人，則超過編制員額四倍有餘，超過預算員額爲八倍半。此說明編制之不合理。」「……各公共圖書館額定經費，未能隨工作需要增加，未按物價指數相機調整，故經費支用，日益短絀，工作推動亦愈困難」（見劉效騫：公共圖書館問題。刊載於圖書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位縣立圖書館館長說：「本縣圖書館目前限於經費的預算，實難發展。因爲本縣社會教育的經費預算，只佔本縣教育經費預算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圖書館的經費預算，又只佔縣社會教育經費預算中的很少一部分，如此少而又少的經費，已屬非常的可憐了，又以二館的預算分作三館使用，如此三下五除二，遂成了苟延殘喘苦難支撐的局面，能够維持現狀，已屬不易，何能談到充實？同時有關這方

面的人才，微薄的待遇難以維持最低的生活，自然望而卻步。於是祇好聘僱一般人員，非但對發展圖書館事業沒有素志，根本對這項工作毫無興趣，好一些的『做一天和尙撞一天鐘』，勉能稍盡職責；次焉者便敷衍責任，混過去就算了。」（見楊秋明：宜蘇縣圖書館發展芻見，刊載於今日社教，創刊號）另一位管理局圖書館負責人說：「本館建於四十九年，迄今已逾六載……草創之初，因陋就簡，今則成效漸彰，惟迄今尙無正式編制，故業務未能順利進行。」（見楊興友：陽明山管理局北投圖書館工作概況，刊載於民國五十五年社會教育年刊）

從這三位公共圖書館負責人的心聲，可以瞭解到今日公共圖書館存在着很多問題，主要的是人員編制過少、經費不足、和專業人才的缺乏。

先談人員編制問題。四十年五月十八日臺灣省政府公布之「臺灣省各縣（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觀其內容，有可商榷之處頗多。如第一條規定除彰化等十五縣市外，暫不設立圖書館。則其他六縣市經濟充裕，人口眾多亦不能設立圖書館。又丙等館編制員額爲四人，即館長、幹事、助理幹事、雇員各一人。依第三條規定，館內分爲四組，除館長兼任一組，幹事各兼任一組外；尙有一組，就須由僱員擔任。第五條規定「各圖書館得視業務需要，呈准于適當地區設分館，其所需人員均由圖書館總員額內調用」。如丙等館其本身業務人手尙嫌不足，遑論外調？若眞正照該「組織規程」規定，甲等館編制員額八人，則臺北市人口一百一十萬人，平均一館員要爲十二萬市民服務。一位教師只不過教導五六十個學生，其程度整齊，年齡一樣。而社會大眾，年齡大小不一，各人需要不同，而令一館員負責十二萬市民的閱讀工作，其不足以應付是顯而易

見的。臺灣省各縣（市）立圖書館組織規程已公佈十七年了，民國四十年時臺灣人口是七、八六九、二四七人，該組織規程規定甲等館員額八人，乙等館六人，丙等館四人。十七年後的今天，人口已達一千三百多萬人，增加了五百多萬人，而員額編制仍舊不變，自不足以應付現狀。法令規章必須適合時代及社會的需要，時代是前進的，社會是變遷的，可以說沒有一種法令規章可以行之久遠而勿庸改易的。我們希望該法令迅予修改。關於人員編制，我們認爲，即或不能照中國圖書館學會所訂之公共圖書館標準第四十二條「公共圖書館館員人數應依一館員服務一萬人計算」來修訂，但至少也要大量的增加了。

次談經費不足問題。經費不足，是各級圖書館的普遍現象。這似乎不單是財政問題；而圖書館事業之不受重視，實是主要原因。只要有關當局和社會人士能認淸公共圖書館事業的重要性，廣闢公共圖書館之財源，並不是絕無辦法。譬如說可以在民生主義社會福利經費項下定出百分比，或將每年增收地價稅之一部分撥爲圖書館經費，或在教育捐項下，寬列圖書館經費等。又如：美國各圖書館的經費，由於私人捐助的，其比例佔百分之十五；而我國竟很少有人從事此項樂捐。如果社會人士，肯把每年吃拜拜所耗費的巨款，拿出五分之一來捐助各圖書館，其成效也就很可觀了。

最後談到專業人才的缺乏問題。按照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圖書館組的課程看，關於社會教育必修學分共二十九學分。該組畢業生理應到省縣社會教育館或公共圖書館工作；但事實不然，我們發現一個可驚的事實，該組九屆畢業生一一九人中，竟無一人在社會教育館或省縣市圖書館工

作。考其原因，這是由於現行法令規定社會教育機關爲一般公務機關，視社會教育人員爲一般公務員。大學畢業生除非高考或普考及格，就沒有具備公務員資格，所以不得進入社會教育機關工作。今後社會教育機構，要想獲致社會教育人才，必先改訂人事法規。社會教育機關可分行政機構和事業機構二類。前者如政府各級社會教育行政機構，其任用資格除須專業技能外，當然應具備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始能擔任。後者如圖書館、博物館、社會教育館等工作人員，有的類似學術機關之研究人員，有的與教師工作相似，其人員之任用，似可比照學術機關及學校辦理。必須如此，始能羅致專才。

(五) 大學圖書館的問題

近年來大學、獨立學院及少數專科學校圖書館之進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今年五月間國立中央圖書館調查所得的資料而言，自由中國各圖書館館員曾受專業訓練者三〇七人中，三十七所大專院校圖書館卽佔一四〇人，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七。藏書數亦佔藏書總數百分之四十，其經費亦佔全部經費百分之三十四。如照六十九所大專院校計算，當不止此數。

惟大學圖書館仍存在着一些問題，如大學圖書館之歸屬問題，迄今尙無一致之規定。根據我國大學法第十四條規定「大學圖書館規模完備者得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任之」。目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私立東海大學五大學圖書館，皆直屬於校長，與教務等處平行。其他院校圖書館，則隸屬於教務處，相當於一組。如此，不僅業務難

以配合其工作，更無法使人重視，影響圖書館之發展至鉅。過去中國圖書館界至少有過三次呼籲，十年前，師範大學亦曾建議大學圖書館應直屬於校長。我們希望修訂大學法時，能明確規定大學及獨立學院圖書館，應直隸於校長或院長，以提高其地位，而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其次所要談的問題，與其說是大學圖書館的問題，不如說是教育的問題。大學圖書館為配合學校之教學進度和研究計劃而設置，圖書館之經營亦以此為鵠的。然我們發現不少大學生只把圖書館當做溫習課本的處所；對於書架上有價值的圖書，常漠然不顧。視其所借書籍，則大都是教授所指定授課用的教本，其次即文藝小說。事實上，教授們僅能講解基本原理，指示研究途徑，至於深入之探索，仍須學生自動地向圖書中尋求。今後我們除了希望能改進教學法，以鼓勵學生利用館藏資料外；並希望各館儘量的設法，以引導學生閱讀課外書刋和研究的興趣。

至於五十三年以後核准設立和立案的公私立專科學校達二十五校之多；然其圖書館，則大都藏書有限，亟待充實。

原載「社會教育研究」（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頁一四四——一七〇

編者按：本文由先生與張錦郎先生聯合署名發表。屈先生嘗手書一跋云：「本文所用資料，太半為本館調查所得；而組織成文，則錦郎兄一手之力也。標題上著者，僭列賤名，曷勝慚恧。爰識數語，以明不敢攘善之意。民國五十七年二月萬里記。」先生之謙虛胸襟，於此可見。

臺灣現存的珍本圖書和重要學術資料

本文是筆者民國五十五年春天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講演稿，當時是譯成英文宣讀的。臺灣大學圖書館學會，將印行學刊，向筆者徵文，遂以此應之——筆者附識。

友人周法高先生在民國五十三年二月曾作過一篇「臺灣公藏文獻資料鳥瞰」一文，載入他的「漢學論集」裏。在那篇文章裏，他列舉了臺灣公家收藏的七項重要文獻資料。這些資料，或是世界各國所沒有的，或者是他國雖有而不如臺灣所藏的完備。這是研究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的人們很值得參考的一篇文章。我這篇講演所要敍述的文獻資料，大部分是周先生曾經說到過的；他沒有提到的，只有一小部分。不過，在敍述資料的內容時，本講稿和周先生的文章，則互有詳略的不同。但周先生那篇文章，實給了我很大的方便。這是我應當首先聲明的，以下將分五類敍述：

一、珍本圖書

現在存於臺灣的珍本圖書，集中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故宮博物院三個機關。臺灣大學也有一些。

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的珍本圖書，共有十二萬多册。其中有宋刋本二〇一部三〇七九册，金刋本五部一六册，元刋本二三〇部三七七七册，明刋本六二一九部七八六〇六册。稿本四八三部四五三七册，批校本四四六部二四一五册，鈔本二五八六部一五二〇一册。另外還有朝鮮古刻本和活字本，日本古刻本和活字本，以及安南古刻本等。在明刋本中，有很多世界上少有的史部書和集部書，它們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資料。有些稿本，從來沒經傳刻過（例如明代王穉登的南有堂集）；或者只刻過一部分，而稿本則保存了它的全部（如淸代翁方綱的文集）。也有不少抄本，它們的內容，比各種刻本都多了很多資料（如舊抄本陸游的家世舊聞）。至於宋元刻本和批校本在校勘方面的價値，更不必說了。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北平圖書館有一〇二箱（約二千八百部二萬多册）珍本圖書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一九六五年十月，這批書也全部運回臺灣，由國立中央圖書館保存。這些圖書，都是經過仔細挑選的甲庫珍本。它們在學術上的價値，自然很大。無疑的，國立中央圖書館，現已成爲世界上收藏中國珍本圖書最豐富的機關。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宋元版書也有六十多部，而比較罕見的明版書，——尤其關於明代史料的——則較多。它收藏的方志近兩千種，其中頗有少見的珍本。另外，它還收藏了一萬多册鼓兒詞小說（有說白有唱詞的小說）。這一大批小說，乃是硏究平民文學最豐富而又是最

珍貴的資料。
故宮博物院的藏書，約十五萬多册，珍本書約佔半數以上。最著名的是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薈要。
臺灣大學所藏的珍本書雖少，但它有一部抄本的琉球寶案二四九册，是世界上僅有的孤本。是研究琉球史的最寶貴的資料。
綜括起來說：臺灣所藏的珍本圖書，以供給校勘方面和明史研究方面的資料最爲豐富。

二、檔案

臺灣有三批最豐富的檔案㈠是內閣大庫檔案；㈡清代軍機處的檔案；㈢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檔案。現在簡單地敍述如下：

㈠內閣大庫檔案。現存三十一萬多件，收藏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裏。這批檔案，原來收藏在清朝的內閣大庫裏，沒有人注意它。到了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大庫房屋壞了，當時的學部大臣張之洞，把它們移存在國子監，共裝了八千麻袋。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又把這批檔案移在清故宮午門上的歷史博物館。歷史博物館曾經整理出來極少的一部分，其餘地都當作了廢紙（共七千麻袋），堆在午門的門洞裏。到了民國十年（一九二一），歷史博物館就把這批「廢紙」，以五千元的代價賣給同懋增紙店，作爲另造新紙的原料。羅振玉聽說這消息後，就化了一萬三千元從同懋增紙店裏買回來。羅氏也整理出來一小部分，印成了史料叢刊。後來，羅振玉

把這批檔案以一萬六千元賣給了李盛鐸。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傅斯年先生又以兩萬元的代價，從李盛鐸那裏買來，才成爲中共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財產。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夏，華北的局勢漸漸緊張起來，傅先生命管理人員選擇了一百箱（三十一萬多件）運到南京。大戰期間，由南京先運到長沙，再運到昆明，又由昆明運到四川省南溪縣的李莊。大戰結束後，運回南京。一九五八年冬，再從南京移到臺灣。經過了這些變故，這三十一萬多件檔案，幸都完好無恙。

這些檔案，包括着：明代崇禎年間兵部的檔案，清朝入關以前內閣所存的舊檔，和清代初年的檔案。在這批檔案裏，有很多史事，不見於記載；也有很多史事，和常見的記載不同。無疑地，對於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來說，這是最珍貴也是最豐富的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把已經整理好的檔案，陸續地印成「明清史料」，現在已印了八集八十册。這八十册書，也只是這批檔案的一部分。

(二)清代軍機處檔案。這是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這批檔案連同內務府檔案和實錄，起居注等，共計二〇四箱二八九二〇件。自從雍正年間（一七二六以後）成立軍機處以後，清朝的政令，已由內閣大部分轉移到軍機處。因而軍機處的重要，並不亞於內閣；它的檔案，自然是重要文獻。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雖然不是清代各朝軍機處檔案的全部，但其史料價值，已經够大。至於，內務府的檔案，和滿文老檔，以及實錄、起居注等，也都是重要史料。

(三)關於近代的檔案。收藏最多的有兩個機關，其一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另一則是中

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收藏，是清代總理衙門、外務部，以及民國時代北京政府的檔案，共計有二二四箱。這些檔案，對於研究清末民初中國和世界各國的關係方面，具有特殊的價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利用這些資料，已編成並出版了中俄關係史料、海防檔、中法越南交涉檔、礦務檔等書十餘種。

黨史編纂委員會所收藏的檔案，偏重於中國國民黨的史料。因爲中國國民黨的史料和中華民國的史料大部分是相關的，因而這批資料，自然也是中華民國史的重要資料。利用這些資料編輯出版的書，有「六十年來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中華開國文獻」等。

三、甲骨刻辭和古器物

據估計，全世界收藏的有字甲骨，約在十萬片左右；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則有二萬五千五百多片。這二萬五千多片甲骨，在數字上看，約當全世界所藏的四分之一。若論它的實際價值，可能相當於其他的七萬多片。因爲：㈠它們大部分是用科學方法發掘出來的（只有六百多片是買來的），出土的地方和它們埋藏的情形，都有正確的紀錄。㈡它有整個的或近乎整個的龜甲和牛骨版約六百片左右；每一片的面積，相當於他處所藏的十餘片乃至數十片。因而，它的價值是可想而知的。此外，國立歷史博物館收藏了有三千六百多片，國立中央圖書館也有七百多片，合計起來，收藏在臺灣的有字甲骨，約近乎三萬片。

關於古器物方面，也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最多也最有價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各處發掘所得的古器物，包括石器、陶器、銅器等，都已運來臺灣，總數在十萬件以上。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特別是殷代——的文化史來說，這些器物，具有無可比擬的價值。其次，是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的藏品。故宮博物院收藏了從宋元以來歷代皇室的古物，運到臺灣來的，計有：銅器二三八二件，瓷器一七九三四件，玉器三八九四件，漆器三一八件，珐瑯、雕刻、雜項等共計二萬多件。中央博物院的藏品，則有銅器八四四件，瓷器五四六件，珐瑯、漆器、文玩等五百六十多件。關於銅器方面，故宮博物院曾出版了一部故宮銅器圖錄（包括中央博物院的藏品）。瓷器方面，也有故宮瓷器錄一書，現已出版了三冊，尚在陸續編印。另外，國立歷史博物館藏有新鄭出土的一批銅器，是新鄭古器圖錄中所著錄的。

四、金石拓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了將近三萬份的石刻拓片，另有陶文拓片一百多冊又八百多張。這些石刻拓片，以墓碑、墓誌之類的爲最多；另外則爲修廟，祭祀、修橋、修路等類的記載。墓碑、墓誌等，固然是研究傳記的絕好資料；修廟、祭祀等記載，則有些是書本中所不易找得到的文獻，對於研究社會史的人說，也是珍貴的資料。陶文中的一百多冊，是清末最著名的古物收藏家陳介祺裏所拓的；另八百多幅，則購自北平的若干收藏家。如果從事陶文研究，這是一批最豐富的資料。

值。

另外，國立中央圖書館也藏有金石拓片五千多份。其中有全形的銅器拓片六九九張，最有價

五、書畫

在中國，寫字和畫畫，是同樣高尙的藝術，因而收藏名畫的人，也同時收藏名家的法書。在臺灣，收藏字畫最多的處所，是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這兩院自到臺灣後已合併成了一個機關。總計兩院所藏的字畫，共達五千件以上。這些字畫，都是宋元明淸各代皇室所收藏。字畫寫作的時代，最早的到達東晉，最晚的則是淸代人的作品。

故宮博物院曾編過一部故宮書畫錄，把這些字畫（連中央博物院的在內）的形式、作者等項，都記錄在這部書裏。另有故宮名畫三百種一書，則是挑選了故宮博物院最著名的畫三百幅，照相精印的。至於法書方面，故宮博物院也正陸續影印各名家的專册，現在已出版了王羲之、唐太宗等六種。

六、附記

以上所說，都是成大批的珍本圖書和學術資料。我只能作概括地、粗略地敍述，無法作較詳細的報導；因爲那決不是一兩個小時的時間所能說淸楚的。此外，像臺灣大學考古學系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藏臺灣高山族的各種標本，國立臺灣大學及臺灣省立圖書館所藏關涉東南亞

各國的圖書和資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在安陽殷墟發掘所得的四百多具殷代的人頭骨、和該所在大陸及臺灣調查方言的錄音檔，以及該所所藏萬片左右的居延漢簡等，也都是重要的學術資料，這裏不再一一敍述。

總括起來說，臺灣所收藏的圖書和學術資料，爲世界他處所沒有，或雖有而不如臺灣完備的，有：

一、關於中國考古學和殷代史資料。
二、關於明代史和清初史的資料。
三、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資料。
四、關於中國古代美術史的資料。
五、關於中國圖書板本學和校讐學的資料。

以上這些資料，固然可以供給學者們作高深的研究，也是讀學位的人作論文時最好的資本。

原載「（臺灣大學）圖書館學刊」，一期（民國五十六年四月），頁一三——一九

一個搶購圖書的故事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部分善本圖書的來源

這是一件偉大而且艱苦的工作，是一個在圖書聚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故事。然而，知道這件事情的人，並不太多。

當抗戰的時候，敵人除侵佔土地，慘殺軍民，和掠奪財物之外，還處心積慮的來算計我們的精神遺產——圖書文物。特別是圖書，一方面被敵人掠奪，一方面受着兵燹，眞是使人生「文武道盡」之感。江南的藏書家，如劉氏嘉業堂，鄧氏羣碧樓，以及張芹圃、張蔥玉等，對着他們的珍貴圖書，都日夜焦慮着。這消息傳到後方之後，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氏，便發憤來設法搶購這些行將散失的珍貴圖書。

中英庚款會，本來有撥交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費一百五十萬元，因爲抗戰軍興，房子無法建築，蔣館長便想利用這筆款子，到淪陷區裏秘密收書。這意見馬上得到了英庚款會董事長朱家驊和教育部長陳立夫的贊許。於是在二十九年的春天，蔣館長便改姓易名，僑作商人的模樣，潛赴所謂孤島的上海。在上海又得到張菊生、徐森玉、鄭振鐸、葉恭綽、何炳松、張壽鏞諸氏的熱心

贊助，馬上組成了一個收書的機構，開始從事於文化上的戰鬬工作。

不久，蔣館長復潛回重慶，專門籌款；鄭振鐸等在上海，便專門收書。他們經常在航快函中，用他們自定的術語，來商量「商情」。那時候法幣還不太跌價，賣書的人，也都有爲國家保存文獻的熱誠，甘願賤價出讓。英庚款會的一百五十萬元用盡之後，教育部又專爲此事批給了大量的特別費。經過了三年的搜求，用了兩百多萬的款子，於是江南藏書家的精華，大部都進了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庫。

這些搶購的圖書，無論在質上或量上，說來都着實驚人。宋本元本，都在百種內外，明刻本則達三千種以上。宋本裏凡監刻、浙刻、蜀刻、贛刻和建刻，應有盡有。其中有若干種，如某家註的周易（至今尙無法查出係何人所註），和月老新書等，不但人間沒有第二個宋本存在，乃至無論在什麼本子裏，也決找不到第二部同樣的書。它們是眞正的「天壤間孤本」。罕見的金刻本，有明昌間平水刻的地理新書；和大定間平水陳氏刻的銅人諭穴鍼灸經。元刻本裏，有蒙古中統時所刻的史記，和元遺山集；建刻的五代史評話，和巾箱本的琵琶記等書，都可說是驚人秘笈。批校本和名家手抄本的書，則有唐伯虎、倪元璐、葉石君、錢叔寶、馮已蒼、傅青主、何義門、顧澗蘋、盧抱經、孫淵如、翁覃溪、吳槎客、陳仲魚、鮑以文、嚴鐵橋、勞巽卿、勞季言、黃蕘圃……諸家。單是黃蕘圃批校題跋的書，即達百種之多，眞可以說是洋洋大觀了。

這批大量的珍本，在史料上和校勘上，自然都有他無法估計的價值。但中央圖書館，並不是把它們秘藏起來當作禁臠，而不准外人染指的。相反的，它正憑着它拮据的財力，想逐漸來把這

些「秘笈」化身千萬。該館影印的玄覽堂叢書，第一集一百二十册早已出版，裏邊所收的都是罕見的明代史料。第二集正在籌備着，大約不久也可以問世。該館預計着，至少可以出到十集。

筆者寫到這裏，謹爲搶購這批珍本圖書的人致敬，並爲中央圖書館祝福。

原載「上海文滙報」，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以筆名「書傭」發表。



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現狀和願望

一、國立圖書館的使命

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十五期裏，刊載了前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慰堂先生所作的「國立圖書館的起源與使命」一文，該文中指出國立圖書館的藏書目標，應該集中於民族文化、世界知識、和各科學術三項。英國伯明翰大學圖書館館長韓福瑞 (K. W. Humphreys) 去年也有「國立圖書館的任務」一文，刊在聯敎組織圖書館公報第二十卷四期裏。在這篇文章裏，他指出國立圖書館的基本任務是：㈠集中典藏一切本國文獻；㈡依法執行出版品存儲；㈢合理收集世界文獻；㈣編印國家書目；㈤報導書目資料；㈥出版各種目錄；㈦展覽。此外如收藏珍貴稿本、圖書館技術的研究、辦理國際圖書交換工作、訓練圖書館專業人員等，他也都認爲是國立圖書館的重要工作。蔣先生所舉的三項原則和韓福瑞所提各項細目，我國立中央圖書館，都正在做着。只因人力和財力的限制，還沒能做到理想的程度。以下先就中央圖書館目前的情形，作一個簡略的

報告。

二、國立中央圖書館目前的業務

㈠ 採訪與編目

中央圖書館的購書經費很少，國外購書費全年六千美元。訂購國外的雜誌、日報即需三千多元；餘下來二千多元即使全買篇幅較少的圖籍，也不會超過三百本。國內購書費，全年是四萬八千元，買一般的線裝書，很難買到一百部，善本書更不必說。幸而，（甲）依照出版法，凡國內的書店和公私機關的出版品都得送一部給中央圖書館；（乙）由於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可以換來一些外國書刊。（丙）由南京遷臺時，運來善本書十二萬多册，和普通線裝書一萬多册。因爲這幾種關係，中央圖書館的藏書量（三十四萬册），雖然距理想的程度還很遠，但已經略具規模了。

編目工作，是和採訪工作配合的。一部書進館後，先到採訪組，經過登錄手續後，送編目組編目；編目完畢，再送閱覽組典藏，以供衆覽。中央圖書館的編目工作，和採訪組配合得很好，凡是採訪組送到編目組的書，都能在短期內完成編目手續送入閱覽組。

㈡ 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

國內各公私機關，乃至私人的出版品，如果願意和外國機關或私人的出版品交換，中央圖書館的出版品交換處是樂於爲他們服務的。那就是把本機關或個人的書刊，開列淸單，交給中央圖書館，中央圖書館便會把外國機關或私人願意交換的書單寄給你。如果看到外國某家的書刊有自己想要的，而那一家也想要本機關或個人的書刊，經過中央圖書館的「撮合」，雙方就把自己的書刊，寄到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就會分別把書刊轉寄給兩方。

目前委託中央圖書館辦理交換工作的，一共有五十八個國家，五百二十多個機構和私人。去年一年內交換的書刊，計送往國內的西文書刊二二五〇七四册，發往國外的中文書刊四四五一一册。這是一個繁瑣的工作，中央圖書館所耗費的郵費、運費，目前已超過了它所能負擔的限度。但，對於國際文化交流來說，這一工作的重要性，是可以想見的。

㈢ 閱覽

臺北市目前有三所公共圖書館，中央圖書館以外，還有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和臺北市立圖書館及其分館。中央圖書館雖也辦理一般性的閱覽事務，但它的重點，則在硏究與參考兩方面。中央圖書館目前除了普通閱覽室外，還有五個參考室，和一個善本圖書閱覽室，一個圖片閱覽室，以及一個期刊閱覽室，一個官書閱覽室。除了辦理閱覽事務之外，閱覽組還辦理解答國內外人士的諮詢工作。由於要求解答的問題，多半是學術性的，有時一個問題，我們須查考好幾天，才能得到圓滿的答案；有些問題，本館的人員不能答覆，還須請敎館外的專家。據統計，上

年度答覆國內外人士的諮詢，共四百五十四次。

三、中央圖書館所藏的重要資料

(一) 善本圖書

中央圖書館原有善本圖書十二萬多册，加上去年從美國運回、現由中央圖書館保管的北平圖書館的甲庫善本書二萬多册，以及來臺灣後購買的善本書，目前所藏善本圖書，已達十四萬三千多册。其中計宋刻本二百九十多部，金刻本十一部，元刻本三百六十多部，明刻本超過了八千部，活字本四百四十多部，日本和朝鮮的古刻本、活字本、以及安南舊刻本等，合計也有五百六十多部。各刻本和活字本外，還有稿本四百九十多部，舊鈔本三千一百多部；批校本也有五百四十餘部之多。世界各國收藏中國善本書的圖書館雖然很多，但無論就它們所藏的質或量來說，都遠不及中央圖書館的藏品。

(二) 各國的官書

中央圖書館所藏官書的數量，在本國當首屈一指。除了本國各級政府、各議會、各文教機關、各公私營事業機構的公報和專題報告之外；還有聯合國及其所屬十多個獨立國際組織，以及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官書。單以聯合國的文件而論，則有年鑑、期刊、條約叢刊，以及秘書

處、安理會、經社理事會、託管理事會、裁軍委員會、國際法委員會……的紀錄等。再以美國的文件而論，則有參眾兩院的各種報告，議事錄等；最高法院的「美國報告」、「權利法庭報告」、「關稅與專利申訴法庭報告」等。美國各部會的連續性刋物，達三百六十餘種之多。這些刋物，自然都是重要的資料。

㈢ 期刊和報章

中央圖書館所藏的期刊和報章，其數量也相當的多。據上年度的統計，中文期刊共九百五十一種，現在按期陸續到館的有四百五十種；西文期刊共一千零五十九種，現在按期陸續到館的有四百零一種；日文的有五十九種，韓文的有四十七種，日報部分，則有中文的五十一種，按日到館的四十七種；西文的二十六種，每日到館的十八種；日文的和韓文的也各有數種。

學術上新的理論和各種報告，常常先在期刊裏發表；日報則是現代史的史料。因而，這兩種比較豐富的資料，也是值得向國人介紹的。

四、未來數年內業務發展的重點

中央圖書館有寶貴的資產，既是那十多萬册善本圖書；自然，這些善本書，幾乎全部是屬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新書的來源，既多由於送繳；而我國的出版品，也以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書佔絕大多數。因此，中央圖書館目前的收藏，是以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類的書籍爲

最多；也就是說，這兩方面的圖書，——特別是本國人的著作，已具有基礎。

誠然，中央圖書館的藏書，對於各科應作平衡發展，而不應該畸輕畸重。但在目前財力艱難的情況之下，勢難兼包並蓄，而不得不採取重點發展的辦法。在未來數年內，收藏的重點，將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兩方面，尤其注重的將是收集世界各國有關漢學的著作。希望世界各國研究漢學的要籍，中央圖書館能應有盡有，配合着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古器物和美術品，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發掘殷墟所得的標本、和其他學術資料，讓自由中國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漢學研究中心。不但我們研究本國文化的人士，可以憑藉着這些資料和圖書，能够達到他們最佳的研究效果；即各國研究漢學的學者，也不能不到我們這裏來搜集資料。響應總統所提倡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這似乎是一個最切合實際的辦法。

五、困難和期望

上述的願望雖然不奢，但以目前中央圖書館的財力而言，萬難達到預期的目的。粗略的估計，中央圖書館如能一次得到臨時費新臺幣二百萬元，用以初步補充所缺的中日韓文和西文的重要圖書，以後每年有二萬美金的購書費，以收集國外出版有關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圖書（特別是與漢學有關的）；那麼，我相信三年之後，將能成一個在國內最完備的漢學研究中心。

其次是書庫的問題。十四萬多册善本書的存放，和故宮博物院已商定合作辦法，俟收宮博物院的書庫修成之後，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除複本外，將全部寄存於該院，並在該院和中央圖

書館同時開放閱覽。

現在普通圖書的書庫只能存放十五萬册圖書，目前已到了飽和狀態。期刊的庫房，也已經沒有隙地。尤其是盛放官書的庫房，早已沒有餘地再增加書架；有許多箱子和郵包，沒法打開整理。現已請政府撥款，擴建書庫。不過，打算擴建的書庫，也只能容納七萬多册圖書；不及三年，又將有書滿之患。為作較長久的打算，最好能建一座可以容納五十萬册圖書的書庫，一方面可以將善本圖書集中管理，一方面可以容納未來十餘年內新增的圖書。這筆建築費和設備費，恐怕需要五百萬元以上。

最後是員額問題。中央圖書館目前的員額是三十五人(包括館長在內)。它有八個單位，但採訪組就實際需要職員十八人。閱覽組就需要職員近三十人。由於上述的原因，不得不用多量的額外人員。額外人員的待遇菲薄，不能久於其位。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逐漸增加正式員額，俾逐漸減少額外人員。倘若能有六十個以上的正式員額，對於中央圖書館的業務，必有很大的裨益。

總而言之，中央圖書館的困難是「窮」，它的願望是能得到經濟的援助。政府和各文教基金會如果重視此一問題，籌措以上所說的這筆經費，似乎也不太難。而況國內不乏急公好義之士，海外更多熱愛祖國的華僑；倘能量力捐助，必將集腋成裘。為了響應總統復興中華文化的號召，為了提高國家在學術文化方面的國際地位，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本人謹代表中央圖書館，向國內外的同胞呼籲。

原載「中央日報」，二版，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計劃中的幾件工作

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稱本館），從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由蔣慰堂（復璁）先生創辦以來，到現在已經三十四週歲了。它生長於患難之中，屢蹶屢起。自民國四十三年在臺灣復館，又已十三個年頭。由於蔣慰堂先生和全館同人的努力，十三年來，館務日漸復興，又已達到小康的現象。

所謂小康現象，是它已擁有三十四萬册以上的書刊（在南京時，藏書曾超過一百萬册。），其中包括十四萬三千多册善本圖書，和聯合國、世界其他聯合組織，以及三十多個重要國家的官書；此外，還有二千種以上的中文與外文期刊。善本書中，有很多是在全世界其他各處找不到的珍籍；官書，在自由中國是最豐富的收藏；期刊的數量，雖不如臺灣大學所藏的豐富，但近年新出版的刊物，則遠較臺大收藏的為多。這些，都是從事研究工作者的重要資料。

照上述的情形看來，本館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基礎；但，有待於擴展的業務還很多。茲衡量本館的財力和人力，把將來能够做到的，或雖未必能做到而必須努力以赴的幾件工作，條述於

下，用以請教於關心圖書館事業的人士。

一、大量補充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圖書

國立圖書館的職責，是收藏本國的和外國的文獻，以及各科的圖書。但本館的購書經費，實在太少；它比起美國國會圖書館來，固然不能望其項背；卽和美國各著名大學圖書館的購書費比起來，也望塵莫及。在這種情形之下，與其兼收並蓄，而一無所長；不如作重點的發展，使它成爲一個某方面圖書的重鎭。

現在我國研究自然科學和數理科學的人，都集中在各大學和研究院所。各大學和研究院所，關於這類的圖書設備，本已具有基礎；加以近年來國家長期發展科學會的補助，這類的重要書刊，多已應有盡有。以目前本館拮据的財力而言，自不必急於去複購這類的圖書。

前面說過，本館有十四萬二千多册善本圖書，這無疑地是我國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資料的寶庫。本國從事文史研究工作的人們，離不開這批資料，不必說了。外國的學者，以這批善本書爲對象而來收集資料的，最近四個月來，就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華盛頓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日本京都大學之教授及研究生等七人、歐美日本各大學委託攝製微影膠片的更多。但，所不足的，就是民國四十二年以前和清代出版的普通圖書太少；日本和歐美的學者有關漢學的著作，尤感缺乏。爲了配合現有的基礎（善本書），因而目前的切要之圖，是能籌措一筆較大的款項，來收購各國有關漢學的圖書、和補充本國的普通圖書。

國人研究文史的，除了極少數學術研究機關和極少數大學的人員外，一般的情形，是知古而不知今（對於現代人研究的成果多不知道），知中而不知外（對於外國人研究漢學的情形多無所知）。由於不了解學術的行情，於是他們自己所選擇的研究題目，或指導學生所作論文的題目，常常是早已有人研究過，而且已經得到正確結論的。因爲自己不知，於是花上幾年寃枉工夫，所也的結論，不是人家早就說過了，就是還遠不及人家的水準。這豈僅是浪費了時間？還必然會受到國際學者的輕視。

要了解學術的行情，就不能不多讀國內外有關的書刊。清代出版的圖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較備；但它既不是公共圖書館，又遠在郊區，自非大多數的人們所能利用。至於民國以來到政府遷臺以前的書刊，和日本歐美有關漢學的書刊，則各圖書館所藏的都不够充實。本館急於要買民國四十二年以前和清代出版的圖書、以及日本、歐、美有關漢學的重要書刊，其目的就在於此。有了豐富的國內外近代出版有關漢學的圖書，再加上十四萬多册善本書，自然，中央圖書館將成爲收藏漢學圖書的重心，也自然可以提高了國人從事研究文史工作的水準。復興中華文化，這似乎是一個最切合實際的措施。希望政府和各基金會，能重視這一事實，在經費方面，予以有效的支援。

二、善本圖書的閱覽和傳佈

本館藏的十四萬多册善本圖書，是從事本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絕好資料，自不待言。

這些圖書，目前雖已全部運抵臺北，存放於館中的展覽室內。但，展覽室容積太小，無法開箱上架；只得仍舊裝在箱內，堆存於該室。這批善本書箱，列成大隊，共計四排，每排堆積三層，眞是盈宇充棟。當讀者來閱覽的時候，特藏組的同人，就不得不翻箱倒篋，把讀者所要看的書找出來，以供閱覽。這樣，每找一部書，往往至少須半天時間，多則須兩天以上。特藏組的員工，雖都能勞而無怨；但躭擱了讀者閱讀的時間，即使讀者可以原諒，而在我們圖書館的從業人員來說，究竟是不應該的。何況植物園是白蟻的大本營；而箱件堆存，在通風避潮方面，自然不合理想。把這批價逾連城的古籍，長期堆存在這裏，我們負典守之責的人員，眞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蔣慰堂先生在接長故宮博物院之後，而尚未交卸中央圖書館的職務之前，曾針對着上述的問題，訂定了一個把館藏善本圖書存放外雙溪故宮博物院的辦法，經呈報教育部和行政院備案。根據該項辦法，俟故宮博物院的書庫建成之後，中央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可以移存在那裏，並可開放閱覽；而且，在故宮博物院的防空洞裏，還可以保留八十只書箱的空位，以備空襲時存放中央圖書館的珍本。

這本來是一個妥當的辦法。但，外雙溪距市區較遠；且故宮博物院每日開放的時間，是從上午九時到下午五時。而利用善本圖書的人，大多數是大學教員和研究生，他們多半上午有課，午飯後稍事休息，再趕車到外雙溪，至少也須到下午兩點鐘以後，因此他們每天很難有三個小時的時間，從事閱讀。那麼，在這批圖書的利用方面來說，將來一定不能使閱覽的人滿意。

爲了補救這一缺陷，本館打算根據前述辦法第一條的規定，提出一批最適於研究之用的善本圖書，和市區的大學或文教機關合作。這樣，閱者既可省下一些車費，又可以節省乘車趕路的時間。而且，合作後開放閱覽的時間，打算從上午九時到夜晚九時。如此，對於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們，才能發揮這些圖書的利用價值。

這意見已獲得學術界人士一致地支持，我希望將來能够順利地達成這一志願。

至於傳佈方面，目前經常有歐美各大學委託本館攝製善本圖書的微影膠片，本館都是轉託中央研究院或政治大學代辦。今年四月下旬，本館自備的微影膠片攝製機將可裝置就緒，那時當更能加強這方面的服務。

戰亂是圖書的最大尅星。當此舉世正在對抗共匪的時代，大戰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本館所藏的善本書中，有很多是人間僅有的孤本；雖非孤而極爲罕見的秘笈，爲數尤多。這些珍籍，如不讓它們化身千百，則戰事發生後，就很可能有文武道盡之歎。因此，本館擬訂了一個影印善本圖書辦法，已呈教部請示，不久當可核下。該辦法公佈後，善本圖書當可大量傳佈。

三、恢復館刊

本館在抗戰期間，曾印行圖書月刊。抗戰勝利後，有館刊和學觚兩種刊物。遷臺以來，因限於經費，無法復刊。最近已和學生書局商定合作辦法，將於本年七月間恢復停止已經十八年的館刊。

預定館刊的內容，將包括讀書指導、本館善本書志、本國出版新書提要、書評、各國圖書館概況，各國學術消息，以及本館每月收到的送繳書目等。希望藉着這一刊物，讓國內文教界人士，多瞭解一些國外學術界的近況；並希望國外圖書館，由於新書提要的介紹，而多買些有價值的中國書刊。而且，過去的善本書志，多注重欣賞或文字的校勘。本館館刊中的善本書志，將注重各書傳本的源流，以及此本和他本的比較，以明各本的優劣，好讓讀者擇善而從。

這是國內外人士期待已久的刊物。將來復刊後，才能和世界各圖書館互通聲氣，而促成更多的書刊交換，或其他文化交流工作。

四、擴展與國際文教機關合作業務

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理國際書刊交換業務，目前和我們經常交換書刊的有五十個國家和地區，相互交換的機構，計五百二十一個。將來還會日益增多，這是可以預料的。此外，如代外國圖書館選購本國新出版的圖書，答覆外國學者所函詢的問題，與美國東方研究所合作編纂中國作家的著者卡片，與哈佛等大學合作編製有關中國社會的圖書及論文卡片，這些都是本館或行之已久，或最近開始的工作。

將來打算進行的，還有以下兩事：

(一) 代國外學人蒐集有關漢學資料

館藏善本圖書中，固然有很多罕見的資料；他如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大學、故宮博物院等，所藏的圖書，也都很豐富，也各有其獨特的長處。從事漢學研究的人，自不能不利用這批豐富的資料。外國學人和旅居國外的本國學者，已確知某書中有某項資料，指明篇名卷頁，來函讓我們把他所需的資料影照下來，或複製，或傳抄下來寄去，以供利用的，是常有的事。但，中國圖籍，浩如煙海，國外的學人，勢難盡知某書中有某些資料。因此，我們打算替他們服務，只要他們告訴我們其所需資料的範圍，我們便可以代他們搜尋有關的資料。

(二) 代國外圖書館鑒別中國善本圖書

世界各國圖書館收藏中國圖書的很多，日本和韓國的圖書館，收藏中文書的尤其普遍。單以北美洲而論，收藏中文書的圖書館就有五十多個；所藏中文書超過十萬册的上就有七個圖書館。各圖書館所藏的中文書中，多有善本；但國外能够鑒別中國善本書的人，實在太少。因此，本館打算和外國各大圖書館合作，如果有願意委託本館代爲鑒別中國善本圖書的，我們樂意接受這項工作。這一工作，進行起來倒很簡便：委託者只要把他們藏書的卷頁一二葉和卷尾一二葉的照片寄來，我們就可以代爲鑒定它的版本。

五、結語

總之，圖書館從業人員，是文教界人士的公僕。我們樂於竭盡我們的力量，忠實地爲主人們

服務。上述的幾點，只是目前在可能範圍內，本館所打算進行的工作。將來館務應該怎樣發展，對於社會人士怎樣才能發揮更佳的服務效果，我們自己固然會時時地計劃着；我們更希望主人們指示我們，督導我們。

原載「教育與文化」，三五一、三五二期合刊（民國五十六年三月），頁一——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一、創立之始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建國大業，於焉開始。當時凡百庶政，無不欣欣向榮。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也就在這一偉大的時代中誕生。

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國民政府大學院在首都南京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會中決議籌設國立中央圖書館於首都，由大學院計畫進行。嗣後，大學院改爲教育部，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八日，教育部令派本館前館長蔣慰堂（復璁）先生爲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在南京沙塘園租民房一所爲籌備處，開始工作。同年四月二十日，教育部核定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組織大綱。經費方面，初由交通部每月補助籌備費二千圓，後經行政院核定每年度經常費四萬八千圓。藏書方面，以教育部北平檔案處圖書四萬册爲基礎；又通函黨、政機關學會與世界各學術團體，徵求出版品；並

依教育部新書呈繳規程，函各出版商呈繳書籍。組織方面，依照教育部核定之組織大綱，主任下設總務、圖書二組，分掌文書、會計、庶務與採訪、編目、閱覽各項業務，後來又接辦了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這樣，一個代表國家的國家圖書館便粗具規模了。

其後，書籍不斷增加，組織不斷擴充，業務也日形繁多，原租用的民房已不敷使用。此時適值中央研究院新建院舍完成，乃商得該院同意，將其成賢街的總辦事處舊址，讓予本館。經修葺後，於二十五年九月一日正式開放閱覽。這時本館全部的藏書計有：中文書籍六九六八四册；金石拓片二九〇一幅；地圖四二七册；雜誌一五四八〇册；其他的圖書，包括零星的小册子在內，約六五五〇册。到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發生之時，藏書已漸增至十八萬册。

成賢街的新館址原亦爲民房，只宜於辦公之用，對於圖書館庋臧與閱覽兩大任務，皆不適合。旋承中英庚款董事會撥助一百五十萬元，作爲館舍建築經費。二十六年由教育部組織「中央圖書館建築委員會」，聘請戴傳賢先生爲主任委員。勘定國府路（卽後來的林森路）土地四十六畝爲館址，訂立建築計畫，徵選建築設計圖樣；然而未及開工，抗日戰爭便爆發了。

二、戰火中的播遷與成立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軍興。八月十五日，首都遭敵機轟炸，本館不得已停止了只差半月還開放不到一年的閱覽工作；並選擇重要圖書封裝二百六十三箱，積存於城南故宮博物院新建密

庫中，以策安全。十一月十八日，奉令隨政府西遷。但時局緊急，輪船艙位有限，僅能擇要携出圖書一百三十箱。二十一日抵漢口，暫將圖書存放於武昌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十二月十五日，奉令遷長沙。二十七年元月三日，舟次岳陽，復奉遷川之命。因雇輪船，直駛宜昌，借白衣巷街聖公會爲辦事處，並存儲書箱於傳教堂內。二月四日，復由宜昌入川。十二日抵重慶，借川東師範大禮堂樓房爲辦事處，並租上淸寺聚興村民房爲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事處。五月一日，在重慶成立參考閱覽室，特設置抗戰文庫，公開閱覽。九日，勘定重慶兩路口新市街第一苗圃爲本館重慶分館基地。九月十日，在雲南昆明分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事處，辦理戰時國際交換業務。二十八年三月，敵機空襲重慶，本館奉令疏散至鄉間，乃於江津縣白沙鎭上松林租民房辦公，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仍留重慶。爲了便於民眾閱覽，特於白沙鎭設民眾閱覽室。

二十九年七月，本館奉令結束籌備事宜。八月一日，國民政府明令正式成立「國立中央圖書館」。十月，任命蔣慰堂先生爲首任館長。三十年元月，重慶分館舍落成。二月一日，開放閱覽。三十一年四月，設新橋閱覽室於白沙紅豆樹國立女子師範學院。

三、抗戰期間的幾件大事

由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四年八月，這八年中，我政府領導全國軍民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並未因艱苦之抗戰工作而遲誤建國大業；本館在政府領導下，亦未因輾轉播遷而阻礙了擴充發

展。

首先應該述及的，是淪陷區善本圖書的蒐購工作。我國江、浙等地，自明代以來，卽爲藏書豐富之區。抗戰初期，那些淪陷區的藏書世家，爲了生計所迫，同時怕被人刼掠，對於先代的珍藏多已不能世守，因而大批的善本書，逐漸流入上海的書肆中。當時，寓居上海的愛國人士，遂分別函電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及中英庚子賠款會董事長朱家驊先生，建議政府設法籌款收購，以免散佚。陳、朱兩先生均認爲實有予收購的必要。而本館當時正有一筆中英庚子賠款會撥來的建築經費，除建造重慶分館外，餘存尙多，可以動用。於是這件事便交由本館負責，蔣館長乃先飛香港，與庚子賠款會留港董事葉恭綽先生接洽，請其負責收購廣東方面流散出來的書籍。繼卽變易姓名潛赴上海，安排滬上的收購工作。爲避敵僞耳目起見，收購工作，以中英庚款會名義進行。這時江、浙和廣東一帶的著名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羣碧樓、番禺沈氏等故家舊藏的珍本圖書數萬册，都爲本館所收購。其經費除以中英庚款會撥助本館建築費餘額滙付外，並由政府撥發專款以補不足。在上海收購的珍本圖書，於民國三十年陸續運往香港，暫存放於香港大學。在港並曾選得精品若干部，空運重慶；然以運費過於昂貴，故所運無多。於是乃有裝箱運往美國，委託我駐美大使胡適博士轉寄美國國會圖書館之議。不料裝箱甫告竣事，未及啟運，太平洋戰爭卽已爆發。不久，香港淪陷，書箱全被日本海軍掠去。勝利後，經盟軍統帥部核准，又歸還本館。

其次是戰時本館的出版工作。民國二十三年，本館曾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二百二十一種一

千九百六十册。二十四年，編印館藏官書目錄、期刊目錄及呈繳圖書目錄。二十五年八月起，編印藏書目錄卡片，以五百張爲一組，出至第八組。可惜這些工作都因抗日戰爭之爆發而中止了。戰時，本館爲適應需要，自二十六年十月起，在武昌、岳陽、長沙、宜昌、萬縣、重慶等地，携帶油印機隨時編印戰時國民知識書目。二十八年九月，編印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聯合目錄。民國二十九、三十兩年，本館在上海收購的善本書，因恐復遭散佚，特選出三十三種影印。題目「玄覽堂叢書初集」，係取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之義，以隱喻這是重慶中央政府所印佈的。

再次爲戰時的閱覽工作。二十七年二月，本館遷至重慶，雖以圖書殘缺不全，經費又艱窘拮据，加之流亡播遷，人員也不能集中，但經過短期之籌備，旋卽恢復閱覽工作。先辦參考閱覽室，附設抗戰文庫。自二十七年五月至二十八年三月，閱覽人數共一七六〇三人。後奉令疏散至白沙鎭，於短期內先後籌設白沙民眾閱覽室及參考閱覽室，並附設兒童閱覽室。三十年一月，重慶分館館舍落成。二月一日，開放閱覽，有普通、特別、報章等閱覽室。因事實之需要，又增闢兒童閱覽室、中文及外文參考室、地圖影片室及三民主義研究室等。另設展覽室，專供陳列展覽品之用。同時又在白沙鎭之新橋設閱覽室於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並隨時舉辦各種展覽會及讀書比賽、講演比賽等活動。

最後卽是戰時本館的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了。抗戰期間，因爲華北及東南沿海盡被敵人佔領，國外交換書刊，改由海防與仰光進口。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乃在昆明設辦事處，統盤負責

兩地的接受和轉運工作。二十九年，教育部聯合外交部設立戰時徵集圖書會，分向各國徵集圖書儀器，充實因戰爭而遭受損失的各大學圖書館與各文化機構，而由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其事。受命之後，本館除主動向各國徵求圖書儀器，再分配給散處在重慶、成都、昆明、貴陽和成固的各大專院校外，同時並調查各院校因戰爭所遭受的損失和各科系實際需要情形，作爲分配的標準。即民國三十三年一年之中，便徵得英國圖書六十二箱，美國圖書二百一十箱，分配給各院校使用。這件工作的重要，實在不是今日安處臺灣眼見造紙、印刷、出版與交通事業均極度發達的我們所能了解的。

四、勝利復員

三十四年八月，日寇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本館散處於鄉間之各單位人員漸次集中重慶，待命復員。三十五年二月，本館首批復員人員到達南京。當即奉命清點僞中央圖書館，僞圖書專門委員會圖書及僞博物委員會之文物。經整理後，即開放閱覽。又奉令接收陳逆羣的澤存書庫，清理後，呈准教育部設北城閱覽室，開放閱覽。後又撥一部分圖書假新街口社會服務處開放閱覽。三處閱覽人數月達三萬人。

勝利後，政府因鑑於要發展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原在二十九年頒布的本館組織條例已多有未盡合宜的地方。三十四年十月，國民政府公布新修訂的本館組織條例。根據是項條例，本館的工

作單位計有採訪組、編目組、閱覽組、特藏組、總務組、會計室、人事室等，員額定爲一百五十五名，另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組織漸臻完備。

三十五年初起，本館的工作人員及所藏的珍本圖書，分批自四川東運。將重慶分館館舍、用具與普通本中外文圖書，悉數移交新設立的國立羅斯福圖書館籌備處。復員後，除在南京設有成賢街閱覽室、新街口閱覽室和北城閱覽室、供衆閱覽外，並在上海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分處，辦理與各國交換事宜。這時本館的藏書，已超過了一百萬册。

五、遷臺保管

勝利後，共匪叛亂。三十七年冬，赤禍蔓延益急。我政府爲了保護我國文化遺產之精英，令本館選擇珍貴圖書文物裝箱，隨時準備撤運，自三十七年十二月至三十八年二月，本館奉令將所提選的善本圖書與文物，會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的古物、圖書，先後分三批由海軍總司令部與招商局所派船艦，運來臺灣。第一、二兩批運來的是館藏全部十二萬一千餘册善本書，五千五百八十一種金石拓片以及漢簡、甲骨、古器物兩箱。第三批運來一百八十六箱普通本中、外文圖書及重要期刊、公報、報紙、檔案等。

三十八年十月，政府爲了緊縮開支，裁併機構，將本館與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華敎育電影製片廠等機構，合併爲一聯合管理處。本館在聯管處中稱中央圖書館組。因此本館出版品

國際交換與開放閱覽等業務，都不得已而中止。三十九年四月，聯管處在霧峯北溝興建的庫房完成，一館兩院的圖書文物遂全部移貯其中，以策安全。是年年底，中央圖書館組奉教育部令將運臺的普通書刊一百五十箱移運臺北，暫借予省立臺北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大學，以供民眾閱覽。

六、復館重建

四十三年八月，教育部令本館前館長蔣慰堂先生籌備恢復國立中央圖書館。九月，本館奉令正式恢復設置，蔣慰堂先生亦奉令復職。教育部除將原由本館合併入聯管處的圖書文物撥歸本館外，並將聯管處中央博物院組所保管的北平圖書館與圖十八箱，撥交本館代管。十月，在臺北市中山南路教育部內設辦事處，正式開始辦公。四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奉令遷入臺灣省教育廳撥給的原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舊址，即現在本館座落在臺北市南海路四十三號的館舍。

本館復館後的首要工作，即在徵集圖書開放閱覽。經分函國內各出版商，請其依出版法送繳出版品；漸次收回前借給臺北圖書館與臺灣大學的圖書；存在霧峯的普通圖書也運來臺北，集中整理。四十五年二月二十日，正式在南海路開放閱覽。三月一日，又增闢中文參考室。後又增設美術、音樂、工藝、法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官書、期刊等參考室。至於善本書方面，復館後也積極編製目錄，由中華叢書委員會於四十六年出版。接着又印行了宋版與金、元版圖錄，以便利學術界的研究工作。四十九年，又選了一萬六千册複本書，運來臺北，闢善本閱覽室。

其次為恢復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本館復館之初，一方面分函國內各政府機構，請其以出版品送交本館，一方面分函各國圖書館、學術機構，告知本館已在臺復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亦準備重新開始展開業務。當即接到二十四個國家八十六個學術機構的復函，除對本館之復館表示祝賀之外，並表示願與本館恢復或建立交換關係。美國國會圖書館並將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四年歷年所積存應贈送我國的交換書刊九十九箱，陸續運來臺灣。本館亦於四十四年初運出復館後首批贈送國外書刊一百十六箱。此外，在大陸時期，美國政府原有兩套官書贈送我國，一套由本館自存，一套由本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轉發國立北平圖書館。本館復館後，這些官書，該歸本館的仍歸本館；該轉發給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則由本館取得美國政府的同意，暫借予國立政治大學使用。此後，美國政府贈送我國的官書，並依例辦理。這就是國立政治大學收藏美國政府出版品比其他大專院校獨多的原因。

再次為各種目錄之編印工作。本館復館後，除編製新入藏圖書的著者及分類卡片外，並指派專人分擬專題，編印各種目錄、索引。自四十三年起，陸續編印完竣出版有宋、元本聯合目錄、高麗本聯合目錄、臺灣公藏方志聯合目錄、三民主義聯合目錄、黑格爾著述及其批評聯合目錄；此外，並編有中國關於韓國著述、關於越南著述、飲食著述、近百年譯書、中國傳記、中央圖書館期刊目錄、中華民國出版品彙編等專題目錄以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英文中華民國文化學術機構錄、中華民國學術研究計畫指南等。每月並編印新書簡報及新到官書要目，以應國內外圖書館及學術機構採購與參考之用。

七、現行組織與工作概況

本館現行組織爲五組、一處、二室，即採訪組、編目組、閱覽組、特藏組、總務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會計室、人事室。總務組、會計室及人事室，皆爲本館內部行政工作，茲不贅述。茲將其他各組、處工作大要簡介於後。

㈠採訪組——隨時根據出版消息徵集圖書；國外圖書之採購因限於經費，則多注重各科之工具書及有關漢學的著作。去年度共收中文書九七〇八册，外文書四一〇九册，韓日文書三一七册。每月編印「新書簡報」及「每月送繳到館書目」，寄往國外各重要圖書館與學術研究機構，作爲其採購我國圖書參考之用。並代國外圖書館及學校採購我國圖書。本館所藏的官書，除本國政府出版品之外，以聯合國與美國各級政府的最爲完備，日本、比利時次之。此外尚有部分我國清末的政治官報，民初北洋政府公報，三十八年以前國民政府公報等。期刊方面，本館藏有中文期刊一〇四七種，經常到館的五百多種；外文期刊一〇五六種，經常到館的四百多種。中文早期的期刊如新民叢報、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國學季刊、國聞週報、時代公論等，與外文期刊如美國國家地理雜誌、通報、中國學報、亞洲學報、英國皇家人類學會學報、哲學季刊、倫敦數學學會會報、皇家天文學會會刊、倫敦地理學會季刊等，都很具參考價值。

㈡編目組——圖書到館經採訪組登錄後，即送編目組編目；經過編目手續後，再送閱覽組典

藏，俾供眾覽。

㈢閱覽組——職司典藏、閱覽、諮詢、展覽等事宜。去年度新入庫的圖書計中文五七三三冊，外文三四八五冊，日、韓文七七七冊。閱覽人數二四六七九八人，出納圖書二三二七一冊，答覆讀者書面及口頭詢問六三四次。在國內舉辦展覽五次，參加國際書展四次。

㈣特藏組——本館自大陸運來善本書十二萬餘冊，在臺購置三四五冊，奉令代管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圖五〇三件、善本書二〇六四〇冊，代管東北大學善本書一三六五冊，現共有善本書十四萬三千餘冊。典藏、保管、校訂、閱覽，均由該組負責。闢有善本閱覽室，去年度共有閱覽人數一一二五人，出納圖書一五四三三冊。

㈤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出版品國際交換工作，無論就本館或就整個國家來說，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業務。本館所藏外文圖書，其重要來源，即由於交換工作；且可溝通中外文化，增進國際了解，以收國際宣傳的效果於無形。目前與本館有圖書交換關係的機構有五百三十二個，分佈在五十多個國家。上年度一年之內，收到國內中文書刊（寄往國外的）四一三八一冊，重九四三六・七五公斤，收到國外書刊二六九六三冊，重六五七七・六公斤，轉發給國內各學術機構的外文書刊二六九三六冊，重六五七七・六公斤，轉寄給國外交換單位的中文書刊五四九四八冊，重九三九五・六公斤。

八、合作事項與調查工作

本館年來的經常工作，大要已如上述。其他尚有近來創辦的和恢復的幾項工作，這些工作，都是屬於合作方面或調查方面的，略述如下：

㈠善本書聯合目錄之編輯——本館應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委員會之委託，編製國內各圖書館所藏善本圖書目錄，以便利中外學者之研究工作。自本年元月份開始，預定一年之內完成。其工作程序，爲各機關先就所藏善本圖書分別編爲書本目錄；另編綜合性書名索引一種，綜合性著者索引一種。此項工作，目前已完成大半；俟全部完成後，中外研究漢學人士，當可獲極大之便利。

㈡每週新到外文要籍簡介之編刊——本館每週平均收到外文圖書約八十册（期刊、官書不計在內）。今年七月得大華晚報讀書人週刊之合作，每期分給本館大約兩千字之篇幅，按期介紹新到外文圖書若干種，每種繫以簡單的提要。該報定名爲「國立中央圖書館每週新到西文要籍簡介」。唯由於篇幅所限，每週只能介紹六種或七、八種。

㈢元、明著作人資料卡片之編製——本館與美國東方研究所合作，由本館負責編製我國元、明兩代著作人資料卡片。每一卡片記載著作人之姓名、字號、籍貫及生卒年、月、日、時，與其作品等資料。現已編定二百餘張。

㈣縮影室之設置——本館所藏善本書十四萬三千餘册，並有許多珍貴的期刊、官書資料。因此，常有國外學術機關委託本館攝照這些資料，以供研究之用。本館承亞洲協會捐助二千美元，哥倫比亞大學貸款三千美元，於今年六月間購置日製富士牌微影攝製機一套，於本年七月開始工作。每日可出正、負片各二百英尺。此後，不僅可應各研究機構與讀者之要求攝製本館所藏各種圖書資料之微影膠片；並爲服務社會計，亦可接受外來資料之攝製工作。

㈤防空疏散倉庫之修建——年來大陸共匪唆使紅衞兵作亂，我反攻聖戰已有一觸卽發之勢；屆時匪共欲作困獸之鬭，臺、澎地區難免遭受轟炸。如此，則館藏六百餘箱善本書之安全，委實可虞。本館雖曾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訂有合作辦法，時局一旦緊急，可以八十箱善本圖書存放於該院防空洞內；而其餘五百餘箱，仍無疏散倉庫。本館有鑑於此，乃會同國立歷史博物館向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請得補助五十萬元，在市郊某地建築防空疏散倉庫一座，以存放兩館善本圖書及古器物。現已開工，預定一百二十個工作天完成。

㈥善本圖書開放閱覽計畫——本館因館舍限制，十四萬册善本書皆裝箱堆存於展覽室中。開箱提書，手續麻煩，對閱者極爲不便。雖曾與故宮博物院有合作辦法，借其圖書館開放閱覽，然一因該院地處郊區，二因該院開放時間爲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亦不合社會讀者之需要。本館乃呈請教育部准以館藏善本圖書之半，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借該校新建之研究圖書館，對該校師生及社會人士開放閱覽。此項計畫，已經雙方同意。俟臺大研究圖書館落成，並呈請教育部核准後，即可實施。

㈦館刋之恢復——前在大陸時期，本館原有學觚、圖書月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刋與英文書林季刋等刋物。都爲當時的文教界所重視。來臺復館後，以經費拮据，竟無力出版一定期刋物。本年七月起，與學生書局合作恢復「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刋」，由本館負責編輯，學生書局負責印行。

㈧本國各級政府出版的連續性刋物調查——本館爲了解我國各級政府出版的連續性刋物起見，特於本年元月份擬定「中華民國各級政府機構編印連續性刋物調查表」，分寄國內各級政府機構查塡。計發出調查表三一五份，收回一四六份。現本館正根據是項資料，核對本館所藏的官書。

㈨臺灣地區文獻處理現況調查——本館爲瞭解我國文獻處理技術改進的情形起見，特於本年四至六月間，舉辦一連串的臺灣地區文獻處理現況調查。計發出「臺灣省內各學術及公私企業機構文件處理方法及設備概況調查表」二三四份；「臺灣省內事務處理機械產銷及文件提供服務事業概況調查表」三十四份；「臺灣省內利用電腦處理資料及電腦工作人員敎育訓練調查表」十六份。現大部分資料均已收回，正在縝密統計分析中。

㈩全國圖書館調查統計——本館爲了解我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情形，並配合聯敎組織之統計工作，特於本年五月舉辦全國公私立圖書館（室）業務調查。共發出調查表六五〇份，收回四四九份。計國立圖書館一所，大專圖書館三七所，中學圖書館三六九所，專門圖書館二三所，公共圖書館一九所。藏書以排架的長度計算，共有一二九九三三・六六公尺。

九、未來發展的幾項計畫

自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總統號召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來，全國同胞熱烈風從。本館未來的發展，自以響應此一文化運動爲目標，而首要者乃在圖書之增置，及書庫與閱覽室之增建，以下分別述之：

一、本館亟應大量補充與漢學有關的中外文圖書——本館所藏我國善本圖書，就質量而言，皆爲世界任何大圖書館所不及。其中孤本秘笈可供專門研究之資料極多。年來歐、美、日本、澳洲、香港各著名大學，多有委託本館將所需之資料攝成微影膠捲以供其使用者。本國學人利用本館善本書者，每月亦常在百人以上。然本館所藏善本圖書雖多，而普通圖書則甚感缺乏。因播遷來臺之時，交通工具極感困難，故除將館藏善本圖書全部運來外，普通圖書僅携來一萬餘册。四十三年復館後，因限於經費，所收藏之書，皆係徵繳所得臺灣出版之本。因此，清代及民國以來迄四十二年前出版之書，本館甚感缺乏。再者，今日歐美人士，研究漢學者日眾；日本人從事此學者尤多。因此，外國此類出版品甚夥，而本國圖書館收藏之者反而很少。漢學已成爲世界之顯學，外國人士所著有關漢學之圖書，本國人士如未及見，則不但將蒙見聞寡陋之譏，且必影響其研究之結果。故大量收購我國清代、民國初年之出版品與日本、歐、美各國有關漢學之著作，實爲刻不容緩之事。此事果能實現，再配合中央研究院及故宮博物院的圖書文物，則我自由中國可

成爲眞正之世界漢學研究中心。復興中華文化，提高學術水準，此實爲當前之急務。

二、重點添置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一個國家圖書館的職責，是收藏本國和外國的文獻以及各科的圖書，不應有所偏廢。但是本館購書經費太少，與其兼收並蓄而一無所長，不如作重點之發展，使之成爲一某方面的圖書重鎭。現在我國研究數理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人士，都集中在各大學和研究院所，其圖書設備，本已具有基礎；加以近年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補助，重要書刋，多已應有盡有。本館也不必以有限之財力，去複購這類圖書。反觀國內各圖書館所收藏的人文及社會科學類圖書，均不十分充足；歐、美、日本各國所出版的此類圖書，更感缺乏。因此，本館將來擬大量搜集世界各國重要人文及社會科學圖書雜誌，以供國內學者參考。

三、增建書庫及閱覽室——本館書庫早已不敷使用。十四萬三千册善本圖書裝箱堆存在展覽室中，固不必論；即普通書的書庫，只能存放十五萬册圖書，目前已到了飽和狀態；期刋庫房已無隙地；官書書庫亦無餘地增設書架，以致許多國外寄來的書箱和郵包，沒法打開整理。現在本館已呈請政府撥款增建書庫。不過，打算中擴建的書庫，也只能容納七萬多册圖書；不及三年，又將有書滿之患。爲作較長久的打算，最好能增建一座能容納五十萬册的書庫，一方面可將善本書集中管理，一方面可以容納未來十餘年內新增的圖書。再者，本館閱覽室不够容納讀者，問題亦甚嚴重。本館現設普通閱覽室一間及其他專科參考室七間，可容納讀者約四百人。除官書、善本、美術音樂、自然工藝、法學等參考室之外，期刋及人文科學參考室均甚擁擠；尤其普通閱覽室，僅有座位一百五十個，離實際之需要相差太遠，所以常常發生爭搶座位的現象。以目前情形

估計，本館若能將各閱覽、參考室擴展，使其能容納一千個座位，方敷使用。

上述增建書庫及閱覽室的工程費和設備費，約需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實非本館所能負擔。所以本館希望政府和各文教基金會能夠重視此一問題。爲響應總統復興中華文化的號召，爲提高國家學術文化方面的國際地位，這實在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原載「教與學」，一卷一期（民國五十六年九月），頁二四——二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主辦的臺灣公藏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編輯工作

由於印刷術之極度發達，出版品日增月盛；因而已經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樣，由各個圖書館個別地蒐集所有的圖書供眾閱覽；而必需經由各個圖書館的分工合作，有計劃地爲讀者作集體性的服務；使讀者在查詢資料的時候，得到最大的方便，以節省其時間與精力。這種集體性服務的具體工作，便是各種聯合目錄的編製。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爲我國現有唯一的國家圖書館，對此項工作素極重視。前於抗戰時期，曾在播遷之際，編印重慶各圖書館所藏西南問題聯合目錄。來臺復館之初，亦曾編製臺灣公藏方志聯合目錄以應學術界之需要。唯以本館經費短絀，無力擴大此項工作，實爲一大憾事。

方今漢學已成爲世界的顯學；環球各國政府與民間對漢學之研究，均甚爲重視。然而中外學人對我國圖書資料之查閱，則多感不便。推其原因，乃由於我國圖書尚無聯合目錄可供利用之故。所以，中文圖書聯合目錄的編製工作，實爲推動目前此一國際文化運動的當務之急。而編製此項目錄，本館也責無旁貸。然以經費問題無法解決，故而久久未能着手進行。五十五年冬，本

館得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之委託與經費之支助，乃得主辦臺灣地區公藏中文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的編輯工作。

五十五年十二月，當本館接受了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委託之後，立即成立了「臺灣地區公藏人文社會科學聯合目錄編輯委員會」，委員人選，除本館的本人及編目組主任林愛芳（林氏於於本年辭卸委員職務，改由閱覽組主任劉崇仁先生接替。），特藏組主任昌彼得兩先生外，尚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主任藍乾章先生，國防研究院圖書館長任呂秋文先生，臺灣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賴永祥先生，師範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王振鵠先生，政治大學教授兼資料室主任趙來龍先生，東海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沈寶環先生，故宮博物院書畫組主任那志良先生，及省立臺北圖書館館長劉效騫先生（劉氏轉任臺東師專校長後，此委員職務改由繼任館長韓寶鑑先生接替。），共計十一人。經開會決定，第一年（五十六年）先編印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去年冬間，又決定續編印中文官書、期刊、普通本線裝書、及本國出版圖書目錄續輯。上述各計劃，有的已接近完成階段，有的則剛剛開始。玆將各計劃進行的情形，簡略地敍述如下：

一、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

本計劃所稱之善本圖書，乃指我國明代以前刋本，日本、韓國、安南舊刋本，以及名家手稿本、批校本、舊抄本、古活字本等而言。此皆為學術研究之極寶貴的資料。此項工作自五十六年

元月份開始，除部分印刷工作尚未竣事外，編輯工作已大致結束。其工作程序，大要為各機關各就所藏善本圖書依四庫分類法分別編為書本分類目錄；再由本館彙編綜合性的書名索引一種與綜合性的著者索引一種。現在分類目錄七冊（計本館四冊，故宮博物院一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一冊，國立臺灣大學、國防研究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私立東海大學、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合一冊），已印成五冊；書名及著者兩種索引，亦已編妥待印。

二、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官書聯合目錄

所謂官書，是指各級政府、議會、及公營事業機關等之出版品而言，包括各種法令、規章、公報、議事錄、調查統計與研究報告等。這些，都是原始的重要學術資料。臺灣公藏的官書雖以本館為最豐富，然其他各重要圖書館亦多有收藏。現本計劃已開始進行，本館已指派專人負責與各大圖書館連絡；預計一年內編輯完成。

三、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

學者們研究的成果，大多數都先在期刊裏發表；其學術價值，自不待言。我國雜誌事業，也很發達。民國初年，約有五百餘種；抗戰前曾達一萬一千三百餘種；戰時也有一千七百六十三種。臺灣地區光復之初，僅三十餘種，現已有七百多種。此項資料，各圖書館多有收藏。現在各種期刊論文索引，印行的已多，參考甚為方便。但欲知那個圖書館裏藏有那種期刊，那種期刊存

有那一卷那一期，就不能不靠收藏目錄。因此，本館提出編製臺灣公藏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聯合目錄的計劃，而得到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支持。現本計劃亦已由本館指派專人負責與官書聯合目錄同時開始進行。預定完成期限，亦爲一年。

四、中文普通本線裝書聯合目錄

所謂普通本線裝書，乃指清代以來我國刋印之書籍具有線裝的形式者而言。現本計劃已於本年元月份開始進行，預定於五十八年底以前完成。其工作進行程序，原則上由各圖書館於五十八年六月以前分別編成分類目錄，再由本館編製書名索引與著者索引，然後排版印行。參加此一計劃的機關，除本館外，則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國防研究院、臺灣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東海大學和省立臺北圖書館等，估計共有線裝本圖書約五十萬册。

五、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續輯

近年來，我國出版事業異常發達。民國四十三年本館奉令在臺復館後，卽依出版法之規定向國內各出版商徵集圖書。之後，除每月編印新書簡報供海內外學術機構作採集我國圖書之參考外，並於民國五十三年編印「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二册。三年以來，我國出版事業更形發達，此項目錄，亟待編印續輯。祇以印刷費無着，故而擱置。現在也由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資助，已着手編製。此項目錄，約可收書近一萬種；編輯工作，也預定在今年年底完

成。

以上各種計劃，皆由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的資助，得以進行。待全部工作完成後，中外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人士，當可獲極大的便利。當然，聯合目錄之編製，不僅不應以人文社會科學爲限，亦不應以中文圖書爲限。爲了改善國內學術研究的環境，爲了弘揚我國文化於海外，這類的聯合目錄，自當多多的編印。希望政府當局以及公私基金會，能注意及此，給予資助，使本館盡其棉薄，多爲社會服務。

原載「中國一週」，九三〇期（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頁三轉頁九



由共匪焚書談到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善本圖書

最近幾個月來，大陸上在毛匪煽動之下，掀起了「紅衞兵」之亂，鬧得天翻地覆。起初是攻擊研究歷史的人們，繼之以毀壞古蹟古物，現在更進一步竟然開始焚燬古書了。這種瘋狂的行爲，顯然是自掘墳墓；可以說是天奪其魄。凡是天良未泯的人們，聽到這些惡耗，無不悲憤塡膺，爲之髮指。

總統蔣公曾說：「今日之反共鬪爭，推本溯源，實爲思想與文化之戰爭。未取決於疆場，先取決於人心；不專恃武力以制敵，而尤繫於道德精神之重振。因此，如何研究孔孟學說之精義，弘揚中華文化優美之特質，而能即知即行，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俾得拯救陷溺之人心，而掃除共匪之思想毒素，發揮成仁取義之精神，以挽救人類空前未有之浩刧，實爲今日嚴重之課題，抑且爲吾人義無反顧之責任。」（五十一年在孔孟學會訓詞）這些精闢的言論，爲我們昭示了一個正確的鵠的。孔孟學說的流佈，靠着古書；中華文化的傳播，靠着古書。古書是我們先民思想和生活紀錄的儲藏庫，是培養我們民族意識的溫牀。共匪們以爲非把我國的傳統文化連根拔掉，不

足以維護他們那邪惡的政權、與遠背人道的暴政，因而也就非把古書燒掉，不足以達到他們那邪惡的目的。

任何國家，任何民族，沒有不珍視他們的固有文獻的。單以我國而論，先秦時代，王朝和各諸侯之國，都有典書的專官。漢惠帝除挾書之律；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使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下至魏、晉、宋、齊，無不儘量地搜集圖書，謹愼典藏。甚至於隋文帝，也還分別遣人，到處訪求異書；每得書一卷，賞書主一匹絹子，政府傳抄副本後，仍將原本交還物主。像這類收羅圖書的故事，在我國歷史上舉不勝舉。而蓄意焚書的事，在歷史上只有兩見：其一是秦始皇，另一個是梁元帝。梁元帝當國家將亡的時候，把政府所藏的七萬卷書燒掉；他歎息着說：「文武之道，今夕盡矣！」他是因爲面臨亡國之禍，受了嚴重的刺激，所以有這種不正常的行動。而眞正爲了愚民、爲了毁滅文化、而有計劃地燒書的，在古代只有秦始皇帝一人。

史記秦始皇本紀，當秦始皇三十四年的時候，丞相李斯曾建議說：

>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敎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始皇於是制曰：「可。」

我們看了上舉的一段記載，和共匪今天的行爲，眞是如出一轍。秦始皇怕人們「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共匪也是怕人們有言論自由；秦始皇怕人們「以古非今」，共匪尤其怕我國的傳統文化。由此看來，共匪燒書的目的，和暴秦完全一致；而爲害之烈，實更過於暴秦。因爲秦始皇還留着「博士官所職」的書沒有燒掉，還有民間壁藏的書沒有燒掉；而「紅衞兵」這種暴行，如果繼續下去，恐怕我先民的精神遺產，在大陸上勢將靡有孑遺了。

我們痛心疾首之際，可以自慰的，是我們有大量的珍本圖書，還保存在我們的民族復興基地——臺灣。這些珍本圖書，尤其是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收藏的最爲豐富。由於筆者現服務於中央圖書館，對於該館所藏的珍本古書，知道得比較詳悉；以下我將該館所藏的珍本圖書，作一個簡略的介紹：

當抗戰期間，長江下游各省都已淪陷，江浙一帶許多著名藏書家所珍藏的古籍，都流散出來。當時的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也就是現在剛轉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不久的蔣復璁先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把中英庚款會撥給中央圖書館的建築費一百五十萬元（那時法幣一元的購買力，超過了現在的一元美金。）秘密地託人在上海收買這些散出的珍籍。蔣先生還曾改換姓名，冒着生命的危險，親自到上海辦理這一重大的業務。當時的成績非常令人滿意，各藏書家的珍本，大部分都被中央圖書館買到了。

勝利之後，蔣復璁館長被任爲京滬區文化特派員，辦理文敎機關的接收工作，接收了僞內政

部長陳羣的「澤存書庫」的大批圖書。旋奉教育部的命令，把這批圖書撥給了中央圖書館。至此，連同抗戰時期在上海秘密收買的書，以及歷年收購的書，那時中央圖書館的藏書，已超過一百萬册；單是善本圖書，就有十二萬册之多。民國三十七年冬，赤禍益急，在傅孟眞（斯年）先生策動之下，得到了軍政機關的通力合作，在運輸工具極度困難的時候，將這十二萬多册善本圖書，連同故宮博物院的古物、書畫、圖書，以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古物和圖書，通通運到了臺灣。

抗戰初期，國立北平圖書館曾把所藏的甲庫善本圖書，計二千八百多種，二萬多册，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託該館代爲保存。去年，由於蔣前館長的建議，及教育部閻部長的支持，和美國政府商洽之後，這二萬多册秘笈，已於去年十月間運回，由國立中央圖書館保存。加上中央圖書館代東北大學保存的善本圖書，和遷臺後收買的一些珍本，目前該館所藏的善本書籍已達十四萬三千多册。不但在我國藏書史上，開創了善本收藏量的紀錄；卽和世界各國任何圖書館所藏中國善本圖書的數量相比，它們也都望塵莫及。

這十四萬多册善本書中有宋刻本二百九十多種，金刻本十一種，元刻本三百六十多種，明刻本在八千種以上，稿本四百八十七種，舊鈔本三千一百〇七種，批校本四百四十六種，朝鮮、日本、安南等舊刻本，也都有相當多的數量。就學術價值說，這裏面有許多沒經過傳刻的稿本，有許多刻本已經失傳而僅存的舊鈔本，有許多較一般刻本的內容多了很多資料的刻本、稿本、和舊鈔本，這些都是從事研究工作者的絕好資料。在校勘方面的資料來說，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

管理善本圖書的同事們，目前服務的情形是艱苦的。中央圖書館雖然擁有這麼多的國寶，可是它還沒有一個盛放國寶的書庫。十四萬多册善本書，裝在五百多隻大木箱裏，堆積在原本的展覽室中，眞到了名符其實的「充棟」的程度。當閱覽善本書的人士來索閱某書時，就只好翻箱倒篋，替閱者把那部書找出來。如果盛放那一部書的書箱，排在「書箱大隊」的中部，而又壓在三四隻書箱之下，則搬箱的工作，是煞費周章的；有時須花掉兩天的時間，才能找出一部書。幸而閱覽人士都體諒我們，能够耐心的等候；管理善本圖書的同人，也都能勞而不怨。不過，這究竟不是長久的辦法。現在故宮博物院已開始建築一所規模較大的書庫，中央圖書館和故宮博物院已商定合作的辦法，等到書庫造成之後，中央圖書館的善本圖書，將移至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收藏、並在那裏開放閱覽。那時，如果閱者願意在南海路中央圖書館看善本書時，我們也可以立刻把他們所要看的善本圖書，從外雙溪取來。

現在總統正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全國上下正在風起雲湧地響應着。希望有志發揚中華文化的人士，都能善於利用這座中華文化的倉庫，我們將竭誠地爲他們服務。

原載「幼獅」，二十四卷六期（民國五十五年十月），頁八——九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重點及珍藏資料

中央研究院，位於臺北市郊的南港區，它有許多研究單位，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爲「史語所」，就是其中的一個。所裏藏有豐富的漢學研究資料。茲就史語所的研究目標、各單位的工作，以及所藏的研究資料等方面，作一簡單的介紹。

史語所研究工作的主要目標，是發揚中華文化。目前有五個學術單位，這五個學術單位包括了四個組一個室，四個組分別是：第一爲歷史組，第二爲語言組，第三是考古組，第四是人類學組，另外還有一個甲骨文研究室。這是研究的單位。從表面上看起來，這四個組一個室各有各的研究範圍，實際上，他們的研究工作，都有相互的關係。至於收藏圖書及標本的處所，則有一個圖書館和一個考古館。

我們研究的主要精神，是本着史語所的創辦人傅斯年先生所提示的一個原則：就是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有材料就不說話。換句話說，我們從事研究工作，是憑材料做客觀的論斷，不尚揣測，也不尚空想。歷年來，我們都本着這個精神做研究工作，到目前爲止，史語所研究的成

果、以及整理出來的資料，已經出版的，約有六百本左右。

我們做學問的原則，既然是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所以我們一定要靠學術資料來做研究工作，我們所裏收藏的學術資料，大致是這樣子的：

先談圖書部分，史語所現在所收藏的圖書，已經近乎二十六萬册，這二十六萬册當中，有兩萬九千多册是西文書，有二十二萬多册是中日韓文書。這些書的大部分是當年傅斯年先生做所長時，有計劃地陸續購買的，因此，這些圖書既適用，而且重複的本子很少。至於和我們研究範圍無關的書，以及通俗性的書刊，和文藝創作等，不在購買之列。

雖然史語所所藏的中文書不過二十多萬册，但是他的使用價值卻很大，因此，二十多年以來，我們雖不是一個公共圖書館，但由於作文史研究的人，每年愈來愈多，所以我們就答應了研究院以外的人士，特別是各大學的教授和研究生，只要有人介紹，我們就同意他們前來看書。單就這一年多來說，我做了一個大致的統計，這個統計並不完全正確，因爲有些人來看書並沒有簽名，我們照着簽了名的人來說：從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到這裏閱覽的來賓（來我們這裏看書的院外人士，我們都稱爲「來賓」），按次數來說，一共有兩千七百六十九人次。因爲住在臺北的外國學者很多，所以在這兩千七百六十九人次當中，美國學者佔一百九十五人次，他如日本、韓國、法國、德國、荷蘭等國的學者，合起來有五十六人次。由此可以看出，到史語所看書的外國學者，以美國學者爲最多。至於國外的學人，擬專程來我國，利用史語所的圖書資料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經過我們同意的也不少。從本年一月到八月底，已有十六人（美國籍十二人，荷蘭籍二

人，韓、日籍各一人）。

來史語所看書的人，除了可以看到在臺北其他一般圖書館，或各大學中所找不到的書之外，我們還有一些特殊的和原始的資料。其一，如金石拓片，我們收藏的最多，有兩萬五千多種，三萬三千多幅。這些都是最直接最原始的資料。其二，我們收藏了七千多本民間的俗曲，如民歌、民間戲曲等，這也不是別的地方所容易看得到的。其三，我們藏有三十一萬多件明清檔案，這自然也是最原始的資料。明清檔案，經過我們多年來的整理，已經出版了一百本書，但這一百本書，大約只佔三十一萬件的百分之五、六，另外還有百分之九十的檔案資料，我們正在陸續整理中。

關於史語所的圖書資料，以及拓片、檔案等資料，略如上述，下面我再談談考古學方面的資料。

大家都知道，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是震驚世界學術界的一件大事，民國十七年以前，一般外國學者，對於我們中國古代史，在西周以前，他們都認爲是傳疑時代；夏代或夏代以前，他們固然不相信，就連商代文化，他們也持着懷疑的態度。因此在許多外國人所編世界史裏，中國史事只佔寥寥的幾頁。其時不僅外國人對中國古史抱着懷疑的態度，有許多本國學者，也是如此。可是，自從民國十七年起，到二十六年對日抗戰開始止，史語所在河南安陽前後共做了十五次的科學發掘工作，所得到的銅器、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大約在十萬件上下，此外還發掘出了兩萬四千九百多片有文字的甲骨。

由於這個發掘工作是科學性的發掘，因此所得到的資料，自然是絕對可靠的原始資料，我們從挖掘出來的銅器（附圖一：銅人面具）的鑄造技術來看，以及由石器、玉器、骨器（附圖二：鹿頭骨刻辭）等雕刻的優良技術來看，都可以證明商代的文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附圖一：銅人面具

附圖二：鹿頭骨刻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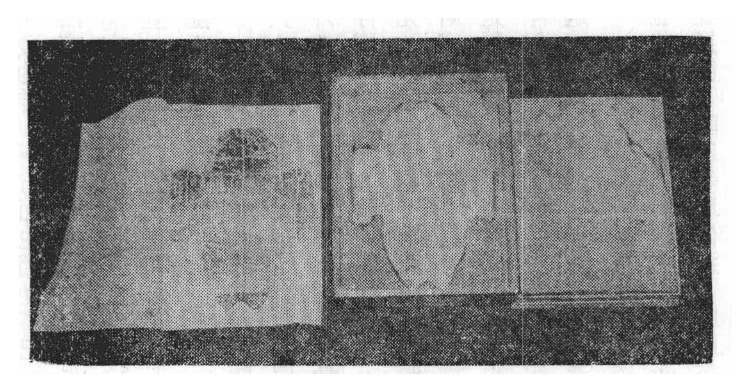
另外，再就甲骨文（附圖三：甲骨圖片）來說，那時已經有四千六百多個不同的字，我們知道，一部三民主義才有兩千三百多個不同的字，在商代，就可以用到那麼多不同的文字，我們便可以推知商代文化高度。而且在這四千六百多個不同的文字當中，形聲字佔了百分之二十七。我們又

知道，文字愈進化，形聲字愈多，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中國文字在發展到像商代這麼進步的文字以前，必然經過一段很漫長的演進時期。傳說中黃帝造文字，這句在沒有得到科學的證明以前，我們雖然不敢肯定的說，但是從剛才所說的現象看起來，中國文字在商代以前，已有千把年的歷史，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再從甲骨文所記載的史事來看，它可以糾正傳統記載之誤，和可以補充圖書資料之缺的，多得不勝枚舉。因爲有這些發現，從前懷疑中國古代文化的外國學者和本國學者，見到了這麼多的眞實資料，當然，他們的觀念都改變了。這是安陽發掘對中國古代史方面一個最重大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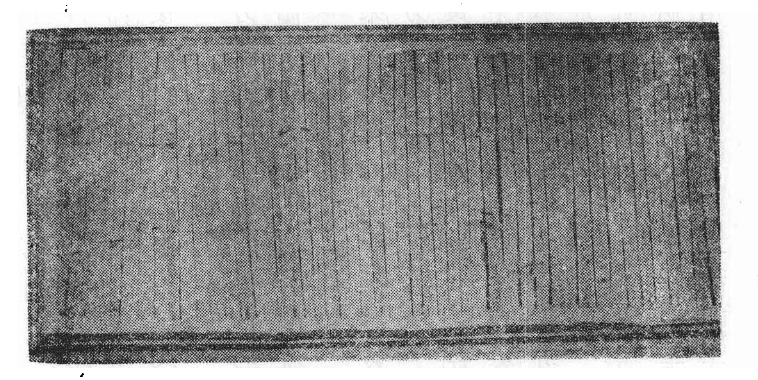
在安陽發掘的這批資料，於抗戰期間，先由南京轉運到長沙，次由長沙運到昆明，再從昆明轉運到四川的西部。勝利之後，又回到南京。大陸危急的時候，便全部運到這裏來。這些東西雖然經過這麼多的顚沛流離，但我們還是統統保存在這裏。因爲資料太多，我們雖已出了許多本考古報告，但還沒有完全把它報告出來。這些資料是我們國家文化的命脈，同時也是史語所最重要的第一手的研究資料。

此外，我們在濟南龍山鎭所發掘的黑陶文化標本，在河南濬縣所發掘的西周時代的器物，在河南汲縣發掘的戰國時代的器物，以及西北科學考察團所發現的一萬多件漢簡(附圖四：居延漢簡)，現在都完整的保存在史語所裏，像這些都是做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原始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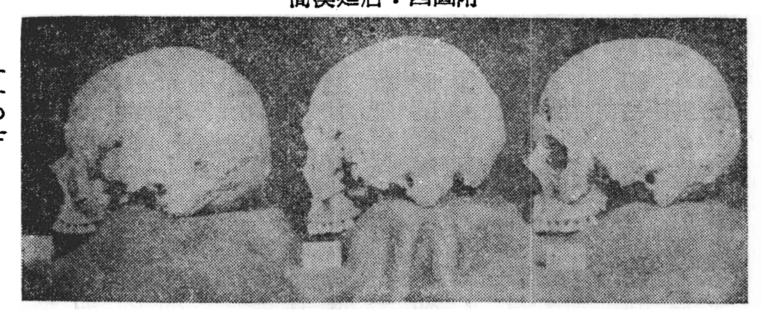
在語言學方面，從民國十七年史語所剛一成立後不久，就由趙元任、李方桂兩位先生帶領史語所的同仁，進行方言的調查工作。那個時候，他們一方面用舊式唱片錄音的辦法，錄下當地人



附圖三：甲骨圖片



附圖四：居延漢簡



附圖五：人頭骨照片

所發的音，一方面他們從事記音的工作，像這類東西，我們叫做「音檔」。把這些「音檔」整理出來，我們已經出版的，如湖北方言、雲南方言、四川方言、客家方言等許多專書和論文。另外還有一些正在繼續整理着。我們早期用力最多的是西南各省的邊疆民族，如苗、傜等方言的調查。這些方言的調查和研究將來收復大陸之後，對於西南邊疆民族的政教措施，必有很大的用處！

最後，我所要談的就是人類學方面的資料。這方面的資料，大致分爲兩部分。其一是屬於體質人類學的，剛才所提到的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中，除了有甲骨文、銅器、石器、玉器、骨器外，還有四百多個完整的人頭骨（附圖五：人頭骨照片）。我們知道，在商代還有一種陋習，就是把俘虜來的敵人，砍掉他的腦袋，用來祭祀祖先。殷王用人作犧牲祭祀後，就把這些人頭埋在一塊兒，人體的骨骼，則埋在另一個地方。這四百多個完整的人頭骨，就是當時的犧牲。經我們初步研究的結果，知道絕大多數是我們黃種人，有少數的幾個，像是高加索人種，也有一、兩個，像是黑色的人種。如果繼續研究的結果，證明了我們初步的觀察可靠的話，那就可以說明在三千多年以前，黃河流域這一帶，固然是我們黃種人的天下；可是在那時候，和西方已有了交通。不過，這只是我們初步的研究，還不是最後的論斷。

另外一部分就是文化人類學的資料。史語所作的文化人類學的工作，和「民族所」所作的，有些不同。他們偏重在現代方面的研究，我們則側重在古代這一方面。抗戰期間，因爲史語所曾在昆明、四川等地住過，所以在西南邊疆所做的人類學方面的調查工作相當多；除了語言之外，

他們的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都曾作過很多的調查，所收集關於這一方面的標本，超過了一千五百件，現在也都完整地運到臺灣來，存在這裏。

以上所說的這些資料，可以說完全和中華文化有關。而且這些資料，不是我們親手發掘的，就是我們親自調查的，他的可靠性，是百分之百的。也就是由於有這些最原始、最可靠的資料，所以我們同仁們根據這些資料研究的成果，頗爲國內外學術界所重視。我們不敢自己誇大的說，對學術文化方面，有多大的貢獻，至少我們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做學術研究工作。對於發揚中華文化，我們多多少少的盡了一些力量。

原載「幼獅學誌」，十三卷一期（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頁一一六——一二二

編者按：本文爲先生口述稿，孫小英女士筆錄。



北美洲的圖書館界

這裏所謂「北美」，是指美國和加拿大這兩個國家而言。現就各大圖書館藏書及購書情形，收藏中文書的數量，中國籍職員的情形，與圖書館學校及圖書館學會的權力等，分別提出說明：

一、各大圖書館藏書及購書情形

(一) 藏書部份

1.美國國會圖書館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底前，藏書一三、四五三、一六八册，又非書資料（裝釘報紙、微捲、稿本、地圖、微卡、影片、樂譜、盲人圖書、藍圖、複印本）四四、一八九、一三七件[1]。

---

[1] Annual 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P. 109 1966 ed.

2. 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底止，各大學圖書館藏書在一百萬冊以上者，有三十六所，藏書最多的前五所圖書館的數量是：

(1)哈佛大學圖書館　七、二四五、四三一冊
(2)耶魯大學圖書館　四、七〇二、八七六冊
(3)伊里諾艾大學圖書館　三、七四七、八七一冊
(4)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三、四五二、六八九冊
(5)密西根大學圖書館　三、二二四、〇六三冊[2]

(二) 一年中進書數量

1. 美國國會圖書館在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進書三一三、六七四冊，又非書資料九〇九、二九四件[3]。

2. 一年中進書最多的五所大學圖書館在一九六三年七月至一九六四年六月進書數量：

(1)哈佛大學圖書館　二四一、二二一冊
(2)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一六七、九六九冊
(3)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　一五二、二八八冊

2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調查報告。
3 同1，p. 109.

(4)洛杉磯加州大學圖書館	一四九、六八七冊
(5)密西根大學圖書館	一三五、八九四冊[4]

(三) 一年中購書費用

1.美國國會圖書館在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購書費為三、二九四、〇七〇・七二美元，包括一般圖書七一〇、六七七・六四元，法學圖書一二四、七九三・〇八元，盲人圖書二、四五八、六〇〇・〇〇元[5]。

(1)洛杉磯加州大學圖書館	一、四四〇、一二〇元
(2)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	一、四一九、一四八元
(3)哈佛大學圖書館	一、二七九、七五七元
(4)康乃爾大學圖書館	一、二六七、一三八元
(5)伊里諾艾大學圖書館	一、〇〇七、一九三元[6]

以上三種情形，其數字之大，實足驚人。但是美國各大學圖書館也並非都是如此有錢，也有窮得僅有少數圖書的。據我所知，在伊斯蘭辛（Eastlansing）的密西根大學，雖然有一所相當

---

4 同2。

5 同1，p. 136.

6 同1。

大的圖書館，但書卻很少。因此在今年春天，該校有很多的學生挑着旗子，上面寫着「我們要書」，坐在圖書館門前表示抗議。芝加哥一家報紙，曾登了這一幅照片。不過像這種情形究竟不多。

二、各大圖書館收藏中文書的數量

芝加哥大學教授錢存訓先生，曾調查北美五十個大圖書館，截至一九六四年六月底以前，收藏中文書的情形，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美國「圖書館學季刊」上[7]。根據他的調查，北美各圖書館收藏中文書的數量爲二、一四八、〇八二冊，最多的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書三四六、三七七冊，最少的是芝加哥美術研究所（Art Institute），僅二〇〇冊。最近接獲亞洲研究會美國圖書館遠東資料委員會最新的調查報告，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底止，美國各大學圖書館收藏中文書最多的前五名所藏中文圖書的數字是：

(1)哈佛大學圖書館　二八四、二〇五冊
(2)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一六四、一六九冊
(3)普林斯敦大學圖書館　一六二、九三六冊
(4)芝加哥大學圖書館　一五二、四九四冊

---

7 *The Library Quarterly* V. 35 No. 4. p. 260-275, Oct 1965. 該文曾由居密譯載「出版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5)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　一五二、〇三七册[8]

根據這項資料，全美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以前，共收藏中文書二、四〇九、〇六〇册，最多的仍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計三四九、三三〇册，最少的仍是芝加哥美術研究所，仍爲二〇〇册。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底，國會圖書館已有三五二、六八一册。美國收藏中文書的數量雖多，但是我們可以自慰的，就是他們所存的中國善本書卻很少。據我的估計，國會圖書館善本書大約有二萬多册，普林斯敦大學圖書館約三萬多册。關於中文善本書的收藏，以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來說，該館原有善本書十二萬餘册，在臺灣零星收購了千餘册，加上去年從美國運回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二萬餘册，合計已有十四萬三千餘册。這不單是美國各大圖書館不能相比，就是世界任何大圖書館都沒有這樣多的中國善本圖書。

三、各圖書館中的中國籍職員情形

根據錢存訓先生調查，在一九六四年以前，全美國圖書館管理東方部中日韓文的圖書館員，工作整日的，有二百二十三人[9]。這二百二十三人中，中國籍職員，約佔百分之七十。也就是說：美國東方部中國籍的職員，佔大多數。但是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檢討的：那就是中國籍職員，整理中國書籍的情形，工作人員如果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大都能勝任，因爲他們都有些國

---

8 The Associaton for Asian Studies, Inc, 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Newsletter* No. 6 Oct. 15, 1966

9 同7。

學的根柢。假使是一個剛畢業的，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便有很多人不如理想；幾乎使每個單位負責的主管們，感到頭痛。原因在那裏？這般青年，多是在本國讀英文學系的，他們的英文程度不錯，容易通過大使館的考試，出國機會比較多。但他們在國內所學的是外國東西，在國外又學不到中國東西，一旦畢業到圖書館去找工作，他們主管以爲他是中國人，編整中國書籍，應該不成問題，於是就派他們從事中文圖書編目的工作。事實上，他們對本國歷史修養有限，中國國學基礎更差，中國目錄學、板本學，根本沒學過，所以編目常常把人名當地名，地名當人名，或是取人名地名各半，而當作一個作者，簡直是錯誤百出。至於圖書分類，錯誤更多。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問題。

四、圖書館學校與圖書館學會的權力

關於美國圖書館學校的制度，此不贅述。茲僅就圖書館學會權力，對圖書館學校方面的影響，作一簡單的報告。

美國圖書館學系或圖書館學校，他們所招收的學生，多半是大學本科畢業，再到這裏來讀一年或二年，便可得到碩士學位，學生不用寫嚴謹的畢業論文，只要提出一篇像讀書報告似的文章，就可以拿到碩士學位。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到圖書館去工作，一般的年薪在六千元上下。如果願意到較偏僻的地方去，待遇可能更高些；有的年薪可達到六千八百元。但是這些學校，必須經過圖書館學會立案才行。如果是在未立案的圖書館學校，或圖書館學系畢業，得到碩士學位

的學生，到圖書館去做事，一般的情形年薪不過三千多元，很難到四千元。工作幾年後，也不易取得正式館員的職位。美國情形如此，加拿大也是如此。加拿大的圖書館學校或圖書館學系，約有三十個左右，可是經過圖書館學會立案的，到今年夏天，只有十一個。奧版奈（Albany）的紐約州立大學圖書館學系，到今年秋天，才獲准立案。一所政府辦的學校，學會卻有這樣大的權力，不讓他立案，他就沒有辦法，這就和我們圖書館學會的情形大不相同。我特別提出這一點來供國人參考。

五、贅語

由上所談各項的情形，我個人有幾點感想，現在從他們藏書和購書費用的數字，與我國的國立中央圖書館作一比較：

㈠**藏書量**：（中央圖書館藏書量以三十四萬册計）

1. 美國國會圖書館約等於中央圖書館四十倍
2. 哈佛大學圖書館約等於中央圖書館二十一倍

㈡**每年進書量**：（中央圖書館每年進書以一萬五千册計）

1. 美國國會圖書館約等於中央圖書館二十倍
2. 哈佛大學圖書館約等於中央圖書館十六倍

㈢**每年購書費**：（中央圖書館每年以七千二百美元計）

1. 美國國會圖書館約等於中央圖書館四百五十七倍
2. 洛杉磯加州大學圖書館約等於中央圖書館二百倍

這個比較，並不是在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而是列舉事實，來提醒國人注意，以便加緊努力，急起直追。

再者，美國各大圖書館的經費，包括建築費、人事費、購書費，以及一切費用，其中有百分之十五，出自社會人士捐贈。我國人士，捐贈經費給圖書館的很少，最近一位臺大客座教授閻敦建先生，捐贈給中央圖書館九百多册圖書雜誌和大批論文抽印本，非常難得。過去蔣夢麟先生，也曾捐贈二千多册圖書給中央圖書館，這都是值得表揚的。我國人民做公益事業並不後人，只可惜大家沒注意到這方面，沒有注意到圖書館藏書的重要性，因而沒把金錢用到這方面而已。我想大家如果能把修廟宇，做拜拜的錢，省下一部份來，用作這種事業，對於我國的學術文化方面，必將有很大的貢獻。

由於上述中國籍職員，在美國圖書館工作的情形，我感覺到，我們應該積極培養青年從事中國目錄學和板本學方面的研究。不但美國需要，我們自己國內也非常需要。在臺灣有好幾個大學或專科學校有圖書館學系科，中央圖書館有足夠的善本書，可供給他們作實習的材料。因而，我們如果從事這一工作，是輕而易舉的。我們有了一些對目錄學、板本學有研究的青年，他們不但可為自己的國家服務，也可以為世界各大圖書館服務。

原載「圖書月刊」，一卷十期（民國五十六年一月），頁五——七

編者按：本文為先生在中國圖書館學會第十四屆年會中之講稿。

北美各大學所藏的中文圖書和著名的漢學家

一、引言

十多年前，周法高教授曾經寫過幾篇文章，報導那時在美國各大學任敎的著名漢學家，以及美國一些著名大學所開的漢學課程。這些文章，收在民國五十三年出版周氏所著的漢學論集裏。對於想了解美國漢學研究「行情」的人，極具參考價値。十多年來，美國漢學界的老輩，有的已經過世；而當時從事漢學研究的青年，現在有些已經成名。因而在著名的漢學家方面，和以前已不盡相同。又：關於各大學所藏中文圖書的情形，周先生沒有談及。今天所要談的，就以上述兩點爲主。至於各大學所開的漢學課程，因爲隨時都有變動，這裏就不再提及。至於這裏所說的北美二字，是包括加拿大而言，並不以美國爲限，這是應當首先聲明的。

以下先談北美各著名大學所藏中文圖書的情形。

二、北美各大學所藏的中文圖書

收藏中文圖書的多寡，和漢學研究的盛衰，雖然不一定成正比例；但收藏中文圖書豐富的大學，容易培植漢學人才，這應該是肯定的。北美各大學圖書館、和公私立圖書館，收藏中文圖書的，據估計約有兩百家左右。而收藏中文書最多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已達四十二萬册以上（據一九七五年六月的報告。）這些圖書，雖然包括了西化的自然科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和新文藝等，不完全和漢學研究有關（許多大學所藏的中文書，也是如此）；然而收藏之富，究竟是值得誇耀的。截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底止，據統計，北美各學校及其他公私圖書館，收藏中文書在五千册以上的，共有六十五家；超過十萬册的，共有十二家。除了國會圖書館以外，其餘十一家，都是大學。玆將這十一家大學所藏中文圖書的册數，表列如下（此項資料，承童世綱先生提供）：

哈佛燕京圖書館	三三六、〇二三
普林斯敦大學	二三〇、二二九
芝加哥大學	二一〇、七七二
哥倫比亞大學	二〇〇、八一八
康乃爾大學	一九五、〇七一
加州大學（柏爾克萊）	一七三、七五五
密西根大學	一六九、一五一
耶魯大學	一六四、一三五
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	一五六、七〇九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一三七、〇三八
華盛頓大學（西雅圖）	一三〇、三九八

由右表看來，北美各大學中，所藏中文書最多的是哈佛大學。若以中文善本書而論，則以普林斯敦大學爲第一。它擁有大半部磧砂藏經（以明南藏及明抄本配補）。和大半部明正統時所刻的北藏。它收藏的明代文史資料、和中醫方面的書籍，在北美各大學中，也最爲豐富。史丹佛大學的胡佛圖書館，就所藏中文書的數量而言，雖然在第九位；但所藏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文獻之多，則非北美其他大學所能及。

此外，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北美各大學博物館、和公私立博物館所藏的中國古代文物。北美較大的博物館中，多藏有中國古代的銅器、陶器、和圖畫。這些，都是研究我國古代史和美術史的第一手資料。加拿大多倫博物館所藏有字的甲骨，達八千餘片之多。除了我國之外，在世界其他的公私機構中，沒有能和它比擬的。它收藏的中國古代銅器和其他文物，也頗豐富。在北美，它當是研究我國先秦史最適當的地方。

三、北美漢學界的中國人士

在北美教授中文和關於漢學專門課程的中國人士，多得不可勝數；這裏只能舉一些大家所熟知的學者。但，由於個人的見聞有限，以下所舉，雖不至於掛一漏萬，而遺漏的必定很多。這是希望大家能够原諒的。

通達上下古今、而以淵博著名的，則有哈佛大學的楊聯陞教授。共認爲漢語語言學權威的，則爲加州大學已退休的趙元任教授，和夏威夷大學已退休的李方桂教授。李教授從前年夏天起，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指導語言研究工作兩年，上月才回夏威夷。以研究漢藏語著名的，則有加州大學的張琨教授。研究經學兼及中國上古史的，則有多倫多大學已退休的史景成教授。以漢代史著稱的，則有加大已退休的勞榦教授。長於三國六朝文史之學的，則有匹茨堡大學的王伊桐教授。以宋史著稱的，則有普林斯敦大學的劉子健教授。治明清史功力很深、而不在大學任教的，則有房兆楹博士。研究宋明理學造詣最深的，則有在達提毛爾大學退休後現在匹茨堡某女校任教的陳榮捷教授。以佛學史著稱的，則有加大已退休的陳觀勝教授。以中國美術史著稱的，則有普大的方聞教授。從事中國目錄板本學研究而爲人所熟知的，則有芝加哥大學的錢存訓教授。研究中國文學而著有聲望的人很多，如李田意（俄亥俄大學）、夏志清（哥倫比亞大學）、柳無忌（印第安那大學）、周策縱（威士康辛大學）、施友忠（華盛頓大學，已退休。）諸教授，都各有其專長。以上所舉，都是老輩學者（只有方聞教授較年輕）。後起之秀。古今兼通而又有專長的，則有余英時教授（原在哈佛，暑後將移耶魯）、和張春樹教授（密西根大學）。以考古學著稱的，則有張光直教授（原在耶魯，暑後將移哈佛。）。以戰國史見稱的，則有許倬雲教授（匹茨堡大學）。研究漢語著有成績的。則有鄭再發博士（原在威士康辛大學，暑後將返清華大學任教。）。研究甲骨文頗著聲望的，則有許進雄博士（多倫多博物院及多大），以研究中國哲學著稱的，則有成中英教授（夏威夷大學）。另有本來研究明史、後來又治考古學的芝加哥大學

教授何炳棣，近年常常發表諂媚毛共的言論；其研究明史的成績，雖頗爲一些人所稱道；而其爲人則不爲多數學者所歡迎。

四、北美漢學界的美加人士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研究中國文化，在美國成了熱門學問。其初，學習初級中國語文、和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人最多，這自然是爲了適應當時的局勢。後來。他們覺察到單是研究現代，不容易了解中國傳統的文化，於是逐漸往上推溯，由清而明、而宋、而唐……，以至於先秦。目前美加學人，研究中國現代和近代的雖然仍佔多數；而研究中國古代的，已有日增月盛之勢，尤以青年學人爲多。

一般的情形是，研究漢學的美加學人，絕大多數都是專究某一個朝代，或某一類學科的某一部分。能博通古今文史、而又有專精之學的，據我所知，似乎以普林斯敦大學的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最爲傑出。他除了具有豐富的漢學常識外，對於明代文史、和中國思想史，都有深邃的造詣。尤其他那文雅謙虛的儒者風度，往往使我們中國人自嘆不如。除了牟教授之外，美加已成名的漢學家，據我所知（我不詳知的，還有不少人。），則如以下所列：

畢漢思 (Hans Bielenstein) 哥大。中國目錄學、中國文明史。

包　德 (Derk Bodde) 賓大。中國文明史、思想史、清代法制。

柯立夫 (Francis W. Cleaves) 哈大。元史。

谷里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 芝大。中國古代史、思想史。
狄百瑞 (Wm. Theodore De Bary) 哥大。明史。
丁愛博 (Albert Dien) 史大。漢魏史。
杜百勝 (W. A. C. H. Dobson) 多大。中國古代語法。
賴世和 (Reischauer O. Erwin) 哈大。唐代史、中國近代史。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哈大。中國近代史。
傅漢思 (Hans Frankel) 耶大。漢至宋各代詩、中國文學批評。
富祿德 (Luther C. Goodrich) 哥大。明清史、中西交通史。
海陶瑋 (James R. Hightower) 哈大。中國文學史、陶詩。
賀　凱 (Charles O. Hucker) 密大。明史。
David N. Keightley 加大。中國古史、甲骨文。
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英屬哥大。中國古文字。
魯德福 (R. C. Rudolph) 漢代史、漢畫像。
司徒修 (Hugh M. Stimson) 耶大。中國聲韻學、元曲。
席　文 (N. Sivin) 原在麻省理工學院，暑後轉賓大。中國科學史。
薛愛華 (Edward H. Shafer) 加大。中國經典、中國文明史。

以上所舉，都是知名的漢學家。不過：㈠表中所列的某某大學，雖然是他們任教的地方，但

有不少人已經退休。㈡他們的專長，有的不止一二種，這裏只是擇要列舉。㈢有不少的青年漢學家，大有後來居上之勢，這裏無法一一詳述。

這些漢學家，固然各有其獨到之處；但，也有些人的意見，在我們看來，乃是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例如，某君讀我國古書的能力較差、而侈談中國古代語法，常常鬧出一些錯誤，以致受到猛烈的譏評。又如研究我國古文字學的某君，說中國文字，都是由天干地支孳生出來的；他的意見，自然也很難使人接受。至於哈佛大學已退休的教授費正清，專門爲虎作倀，替毛共政權張目；他的偏見使我們憎恨，自不必說了。

五、餘說

關於北美各大學所藏中文圖書、以及著有聲望的漢學家，略如上述。從事漢學研究的大學，向以哈佛爲最著名。普林斯敦大學的東亞學系，成立雖不過六七年，然在各大學東方學系中，已躍登第四位。而本不以漢學研究著名的俄亥俄大學，近年擁有不少的中國學者，如李田意、陳穎、荊允敬、薛鳳生、張顥、勞延煊諸教授，皆學有專精；將來的發展，實未可限量。但，也有些學校，由於經費關係，打算撤消東方學系、或減少東方研究的課程，這是使人感到遺憾的。

各大學的東方學系（各系的名稱不一，姑以此名概之），絕大多數都是以研究漢學爲主。但，近年來日本的國際交流基金會，以千萬美元，分贈給美國十所著名大學的東方學系——每系一百萬元。這筆贈款，指定購買日本圖書、和聘請日本教授；不但可以動用利息，而且可以動用

基金。無疑地，對於漢學的發展，是一大威脅。宜如何應付這個情勢，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儘管北美各著名的大學，都有幾位傑出的漢學教授；而人數究竟無多。但，學生們研究的專題各異；因此，一位教授，常常須指導多方面的論文。楊聯陞先生曾自謙地說：「我在這裏開漢學雜貨舖。」這雖是戲言，卻也是實情。返觀我國各大學的文史學系，每一門課程，都有專家教授。以中文系爲例，經學方面，詩、書、易……各有專家；小學方面，文字、音韻、訓詁，各有專家；文學方面，詩、詞、劇曲、小說，各有專家。這樣的陣容，在外國是不可能有的。加以臺北各研究機關、各大學、各大圖書館、以及博物院所藏的圖書文物，甚爲豐富，實不愧爲外籍人士所嚮往的漢學研究中心。但，美國雖然富庶，近年也由於經濟的不景氣，能得到獎助金來我國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已不太多；歐洲、韓國、東南亞各國的學人。更不容易找到來華研究漢學的補助費。因此，去年敎育部曾打算建築一座十一層的大樓，專供招待來華研究漢學的外國學人住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措施。有了一個收費低廉的食宿之所，必然能吸引很多的外國學人。這些學人，接受了我們傳統文化的薰陶，必不至爲邪說所誤。他們又有較長的時間住在臺灣地區，親眼看到我們民眾安居樂業、熙來攘往的情狀，必不會相信那些誣衊我政府的謠言。這樣說來，不獨對於傳播我國文化，有良好的作用；對於當前的政治局勢，也是有裨益的。

原載「中央日報」，四版，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編者按：本文爲先生於民國六十六年紀念　總統蔣公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十週年大會之專題報告，曾由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印成小册，於會場分發。

幽靜的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

新澤西州一向有花園州之稱，普林斯敦市的風景尤其引人入勝；十里平林，草坪處處。置身其中，彷彿是在一個規模宏大的植物園裏。沿着叢林中靜潔的馬路，向普市的南郊走去，步行約半小時，便看到幾座紅樓，若隱若現的在萬木叢中，這就是舉世聞名的高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高深研究所雖然是全世界學者所嚮往的地方；但一般人對它的情況並不熟悉。很多人以爲它是普林斯敦大學的一部分，其實它們是兩個機構。普大已有二百二十多年的歷史，而高深研究所才只有三十六歲；普大自有供學生讀學位的研究院，而高深研究所卻只有研究人員並無學生。

高深研究所創立於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它是用巴布基爾（Louis Bamberger）及其妹福爾德夫人（Mrs. Felix Fuld）的捐款創設，並用他們的捐款來維持的。據首任所長佛勒克斯納（Abraham Flexner）的回憶錄（I Remember），他們兄妹第一次捐了五百萬元。據本年

七月八日的時代雜誌（八十八卷二期），知道他（她）們共計捐了一千九百萬元。

巴布基爾於一八八五年生於拔提摩爾（Baltimore），卒於一九四四年。他居住於新澤西州的橘市（Orange Town），他和他的妹妹在紐沃克（Nework）合開了一家百貨公司。他（她）熱心於想辦一個學術機關，他們請教於當時著名的一位醫學教育改進家——佛勒克斯納。佛氏以「有用的無用之學」（The useful of useless knowlege）的道理，說動了他們；不久，高深研究所就誕生了。

佛勒克斯納於一九三九年卸職，繼任人是名學者艾戴樂（Frank Aydelotte）。艾氏於一九四七年卸職，由享有「美國原子彈之父」之譽的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繼任。今年六月，歐氏辭去了所長的職務，繼任者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年方四十六歲的凱森（Carl Kaysen）。

爲了保管基金和決定經費的用途，該所有一個信託委員會，由十五位委員組成。該所所長，也是由這個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所長專門主持與學術研究有關的事務。

該所現分三個部門，即：歷史、數學和自然科學。每一部門的研究人員，都分爲永久的和臨時的兩種。永久的研究人員是終身職，待遇也優厚，年薪最高的可以到二萬四千元。臨時研究人員，是經過申請或推薦手續後，由有關部門的永久研究人員過半數的票決而產生的；他們經投票通過後，便認爲是該所的會員（Member），在所研究半年、一年、以至二、三年不等。臨時人員的年薪，自七、八千元到一萬五千元，多是由他們自己服務的學校、機關或各基金會資助半

數，另半數則由高深研究所負擔。永久研究人員，都是聲名顯赫的學者；臨時研究人員，也多是在學術方面有了相當成就的人，以及以優越的成績得到了博士學位，並且是公認爲前途遠大的青年。永久研究人員，現在是二十九個人，計：歷史門十二人，數學門也是十二人，自然科學門則只有五人。其中惟一的中國人是楊振寧先生（自下年度起，他已決定到紐約州立大學任教，自然要辭去永久研究員的職務）。臨時研究人員，據今年上半年的名單，是歷史門二十九人，數學門五十人，自然科學門二十人。研究人員們，來自世界的許多國家：英、法、德、義、荷蘭、中國、日本、印度……等國的學者，在這裏是經常遇到的；美國的學者，大約只佔半數。中國的學者，除了楊振寧以外，在該所作過臨時研究人員的，歷年以來，則有陳省身、吳大猷、李政道、吳健雄、林家翹、王憲鐘等；在數學方面的英年績學之士，如蘇競存、項武忠等，也都在這裏住過。該所成立之初，所請的研究人員，多是些負有盛名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於一九三三年入所爲永久研究員，直到一九五五年他死去爲止。）可能由於這種原因，過去三十多年，來此從事研究工作的，一直是以數學方面的學者爲多（以前無自然科學門，理化等科都列入數學門。）。從事歷史方面研究的人們，近年漸有增多的趨勢，但中國人絕少。三十六年以來，在該所的歷史部門裏，筆者可能是惟一的中國人。

該所的研究人員，都是從事「純理論」之研究的；「純」的至於研究理化的人連實驗室都沒有。研究人員如果必需用到儀器時，則可以利用普林斯頓大學的儀器設備。它的圖書館也還不够大；但普林斯敦大學的圖書（現已超過二百萬册），可任憑該所的人員閱覽或借出。該所和普大

雖是兩個機構；但在學術研究方面，合作無間。該所曾以百多萬美元買了葛思德（Gest）的一批中國書（約七萬五千册，善本書佔一半以上。），而以一元的代價租給普大，租期爲九十九年。卽此一事，便可見這兩個機構的交情。

該所的研究風氣，是絕對自由的；自由的程度，超出人們想像之外。隨便你作什麼研究工作，所方概不過問。它既不要求你把研究的成果給它出版，也不要求你作研究成果的報告。它固然有各種學術討論會，但如果你無意講演的話，該所決不會要求你講些什麼；開講論會時，照例發給你通知書，但參加與否，則悉隨尊便。它雖然有上下班的時間，也有你的研究室；但你整年不進你的研究室、或者天天在研究室裏苦讀到深夜十二時以後（後者很多），一概沒人過問。時代雜誌（卷數期數見前）以「學者的樂園在普林斯敦」爲題，給該所作了一篇特寫。它說：「假若有一個住者（指研究人員）願意在草坪上裸體跳舞、而認爲對他的思想有益的話，研究所也決不介意。」這話有點過甚其辭。但它又說：「歐本海默告訴新來的人說：『有一件事情我們決不問你，那就是你在做什麼。』」這話則千眞萬確。我初到該所去晤見歐氏時，曾經問他有些什麼規則我應該注意遵守的；他笑着說：「我想你自己就可以決定。」

永久研究人員，各有自己的房屋，分散在研究所附近的叢林中。這些房屋，多是用研究所的地皮，而由自己設計建造的。建造時可以向所方貸款，以後分期扣還。離所時則照建築時的原價，賣給所方。另在距研究所更近的地方，建有可供一百多家住的宿舍（包括眷屬的和單身的），則是專供臨時研究人員住的。宿舍和宿舍之間，都有寬大的草坪。路旁嘉木葱蘢，秋來紅葉吐

豔，撩人欲醉。這裏的住家雖多，卻非常寂靜。汽車雖經常來往，從沒有按喇叭的習慣。住戶則各安於室，絕無喧囂的聲音。夜裏不必說了；卽使在白天，也靜得可以聽到落葉敲窗的微聲。宿舍的租金特別便宜，三間臥室，一間大客廳、廚房、餐廳、洗澡間俱備的一幢平房，每月租金才一百元，還包括水電、煤氣、暖氣、和臥室的床張被褥，及廚房的一切用具在內。在普林斯敦市內，像這樣的房屋，月租至少需一百八十元。

研究所備有交通車來往於研究所和普大，每天往返二十次。另於每星期一、四的下午一時，各開一部專車到普市近郊的中心市場，則專爲太太們買菜而設。宿舍區的中央，有一個服務處；在那裏設有洗衣機和烘衣機，免費供給各住戶使用。吸塵器和其他家庭用具，則隨借隨有。總之，研究所儘可能地給研究人員們和他們的眷屬以方便，免得他們爲瑣務而分心。

「像混合的酒一樣，高深研究所是刺激的、是令人迷惘的。」這是去年十一月假期雜誌（Holiday）的記者，評述該所的話語。他又說：「在佛羅里達和加利佛尼亞，『普林斯敦』這個名詞，對於從事研究工作的才智之士是一種誘惑。」這話是包括普林斯敦大學說的。據說：有許多住在普市十英里以外的人，信箱卻設在普林斯敦。這樣，他們認爲可以增高身價。事實上，學生們能在普大讀書，固然值得驕傲；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們，能進入高深研究所，更有「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之感。特別的是研究數理科學的學生和學者。

多年來，人們在喊着漢學中心在歐洲，也有人說漢學中心在美國，或者說在日本。但平心而論，就學術研究方面來說，除了日本是我們的勁敵之外；歐洲和美國，還都不能和臺北較量。更

就學術資料來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那麼多的考古資料、甲骨文、漢簡和明淸檔案，近代史研究所有那麼多的近代檔案，加以中山博物院的大批銅器、瓷器、書畫、和檔案，中央圖書館的大批善本圖書。這些寶貴的學術資料，或者是世界各國所沒有，或者雖有一些而不能望其項背。假若有熱心於文化事業的企業家，捐出一筆巨款，創辦一個文史研究所，推選一些具有現代學術眼光，而在經學、史學、諸子、文學、美術、目錄板本等學科確有成就、而又公正的人士，利用上述的資料，在所裏一方面自由研究，一方面培植後進。同時還可以接受外國學者的申請，在所裏從事研究工作。這樣，它既不像公立的研究機關，須受經費和員額的限制；也不像大學中的研究所，須受種種法令的約束。我想不多年後，必有燦爛的成果。發揚本國文化，確定漢學中心在自由中國，這應該是有效的辦法之一。

嘉新水泥公司能每年捐出巨款用於文敎事業；以臺灣富商之多，難道只有嘉新專美嗎？有志於文化事業的人們，何不學一學巴布基爾呢？

原載「中央日報」，九版，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普林斯敦大學所藏的中文圖書

一、前言

漢學在北美，近年來已成爲熱門學問，如果一個大學中沒有中國學系，或者沒有漢學方面的課程，在一般人心目中，它就不能成爲第一流的大學。因此，美國各大學收藏中國書的風氣，也就很盛。據調查，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底爲止，北美各公共圖書館、各大學圖書館、各研究機關，收藏中國書的，已在五十個機構以上：收藏中文書的總數量，已達到二、四〇九、〇六〇册。單是國會圖書館所藏的中文書，就有三五二、六八一册；此外，在各大學中，收藏中文圖書在十萬册以上的有七所，接近十萬册的也有三所。藏中文書最多的前五個大學是：

哈佛大學	二八四、二〇五册
哥倫比亞大學	一六四、一六七册
普林斯敦大學	一六二、九三六册

芝加哥大學　一五二、四九四冊

加州大學（柏克萊）　一五二、〇三七冊

在北美各大學中，就收藏中國書的數量而言，普林斯敦大學居第三位；可是若就各圖書館（包括國會圖書館及各大學圖書館）所藏的中國善本書而言，則以普林斯敦大學爲最多。

二、普大中文圖書的來源

普大所藏的中文圖書，絕大部分是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和他的朋友吉里斯（I. V. Gillis）兩人共同收集的。葛思德是一個工程師，在紐約開了一個葛思德建築公司，常在北美、南美、亞洲等地，包攬工程。有一年他到中國來，那時他的眼睛正患綠內障，各國的名醫都不能給他治好。他到北平（那時還叫北京）時，遇到美國駐中國公使館的武官吉里斯。吉里斯勸他買瓶定州馬應龍的眼藥試試看。葛思德聽了吉里斯的話，就買到了馬家的眼藥。這眼藥雖然沒把葛思德的眼疾完全治癒，可是每晚點上眼藥睡覺，就覺得很舒服。葛思德因而對中國的醫書感到很大的興趣，於是就留給吉里斯一批錢，託他代買中國的醫學書籍；葛氏收買中國圖書就是這樣開始的。

吉里斯替葛思德買了約莫有二千冊的醫學書之後，他們的興趣擴大了，進而收購醫學以外的圖書；特別着重善本。葛思德在加拿大的芒垂爾（Montreal）有一個分公司，因此，葛氏所買的書，就運存在該城的麥克吉爾（Mcgill）大學裏，於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以「葛思德中國

研究圖書館」的名義，開放閱覽。以後吉里斯在北平陸續替葛氏收買，到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葛氏的收藏，已超過了十萬册。

這年，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得到了洛氏基金會的資助，以高價（聽說在十萬美元以上？）把葛氏的藏書全部買去，並以美金一元的代價租給普林斯敦大學，租期是九十九年。

普林斯敦大學，有了這批圖書，加上它自己原有的中國書，再加上最近幾年來努力的購買，於是到去年六月底止，它所藏的中國書已接近十六萬三千册。

三、普大中文書的概況

前面說過，葛思德所買的書中，醫學圖書在二千册以上，其中不乏罕見的書，是研究中醫學者很難得的一整批資料。此外，還有兩部原本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其一是全部的——一三八種；另一部只差一種——一三七種。原本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流傳的雖不算少；但完整無缺的，在全世界卻只有少數的幾部。普大居然有兩部；雖然有一部還缺了一種，可也很足以自豪了。

其他的殿版書，普大收藏的也相當多，大部頭的，則有銅活字本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計五、〇二〇册；以及初印本的二十四史，共七五〇册；清代各皇帝的御製文集等，普大收藏的也比較多。這些書，在今天看來，就都可以列入善本了。可是普大的善本書志中，並沒把這些書列入。

普大的善本圖書（列在善本書志中的），在三萬册以上；以明刻本爲最多，也以這一方面的資料最有學術價值。其中如崇禎刻本文荷齋南華日抄五卷（徐曉著），明刊梵夾本離山寶卷和銷釋保安寶卷，萬曆刻一百八十卷本弇州山人四部藁（王世貞著），隆慶五年刻本青蘿館詩前集四卷（徐中行著），萬曆到清順治間遞刻本青來閣初集二十卷（方應祥著），崇禎刻本絕餘編四卷（釋智旭著）等，或是世界上僅有的孤本，或是流傳極少的珍本，在學術研究方面，都有重大的價值。

此外，普大這批書中，明代所刻學塾中的讀本很多，如簡略的歷史讀本，删節本的諸子、文選、詩選、類書等。這些啟蒙之書，看來好像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可是，對於研究明代教育史的人來說，它們卻都是絕好的資料。

在這批明版書中，假貨也特別多；有些明本，經過了改頭換面之後，以冒充宋本；有些殘本，經過割裂、改竄、剜補之後，而冒充全本；也有當時乙書商買了甲書商的書版，於是把原校刊人的名字剜掉而另換上自己的名字的；又有本來是甲的著作，乙用原書翻刻而改題乙著的；至於冒用名人的名字而實由陋儒編選的兔園册子，尤其多得不可勝數。這些，都是研究目錄學與版本學的上好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大有一部磧砂本藏經。磧砂藏經，從南宋時刻起，到元代才完工。普大所存的一部，雖然不完全是宋版和元版（宋版存六百九十多册，元版存一千六百三十多册，另有明刻本八百六十多册，明抄本二千一百多册。）但其中有七册是當年影印磧砂藏經時所到處訪

求而未得的。另外，普大還存有近乎全部的明刊本北藏，以及佩文韻府校訂底本，清寫進呈本滿漢大臣傳，這自然也是難得的珍籍。

四、普大的善本書志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普大聘了當時正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的北平圖書館職員王重民，來給這批善本書編纂書志，編成了稿本四册。民國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胡適之先生擔任普大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時[1]，曾把王氏所編的善本書志，審閱一過，發現了一些問題。胡先生只在原稿有問題的地方，加以簡單的批語；自然他並沒有時間去解決那些問題。

前年筆者應普大和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之約，在普市住了一年，主要的任務，是修訂王氏的善本書志稿。由於王氏原稿的體例，和他所編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善本書志一樣，筆者認爲有改變體例的必要；又因王氏的原稿係倉促間編成，錯誤的、遺漏的、應補充的、和應删汰的地方頗多；於是乾脆就把原稿放下，而重新另作了一部。這部書志，普大本打算在今年內印行；但聽說印刷費還沒籌足，因此這計劃今年能否實現就不敢說定了。

原載「大華晚報」，四版，民國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1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是普林斯敦大學圖書館的一部分。因為絕大多數的圖書，是葛思德舊藏的，故以葛氏之名為名。又因為近年收藏了一些日文、和韓文的圖書，所以叫作東方圖書館。胡適之先生離職後，被聘為東方部的榮譽主任。繼胡先生為主任的，是童世綱先生。現在這一部分，共有正式職員六人，臨時職員也有五六人。這十餘人中，除了一位韓國太太(正式職員)和一位日本小姐(臨時職員)外，其餘全是中國人。

普林斯敦大學所藏中文善本書質疑

普林斯敦大學所藏的中文圖書，就數量言，在美國各大學中居第三位；而它所藏的中文善本書的數量，在美國各大學中，則首居一指。

美國的工程師葛思德（G. M. Gest），因患綠內障眼病，各國的醫師，都沒法治愈。後來，他到了北京；有人介紹他試用定州馬家和白家的眼藥。他用過之後，雖然沒把眼疾治好，卻感覺着舒適了很多。因此，就引起了他購買中國醫學書的興趣。他的朋友吉里斯（I. V. Gillis），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武官，對於我國的各種情形，比較熟悉，就幫他收買。漸漸地，由購買醫學書而擴及到一般的圖書，再由普通本而擴及到善本。十數年之間，他們陸續購進的書籍，共達十萬册以上。

葛思德在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有一個分公司，他就把這批圖書，運到加拿大，存放在當地的麥克吉爾（Mcgill）大學裏。一九三七年，這批圖書，被美國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買去。不久，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就以一元的代價，租給普林斯敦大學。爲了紀念原物主葛思

德，普大圖書館的東方部，就定名爲葛思德圖書館。

由於近二十年來不斷地購買，普大圖書館所藏的中文圖書，到去年十二月底止已達十七萬五千七百餘册；但就善本圖書而言，則幾乎全是葛思德舊藏的。

在這批善本書裏，有不少珍貴的秘笈，這裏不來談它們。現在所要談的，是一些有問題的善本。所謂問題，可歸納爲以下的四類：㈠攘竊他人的作品冒充己作的書；㈡襲取他人的刻本冒充已刻的書；㈢以明刻本冒充古本的書；㈣以殘本冒充全本的書。這些有問題的善本書，幾乎是每一個收藏中文善本書的圖書館都具有的。但因爲普大的善本書，我曾經一部一部地都翻閱過，知道得較熟悉；所以本文就專論普大所藏的中文善本書。

除了上述的四類僞品之外，普大也收藏了一些稀見的原刻本；利用這些原刻本，可以證明某些書是攘竊的：這是非常可貴的資料。現在就依照上舉的五類，分別舉例，來加以說明。

一、攘竊他人的作品冒充己作的書

把別人的著作竊爲己有的事，雖然是於今爲烈，卻也是自古已然。普大所藏的中文善本書中，就有很多的例子。而且，這些竊案，全部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人所爲。

例一：福壽全書六卷

普大圖書館藏有福壽全書六卷，是明崇禎間的刻本。在卷五的開頭，刻着：「雲間陳眉公

輯，鹿城顧錫疇定，諸子同閱，織簾居梓。」全書共分二十個子目，每一子目的開頭，都有小序；小序的末尾，都題着「雲間陳繼儒識」。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九著錄，題「陳繼儒撰」；並沒懷疑作者有什麼問題。

該館又藏有明鄭瑄作的昨非菴日纂二十卷（也見於四庫總目子部雜家類存目九；「菴」作「齋」。）也是崇禎間的刻本；有喻思恂、顧錫疇、許豸、何如寵、馬鳴起、侯峒曾、徐石麟諸家的序文，和鄭瑄的自序。

把這兩部書互相對勘，才知道內容完全相同。不但書的內容全同，就是板刻也大致一樣。經過仔細核對之後，原來所謂「福壽全書」，不但就是「昨非菴日纂」；甚至連它的書板，也是剜改昨非菴日纂的原板而成的。它改換了書名，改變了卷數，把書口的原書名剷掉，把小序末尾「鄭瑄」的名子剜改爲「陳繼儒」，把顧錫疇昨非菴日纂序中「鄭子」剜改爲「陳子」，把其他各家的序文都抽掉。經過這樣改頭換面之後，就儼然另成一書了。

但，這只是書賈作僞，而連累了陳繼儒。

例二：新鍥簪纓必用增補秘笈新書十六卷

這書計正集十三卷，別集三卷。書中所題的著者，是：「宋先賢謝疊山公編次，明翰林李九我增補。」有萬曆三十七年吳道南序。按：謝疊山是謝枋得，李九我是李廷機，都是著名的文人。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著錄翰苑新書前集七十卷、後集上二十六卷、後集下六卷、別集十二卷、續集四十二卷。提要說：

不著撰人名氏。據陳文燭序，亦但稱爲宋人。今別有刊本，題宋謝枋得撰者，坊賈所贋託也。

同書類書類存目二，又著錄秘笈新書十三卷，別集三卷。提要說：

明吳道南編。道南有河渠志，已著錄。是書自序，以爲本謝枋得未及付梓之書，爲之增補。然所載皆職官故實，故標題有簪纓必用字。……割裂瑣碎，尤多掛漏，斷非枋得所作。蓋後人假其名以取重，道南未及詳考耳。

按：普大圖書館又藏「新編簪纓必用翰苑新書」二十九卷，計前集十二卷，後集七卷，別集二卷，續集八卷。這書出版於萬曆十九年，沒題編著人的姓名，有萬曆十九年陳文燭序。四庫提要所著錄的一百五十六卷本，有陳文燭序；這二十九卷本，也有陳文燭序。（文燭是嘉靖乙丑——四十四年——進士。）一百五十六卷本的翰苑新書，各家書目所著錄的有明鈔本，它似乎是編成在二十九卷本之前。則二十九卷本，很可能是從一百五十六卷本節錄而成。但，這二十九卷本，又似乎不是四庫提要所說的「別有刊本」；因爲它沒題謝枋得撰。這些問題的眞相到底怎樣？這裏且不去考證。

現在拿十六卷本的秘笈新書、和二十九卷本的翰苑新書，互相比較，才知道它和翰苑新書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秘笈」沒有「翰苑」的後續兩集，正集則「秘笈」多了一

卷。而這多出來的一卷，乃是割裂「翰苑」第十卷中的「家世」部分、十一卷中的「通叙」部分、和十二卷中的「干請」部分，拼湊而成。又在各卷的末尾，間或增加「名公全啟」一目；如此而已。

但天一閣書目，有鈔本新編翰墨新書三十一卷，題「進士劉子實茂夫著」。余氏四庫提要辨證，以爲它與翰苑新書，實爲一書。且以爲此書異名頗多，卷數分合也不同，而實爲劉茂夫作。由上述的情形看來，秘笈新書，固然不是謝枋得的著作，也不是李廷機所增補的；它是不是劉茂夫或吳道南編的，恐怕也成問題。

例三：彙書詳註三十六卷

普大藏有彙苑詳註、和彙書詳註兩書，都是三十六卷，都是明萬曆間的刻本。彙苑詳註的扉葉題：「王鳳洲彙苑詳註，金閶世裕堂梓行。」有萬曆二十三年車大任和黃鳳翔的序文各一篇。彙書詳註的扉葉，則題：「鄒善長先生訂輯，尚德堂藏板。」也有黃鳳翔的序文。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存目著錄了彙苑詳註，提要說它「剽劉事文類聚、合璧事類而成，疑託名王世貞者所爲」。這判斷大概是可信的。

而彙書詳註，乃是就彙苑詳註的卷板，剜改而成。以兩書互較，知道彙書詳註除了把彙苑詳註各卷標題中的「苑」字、剜改爲「書」字外，其餘完全相同。只是彙苑詳註有引用書名十六葉，彙書詳註沒有了。可是，黃鳳翔的序文理，明說鄒善長是校訂人，而不是編輯者；書賈既改

書名，又大書「鄒善長先生訂輯」，眞是掩耳盜鈴。所以，彙苑詳註的編者，已是僞託；彙書詳註，更是僞中之僞了。

例四：類選註釋駱丞全集四卷

普大所藏的這部書，開卷題：「上海顧從敬類選，雲間陳繼儒註釋，吳郡陳仁錫參訂。」有湯賓尹的序文，沒題年月。美國國會圖書館，也收藏了這部書。王重民編的該館中國善本書錄（八二五頁），對這部書曾作過考證，說：

> 茲校以陳魁士注本，乃不差一字；則是本爲偸刻陳魁士本無疑。湯序固出坊賈之手，顧、陳必皆託名。……卷端所附事傳，較陳魁士本多唐詩紀事一則，楊升庵、徐獻忠、王鳳洲各一則。按：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四，有萬曆十九年虞吏生訂釋本，正有此四則；然則，此四則又爲從虞本販來者。

這說法是很正確的。陳魁士本，刻於萬曆八年。此本既託名陳仁錫和湯賓尹，字體也是明代晚年的風格，它大約刻成於萬曆晚年，或者天啟、崇禎間。它既然晚於陳魁士註本，自然不會是陳魁士本竊襲此本了。

例五：唐詩紀一百七十卷

普大收藏了三部唐詩紀，其中兩部的前十六卷，都是題着「吳郡黃德水彙編，鄣郡吳琯校

訂」；十七卷以下，題的是「鄣郡吳琯彙編」。另一部則題着「豫章李明睿閱，滁陽方一元彙編，海寧方天眷重訂」。這三本，都有李維楨和方沆的序文，都是作於萬曆十三年。

以所謂方一元彙編本和黃吳二家合編本對校，證知二者不但是一部書，而且是同一個板。據李維楨序，此書起初是黃德水編的，編到十六卷，德水死掉了；於是從十七卷以下，就由吳琯繼續編成。吳琯是以刻書著名的，這書就由吳氏付刻了。刻成的時間，當在萬曆十三年前後。

所謂方一元彙編本的校閱人李明睿，是天啟年間的進士。方本既用了李氏的大名，必定在他成進士以後。如此說來，方本後於原刻約四十年左右。由此我們可以這樣推斷：大概吳刻的原板，後來賣給方家，方家不但剜改了校訂人，並且把編輯者也換成自己的名字。方氏這樣做，大概自以為是得意之作；殊不知那實是自播其惡於眾的拙劣行為。

二、襲取他人的刻本冒充己刻的書

前舉的福壽全書和彙書詳註，都是利用他書的書板，改頭換面而成。它們既改換了書名，又改換了著者；這種竊盜的行為，是比較嚴重的。本節中所要敍述的，是有的只襲用他家的書板，只將校刻者的姓名剜改一下；至於書名和著者，並沒經過改動。有的改了校刻者的姓名，並且改換了書名；但並沒改換著者的名氏。而且，這種情形，大都是刻書的原主，把書板賣給另一家，新主為了表示「板權所有」，才剜改校訂者的姓名；又為了以新書相號召，才改換了書名。比起福壽全書等來，這雖然情有可原；但，講究目錄版本學的人，卻不能不加以注意。以下也分別舉

幾個例子。

例一：性理標題彙要二十二卷

普大藏有性理標題綜要和性理標題彙要各一部，都是二十二卷，都是崇禎間的刻本，都題着詹淮撰、陳仁卿訂，每半葉都是九行、行十八字，都有朱從古、陳仁錫、李廷機和詹淮的序文。字體風格，板匡大小，完全相同。一望而知它們必有因襲的關係。但「綜要」的扉葉，題的是「梅墅石渠閣藏板」；而「彙要」則作「製錦堂梓行」。

這兩部書，都已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的存目；四庫館臣並且已覺察到它們實是一書。提要說：

> 核檢彙要，與綜要相同。蓋坊賈以原刻習見，改新名以求速售，非兩書也。

提要這話，是不錯的。不過，它們不但不是兩書，而且還是一板。細核兩書，才知道「彙要」是把「綜要」的「綜」字剜去，而改換了一個「彙」字，剜補的痕迹，顯然可見。而且，綜要的字畫清晰，「彙要」已有些漫漶的地方，可知綜要印行在前，彙要印行在後，這也是彙要承襲綜要的證據之一。

可是，據詹淮的序文，此書原名彙要。石渠閣本綜要卷一目錄前的書名標題，還作彙要。由此可知，石渠閣刻這部書的時候，把彙要改成了綜要；改得不够仔細，所以還有漏網之魚。後來板歸製錦堂，再把「綜」字改成「彙」字，實際上是做了復原的工作；但，題作「製錦堂梓行」，就和事實不合了。

例二：明辨類函六十四卷

普大所藏的明辨類函六十四卷，有崇禎壬申（五年）張溥序，所題校閱人的名子是鍾惺。這部書已著錄於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的存目，提要說：

是書明史藝文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詹氏小辨；而世所傳崇禎壬申刊本，實作明辨類函：蓋後又改名也。

可見四庫館臣，已經知道明辨類函就是詹氏小辨。但，詹氏小辨是簡稱，它的全名是詹氏性理小辨。普大也收藏了這部書，可惜不全（存前十四卷）；是萬曆二十四年王元貞校刋本。它題着：「新安詹景鳳東圖父著，淮陰朱維藩价卿父訂，秣陵王元貞孟起父校。」有萬曆二十四年王元貞的序文。

以明辨類函和詹氏性理小辨對勘，不但內容完全相同；而且明辨類函實就性理小辨的原板剜改而成。它（類函）除了把原板的書名標題全部剜改了之外，並把校訂人王元貞剜改爲鍾惺；更可笑的是把王序的末行「萬曆二十四年王元貞序」十個字，改爲「崇禎壬申孟冬朔日張溥題」十一個字；而序文的內容，則沒有更動。剜改的技術雖然拙劣，但如果不仔細核對，就無法知道它和性理小辨是同一部書，更無法知道它就是襲用的性理小辨的原板。

例三：二十子存七十卷

普大所藏的二十子殘本，存老子到譚子化書等九種七十卷，各卷的書名標題下，刻着「明新安黃之寀校」七個字。從字體看來，它是萬曆間的刻本。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此書的全本。該館中文善本書錄中，載有周貞亮的跋語，說這個所謂「黃之寀校」的二十子，實際上就是吳勉學所刻二十子的原板。我曾經細看所謂黃校的二十子，「黃之寀」三個字，都有剜補的痕迹；可知周貞亮的話是對的。大概是因爲吳家把這書板賣給黃家，於是就把校訂人改換了。

另有所謂「八代四六全書」一書，實際上是翻刻的「詞致錄」，而增加了一些眉批。這情形和前述的一、二兩例相似；不過，它是翻刻的，而不是用的原板。

以上各例，有的是襲用了他家的原板，而又改變了書名；有的則只改變了校訂人的姓名。二者相較，自然後者的罪過比較輕些。

三、以明刻本冒充古本的書

上文所述的一、二兩類，都是作僞於圖書未印之前；下文所要說的三、四兩類，則是作僞於圖書已經印成之後的例子。

以近刻本冒充古刻本，本是書賈的慣技。只是作僞的技術，有的高明，有的拙劣。但，作僞的人無論多麼高明，卻很少能逃過板本鑒別家的眼睛；至於一些沒大經驗的藏書家，受騙的可就多了。以下是這類僞本的例子。

例一：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是明代凌稚隆輯錄各家評語，放在史記原文的上端，於萬曆四年刻成。普大收藏了此書三部，兩部是原刻本，一部是翻刻本。原刻本之一，經過書賈僞作，把紙染成陳舊的暗黃色，把原書王元美、茅鹿門、徐中行三家的序文撕掉（因爲他們都是萬曆時人），又把明代人的評語，都改爲宋代或宋代以前人的評語。這樣，書賈認爲就可以冒充宋板了。但，此本的卷前，有清乾隆年間胡季堂手寫的題記，已經揭發了它的僞迹。題記說：

是書乃明時鐫刻初印本，原有王元美、茅鹿門、徐中行三序，俱撤去。將明人評語，改爲晉唐宋人：如柯維騏作眞德秀，楊愼作楊時，陸深作陸機，唐順之作唐子西，張之象作柳宗元之類；又將紙色做舊。此坊間僞冒宋槧，以冀售得重價耳。却又存丹鉛錄之名，以自露其僞，殊覺可笑。

按：此本把明代的人名剜掉後，另從同一板本的史記評林中找到要換的字，把它們割下來，嵌補在剜去原人名的空隙裏。剜補的精緻，幾乎像無縫的天衣。所耗費的功力和時間之多，是可以想到的。但，作僞的人雖然把楊愼的名子改成楊時，卻忘了把丹鉛錄改掉；胡氏認爲可笑，固然不錯。而且，萬曆年間刻書的字體，和宋板書的字體，大不相同。即使把丹鉛錄改掉；而此書之爲明板，也一望而知。書賈這樣作僞，眞是心勞日拙了。

例二：羣書考索存一百三十卷

普大所藏的羣書考索，存前集六十六卷，後卷六十五卷，沒有續集和別集。書中題着：「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建陽知縣區玉刋行，縣丞管韶校正，羅源知縣徐珪校正。」各卷章俊卿題名的後面，也有題着「木石山人劉弘豫校正」的。它無疑地是明正德戊辰（三年）建陽劉氏愼獨齋的刻本。

這部書也是經書賈僞造過的。此愼獨齋刻本，原有正德間鄭京的序文；書賈把鄭序的末四行撕掉，而另行抄補。抄補時把原來正德的年歲，改成至元二年；並把鄭京改爲蘇天爵。又把目錄後的牌記，改爲「皇元至正二年西湖書院刋行」。於是就儼然變成元刻本了。

但，這個本子的字體，既不像元板；區玉、管韶、徐珪又都是明代人；而且，「縣丞」這官名，也是明代才有的。因此，常識比較豐富的人，都不會受到欺騙的。

例三：集千家註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二十卷

普大所藏的這本杜工部詩集凡二十卷，附年譜一卷。題唐杜甫撰，宋劉辰翁評點，黃鶴補註。黑口，四周雙闌。乍看起來，很像明代初年的刻本。卷前有「重刋杜詩序」，可惜序文末葉沒有了，以致不能見到作序人的名字、和作序的年月。

普大另藏有高楚芳編的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年譜一卷，是明萬曆間黃陞等

校刻的；卷前有黃芳的序文，作於萬曆九年。拿這篇序文和上述黑口本的「重刊杜詩序」對勘，它們完全一樣；才知道黑口本的這篇殘序，就是黃芳在萬曆九年作的。黃芳的序文，固然不是爲了黃陞等校刊本作的，也不是爲了黑口本作的（是爲金鑾刊本作的）；但黑口本既轉載了黃芳的序文，可知它刻成的時代，必定在萬曆九年之後。

這黑口本可能是翻刻的元本或初本，而補刊了黃芳的序文。書賈看到它很像元代或明初的刊本，於是把黃序的末葉抽去，用以冒充古本。

四、以殘本冒充全本的書

在各家收藏的善本書中，以殘本冒充全本的例子是最常見的。普大所藏的善本書中，這類的例子，約有七八部書之多。這裏選出了三個比較有趣的例子，分述如下：

例一：青蘿館詩前集四卷正集存三卷

普大所藏明徐中行作隆慶五年新都汪氏刻的青蘿館詩集，是非常罕見的一部秘笈。它的前集是四卷；正集本來是六卷，但普大的藏本缺了後三卷，所以只賸下三卷。這書各家書目所著錄的只有正集六卷；前集四卷，清代以來的藏書目錄中，是很少見到的。

這書有隆慶五年俞允文作的序，說：「勒爲十卷。」因爲前集四卷、正集六卷，合共十卷，所以俞序這樣說。但這本只賸了七卷，書賈要把它冒充全本，於是就動了腦筋。

兪序的末尾，有「秋七月」三字。於是書賈就把「勒成十卷」的「十」字剜掉，而另把「秋七月」的「七」字割下來，遞補了「十」字的遺缺；「七」字的闕空，又用紙補起來，用墨筆填了一個「八」。於是「勒成十卷」，就變爲「勒成七卷」；「秋七月」，就變成了「秋八月」；又把正集卷四以下的目錄，全部去掉。於是序文所說的卷數，就完全和目錄相合了。

然而剜補的痕迹，一望而知，怎能騙得過人呢？

例二：唐詩拾遺十卷

普大藏有高棅編的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是崇禎年間吳恂校刻。又有唐詩拾遺十卷，就是唐詩品彙的拾遺，是崇禎年間新安汪氏校刻的。以兩本互校，卷一的第二葉，張本誤把別的詩刻進去，而汪本則不誤。這且不談。

汪本有高棅的原序，又有崇禎癸未（十六年）唐光元序。但，高序缺了後半，而唐序缺了前半。於是書賈就把兩序合成了一序，以掩飾其殘闕。以致張冠李戴，上下文當然就不能銜接了。

例三：蘇雋存三卷

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四十一年刻的蘇雋五卷，是王世元編集的。它的內容是：老泉集一卷（卷一），東坡集二卷（卷二、卷三），潁濱集二卷（卷四、卷五）。這書四庫全書總目沒著錄。

普大也藏有此書，也是萬曆四十一年的刻本，但只存卷一老泉集和卷二、卷三東坡集，而沒有潁濱集。它卷前有總目錄，總目前的標題是「三蘇雋」的「三」字中間的一畫剮去，於是就變成了「二蘇雋」。

以上所舉的三個例子，都幼稚得可笑。但，善本書中這類弄巧成拙的例子，卻是數見不鮮。

五、可資以辨偽的善本書

善本圖書通常的用途，是用以校訂後代刻本之訛誤的。但，普大所藏的善本書中，卻至少有三部可用以證明某書的著者是攘竊或僞託，而足以糾正前人著錄之誤的。這在善本書的用途上說，應該說是最重要的資料。現在列舉三個例子如下：

例一：籌海圖編十三卷

從明代末年以來，大家所見的籌海圖編，大都是天啟四年新安胡氏的刊本。這一刻本所題本書的著者是胡宗憲，於是各家書目（包括四庫全書總目），凡是著錄此書的，似乎沒有不題爲胡宗憲撰的。

普大藏有此書的原刻本，是嘉靖四十一年浙江刻的。開卷題着編校人的姓名，是：「崑山鄭若曾輯，男應龍、一鸞校。」所列的校刊人，有浙江布政司吏施孝、孫子良、沈世周，鹽政司吏范淵等，共十餘人。有鄭若曾的自序、和胡松、茅坤、唐樞三家的序文，以及盧鏜的跋語。鄭胡

兩序，都是嘉靖四十年作的；茅序、盧跋，作於嘉靖四十一年；唐序則沒題年月。盧跋說：「……此開陽鄭君籌海圖編之所由作也。宜乎軍門之重而徵之，梓而傳之。」軍門，是胡宗憲。可見此書是鄭若曾所作，胡宗憲命浙江布政、鹽政等司刻行。宗憲雖然結納嚴嵩，喜歡權詐；但從上述這書原刻本的情形看來，他並沒攘竊此書爲己有的意思。

到了天啟四年，宗憲的裔孫重刻這書時，就把著者改題爲胡宗憲；又把胡松、唐樞、和鄭若曾的序文，以及盧鏜的跋語，統統去掉，只賸下了茅坤的一篇序文。於是謬種流傳，使大家都認此書爲胡宗憲著的了。假使沒有這嘉靖本還留在人間，那麼，鄭若曾的不白之寃，恐怕是永遠沒人知道了。原刻本圖書的功用，有如是者！

例二：事物考八卷

普大藏有事物考八卷，是明嘉靖年間的原刻本。這書是王三聘所作，乃是就宋代高承的事物紀原增補而成的。有三聘自己的題識，沒記年月；另有趙忭的序文，題嘉靖四十二年。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存目，也著錄了此書，也是八卷。提要說：

明傳巖撰。巖，字野清，義烏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大抵本高承事物紀原，而稍爲附益；兼增入明代地名、官制、禮儀，鈔合成書，不免罣漏。……

提要下文並舉出了這書的一些缺點。按：四庫書目所著錄的這部書，書名、卷數，和提要所說它的內容，以及提要所指斥的一些缺點，和王三聘的書，完全相同。顯然地，它們實際上是同一部

書。而王三聘是山東黃縣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事蹟見蘭臺法鑒錄卷十六）；傅巖是崇禎年間的進士。以二人中進士的年歲推算，傅巖距王三聘將近一百年。如此說來，這當是傅巖攘竊了王三聘的著作。

這書有萬曆年間錢唐胡氏所刻的格致叢書本，還題着王三聘編；但，四庫館臣，似乎沒見到胡氏刻本。此嘉靖原刻本，更是罕見。普大收藏了這個祖本，因而據以揭發了這一盜案，可以說是藝林一大快事。

例三：新選古今類腴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存目，著錄了古今類腴十八卷，提要說：

>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吳一鵬序，云：是王麟洲所作。麟洲，王世懋別號也。……是書分十門一百二十一子目，皆採掇成語，以備舉業之用。殆坊刻陋本，必不出世懋之手。

普大收藏了這部書，標題是新選古今類腴，是萬曆年間的刻本，也是十八卷，也分十門一百二十一個子目。卷內題「陳世寶總訂」；有萬曆九年王宗載的序文，而沒有吳一鵬序。據王序，知此書是陳世寶集諸學官弟子，共同纂解，而由世寶點定的。書中所題的刪校人中，有王世懋；但絕沒說此書是王世懋所作。

四庫館臣所見，大概是重刻的本子。由於編著人陳世寶的聲望不夠大，於是書賈就把刪校人王世懋提升為編著人。所謂吳一鵬序，也可能由於此本的「考訛」部分，有人名叫「王一鵬」，

書賈因而引起了動機，改王爲吳，而替他作了一篇序文。

以上所舉，大多數是作僞的例子，少數是可以揭發作僞的例子。這些作僞的例子，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作僞於圖書印行之前的，攘竊他人的作品、和襲取他人之刻本的，屬於這一類。另一類是作僞於圖書印行之後的，以明刻本冒充古本、和以殘本冒充全本的，都屬於這一類。而最難得的是用原刻本證明後世翻刻本之爲僞託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前一類的例子，都出於明代中葉以後。這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已經注意到了。四庫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革朝遺忠錄的提要說：

> 蓋明代刊書者，往往竄亂舊本，而沒所由來。諸版競出，混淆彌甚；其風熾於萬曆以後。今觀此本，則嘉靖中已有之矣。

由上文所舉的例子看來，四庫提要這段話，是很正確的。

僞作圖書，固然是可鄙的行爲。但，僞作的圖書，也有一項用途：那就是可以作爲標本，用來教導初習圖書板本學的人。

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揮汗寫畢

原載「圖書館學報」，十期（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頁一——一〇

編者按：本文據先生手定稿排印。

童世綱先生主持下的葛思德東方圖書館

普林斯敦大學，是美國第一流的大學；在美國各大學的圖書館中，普大圖書館也是第一流的圖書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是普大圖書館的一部分，它是專門收藏中、日、韓三國圖書的部門；單就收藏中國圖書的數量而論，在美國各大學中，它居於第三位。

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底止，葛思德圖書館所藏的中、日、韓文圖書，共計十九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册，其中中文圖書是十六萬八千二百六十七册。這些中文圖書，大部分是葛思德的舊藏，由普林斯敦高深研究所買去，而以一元的代價租給普林斯敦大學的（租期是九十九年）；因此，這個圖書館便以葛思德爲名。

葛思德圖書館收藏的中國醫藥書最多，在二千種以上。它所藏的中文善本圖書，超過了三萬册；在美國各圖書館所藏的中文善本書中居第一位。這些善本書中，以磧砂藏經、明北藏、和許多稀見的明刊本圖書，最爲名貴。普通本中，如清代列朝皇帝的御製詩文集，收藏的特多；原本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就有兩部。這也是其他圖書館中所少有的。

二十多年以前，葛思德的藏書雖然已歸普林斯敦大學保存；但，那時普大還沒專設研究東方學的系組，自然圖書館也還沒闢東方部門，因而這批圖書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裏，很少有人過問它們。到了一九五〇年，普大聘胡適之先生作葛思德圖書館的主任，這一個部門才正式展開工作。胡先生那時住在紐約，每星期到普大來兩天，他自然無暇整理那一大批圖書；於是便從哈佛大學把童世綱先生約來作他的助手。從這時起，葛思德藏書的整理工作以及該館如何發展的重擔，就實際上由童先生擔負起來。

兩年以後（一九五二），適之先生辭去了葛思德圖書館主任的職務，繼任人便是童世綱先生。由於他十年來的擘劃經營，而成就了葛思德圖書館今天這樣宏偉的規模。

童先生的工作是艱巨的。在胡先生作主任的時代，館裏的工作，只靠他一個人，其繁雜固不消說。就是現在，該館藏書已近乎二十萬册，每年進書量已達八千多册（期刊等在外）；而它的工作人員，連童先生在內才只有六個人，另外還有幾位來去無常的臨時人員。以這麼有限的人手，來辦理採訪、編目和閱覽等工作，其辛勞可想而知。而且，辦理中文採訪、編目等工作的，雖然都是中國人，也都是得到美國圖書館碩士學位的；但由於他們在國內大都是讀的英文科系，對於國學素無根柢，一旦從事中文舊書的編目工作，就時時會發生錯誤。於是童先生只好耐着心地修改。因而，他不但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常常在館裏工作；乃至每一星期中，他經常有四個晚上，在館裏工作到十一點。可是，從來沒聽說他報過加班費。

他本身的工作，已經忙到這樣地步；但他還於百忙中抽些時間，替在普林斯敦的中國人士服

務。週末或星期天，他總要搶點時間，駕着汽車，邀着沒有車的本國太太們，到郊外的中心市場買菜；如果有點較長的時間，他還要載着沒車的人們，到十英里之外的春屯購物。對於初到普市的本國人士，更是他服務的對象。筆者在普市一年，曾受過他數不清的幫助。因此，長住或暫住在普市的中國學人，對他都有好感。胡適之先生不必說了；像吳大猷、楊振寧、李政道、王憲鍾等，這些著名的學人，都是他的好友。大家曾給他上了一個尊號，戲稱為「普林斯敦市中國市長」。

他雖然精明幹練，但是他的身體究竟不是鐵打的，何況他已過了五十之年！長久辛勞的結果，在去年春夏之交，他病倒了。可是，病還沒有全好，他又到館裏趕工作。他的館長和普大的一些教授們，為了酬謝他的辛勞，為了給他一個休息的機會，於是籌了一筆款子，讓他帶着太太——吳元清女士（普大圖書館的資深編目員），以參觀遠東各圖書館和採購圖書的名義，到中、日、韓、和香港等地旅行。他自已雖已接受，但他堅決地替他太太辭謝了；理由是他太太並不管東方圖書，不應該只為了陪伴他旅行而消耗公家的旅費。

去年秋冬之際，他遍訪了香港、臺灣地區、日本、韓國各大圖書館，也遍訪了各大城市的書店，蒐集了很豐富的圖書館和出版界的資料。他忙着參觀調查，實際上在旅途中並沒有休息的時間；又因為他人緣好，應酬多，經常地困於酒食。等到聖誕節前兩天回到普市，又病了一些日子。

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原設在普大圖書館總館裏；由於它日益擴展，已由附庸變成大國；現已

決定擴充編制，搬到另外一幢大樓裏。此後的業務雖然日益繁多，但，由於將來的助手漸多，童先生也許可以稍稍清閒一些。筆者謹爲葛思德圖書館祝福，也爲童先生祝福。

原載「圖書館學報」，九期（民國五十七年五月），頁一——三

漢學與漢學中心

臺北地區所藏的漢學圖書和文物，
是發揚中華文化的重要資源。

一、前言

近年來，不少人喊着在臺灣地區建立一個漢學中心。這用意是很好的。但對於「建立」二字，筆者卻有不同的意見。因爲構成學術中心的條件，不外兩點：㈠是人才；㈡是資料。從這兩點看來，但就臺北地區所藏漢學圖書和文物的豐富，以及在國學方面具有高度造詣的學者之多而言，確非各國任何地區所能及。美國研究明代史的著名學者賀凱（Hucker，現任密西根大學教授，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明史兩年），於二十多年前（一九五四），在遠東季刊上，以「臺灣之漢學研究」爲題，發表了一篇論文，其中有一段說（據周法高教授漢學論集引譯）：

他們（臺灣的漢學家）是這樣多，而且他們著作的質和量是如此的豐富，雖然遭受挫折，臺灣必須被認爲或許是自由世界漢學研究最重要的中心。

二十多年來，我們培養的人才更多，我們收藏的資料更富；所以但就臺北而論，已是名符其實的漢學中心，只需要發揚，不需要「建立」了。

以下拋開漢學人才不談，只談漢學資料——圖書和文物。

二、圖書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周法高教授在耶魯大學寫過「臺灣公藏文獻資料鳥瞰」一文（收入漢學論集）；五十五年（一九六六）筆者在多倫多大學東亞學系的研討會中，也曾以「臺灣現存的珍本圖書和重要學術資料」爲題，提出報告；這篇報告稿，於民國五十六年刊登在臺大圖書館學系的圖書館學刊第一期裏。不過，那時各圖書館、博物館的藏品，還沒完全整理清楚；而且十幾年來，各館的藏品——尤其是圖書，更增加不少；因而當時所列的數字，現在看來，有很多地方，已成明日黃花。現在就最近的統計，作一概述，並略加說明如下：

在圖書方面，中研院史語所藏的二十五萬多册圖書，最爲適用。這二十五萬多册中，包括中、日、韓文書二十二萬多册，西文書二萬九千三百多册，另有微影膠捲二千三百多種，都是和經學、史學、語言文字、考古學、人類學有關的。誠然，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中文書，已超過四十萬册；哈佛大學所藏中文書，已超過三十萬册；哥倫比亞、普林斯敦、芝加哥各大學所藏

的中文書，都已超過二十萬册。就數量來說，史語所的藏書，並不算多。但，史語所所收的，以上述的幾類爲限；近代人所作關於理工農醫各科的書，固然不收；即社會科學方面的書，也只選購一部分。至於近人的文藝作品，凡和「史」無關的，也不在收購之列。所以在質的方面是很充實的。特別是罕見的明代史籍之多，地方志之富，民間俗曲之收藏（在一萬五千種以上），更是它的特色。因此，在專門從事上述經、史、語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來說；它的利用價值，實超過了上述美國各圖書館之上。

史語所圖書館，本是供該所研究人員自用的，並不是公共圖書館。但，由於它的藏書充實而適用；又由於近二十多年來，各大學多漸次設立文史研究所，加以國科會鼓勵學術研究；於是很多從事文史研究工作的人，要求來史語所閱書。史語所有求必應。二十多年來，利用這所圖書館，完成文史學科碩士或博士論文、以及教師們完成學術著作的，已不知凡幾。但就上年度來說（六十三年七月至六十四年六月），利用史語所圖書的來賓，計二六八三人次；其中屬於外國籍者（住在臺北的外籍人士）三二七人次。另有得到史語所的同意，由國外專程來臺，利用史語所藏書、從事研究工作的，自六十三年七月到六十四年十二月，共計十九人（計美國十三，韓國三，法國、澳洲、荷蘭各一），尚未列入上舉的數字之內。

故宮博物院，雖以收藏古物書畫著名；但它所藏的圖書，也很有價值，除了近年所收新出版的圖書之外，它收藏了十五萬三千多册舊版書，其中善本圖書，約佔半數。善本書中，有宋版六十二部，金版三部，元版一百一十二部。最著名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就在這裏。淸代以來，雖

然書業很盛；而四庫全書中，仍有不少的著作，沒有刻印過；因而從事專門研究的學人，有時還不能不取資於此書。此外，清代的殿版書，滿蒙文刻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也最多。另外清初所刻的龍藏，也是比較少見的全本。這些，在文史研究方面，都是重要的資料。

國立中央圖書館，自有的善本圖書達十二萬多册，其中宋刊本二〇一部，金刊本五部，元刊本二三〇部，明刊本六二一九部，稿本四八三部，批校本四四六部，抄本二五八六部；另有韓國舊刊本、舊活字本，日本舊刊本、舊活字本，都有頗多的數量。加以抗戰期間，國立北平圖書館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善本書，計二千八百多部、二萬多册，現在也全部由中央圖書館保管。合計起來，中央圖書館現存的善本書，共達十四萬册以上。數量之多，在自由世界的任何圖書館，無與倫比。所藏的宋元刻本，雖然多經影刻或影印，學術的價值已經稍遜；但「存眞」的價值，還是很高的。在學術資料方面，價值最大的，是它所藏的罕見的、大量的明人文集和雜史一類的書，以及很多沒印行過的稿本。這些圖書，有很多很多種，每一種都可用來作一篇碩士論文、乃至於博士論文。在發揚中華文化方面，是一個重要的資源。如能有精通目錄學、板本學的人，管理這十四萬多册善本，以評介或提要的方式，把特別有學術價值而又罕見的書籍，宣示給國內外的學人，不但對於漢學界人士，有很大的助益，而且也可增加中央圖書館的國際地位。

臺灣大學中文系所藏的中國文史方面的書，雖不過十多萬册；但其中有一百多種清人文集，沒被「清代文集篇目索引」收進去。臺大歷史系、和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分別收藏的南洋資料，其數量之多，也不是其他圖書館所能企及的。

以上單就圖書來說，臺北地區已足以擔當「漢學中心」之名而無愧；而臺北地區，所存圖書以外的學術資料，更有重於圖書者。茲分述如次：

三、檔案、簡牘、書畫、和金石拓片

檔案是第一手的學術資料，它可以糾正官修的、私撰的記載之誤，也可以補書本的記載之缺。所以從事史學研究的人，非常重視檔案。臺北地區所存的檔案很多，除了保存在原機關，還沒公開的之外，各學術文教機關所收藏的，大致如下：

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檔案三十一萬多件。

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道光至民國初年的外交檔案三十多萬件；又清光緒至民國三十八年的經濟檔案約六十多萬件。

㈢國史館，藏民國以來，各機關檔案六萬五千多宗。

㈣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十五萬八千多件；又軍機處檔約十八萬件。

㈤黨史編纂委員會，藏民國以來的檔案、會議紀錄等十三萬五千多件。

這些珍貴資料，雖然各機關都在整理印行；但限於人力財力，印出來的究竟有限。因而，研究明清史和現代史的外國學者，不遠千里而來，以這些資料爲研究對象的，大有人在。

在紙張還沒有發明以前，寫書或其他文件，在我國，多是用竹片或木片（有時用帛）。用於寫書的，叫做簡；用於公文的，叫做牘。但一般人也常常把「簡」字概括了「牘」。在漢代的孔

壁中所出的簡書；在晉代，汲冢中所出的簡書，都在學術上發生過重大的作用。近代簡牘的大批發現，第一次是在清光緒二十四年敦煌附近所出的一千多片，第二次是民國十九年，西北科學考查團在居延發現的一萬多片。近年淪陷區也發現了幾批。但，數量最多的是居延所出漢代的簡牘。

這批漢簡，共計一萬三千多片，絕大部分是漢昭帝到王莽時的公文，只有極少數的其他文件。抗戰期間，曾把這批簡牘，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民國五十四年，從美國運回臺北，由史語所保管。因為這批簡牘，出於西北邊疆；在漢代，西北邊疆是常遭外患的地方。所以這批資料，關於戍役、烽燧、邊疆軍民生活，乃至戶籍等的記載特多。據勞榦教授的初步研究，已經有很多補充史書之缺和糾正史書之誤的地方。

書法是我國特有的美術，受影響最大的是日本和韓國。這且不談。而我國的繪畫，則是世界人士所共同欣賞的，也是我國藝術史的重要資料。故宮博物院（包括中央博物院）所藏的書畫，達一萬五千件之多；單是宋人的畫，就有一千件。收藏之富，固非世界任何博物館所能及；學術價值之大，更是無法估計。

金石拓片，除了它的美術價值之外，它的學術價值也很高。雖然石刻方面的諛墓之文，不乏溢美之辭，但它究竟是第一手的資料。一些史籍裏錯誤的記載，可賴以糾正；一些史籍沒記載的事項，可賴以補充。所以自宋以來，著錄金石的書、考證金石的著作都很多。中研院史語所所藏的金石拓片，計二萬五千多份，三三八八九幅。除了不少的彝器全形和銘文拓片之外，最多的是

石刻拓本。石拓刻本，最多的是墓碑、墓誌；此外如祭神、修橋、修路、修河、修廟等類的記載，也相當多。大多數是書本中不易找到的資料。另有陳介祺家舊拓的陶文墨本一百多册，以及各家所藏陶文墨本，合計約有萬幅左右，堪稱洋洋大觀。

國立中央圖書館，也藏有金石拓片五千多份，多是舊搨。其中有彝器全形拓片六百九十九幅，是研究古銅器花紋的絕好資料。

四、甲骨文及人頭骨骼

甲骨文的發現，到現在已七十五年。七十多年來研究的結果，不但糾正了先儒注解經書的很多錯誤，不但匡正了以小篆推究字源的很多臆說，並且使殷代的史事，燦然大備。史記殷本紀，敍述殷代的全部史事，只用了二千九百六十五個字（據商務印書館影印宋黃善夫刋本）；而出土的有字甲骨，估計約在十二萬片內外。其資料的豐富，可以想見。倘若孔子生在現代，也不會再興「文獻不足」之歎了。

這十二萬片左右的有字甲骨，流散在日本的約一萬五千多片，在加拿大的約七千五百片，在歐洲的約二千六百片，在美國的約一千八百片；加上香港、南洋以及其他地區的收藏，姑以三千片計，合計共約三萬片。史語所在安陽發掘所得的約二萬五千片，又收購了六百片；國立歷史博物館收藏了三千多片，國立中央圖書館有七百片；加上臺大和私人的零星收藏，總計在臺北的，共約三萬片以上。其餘都淪陷在大陸。淪陷於大陸的約近六萬片（包括近年新出土的），在數字

上看來似乎較多；但實際上它們的學術價值較低。因爲它們的絕大多數，是像指甲大小、僅有三數個字的碎片；這些碎片上的文字，又多是常見而無特殊意義的。例如劉體智收藏了甲骨二萬八千片，郭某選拓爲殷契粹編，只收了一五九五片，其細碎的情形可見。史語所所藏的二萬五千多片，則大片的特多；出土時就完整，以及經過拼綴後成爲整個的和半個的龜甲、牛甲（龜甲佔絕大多數），多達四百版左右。每一版可敵小片的甲骨數片乃至數十片。如此說來，甲骨文的重鎭，自然非臺北莫屬。

也許有人說：甲骨文既有拓片，又印成書，這些實物，就沒有多大的價值了。其實不然。因爲有些資料，如兆紋、鑽鑿形態，書而未刻、塗墨、塗朱等情形，有的非拓片能夠表現得出來，有的因沒有文字而不予傳拓；如果擴充研究的範圍，就非靠實物不可，何況甲骨上面，有時會附著很有價值的研究資料。例如史語所所發掘的甲骨，有些碎片上，附有紡織品，經送請調查局以二萬五千倍的放大鏡鑑定之後，證明它們是棉織品。這是一件驚人的發現，專研甲骨文的張秉權教授，正在謹愼地研究這一問題。

在殷代還有用人作犧牲來祭祀祖先的習俗，這是吳其昌教授根據甲骨文資料首先證明的。這種祭祀，叫做「伐」祭。伐祭是把人頭砍下，用來祭祖；被伐的多半是敵人或俘虜。史語所發掘殷虛時，在西北崗三座殷王大墓旁邊的九十多個小墓裏，發現了四百多個人頭骨（其中六十個屬於女性），現在都保存在南港。它們只有頭骨，並無其他部分的骨骼；顯然是伐祭的遺蹟。這不僅替吳氏之說增加了強有力的證據，也不僅可以補古史記載之闕；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意義。

在一個地區，出現了三千多年以前的人頭骨骼，數量達四百餘具之多，而且絕大多數都很完整；這是世界體質人類學家所驚嘆、豔羨的一批寶貴資料。據初步研究，其中絕大部分是類蒙古人種，一小部分是類黑人種，極小部分（只有幾個）是類高加索人種。由於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故上述情形，還不是最後的定論。但無論如何，這批資料，對於研討殷代的人種問題，以及那時的中外交通問題，必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五、古銅器及其他器物

在清末以前，一般人都把古器物視爲古董，作爲淸供、玩賞之用。用鐘鼎彝器的銘文考史，和用爲文字學的資料，雖然從漢代就有人做過；但究竟是極少數的人從事於此。把古彝器作爲學術資料，用以證經，用以考史，用以推究文字的演變，而蔚成風氣，實盛於清代晚年。近半世紀以來，更從彝器的形制、花紋等方面，研討它們的源流，推證它們是否受外國文化的影響。近年故宮博物院、和史語所的考古組，更試圖利用這些資料，以探測我國古代的鑄銅技術。這些研究，對於稽考我國古代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這是關於古銅器的學術價値。其他的古物，如玉器、瓷器、骨器、琺瑯、漆器等，這些工藝品，都是研究美術史的第一手資料；從這些資料中，不但可以顯示我國古代在工藝方面的高度成就，也可以窺見我國古代的文化水準。

古銅器方面，臺北地區收藏的最爲豐富。史語所在安陽發掘所得的殷代銅器（包括彝器、兵器、車飾、銅盔……等；下同），計八千四百多件；在濬縣發掘所得的西周銅器，以及在輝縣和

汲縣發掘所得的戰國銅器，共五千多件；加上山東和甘肅出土的銅器三百餘件，以及捐贈和購買的銅器三百六十餘件；總計共達一萬四千餘件之多。這些古銅器物，百分之九十五是用科學方法發掘所得的，種類既多，產生的時代，又可以確知；其資料之可貴，自不待言。故宮博物院（包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收藏了銅器四千餘件，大都是清宮的舊藏，全是鐘鼎彝器，也是馳名世界的一批寶藏。鄭縣出土的一批春秋時代的銅器，現藏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自然也是重要的學術資料。

古銅器以外的古物，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最多也最精。據最近的統計（包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其重要物品的數量如下（所列數字，只取整數，零數未計。）

玉器：四七〇〇件。
瓷器：二三八〇〇件。
琺瑯：一八〇〇件。
漆器：四五〇件。

史語所所藏，則都是發掘所得的物品；它們的品類和數量大致是這樣：

石、玉類：一三六〇〇件。
陶、瓷類：七七〇件。
骨、牙、角類：四〇五〇〇件。
蚌類：四七〇〇件。

此外，如中研院民族所、臺大考古學系，和臺北博物館所藏的臺灣山胞文物，歷史博物館所藏的歷代錢幣，也都是重要的學術資料。這裏不再一一詳述。

六、餘說

以上所述的學術資料，幾乎全是從大陸撤運來臺的。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感念故總統蔣公，由於他的高瞻遠矚，由於他的大力率導，才能把這些關係我民族命脈的文化遺產，運來臺灣，而成爲復興中華文化的重要資源。由於有了這些寶貴的文化資源，在近乎三十年的時光中，使很多文史界著名的學者，著作更爲豐富；也培育了不計其數的、將來必有高度造詣的青年學人；並且吸引了眾多的外國漢學家、到我們這裏來從事研究工作；更吸引了大量的外國青年，到我國各大學修習中國文史學科的學位，或隨班聽講。對於我國文化的發揚，其價值是難以衡量的。

前年夏天，當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之後，中研院的史語所和近代史所，曾合辦了一次歷史研討會。在會中，嚴耕望院士曾以「如何加強研究機關、大學、公共圖書館設備使臺北地區成爲國外文史學者所嚮往的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爲題，發表了一篇精采的演說。但由於時間的限制，對於學術資料方面，無法作詳細的敍述。現在抽暇草述此文，來替嚴先生的講演作一個注腳。據說，教育部準備建一座十一層大廈，作爲外籍學生，及在臺從事研究工作的外國學者住宿之用。這是一個重要的計畫，將來大厦落成，不但符合了嚴院士的部分希望，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播，必

有更大的助益。

六十五年二月廿五日寫訖

原載「聯合報」，十二版（副刊），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四日

關於漢學中心的兩個問題

兩月前筆者草成一文，專談臺北地區所藏關於漢學的圖書及文物資料，原題爲「發揚中華文化的重要資源」，副標題爲「臺北地區所藏的圖書及文物資料」，投諸聯合報副刋。編輯先生因拙文涉及漢學中心問題，希望標題更顯豁些，建議改以「漢學與漢學中心」爲題，經筆者同意，於三月四日刋出。接着讀了方豪、蔣復璁、昌彼得、張以仁、周道濟諸先生以中華文化研究中心爲重點的大文。最近，中華日報副刋，又刋出黃得時教授論漢學中心的鴻文。諸先生的議論，都有獨得之見。但就目前我國的人力物力而言，有些措施，短期內可能不易實現。筆者也有兩點淺見，橫於胸中；只因冗務蝟集，無暇執筆。今天偸得半日閒，閉戶草述此文，以就教於關心此一問題的人士。

一、亟待補充的漢學圖書

臺北地區所藏關於漢學的圖書和文物之豐富，已如筆者前文所述。但那些多是原始資料。關

於研究的成果，我們比較缺乏的，是日本和歐美學人關於漢學的著作。一般說來，外國研究漢學的學者，其涉獵的淵博，造詣的深邃，多半不如本國的學人。但，他們究竟是站在廬山的外面，可以見到我們所忽略的問題。而且，他們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新方法、新趨勢，也都值得我們借鏡。

關於日人的漢學著作，在抗戰以前和抗戰期間出版的，以臺灣大學和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收藏的爲最多。勝利以後到現在出版的，各學術機關、各大學、各圖書館，收藏的都很少。似乎應由臺灣大學和中圖臺灣分館，先編一本「日本漢學論著聯合目錄」，由國科會資助編譯館聘請專家們主辦。有了這個目錄之後，再看我們到底缺乏了那些重要的日本漢學著作，然後由學校或學術機關或圖書館，有計劃地分別採購。將來，對於我們的研究工作，必有很大的助益。

研究漢學的歐美學者，固然有很多誤解中國古書，乃至於可笑的論說；例如歐洲的漢學泰斗高本漢，他解釋詩經天保的「俾爾戩穀」，爲「天使你收割穀子」；把伯兮的「誰適爲容」，解釋爲「我把誰當夫主而爲他裝飾我自己」（據董同龢譯本）。使人傳爲笑談。但我們總不可因噎廢食。因爲歐美學者的論著，確也有些我們沒見到沒說到的地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西文漢學書較多，但還不够充實。據筆者所知，美國康乃爾大學收藏的這類圖書最多，史語所曾和該校圖書館接洽，希望把史語所所缺的書，都攝一部微影膠捲；只因該館沒有書本目錄，無法選書，所以至今還沒達到願望。但，近年出版而可以買到的與漢學有關的西文書刊，總應該寬籌經費，盡量收買。這一工作，似乎由中央圖書館辦理，最爲適當。

淪陷後的大陸，所出的書刊，也應該盡量收集。文化作戰和兵家作戰有相通的地方，就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舉例來說，我們如果不能見到匪區批孔揚秦的文章，我們就無法踏實地去批駁他們的謬論。我們如果見不到他們對於建國和抗戰的歪曲記載，我們就無法針對他們的謊言加以駁正。單就學術資料來說，我們如果見不到二十多年來匪區出版的新出土古器物的影片和報告，我們做的研究工作，就可能因缺乏資料而得不到正確的結論，不但貽誤後學，而且會使外國學者看不起我們的學術水準。因此，筆者建議，應由有關機關派員，組織一個委員會；由政府指撥專款，盡量購買匪區出版的圖書。書到後，交這個委員會審查。屬於學術性的書，交給指定的圖書館，專闢特藏室慎藏。凡是從事研究工作的人，經過嚴格的手續後，可以閱覽。屬於宣傳性的書，交給調查局或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以供應用。警備司令部歷年沒收的書，似乎也可以交給這個委員會，作同樣的處理。

此外，關於敦煌卷子的問題。流散在國外的敦煌卷子，重要的有三批：㈠英國倫敦博物院所藏，約八千多卷；㈡法國巴黎圖書館所藏，約三千多卷；㈢蘇俄亞洲人民研究所所藏，約一萬多卷。蘇俄所藏的，自然無法弄到複印本；英倫所藏的，中研院史語所已有全部的影片；巴黎所藏的，至今還不肯讓人全部攝製微影膠捲，眞是一大憾事。但，總應多方設法，希望能得到全部的複印本。

二、成立外籍學人服務中心

去年國建會開會時，一些由海外回國的學人，建議在臺北設立漢學研究中心；這意見頗爲當局所重視。但，細看他們所謂漢學研究中心，實係以教初級中國語文爲主的中心。也就是說，它是中國語文研習中心，而不是漢學研究中心。關於中國語文研習，自然可以設「中心」，乃至不必限於一個中心（事實上臺北已不止一個中心）。至於漢學研究，則不必以研究中心爲名，而專設一個機構。因爲來華從事研究工作的外籍學人，他們研究的主題，各不相同，所要利用的資料也就各異；而各機關所藏的學術資料，又各有其特長，絕不可能合在一處。而且，外國學者希望常常商談的中國學人，又散處在各校或各機關，勢不能集攏在一起。因此，絕不可能，也不必要專設一個叫做「漢學研究中心」的機構。

但，外國來華學習中國學問的學生，和從事研究中國文化的學人，希望來臺的日益增多。美國籍的學生和學者，大多數（並非全部）都得到補助費，在此食宿自然沒有問題。澳洲的、日本籍的，問題也不太嚴重。歐洲的、韓國的、東南亞的，就有很多人想來華讀書或從事研究工作，但因爲無法拿到補助費，或因補助費太少，而被摒於國門之外。

爲了解決上述的問題，教育部打算爲外籍學人建築的一幢十一層大樓，是一項非常應急的重要措施。這幢大樓，似可定名爲「外籍學人服務中心」。這幢大樓如何使用，想教部已有周密的計劃。然而愚者千慮，或有一得。筆者本著野人獻曝的愚誠，在這裏提供一些淺見：

㈠這幢樓房，以爲外籍學人服務爲目的。似應以大部分房間，作爲外籍學人住宿之用，應備單身房間和眷屬房間；並應有餐廳和公共休息室。對於住宿的人，可酌收維護費、水電費和服務

費，但不以贏利為目的。

(二)似應有一規模較大之講演廳，以供各種學術講演、國內學術性會議和國際學術性會議之用。

(三)應設一小型圖書室，除報章及重要期刊，以及行政院新聞局和省政府新聞處所出的書刊外，應備有常用的工具書（字典、辭典等），常用的參考書（如十三經注疏、廿四史、四部備要或四部叢刋之類）、常用的圖書目錄和索引等。

(四)應有服務臺，除辦理住宿飲食等業務外，並辦理與各學術機關、各大學、各圖書館、各博物館等的連絡事項。必要時，亦可代外籍學人蒐集學術資料，和介紹與外籍學人互相切磋的本國學人等。

(五)設一個或數個中國語文研習班，選擇國語標準、教學認眞的教師，教中國話、白話文和淺近的文言文。如有願意專請一位教師單獨教學的，服務臺也可以替他們介紹適當的人選。

以上兩節所談，眞是卑之無甚高論。但，這些鄙見，如果還有一二點可取的話，卻都是目前可以做到的。希望關心發揚本國文化的人士，多多考慮這一類的問題。

又：筆者對於「漢學」二字，雖不像方杰人先生那樣的深惡痛絕；但也覺得「漢學研究中心」這一名稱，遠不如「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為佳。只是大家都用慣了「漢學」字樣，所以本文仍循俗以「漢學中心」為題。

原載「中華日報」，十一版（副刊），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十九日

明釋藏雕印考

釋藏版本究之者蓋寡，有之：則羅振玉宋元釋藏刋本考，呂澂佛典泛論，與日人常磐大定之大藏經雕印考是已。大藏經雕印考一文，載於一九一四年哲學雜誌，迄未獲一讀，不知內容如何。羅氏僅著宋元，呂氏及於明矣，惜又略而未詳，頗以爲憾。年來執役山東省立圖書館，爲整理釋藏，於明藏傳本略窺涯涘。館藏明南藏凡四部，全者一焉。其餘若北藏，若萬曆方册藏，若大小五大部經，若其他單行本，雖非全帙，亦足以管測一斑。爰就所見，草爲斯篇。紕繆疏漏自不能免，海內閎雅幸辱敎焉，則企予望之矣。

明釋藏凡四刋：曰南藏、曰北藏、曰嘉靖方册藏、曰萬曆方册藏。前二者刻於朝廷，後二者刻諸民間。

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緣起云：「至明僅有南北二藏，南藏者太祖所刋，在於南京官庫。北藏者太宗所刻，藏於北京城中，是以得之亦不易也。浙之武林更刻方册大藏，無幾而其版亦湮滅。萬曆年間有密藏禪師者，發願刻方册大藏」。按此，是明藏凡四刻。惟雍正十三年御製重刻藏經序云：「明永樂間刋板京師，是爲梵本北藏。又有民間私刋書本，板在浙

江嘉興府，謂之南藏」，則是未知南京之梵夾本，而以萬曆方册藏當南藏，誤也，其說詳後。

南藏者成於太祖年間，蓋因宋元間磧砂舊板，而補修之。

佛典泛論云：「明太祖頗信佛教，洪武五年集大德於蔣山，點校藏經，刻南藏板」。案南藏卽因磧砂舊板而補修之，非太祖所刻。其理由有四：一、刻藏事體綦大，太祖世戎馬甫定，若非因仍舊板，新刻似未暇及。二、磧砂板刋於宋末而成於元，其時旣去明未遠，而刋地在揚子江口平江磧砂延聖寺，距南京尤近。三、凡數經同卷者，其分合多與磧砂本同，而與他本迥異。四、南藏傳法正宗記卷一題云：「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局，今依福州開元禪寺校定元本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重新刋版流通。……延祐二年歲在乙卯五月日，住持傳法比清表題」，爲原刋題識。有上四證，則其爲磧砂舊版，似無疑義。又中峯和尙廣錄有洪武二十年重刋序，禪宗頌古聯珠通集有洪武二十五年重刋序，佛說一切如來眞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敎王經卷二末有成化十五年淳貴等補刋題記。爾後補刻尤多，以經文字體驗之自明。足證其爲因仍舊版代有補刻，彼佛典泛論述南藏謂「其時各舊本，以兵亂散亡，所校多出杜撰，時有脫誤」。蓋意度之言，未足爲典要也。

磧砂版者刋始於宋理宗嘉熙二年，成於元武宗至大年間，其源出自福州開元寺本。然自北宋福州東禪寺本以降，下逮福州開元寺本、思溪本、磧砂本、杭州本，行款字體儼如一版。然則南藏者實磧砂舊版，而上紹北宋福州東禪寺本者也。藏爲梵夾本，每版三十行，每半葉六行，行十七

字，字爲率更體。

佛典泛論謂版式六行十七字，自思溪本始。案福州東禪寺本卽已如此。不得謂自思溪始也。又謂南藏五行十七字，亦誤。且諸本字用率更體。亦自東禪寺本始，其後開元寺、思溪、杭州、與南藏本（卽磧砂本），追摹規仿，神采酷似。蓋自宋中葉後，刻書風氣，率更字體最爲時尚。而南藏之刋非由洪武創始，於字體上辨之，亦一有力之證也。

全藏都一千六百十種，六千三百三十一卷，函號起天字終石字。板藏南京報恩寺。

此依南藏目錄，凡一經數譯者亦作一種計。又所謂卷數，實册數也。金陵梵刹志卷四十九載請經條例云：「看得報恩寺藏經版一副，原係聖祖頒賜，令廣印行。」案卽南藏版。

北藏刋始於成祖永樂十八年，成於英宗正統五年。都一千六百十五種，六千三百六十一卷。

正統五年御製大藏經序云：「惟我皇曾祖太宗，體天弘道，……至孝文皇帝(案卽成祖)，德全仁聖，……於是博采竺乾之秘典，海藏之眞詮。浩浩乎，穰穰乎，繕書刋梓，用廣傳施。功垂就緒，龍御陟遐。洪慶所貽，傳序暨朕，恭嗣大寶，統理萬邦。追維聖孝之隆，敢忘繼述之務。大藏諸經，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咸畢刋印。」又萬曆御製聖母印施佛藏經序云：「惟茲藏經，繕始於永樂庚子（按卽十八年）。梓成於正統庚申。」（按卽五年）卽北藏也。

亦梵夾本，每版二十五行，每半葉五行，行十七字，字用趙子昂體。函號亦起天字終石字。明世版藏內庫，其後未詳。

明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祕書典籍……。」案其目中所列，有北藏版。又今北平柏林寺所藏，則淸刻龍藏，非北藏也。

至萬曆十二年，復續刻四百十卷。以傳播未廣，故版式如何，不能臆斷。

萬曆十二年御製續入藏經序云：「續入藏經四十一函，超華嚴懸談會玄起，至第一希有大功德經，計四百一十卷，此我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所命刻也。」

今所習見者，則爲萬曆三十四年後南京刻本。其字體除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仍用子昂體外餘悉宋體。版式仍南藏，函號起鉅字終史字。

金陵梵刹志載萬曆三十四年所訂請經條例云：「經版少續藏四十一函，每版壹塊。該銀三錢六分……板用梨木打光，捌分厚，價銀四分。每板二面共陸拾行，計壹千零貳拾字，刻用宋字樣。」案山東省立圖書館藏續藏本眞心直說卷末跋云：「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信士王應遴喜刻此經，補入報恩寺大藏，永遠流通。願借己壽一紀以延母任氏壽一紀，仍同往生極樂者。萬曆己酉（案即三十七年）中元吉上元陳士賢寫，奚子皐、萬應麒刻。」行款字體悉如請經條例所定，卽南京所刻續藏本也。

此南北兩藏刊板之大略情形也。至於印施，則北藏不如南藏之廣。北藏除正統十年及萬曆二十七年頒發二次外，罕聞印施。南藏則不惟江南印施者多，乃至播及北數省。且著爲請經條例，便請印焉。

長淸縣靈巖禪寺靈巖志載明英宗正統十年勅云：「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

志，刋布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山東濟南府長清縣靈巖禪寺，永充供養。」又同上萬曆二十七年勅曰：「佛氏藏經舊刋六百三十七函，我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續刋四十一函，……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案此皆北藏。

威音雜志第三十七期，載北平廣濟寺被災新聞云：「北平廣濟寺（西四牌樓）所藏藏經五千零四十八部，係順治壬申年由南京運來。」又河北冀縣某寺藏藏經六百餘函，該寺有碑記云：「自南京運來。」案二者皆南藏也。又本館所藏之南藏四部，其原藏處：一爲泰安雷姑菴，一爲霑化縣超化寺，一爲德縣崇佛禪林，一爲掖縣朝陽禪寺。皆隆慶及萬曆間自南京請印者，足證其印施之多，傳布之廣矣。

請經條例，見金陵梵刹志。

嘉靖方册藏刋於嘉靖間，板原存武林昭慶寺，以刻工不良，印行六十餘年，卽成廢本。

見佛典泛論。又日本緣山三大藏經緣起云：「爰有尼法珍者，欲摹刻方册藏本，簡便弘通，……三十年而始就其功，是方册創制也。星霜遷延，此版亦亡矣。」

釋藏至此，始改爲方册本。其版式及卷數函號，皆不能詳矣。

萬曆方册藏者繼武林藏而起，刻始於萬曆十七年，歷數十年始就。總事者爲密藏、幻余二禪師，贊之者有憨山、紫柏諸大師，及袁了凡、馮夢禎諸居士。

日本校訂縮刻大藏經緣起云：「萬曆年間有密藏禪師者，發願刻方册大藏，普募緇素，無

不響應。紫柏、憨山等碩德爲之羽翼，陸光祖、馮開之等諸宰官爲之贊成。其募緣疏成在萬曆十四年，而創刻於五臺在十七年矣。無何，藏師匿迹而去，代之總事者爲余幼（按係幻余二字之訛倒）禪師，師亦尋遷化，始與藏師與事者四十人，至萬曆二十九年其人存歿半，而刻未半云。蓋全藏終工不知在何歲也」。

刻經處曰楞嚴寺，曰徑山寂照菴，曰徑山興聖萬壽禪寺。

楞嚴寺題記見大唐西域記，寂照菴題記見高僧傳，興聖萬壽禪寺題記見妙法蓮華經。

版式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字用宋體。白口雙邊，版心中鐫書名，上鐫部類名，書名下記頁數，再下記號字。

案是藏各書志皆稱爲支那本，其實誤也。各目所著爲支那本者，皆此土著述部之書。此土著述，是藏名曰支那撰述，此四字部名鐫版心書名上，雙行書之。摺疊後則前面分支那二字，後面分著述二字，且有墨線圍之。著錄者見支那二字而未細審，遂誤用爲版本名耳。

全藏都六千九百五十六卷，一千六百五十四種。函號起天字終魚字。後此復有續刻，初續九十函，次續四十三函，都五百三種。版式如舊，惟不著函號，至何時何人續刻，已不能詳，此民間兩藏刋印之大略也。其印施情形，則嘉靖本向未見諸著錄，萬曆本則印施較多，傳播甚廣。

萬曆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五種，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八種，其他各書目亦間有著錄，咸以支那本稱之。

明刋諸藏，大致如斯，其他零星刋本，俟他日更詳焉。

原載「國學彙編」，第二册（山東，齊魯大學文學院國學研究所，民國二十三年），頁三二——三六

產語的著者問題

日本流傳着「產語」一書，是用中文寫的；文章的風格，乍看起來，很像戰國諸子。書末有太宰純的跋語，說這書是他從浪華市買得；並且說據傳這書舊藏於寧樂佛寺；他爲之「手校繕寫，藏之巾笥」。於是他說：

夫古書之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頗多，如古文尚書、孝經，其昭昭者已。誰知此書非管晏李白之徒所著，亦逸于中夏而存于我日本者乎？

卷前又有太宰純的弟子宮田明在寬延二年（西元一七四九）所作的序文，一開頭就說：

王弇州嘗作左逸、短長也，而曰獲之嶧陽與齊之野；豈以其修辭立說，擬議成章，錯諸戰國秦漢之間，不可間疑乎？亦唯自信之篤如是夫？春臺先生著產語十二篇，蓋亦弇州之爲哉。

序文後段又說：

（春臺先生）嘗著經濟錄，頗備一代之治，其書祕而藏之。乃如此書，亦其緒餘。……而

託諸古之人，亦唯自信之篤，必以其擬議成章，錯諸戰國秦漢之間不可間疑也。

是宮田明已明說此書是他老師的託古之作。前澤月淵所著的太宰春臺傳，也說太宰純的老師荻生徂徠，讀了產語幾篇之後，就斷定它是太宰純的作品。因此，日本的一般學者，都確信它是太宰純的託古之作。各公私家的藏書目錄，關於此書的著者，所題署的也都是太宰純。

近年來日本神谷正男博士，對此書用過很多的功夫。他認爲這是佚於中而存於日本的一部古書；它的著成時代，當在戰國到秦之間，他以爲它可能是漢書藝文志農家類的野老書。去年夏天，神谷博士來臺灣文化學院講學，曾贈我他所校注的產語全卷和他所編的「產語及其批評」一書，囑我表示一點意見。我那時正在中央圖書館服務，簿書鞅掌，人事紛繁，簡直沒有閱讀和構思的時間。今年三月初，雖然辭掉了中央圖書館的職務，但以所積的文債既多，而學生的課務又紛至沓來。直到現在，纔算鬆了一點。爲了報答神谷先生虛懷若谷的雅意，謹表示我個人的一些意見，來請神谷先生指教。

一、產語不是秦以前的書

產語所引的書，有不少是漢代人作的，這點，王叔岷和黃得時兩位先生已舉出不少的例證。現在就王黃兩先生所舉的，擇取三事如下：

(一)四民篇第九「齊景公好戲」章的末節，所說「其後景公與魯君會於夾谷，齊令俳優侏儒戲於前。仲尼相魯君，於是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論右司

馬速加刑焉。』乃斬侏儒，首足異處。」王黃兩先生認爲這段話是本於史記孔子世家，那是完全正確的。

㈡琴乙篇第四：「夫有土之君，世卿之家，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這幾句話，王黃兩先生認爲是出於史記貨殖傳，也絕無可疑。

㈢文侯問篇所載李悝對魏文侯問治生的話，從「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四句起，到「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止，近乎二百字，全是抄自漢書食貨志上鼂錯說文帝的話，僅有很少的幾處略改漢書的文字。以下也有不少地方，是引用食貨志所載鼂氏的話語。食貨志雖然引述李悝的話；但鼂錯這些話，則決不是出於李悝。因爲鼂錯既沒說這是李悝之言（下文引神農之教，曾經言明。）；而下文又有「入粟縣官，得以拜爵」的話（產語沒引述），這決不會是戰國時人的口氣。

由以上的三個證據看來，產語決不是戰國或秦代的產物。產語中時常假借古書中所載的人名，而自己另編造一些故事；或自己編造一些話語，而假借那些古人的嘴說出來。甚至一些古人名字，也是由產語的著者編造的。這些莫須有的故事和話語以及人名，本來是杜撰的，自然就無法找到它們的出處了。

二、產語不是東晉以前的書

王、黃兩先生，認爲「是書出於東晉前後之可能性極大」，但，據我看來，它也不會是那時

代的產物。我的理由是：

有人篇載文摯說衞君的話「峻宇雕牆，姬妾數百」二語。按：「峻宇雕牆」一語，出於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篇。僞古文尚書是東晉時梅賾奏上的。

四民篇載晏嬰諫齊景公的話，多是產語的著者所編造的，其中有「冠履倒置」一語。按：這個成語，最早的出處是見於後漢書的楊賜傳（作「冠履倒易」）。後漢書是劉宋時范曄作的。

冷無疆篇載陳軫說楚頃襄王，有「大王少嗜文學，長惇詩書，又好辭賦」等語。按辭賦二字連用，始見於文心雕龍；文心雕龍，是梁代劉勰作的。

從上面的幾個證據看來，產語著成時代，不但不會早到東晉以前，也不會早到梁代以前。

三、產語也不是明代以前的書

梁子美先生認爲產語中有些故事是從明清人的著作中採來的，他從樂施篇講「竹節木節」的一段話，推證產語的作者應該讀過劉基的尙節亭記；他認爲皐賓換瘤子的故事，是出於明清的笑話書。尤其重要的，是皐賓篇所載「梁人有畜貓者」故事，是出於明朝劉元卿所作應諧錄中的「貓號」篇（以上並見產語及其批評六十三至六十四頁）。這可說是鐵案如山的證據，足以證明產語的著成時代，不會早到明朝以前。

但神谷正男先生卻認爲產語中還有許多故事，其來源不詳；不能單取一畜貓故事，來解決斷代問題（見產語及其批評）。

按：產語中許多來源不詳的故事，都是產語的作者所編造的；這從上文所舉文摯說衞君，而用「峻宇雕牆」的成語；和陳軫說楚頃王，而用「辭賦」的語彙，即可窺見其漏洞的一斑。而且，有土篇所載李悝說魏文侯的話，有「雖非麻油，則然魚膏」二語。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以人魚膏爲燭。」這是「魚膏」一辭見於記載之始。而「麻油」這個名詞，則始見於三國志魏志滿寵傳。由「雖非麻油，則然魚膏」二語看來，顯然是說麻油貴於魚膏。戰國初葉有沒有麻油，固是問題；即使已有，在魏國的地帶（水澤旣少，又離海遠。）魚膏也一定貴於麻油。因此，麻油貴於魚膏之說，必定產生在長江一帶或臨海地區。產語用這兩句話，我認爲十之八九是受了徐鉉稽神錄的影響。稽神錄有一故事說：

> 廬山下賣油者，……爲暴雷震死。……其母一夕夢緋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魚膏雜油中。……」

這是油和魚膏並舉的出處，也是油比魚膏貴的出處。產語的作者，是一位學識淵博之士，我相信他一定讀過稽神錄，而且這兩句話是受稽神錄的影響。

由上述的證據看來，產語旣不出於先秦，也不出於東晉以前；已足以證明它那古色古香的外衣（文辭），全是僞裝。而它又有受稽神錄和尙節亭記之影響的可能。然則它襲用劉元卿的應諧錄，又有什麼可異呢？

四、產語的作者是太宰純

梁子美先生舉出：一、「甚口便捷」，二「敢問治生何道之以」，三、「發政以制之」，四、「何不似有國者甚也」等語，認爲「一看就知道是日本漢文」，神谷先生雖然也有所辯解；但，在中國人看來，二、四那兩句話，確乎不是漢文的句法。此外如鳥獸篇「曾何鳥獸之若哉」（二葉五行），四民篇「竊爲大王殆之」（三十三葉六行），也都和中國文的句法不合。

產語的著成時代，既不會在明代以前；產語的文辭，又有一些「和臭」。太宰純的老師和學生，又都明說它是太宰純的託古之作。那麼，這書是太宰純作的，應該不會再有什麼疑問了。

原載「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二卷一期（民國五十七年七月），頁六——八

元祐六年宋朝向高麗求佚書的問題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予應韓國檀國大學校東洋學研究所之邀，參加第四回東洋學學術會議，以本題提出討論。關於本文要點之訪求書目部分，係據增補文獻備考，誤字頗多。承李丙燾教授惠告：增補文獻備考所載此事，實據高麗史，而高麗史誤字較少。茲覓得影印舊本高麗史，校正誤字數處。又因原稿以六千字爲限，故尙有些許餘意，當時未及寫入；茲復略加訂補。開會期間及會前會後，承校長張忠植先生、東洋學研究所所長李熙昇先生，及所中李徽教、李章佑、孔在錫、辛勝夏諸先生，熱誠招待，至感雅誼。孔先生承李所長之命，導予至慶州遊覽；辛先生既將拙稿譯爲韓文，討論時復爲予傳譯。良友厚惠，尤不能忘。謹於此附志感謝之忱。

一、前言

中韓兩國的文化交流最早。韓國朴容大等所著的增補文獻備考（隆熙二年，卽淸光緒三十四年出版），在藝文考裏，引述了涵虛子一段話，說：

> 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皆往從焉。

這是傳說之辭，於古無徵，恐怕不能盡信。但據增補文獻備考所載，從新羅眞興王二十六年（陳文帝天嘉六年，西元五六五年）陳遣劉思與僧明觀聘新羅，送釋氏經論一千七百卷起，以後韓國屢次來中國訪求圖書，而以高麗忠肅王元年（元仁宗延祐元年，西元一三一四年），遣博士柳衍，購得經籍一萬零八百卷，在數量方面是最多的一次。由於中韓兩國文化交流最早而又頻繁，所以從宋代以來，就有人認爲許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的古書，在韓國還保存着。宋張端義貴耳集說：

> 宣和間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先秦以後，晉唐隋梁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幾千集。

朱子語類也說：

> 嘗見韓無咎說：高麗入貢時，神宗諭進先秦古書。及進來，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喜，即欲頒行天下。王介甫恐壞他新經，遂奏云：「眞僞未可知，萬一刊行後，爲他所欺，豈不傳笑夷夏。」神宗遂止，本亦不傳。以某觀之，未必有是事。蓋招來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甚剛明，設使所進果有契於上心，亦豈介甫所能止也？

朱子說招來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這話雖有問題（詳後）；但從這兩條記載看來，在宋人心目中，認爲高麗時代韓國所存的古書，必定有很多異本而爲中國已經失傳。事實上高麗確曾有獻給宋朝的圖書，見於宋史高麗傳的，哲宗時高麗曾遣使臣黃宗愨來獻黃帝鍼經（此事亦見增補文

獻備考卷一百七十二交聘考；但懿字作懿，恐誤。）；見於邵博聞見後錄的，有高麗令醫官某進獻的東觀漢紀（也在哲宗時）；見於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的，有高麗所進的說苑；見於玉海（卷五、天文）的，有元祐八年高麗所進的京氏周易占十卷。從這些情形看來，高麗收藏的中國古書，確有不少異本。由此可知，諸書所載元祐六年宋朝向高麗訪求佚書的事，可能是確有根據，而不是傳聞失實之說。

二、元祐六年宋朝向高麗訪求佚書的目錄

高麗史、東國通鑑、增補文獻備考，及朝鮮史（日本朝鮮總督府所編）等書，都載有宋帝向高麗求書的事。記載此事的，以高麗史爲最早。高麗史宣宗八年（宋哲宗元祐六年，西元一〇九一）六月丙午記述此事說：

李資義等還自宋，奏云：「帝聞我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乃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付來。」

下文卽列舉了所訪求的一百二十八種書名。這些書是：

百篇尙書　荀爽周易十卷　京房易十卷
鄭康成周易九卷　陸績注周易十四卷　虞翻注周易九卷
東觀漢紀一百二十七卷　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韓詩二十二卷
葉遵毛詩二十卷　呂悅字林七卷　古玉篇三十卷

括地志五百卷　輿地志三十卷　說苑二十卷
新序三卷　劉歆七略七卷　劉向七錄二十卷
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王方慶園亭草木疏二十七卷　元白唱和詩一卷
張仲景方十五卷　黃帝鍼經九卷　深師方
小品方十二卷　九墟經九卷　尸子二十卷
陶隱居效驗方六卷　公孫羅文選　淮南子二十一卷
羊祜老子二卷　水經四十卷　鍾會老子二卷
羅什老子二卷　孫盛晉陽秋三十三卷　阮孝緒七錄
于寶晉記二十二卷　孫盛魏氏春秋二十卷　魏澹後魏書一百卷
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　劉璠梁典三十卷　魚豢魏略
元行冲魏典六十卷　吳均齊春秋三十卷　揚雄集五卷
沈孫齊記二十卷　崔駰集十卷　班固集十四卷
謝靈運集二十卷　汲冢紀年十四卷　三教珠英一千卷
顏延年集四十一卷　類文三百七十卷　孔逭文苑一百卷
仲長統昌言　文館詞林一千卷　諸葛亮集二十四卷
杜恕體論　周處風土紀一卷　王羲之小學篇一卷
管弦志四卷　張揖廣雅四卷　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

王祥撰音樂志
穀梁廢疾三卷
孝經劉邵注一卷
三蒼三卷
通俗文二卷
飛龍篇一卷
晉中興書八十卷
三輔黃圖一卷
益都耆舊傳十四卷
玄晏春秋三卷
漢名臣奏二十九卷
申子二卷
何承天姓苑
高麗風俗紀一卷
公孫尼子一卷
風俗通義三十卷
大衍曆

古今樂錄十三卷
公羊墨守十五卷
鄭志九卷
埤蒼三卷
凡將篇一卷
聖皇章一卷
古史考二十五卷
漢官解詁三卷
襄陽耆舊傳五卷
干寶搜神記三十卷
今書七志十卷
隋巢子一卷
高士廉氏族志一百卷
高麗志七卷
愼子十卷
氾勝之書三卷
兵書接要七卷

信都芳撰樂書九卷
孝經韋昭注一卷
爾雅圖贊二卷
衞宏官書一卷
在昔篇一卷
勸學篇一卷
伏侯古今注八卷
三輔決錄七卷
嵇康高士傳三卷
魏名臣奏三十一卷
世本四卷
胡非子一卷
十三州志十四卷
子思子八卷
晁氏新書三卷
靈憲圖一卷
司馬法漢圖一卷

黃帝大素三十卷　桐君藥錄二卷　曹植集三十卷
名醫別錄三卷　桓譚新論十卷　司馬相如集二卷
盧諶集二十一卷　劉琨集十五卷　書集八十卷
山公啟事三卷　古今詩苑英華集廿卷　應龐百一詩八卷
集林二十卷　計然子十五卷

以上一百二十八種書籍，高麗史沒按照類別分列，所以顯得很龐雜。現在依照四部分類法，粗略地把它們歸納一下，計經部（包括小學）三十一種，史部三十九種，子部三十八種，集部二十種。但，這些書中，還有一些問題，當在下一節裏討論。

三、訪求書目中的若干問題

上列一百二十八種書目，因爲各書旣連接着寫，又沒斷句，再加上一些錯字，以致有些書名，究竟是一部書，還是兩部書，驟然間不易辨清。現在參考隋唐宋諸史的經籍志和藝文志，總算認淸楚了，但，還有下列的三個問題：㈠書名或著者錯誤的問題；㈡卷數差異的問題；㈢這一百多種書，在宋代是否都是佚書的問題。現在先談第一個問題：

㈠　**書名或著者錯誤的**

這一百二十八種書中，有些是書名錯了，也有些是著者錯了。現在把這兩種情形列舉如下：

呂悅字林　悅字當作忱　　劉歆七吡　吡字當作略

于寶晉紀　于字當作干　　沈孫齊記　孫字當作約

公羊黑守　黑字當作墨　　聖皇章　皇字當作草

于寶搜神記　于字當作干

以上書名錯誤或著者錯誤的共計七種（增補文獻備考誤字更多）。此外如古玉篇，當是指顧野王的原本（沒經過增定的）而言；劉向七錄，乃是劉向七略別錄的簡稱；深師方，當是僧深集方的簡稱；公孫羅文選，當是公孫羅注文選的簡稱；水經，乃是水經注的簡稱；羅什老子，乃是鳩摩羅什老子的簡稱；信都芳撰樂書，乃是信都芳刪注樂書的簡稱。這些雖然都不是文字的訛誤，但也容易使人迷惑。至於造成這些錯字的原因，大概都是由於傳寫或傳刻的關係。

㈡ 卷數的差異

史志和各家書目所著錄的典籍，同一部書而卷數相差一二卷的，本是常事。但如果卷數的差距太大的，就值得注意了。在這一百二十八種書中，卷數差異最大的，有以下幾種：

新序三卷　隋志、新舊唐志皆三十卷，宋志及今本皆十卷。此疑三下脫十字。

元行沖魏典六十卷　舊唐志未著錄，新唐志三十卷。疑後人併二卷爲一卷。

三教珠英一千卷　舊唐志幷目一千三百一十三卷，新唐志一千三百卷，蓋未計目錄卷數。此作一千卷，誤。

類文三百七十卷　新唐志作三百七十七卷，蓋併目錄卷數計之。商務印書館影印宋刋本舊唐書，於此書卷數作「三百士」；士，蓋「七十」二字之訛。

今書七志七十卷　隋志、新舊唐志俱七十卷。此疑脫七字。

魏名臣奏三十一卷　隋志作魏名臣奏事，四十卷。新舊唐志皆未著錄。此作三十一卷，未詳何據。

兵書接要七卷　隋志作兵法接要，三卷。新舊唐志皆七卷，與此同。

劉琨集十五卷　隋志九卷，新舊唐志、宋志皆十卷。此言十五卷，未詳所據。

盧諶集　隋志、新唐志皆十卷。商務影印宋刋本舊唐書，諶字誤作謀。此作二十一卷，未詳其故。

書集八十卷　隋志八十八卷；新舊唐志皆八十卷。作八十八卷者，疑併目錄八卷而言。

集林二十卷　隋志一百八十一卷；新舊唐志皆二百卷。作二百卷者，疑有後人增益之文。此作二十卷，十字當是百字之誤。

以上十一種，都是卷數差異較多的。至於相差一二卷或三四卷的，就不再一一論及。從這些卷數的異同看來，這個目錄，固然有傳寫或傳刻之訛；但開列此目錄的人，也可能別有所據，而不一定根據隋志和舊唐志。至於新序和劉琨集，那時應該都不是佚書；這點下文當再論及。

(三) 訪求書目所列的並不全是佚書

這一百二十八種典籍，到宋代固然大部分都失傳了；但也有不少的書，宋時仍然流傳着。除了上文所說的新序和劉琨集之外，如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說苑、淮南子、水經注、孫盛晉陽秋、元行沖魏典、揚雄集、汲冢紀年、孔逭文苑、類文、諸葛亮集、古今樂錄、襄陽耆舊記、干寶搜神記、何承天姓苑、子思子、愼子、風俗通義等，既見於隋唐書諸志，也見於宋史藝文志，可見這些書在宋代並沒有亡佚。而且，有些書至今還流傳着。其所以列入訪求書目的原因，我想不外以下兩種：

（甲）書雖然沒亡，但開列書目的人沒查考淸楚，誤以爲失傳了。

（乙）書雖然沒亡，但中國所存的本子不够完全，希望訪得一部完全的本子。

關於（甲）種的可能性最大，因爲那時內府收藏的書籍雖多，但由於分類歸架的方法不够簡便，檢查很不容易；私家藏書，外人更難得閱覽。於是開列訪求書目的人，把一些本來沒有失傳的書，也列入了訪求書目。關於（乙）種，也有實例可證。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說苑說：

李德芻云：「館中說苑二十卷，而闕反質一卷，曾鞏乃分修文爲上下，以定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

訪求書目中有說苑二十卷，可知中國雖有此書，但不是全本，因而向高麗訪求，果然如願以償了。

增補文獻備考在上述的訪求書目之後，加了一段按語，說：

臣謹按：今此一百二十八種書目，宋帝所求者若是。而本國之以某某種應副者，則史無明

文，必是遠外傳聞懸度之事，而恐非東國之所在（里案：在，疑存之誤。）中國逸書也。姑列編目，以備後考。

照這段按語看來，似乎認爲宋帝確知高麗有這些書，因而列目訪求；而事實上高麗並沒有這些書，所以說「必是遠外傳聞懸度之事」。我想：恐怕宋帝只是聽說高麗有些中國已經失傳的古書，而把打算訪求的書，開列目錄，以備個別地訪求；並非認爲訪求的書，高麗一一都有。自然高麗也就無法全部供應了。

事實上，高麗確有些異本，送給宋朝，如前文所說的黃帝鍼經、東觀漢紀、說苑、京氏周易占都是。而且，前三種也都見於訪求書目。玉海（卷五十二、藝文書目條）說：

元祐七年五月十九日祕書省言：「高麗獻書多異本，館閣所無。」詔校正二本，別寫藏太清樓天章閣。

從這些資料看來，高麗藏書，的確有些異本，也的確曾把一些異本送給宋朝。遠在九百年前後，中韓圖書交流的情形，已如此繁多。從而可知，中韓兩國的友好關係，源遠流長，其來有自了。

四、百篇尚書問題

訪求書目中的第一部書，是百篇尚書。這是一部很重要的書，但也是問題最多的一部書，所以這裏特別地加以討論。

孔子用詩書教人，詩是三百篇，書也必定有教本；但，那時的教本，究竟有多少篇，就不能

確知了。秦始皇焚書的時候，濟南伏生把他的尙書，藏在複壁裏。到了漢代初年，伏生把壁中書取出來，只剩了二十九篇完整的，其餘各篇，都殘缺不全了，於是他就用這二十九篇傳授門徒。到漢景帝時，魯恭王破壞孔子的故宅，得到了一批經書，其中有尙書。這孔壁中的尙書，比伏生所傳的二十九篇，多了二十四篇。另外還有書序；從書序中可知尙書有一百篇。所以從西漢末年起，大家都說孔子編定的尙書共計一百篇。其實從各方面推證起來，可知百篇尙書的編定，大概是在戰國時代，並不是孔子當時的原本。但，在古人心目中，就都認爲這百篇尙書，就是孔子編定的了。

按：歐陽文忠公文集（商務印書館影印元刋本、卷五十四）有日本刀歌一首，其中的幾句是：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

可見宋代傳聞日本有百篇尙書。高麗距日本不遠，所以宋人認爲高麗也可能有此書，因而列入訪求書目，這是很自然的事。只是百篇尙書，從秦漢以來就已失傳；徐福傳入日本之說，只是揣測之辭，並無事實的證據，當然無法找到這書了。

由於歐陽公日本刀歌的啟示，於是明代就出現了三部僞本的尙書。僞本尙書之一，是所謂箕子朝鮮本，從帝典起，到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據說是箕子封於朝鮮時帶去的本子。其二，是徐市倭國本，據說是徐市帶到日本去的本子；其內容今已不詳。這兩本都出於豐熙的家裏。而豐熙的兒子豐坊，是以作僞書著名的人；所以這兩部僞作的尙書，沒人肯相信它們。另一僞本的尙書，據說也是朝鮮本；在洪範八政一段的末尾，多了五十二個字。

上述的三個僞本，都見於日知錄卷二「豐熙僞尚書」條。顧亭林旣證明豐熙尚書之僞；又在自注中評論多了五十二個字的洪範說：

按：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僞撰也。

尚書在漢代，有張霸僞作的百兩篇本；今傳的五十八篇本，其中有二十五篇是東晉人僞作的；而到了明代，又出現了三個僞本。尚書這部古經，眞可以說是多災多難了。

五、餘說

前文引述朱子的話，他不相信高麗有未曾焚的六經，這意見是對的。至於說「招來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這話卻有問題。按：宋史高麗傳言：「天聖八年，……其後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到了神宗熙寧三年，宋史高麗傳說：「(高麗) 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來，詔待之如夏國使。」又熙寧九年，高麗傳說：「(高麗) 復遣崔思訓來，……治館待之，寖厚其使，來者益衆。」據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三年以王安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七年四月罷；八年二月，再以安石同平章事，至九年十月復罷。朱子所言，如指熙寧三年的事說，安石固在相位。又按：安石上三經新義，是在熙寧八年的六月。從「王介甫恐壞他新經」的話看來，則招來高麗之語，又像是指熙寧九年的事說。但這年十月安石才罷相，崔思訓之來，宋史雖沒載明日期，恐怕也不一定在安石罷相之後。此訪求書目，高麗史繫於宣宗八年，即宋哲宗元祐六年；黃宗羲獻黃

帝鍼經，是在元祐七年（見宋史高麗傳）。某醫官獻東觀漢紀，也在哲宗的時代。這樣看來，可能是輾轉傳說，把神宗時高麗的通使，和哲宗時的訪書獻書，混爲一談，以致纏繞不淸了。

此外，高麗史和韓國的其他記載，都把這件訪書的事，繫於高麗宣宗八年。宣宗名運，在位十一年薨，也見於高麗史和韓國的其他記載。但宋史高麗傳卻說：

運立四年卒，子懷王堯嗣。未閱歲，以病不能爲國。國人請其叔雞林公熙衞攝政。未幾，堯卒，熙乃立。

這必然是高麗傳記載失實了。

原載「東方雜誌」，復刊八卷八期（民國六十四年二月），頁二三——二六

載書播遷記

附：山東省立圖書館第一次運往曲阜金石典籍書畫目錄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倭人犯順，華北阽危。時予執役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先生，命予選館藏圖書文物精品，準備播遷。比倭患益急，予偕工友李義貴，載書物初遷曲阜。未幾，復隨獻唐先生載書物入川。喘息既定，曾爲文以記其事。稿藏篋中，忽忽近四十年矣。茲倩人抄錄一過，爲山東文獻補白，用志鴻爪。神州既陷，焚書坑儒之禍，又見於今。不知此圖書文物，尚存天壤間否。且聞獻唐先生墓木已拱，北望齊烟，何勝唏噓！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識於臺北。

中華民國二十有六年七月七日，駐我豐臺倭軍，非法演習，藉口入宛平搜查，我蘆溝橋守軍二十九軍團長吉星文氏，據理拒之，戰釁遂啟。時冀察委員會委員長樂陵宋哲元氏，尚冀和平解決，未卽備戰。迨二十八日，和議不成，乃起而拒敵。宋故兼二十九軍軍長，九一八事變，在喜

峯口諸隘，屢挫倭軍，以是聲威遠播。蘆溝橋事既起，倭軍源源進關，數逾四萬。宋氏以喜峯口之役，數破倭軍，謂此區區數萬之寇，當無足慮。詎知平津各要地，倭寇潛力已深，重以敵械精利，遠非我軍所及。以是南苑一役，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力戰殉國，平津遂陷。然二十九軍將士，敵愾益奮，於霪雨泥淖中，轉戰兩月之久，卒以軍械懸殊，退至滄縣，由某軍接防。而師出無律，曾不半月，不戰而退至德縣。至是復由第三路軍接防。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氏，受日人誘惑，首鼠兩端，和戰不決。復不戰而退至平原，濟垣震驚，居民紛紛逃移，機關職員，亦多請長假以去，於斯時也，本館書籍文物，乃決選精品南徙。

本館創始於遜清宣統元年，時山東提學使湘潭羅順循正鈞先生，提調本館，擘劃經營，備極勤勞。今日所以有此鴻規者，實奠基於羅氏也。開辦之初，即附有金石保存所，故書籍而外，兼蓄金石。惟濫觴伊始，書籍多通行板本，金石亦無甚奇品。厥後數易館長，胥以經費拮据，建樹無多。迨民國十八年，日照王獻唐先生，來主館政，經費漸裕，搜集滋多。洎乎今茲，書籍達二十餘萬冊，善本亦三萬六千冊有奇，金石物品，至萬七千餘件，建奎虛書藏新樓儲之，可謂盛矣。館中組織，凡分四部，同寅都二十八人。數年辛勤，至斯圖書目錄，行將編竣，金石器物，亦漸次整理。方期工作將畢，同人得以餘暇，肆力於學術之擘討。胡意大盜竊國，變生倉卒，疆吏自私，不忠職守，卒致國事日非，回天無術。吁，可哀矣！初，戰端既開，獻唐先生即請於當道，擬遷書物於遠省，俾資安全。當局未暇及此。比戰事既迫，乃選善本及金石書畫精品，裝為十箱，謀遷諸曲阜。適時館中同人，請假去者已多。而津浦火車，日日遭敵機轟炸，復成畏途。

獻唐先生召予曰：「本館爲吾東文獻所薈萃，脫有不測，吾輩將何以對齊魯父老？擬就力之所及，將比較珍祕者十箱，移曲阜至聖奉祀官府。顧此事重要，可以肩其任者，惟余與子耳。津浦車時遇敵機襲擊，往卽冒險，然欲爲吾魯存茲一脈文獻，又不容苟辭。子能往，固善，否則余當自往。」余聞而感奮，已拚茲藐軀，與此纍纍十箱者共存亡，卽慨然請行。道途之艱險，非所計矣。

十月十二日晚，坿省立醫院專車啟行，翌晨九時許，抵吳村車站，空襲警報忽發，車乃退出站外，乘客則走匿田間。移時敵機未至，警報遂解。聞飛往濟寧，投彈四枚而去，彈落田間，無甚損傷也。午後三時，抵滋陽，思卽運赴曲阜，乃遍覓車不得，蓋載重汽車，悉爲省府徵去，獨輪車則懼載重弗勝，而馬車又懍於徭役及敵機轟炸也。曲阜旣不得卽往，而箱在站臺，目標甚大，若遇敵機，必難幸免。思離此險地，移之站下逆旅中。數商諸力夫，僉以箱重難致，雖多與之值弗應。時日已向暮，不得不於站臺度夜。然中心忐忑，終宵弗寧也。

予之南來也，有館役李義貴隨行。次晨六時，留義貴守箱，予以脚踏車遄赴曲阜，訪至聖奉祀官府印譜處彭君輯五。輯五本濟南聚文齋書店經理，性恭謹，無市儈氣。獻唐先生囑雇車事與彭商之，蓋彭居曲阜久，此事易爲力也。旣相晤，多方雇覓，卒不可得。方躊躇思策，警鐘頻鳴，俄聞巨響震天，窗紙欲裂。便見敵機三架，自西北飛來，掠曲阜旁空而去。曲人以經驗度之，咸謂被炸者非滋陽卽姚村，而聲響近南，殆屬滋陽。予聞其言，心膽欲碎。竊思所炸果屬滋陽，則此十箱者，必成灰燼，是遯難而難適及，予將何以對獻唐先生囑託之重？與吾魯文化界屬

望之殷？殆碎吾身不足以爲殉也。轉念敵機來自西北，則所炸寧非姚村？而是日爲東南風，其聲亘如此，又疑屬鄒縣。姑意爲鄒縣和姚村，以自慰其心，蓋事勢至此，不得不勉力鎭靜，俾從容將事也。輯五頗能急人之急，覩予狀，謂曰：「覓車事，予獨任之，君勿復慮，今日遲早必使車到滋陽也。」予聞而感慰，乃晉謁奉祀官孔達生德成先生，接洽房舍，當承慨許。孔公年甫十九，溫溫儒雅，而應事明決，望而知爲非常才也。時業師莒縣呂先生今山，方任奉祀官府西席，亦得晤面。師性耿介，肝膽照人。其授徒也，循循善誘，如匡鼎說詩，如生公說法，析入毫髮，使人忘倦。生平所歷中學教師，大學教授，未見其儔。予先後在第七中學及東魯高級中學受業數載，今日粗能執筆屬辭者，實呂師誘導之力也。予性亦孤冷，有似於師，以故特蒙青眼。數年睽違，時縈夢寐，今於患難中相晤，喜極欲泣，直不知語從何起。然念書物危殆，又不敢暢訴衷曲，亟辭去，馳歸滋陽。此時情緒，殊難言喩矣。

歸滋途中，疾馳如飛，逢人輒問，僉謂敵機未襲滋陽。然猶疑信參半。既近車站，則見纍纍者，果安然無恙，心頭一塊石，遂乃落地。欣喜欲狂，幾疑身在夢寐中矣。亟再商之力夫，幾費唇舌，始以十八人之力，舁箱件於客棧。至是身始覺疲，腹始覺饑，時已午後四鐘矣。是夜曲阜車竟未至，心復焦灼。翌晨五時車來，乃載之行，復窘陰雨，泥濘不堪。午後到達，即妥存奉祀官府。雖艱苦飽經，而此時則心泰神怡，其樂陶陶然矣。

此次所携，凡書籍之屬四百餘種，都二千六百餘册，裝五巨箱。金石器物之屬，凡七百三十餘品，裝三巨箱。漢魏石經殘石百三十二凷爲一箱，書畫之屬凡百五十餘軸爲一箱。本館歷年所

慘淡經營者，其精華略萃於此矣。昔李易安一弱女子耳，遭逢時變，猶能槖書遠遷。爾時道途之險阻，以今擬之，何啻霄壤？所以如此者，亦冀夫文物書種，長留人間，俾我先民之精神遺產，得永存不替耳。長恩有靈，其呵護之！

平日自濟南至曲阜，不過一日程耳，今乃稽遲四日之久。此四日中，獻唐先生，以未得消息，乃先以電來詢。安置既畢，卽電覆，並上長函述經過。旋得覆書，情懇語摯。以文獻攸關，附載於此：

電函均悉，快慰已極。自弟行後，兄日夜提心弔膽，以劇院運箱件至泰安，中途曾經被炸故也。既未得電，卽屢屢詢醫院，次日午後，言已安抵兗州，心稍放下。又隔一日，而弟電仍不至，復極驚惶，卽電輯五詢之。是夜兄俟回電至二時，終不來。昨日午前始到，其慢幾成快信矣。此次冒萬險而來，在吾輩可能範圍內，不如此無以對齊魯父老，內疚於心，終吾身不能釋矣。此間日前形勢甚緊，省府及各廳，紛紛南遷滋陽、寧陽，惟主要長官，尚留於此。敵軍已到禹城一帶，謠言千奇百怪，人心驚惶，前所未有。幸自昨今兩日，前線似無戰事，敵機亦未到，殆雷雨將發，此正濃雲密布時也。館中伯幹等已回家，只克明、彬候、少亭等十人留此，卽以克明等三人，代理各部主任。祥農亦留守，業已安排妥貼，並分發生活費。兄日常在館照料。如此間當局離濟，兄亦當隨而南下，如彼一日不走，兄亦一日不走。且心中時時以爲尚有轉機，無論如何，亡國奴帽子至海枯石爛，兄決不戴也。此刻各社會教育機關主管人，大約只有兄一人在此；若省立醫院等，皆已全體南移矣。將來兄南下第一步卽至曲阜，曲阜爲館中辦事處，遍觀省內各地，無如此

間妥者，既有人幫忙，又有特殊力量無形保護，過此則遍地荊棘矣。兄已留出一部份公款，為辦事處公費，將來如大遷尚費周章，小遷當無問題，弟即與李義貴長川住此可矣。房子已與仲釆說妥，彼云可隨意住之，兄擬以為辦事處地址。聞印刷局楊局長有一部份眷屬在此，伊住房無多，楊又與兄至好，均無妨也。蓮舫輯五，已另函申謝，弟設筵酬之是也。調甫尚在此，鎮靜如恒，兄約其至不得已時，同遊曲阜，尚未定也。十月十七日中夜

是時敵方集中兵力，進攻太原，津浦路敵軍，抽調殆盡，所餘僅劉桂堂、張濟標兩偽軍部屬，倭寇正規軍，殆寥若晨星。我軍如乘此時反攻，則德滄諸縣，一鼓可下。否亦牽敵西進之軍，使不得併力於一途。在常人猶見及此。乃中央數令韓軍反攻，悉若罔聞。反派烟土、搜民財，以肥其囊，致敵人遂得志山西。可慨也夫！三路軍既不反攻，偽兵亦無力南犯，遂遙峙於禹城徒駭河一帶，相安無事。於斯時也，館中復得從容更檢書籍文物之次要者，再裝二箱，值印譜處運紙之便，坿載以來，仍存前處，時十月二十三日也。獻唐先生，旋寄書來，述移運情形，兼及學術之探討，具錄於次，以見吾輩於戎馬倥傯之際，尚未廢學也。書云：

昨覆長函，計已收到。字畫書籍金石，尚有一部份佳者，前次不便更動，因未帶來。茲因輯五運紙來曲，又檢裝兩小箱，託其一同運來，並附一函及封條一束，此時想已到達矣。運時未貼封條者，恐有人注意（因係從搭軍用車）也。箱既到來，再加貼之，其餘之封條，即存弟處，備不時之需可矣。外附來第二次運來各件細目一份，即與第一次清冊合訂，並存弟所，箱件仍移奉祀官府存放。又託輯五之介弟，帶來覆奉祀官一函（內附拓本

五種），及覆孟縣長毅生一函（附聯一付），此刻想已分別送去矣。轉五介弟，此次押運各件來曲，臨行時兄付與十元，作搬運各種費用，如有餘款，卽由弟收存，如不足，亦可由弟處補給，大約敷用也。此間近日甚平靜，一時當可無事。兄從前日夜焦急者二事，一公一私，自得弟函電，公之任務圓滿矣；又得家電，眷屬亦平安旋里矣。以是中懷曠然，百無牽掛，日讀書半冊，校書一、二卷，安適已極。惟偶欲述作，所有書籍均裝箱外存，不得參考，爲可恨矣。看目下情形，十月份經費，尚有半數希望，如無變化，尚欲將善本書目印出，所謂得隴望蜀者矣。宋人有東家雜記、祖庭廣記，記得四部叢刊內有之，其書爲現存孔氏家譜之最早者，內有一部份記曲阜建設古迹。兄舊有志到曲阜，以書中所載宋代情形，逐條訪求印證，以明今昔異同，可以彙成一文或一書，惜兄所藏舊本，裝入箱中，此刻不在手底，無從檢寄。弟如有意此事，或奉祀官府有此書，可以設法借閱爲之，如無其書，館中檢寄亦可。（本有宋槧金槧，舊藏聖公府，錢塘何夢華為孔氏館甥，從而得去，售之黃蕘圃，今藏鐵琴銅劍樓。通行者為琳琅秘室叢書本，卽從其本抄出付梓者也。）再古魯城址尚在（土城牆基。周秦漢晉無磚城牆，皆以土板築為之。），兄亦有意尋其踪跡，繪爲一圖（若周秦漢，若金元以後。），借證歷次出土古物所在。（多在聖林前。古物出於葬墓中者，十之八九，可以地點考古代叢葬處。魯國文化，兩周分為二期，初期多從王朝蛻出，後期則與齊國混合，兄從文字方面考之如此。至器物方面，資料太少，未暇致力也。邾齊文化為一支。）前次來此，本欲爲之，後匆匆返濟，未得如願。吾弟暇時，何不參考邑志諸書，一踪跡之耶？流離飄泊之中，正不能廢學，學而居此聖賢之鄉，寧非大幸？惜兄一時不能來也。廿一日中夜

戰國書體，分兩大支，一爲西土（王朝爲之宗），一爲東土（齊爲主，魯副之），李

斯制定小篆，本從西土一支出，漢魏沿之，流爲今日之書體。若東土一支，爲其削棄不用，其存於今者，爲壁中古文，爲山左之鐘鼎文，爲璽印文，爲陶文，故此四者，皆息息相通，多與小篆各異。兄之志願，卽在闡明東土書體，調甫亦同此類。

壁中古文，存者爲說文，爲三體石經，爲汗簡諸書，而汗簡尤爲重要。調甫初似不信，近則篤信，大致力其書。古人書安可以意輕視耶？又及

予卽復上一函，謂擬將此次移書經過，及在曲阜見聞，草爲一書。末有嘔心傾腦，聊當新亭痛淚之語。蓋斯時察綏已全部淪陷，冀魯晉豫，亦皆僅存半壁矣。

憶民國二十年冬，予之初來館也，獻唐先生以二事相勗，曰：「治事期如銀行之整飭不紊，治學期如學校之師友講習」。數年來黽勉以赴，雖未能盡副所期，然旣竭吾力，寸心尚安。離館前已將本館善本書目初編編定，且已校錄清本。惟本館藏書總目，尚虧一簣之功。脫再假以三月之力，亦可編定付鈔。乃時不我與，徒喚奈何，念茲在茲，所日夜痛心者也。

函中屢及調甫先生，先生姓欒氏，蓬萊人，歷敎授齊魯大學及國立山東大學。精丙部書，尤邃於墨子。嘗著文以評梁任公墨經校釋，任公讀後，致先生函，有頫首至地之語。又出餘力著名學及經學源流兩書，皆卓犖不羣。近年復治古文字，兼及璽印。其敎人則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未嘗執兩可之說，篤實正如其爲人也。

予居曲阜，時趨呂師處請益。公府西席三人，呂師而外，則莒縣莊心如陔蘭先生，萊蕪王毓華樸先生也。凡五經四書左傳公羊傳及詩文之屬，皆呂師授之。歷史地理諸科，則王先生授之。

先生兼掌公府庶政，勞怨不辭，近年公府生計漸裕，先生之力居多。心如先生，則授講宋明理學，而尤注重精神之熏陶。初公府西席，惟呂師與毓華先生二人，間聘授西文者，然間斷時多。呂師思得一經師而兼人師者，以為奉祀官傅，計莫若心如先生，乃親往延之。先生年近古稀，家又豐饒，人固必其不出也。既晤，師言其意，先生果謝曰：「予年來治佛學，不啻孔門罪人，是烏可往！」師請益堅，而先生辭益力，將不諧矣。時日嚮暮，呂師索酒，相與對飲，至半酣，師正色曰：「吾輩今日能明義理，屬文辭，粗有聲聞者，非讀孔氏書而致之乎？」先生曰：「然。」曰：「然則聖人之裔，孤幼待教，彼德足以型之，而學足以傳之者，寧能恝然不顧乎！予懷無窮之望而來，以為聖門孤裔，永有所託，不謂先生漠然視之。既不獲命，吾其行矣。」推杯而起。先生蹙然曰：「有是哉！吾往矣。雖然，予以三事相約，可則偕行。」師請其說，則曰：「吾不受束脩也。」師應曰：「諾。」繼曰：「往返路費，亦未可過豐也。」師又頷之。終曰：「吾當與奉祀官友，不能為師也。」師復諾之，其義遂定。此一事也，而足驗兩先生之為人矣。

心如先生，初登翰苑，繼留學東瀛，德望既隆，經術湛深。然與後生言，至為謙撝。一日，予向先生問學，值酒後微醺，笑相謂曰：「八股匠豈知學者？祇可言八股耳。」予即以八股請。先生曰：「八股文者，實駢體文之流亞也。自楚騷啟賦之源，至漢而盛，歷六朝至唐而對仗漸工，駢四儷六，珠聯璧合。然皆句自為對，聯自為對，未有兩段兩節互對者，有之，則八股文是已。夫詩變為詞，再變至曲而極。惟文亦復如是，八股文則駢文之極則也。在昔帝王以此試士，錮蔽天下學子之聰明，俾胥赴於是途，實愚民政策之最酷者。然就文章之技術言之，斯固未可厚

非也。」其論精闢如此。

無何，濟北倭寇，又復南逼，韓氏乃令所部，退守黃河南岸，並自毀鐵橋。倭寇以鵲山為礮兵陣地，隔河射擊，彈落千佛山白馬山間，一時人心大恐，紛紛出走。獻唐先生亦於是時來曲，時十一月十六日也。先生來曲後，晝每相與偕遊，夜則篝燈談學，恆至夜分，實喪亂中一快意事。先生得詩多首，以四什書為堂幅贈予，記其二曰：「手掇殘陶陌上行，頽雲半壁魯城傾。劇憐閱世蟲沙改，勞我芒鞋半日程。」（故魯城）「少識古文薄漢京，千秋絲竹不聞聲。一場寂寞憑誰語，直是麻姑海上行。」（魯壁）蓋靈光殿故址左近，遺存漢代磚瓦綦多，常擬拓其花紋，彙為靈光殿專瓦集拓一書，故出遊輒攜數塊以歸，即首詩所謂手掇殘陶者也。後竟未遂所願。次詩云云，則前錄致予第二書中意也。予亦得絕句二什，云：「沂泗迴環路幾程？防山隱隱暮雲平。魯城賸有殘垣在，一任先生曳杖行。」「漢殿魯宮幾度過，殘陶斷瓦足摩挲。芒鞋踏遍古城道，忽忘滄桑一浩歌。」一日，值夏曆十一月上丁之前夕，相與赴聖廟觀演禮，先生於東華門外冷攤上得漢薛司空半通官印一紐，篆刻甚精，纔費番佛一尊，估人已喜出望外，先生尤沾沾自得，賦詩寄調甫先生，有「暖到心頭是冷銅」之句，情溢於辭矣。

在曲幾無日不聞敵機轟炸聲，且凡炸鄒縣、滋陽、姚村、吳村諸處，敵機必經曲阜，司空見慣，已不覺其可懼。一日，予以公務赴滋陽，將抵泗濱，見河沙映日，一白無際，憶李太白東魯門泛舟之詩，意栩栩然。旋聞軋軋機聲，自南而至，視之凡四架，予乃避入叢林，則見冢上洞孔密布，蓋敵度林中必有匿人，以機槍射擊所致也。因復趨出，偃臥道側，以察其肆虐之狀。是時

我高射礮齊發，烟花綴空，如白雲朶朶。機槍則密如連珠，時雜以轟炸聲，儼如置身戰陣也。約半小時，敵機逸去，我僅傷一平民而已。

是時寇復分其兵力，急圖南京，津浦線上，至以疑兵僞礮，以張聲勢，彼因知韓氏之不能反攻也。獻唐先生，既來曲阜，予乃復乘間旋里小住。夏歷十月二十八日，爲先母棄養八週忌辰，因哭祭於母墓，次日遂返。獻唐先生，旋返濟南，再檢查書籍磚瓦之屬，得十九箱，派人運來，仍存原處，時十二月二十日也。斯時南京已陷，津浦寇又將南侵，先生回曲，乃議書物遠徙之策。顧時館中經費，已欠兩月，運費殊無所出。適省立醫院，奉軍政部命，改組爲第十重傷醫院，將以專車往漢口，爰商得同意，允坿載書物五箱。乃就第一次所運十箱中，更選其半，俾坿載而南。其餘在奉祀官府者，爲妥訂辦法存之，不復能遠移矣。二十七日南行，過銅山，經汴鄭，出武勝關，凡八日行程，三遇空襲，而抵漢口。至漢乃悉濟南已於予離兗之日淪陷，韓氏率所部，不三日而退至滋陽，寇遂長驅直入，肆無忌憚。魯人聞之，咸欲呈訴當局，得韓氏而甘焉。

漢口在昔僅一鎭耳，今則洋場十里，危樓切雲，有東方支加哥之號。南京陷後，軍政重心，移於此間。益以流亡者之麕集，故市肆尤爲繁華。在漢居停十餘日，以敵機時來空襲，故出遊時少。僅與獻唐先生渡江至武昌黃鶴樓一遊。樓在蛇山西端，踞武昌故城上，俯瞰長江，雪濤拍岸，風帆如織。而晴川閣、鸚鵡洲諸勝，隱隱入目。惟舊樓燬後，不知伊何傖父，就其基起西式方樓以當之，負此江山之勝矣。燬餘石刻，猶多殘存，大抵非僞卽劣，無甚可觀。而舊傳名聯，

如：「何時化鶴重來？且自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此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者，今已不見。乃與獻唐先生，品茶於抱膝亭下，望浮雲之悠悠，聽江水之滔滔，不覺壯懷頓生，慨然有擊楫之志。夫男兒具七尺軀，值國家破亡之日，不能執戈前驅，梟倭寇之首，懸諸藁街。乃復區區事此毛錐，將何以對我英勇抗戰之諸將士耶？

未幾，孔奉祀官抵漢，呂師偕來，相見幾如隔世。俄又聞韓復榘已被解來此，人心大快。蓋韓氏既不遵命抗敵，迭失要隘，已退至兗濟，不待換防軍至，又復南奔，中央忍無可忍，遂捕解以來，將依法治罪。人惟恐其不死也。

時山東大學教職員，亦在漢口，奉教育部令，將遷至四川萬縣開學。校長林濟清氏，請獻唐先生任中文系教職。先生念如是則本館書物，得與大學書物偕存，計亦良得，遂允之。十九日，以箱件交太古渝公司，負責轉運，予等乃登輪行，即晚泊嘉魚。次晨船開殊早，熹微中過赤壁，未獲覩當年鏖戰遺跡，甚憾事也。二十一日薄暮抵沙市，曾登岸小遊。市距江陵十五里，惜匆遽中不克一至。翌晨復啟碇而西，行百四十里，江岸漸有岡巒起伏。過虎牙荆門三山，漢光武時岑彭破公孫述兵，燒其浮橋攢柱處也。兩山對立，崖陡流急，形勢殊險。竊意所謂三峽者，亦猶是矣。自是西行，羣山夾江，至於宜昌，綿亘不絕。是時已夏歷歲杪，而山上草木，猶多碧綠，信乎江春之入舊年也。二十三日抵宜昌下船，溯自漢口啟程，至此航行五日，計程已千餘里矣。

宜昌，古之夷陵，有陸抗城、郭景純爾雅堂、桃花潭、三遊洞諸勝。顧或因駐軍，或以路阻，未克暢遊。省立宜昌中學內，有元峽江路儒學廟碑，嵌壁中。圬者堊壁，乃並其碑而墁之，

致不可讀，南中金石寡陋，宋元碑刻，已如麟角鳳毛，乃並此而不之惜，得勿蒙焚琴煮鶴之譏乎？又蘇東坡時，謂有歐陽永叔至喜堂，今士人已無知者。

到宜昌之次日，余赴輪船公司，接洽船票，街中仰見飛機六架，連翩而至。宜昌固有飛機場，我機時時習飛，因未介意。旋聞砰轟之聲連作，則見彼六機者，方盤旋投彈，始知敵來空襲。乃於店前簷下避之。是役，死傷甚多，我機場被炸，損失亦重。蓋敵機乃首次來襲，防空部未能及時發警報故也。自是，商民遂紛紛移入鄉村，向日逆旅中人滿爲患者，不三日而寥如晨星焉。

斯時各機關職員，及東部各省難民，西上者多，船票至不易謀。幾費周章，始得三人艙位。公司通告，定三十一日晨七時上船。是日五時起床，六時趨赴碼頭。時尚未曙，街頭燭光點點，行人憧憧，因知是日爲舊曆元旦，遙思家中此時，思念遊人之情，當不減於遊子之思家也。比至江岸，乃悉因元日故，工人狃於舊習，不任搬運，致貨物不能上船，旅客亦不克登。江干鵠候竟日，薄暮乃獲登焉。次晨開行，過平善壩，而入西陵峽。蓋自奉節舊夔峽至此，六百里間，江窄流急，舟行至險。過此則江寬流穩，舟人每置酒相慶，此平善之所以名也。既入峽，山頗陡峻，峭壁夾江，勢如列屏。而巨渦湍流，以載重近千噸之巨舟，當之時震震如慄。每遇險灘，則左右欹側欲傾，使人驚沮。過牛肝馬肺峽，未幾而至新灘。新灘者，古名青灘，江枯絕險。茲值春初，適當險時。灘上下水差至四尺，高屋建瓴，輪船馬力，不足以當之，復以百數十人之力，挽纜相助，乃克上駛。俗有：「走遍千灘不算灘，青灘才是鬼門關」之諺。帆船過此，每致覆沉焉。既而

至香溪，卽明妃村，杜詩所謂：「羣山萬壑赴荆門」者也。又五里至黃魚三滾，對岸有汨羅，或指爲屈子沉江處。按其處實在今湖南長沙北湘陰縣境，有汨羅水通洞庭湖，距湘水不遠。屈子懷沙賦言：「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漁父辭言：「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王逸九思，亦言：「悼屈子兮遭厄，沉玉躬兮湘汨。」汨皆近湘，較然甚明，不獨水經注有詳盡之紀述也。茲之汨羅，蓋因近屈子故里而傅會。由此上溯二十二里，有縣曰秭歸，屈子故里，卽在其北。水經注引袁山松說：「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云云。舟過其處，山高雲深，徒引領企望而已。是日泊巴東，巴東居山坳，肆荒人少。市外有淸風亭，背山面江，頗饒形勝，宋寇萊公宰是邑時初建也。蘇東坡詩，稱有萊公手種松，今已不存。按今在興山縣

次日，過官渡口而入巫峽，適細雨霏霏，兩岸亂山攢聚，所謂十二峯者，竟不詳孰是。又不知東坡所謂：「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者，尚存乎否耶？過巫山縣，入瞿塘峽，峽至夔門而止。蓋江流至夔門，水面斗窄，江岸斗高。雙峯扼江，壁立千仞，如巨斧闢成。雄偉險峻，造物之工，使人駭歎。過夔門而上爲灩澦堆，堆爲玲瓏石山，屹立江心，水大時絕險。古謠謂：「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者，言江漲時堆沒將盡，急流直衝，下水船最易誤觸致沉也。聞今已炸毁，不似昔日之險。惜予在艙中，並此與白帝城八陣圖均未得見，眞恨事也。無何，抵奉節，粉樓雉堞，依稀猶有存者。值茲兵馬倉皇之日，吟老杜秋興諸作，益令

人感傷。吾輩此日依南斗，京華尙堪回首耶？至是三峽已盡，以西山漸平衍。舟行至此，宛如聽關西大漢，唱大江東去之後，繼以妙齡女郎，低吟楊柳岸曉風殘月。緊張情緒，為之弛緩。間有三數奇嶂，遠插天外，則絃外餘響而已。大抵峽中江寬處不逾一里，狹處或不及五分之一。危崖夾持，如行複壁中。曲折處兩峯扼江，疑其不能通舟，至則遙天一線，豁然開朗。間有陂陁，則亙股長伸，若向江中濯足。股側竹樹密處，炊烟縷縷，茅屋數椽，儼如神仙中人。山坳時有徑徯橫斷，如長帶圍腰。而細瀑曲流，又如修蛇飲江。山麓為江水沖削，或巨塊渾成，脈理不分。或薄岩複疊，狀如積餅。邊緣或整齊如刀斬，或參差若鼠嚙。江中嶼渚，或如伏黿，或如奔馬，或峙如疊嶂，或散如列星。洪流激之，雪浪洶湧。使人亦駭亦快。獻唐先生笑相謂曰：「貪看山色，憑弦疲憊欲死，轉欲景物速盡，俾得小憩；然又恐其竟盡，致不克飽此饞眼。」因憶東坡詩所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者，誠非虛語，信乎造物之工也。近人傳樵村，有行川必要一書，紀江中程站綦詳，茲節錄三峽中險灘於後，備入蜀者問津焉。

宜昌市
五里 南津關
七里 大平善壩
六里 燈影子峽
十里 南沱大水險
六里 黃陵廟大水險
二里 上鹿角多亂石
五里 燈灘
五里 上洋背
三里 紫陽
一里 楠木坑大水險
五里 偏老大水險
五里 柿子老大水險
六里 斗船沱
三里 岱石大水險
二里 馬屁股大水險
五里 塔過州小水險
五里 扁岩子

五里 石門
九里 小平善壩
一里 火廠壩大水險
五里 喜灘大水險
五里 紅石子大水險
二里 下鹿角
五里 山斗坪
五里 下洋背
六里 美人沱
七里 黑岩子枯水險
五里 大佛練大水險
二里 三灘
六里 小心灘
五里 黃魚三滾小水險
二里 石門

五里 秭歸縣
二里 紫荆沱
五里 老佛岩
五里 七姊妹小水險
八里 小八斗平水險
二里 牛口大水險
五里 黃臘石
五里 小通嶺
五里 牛肝馬肺峽
一里 二灘枯水險
五里 兵書峽
三里 鉅子梁
二里 舊歸州
二里 渣上大水險
五里 燈盞灣

四里 么姑沱
五里 蟒蛇砦
五里 大八斗大水險
七里 橫梁子
七里 巴東縣
五里 柳嶺崎
十五里 射紅蹟
三里 新灘枯水絕險
四里 香溪
五里 兵板崎灘小水險
二里 四季擋
九里 九道梁
四里 登子石
三里 洩灘大水險
五里 石門大水險

四里 狗矢沱又名蛟龍沱
八里 鷄翅膀
四十里 青竹標枯水險
四里 萬戶沱
二里 官渡口
五里 竹流
十里 小灩澦石小水險
四里 金扁擔
五里 培石大水險
八里 沙木瀼
三里 青石洞
一里 碎石灘
二里 老鼠錯大水險
二里 鬼錯路
二里 空王沱大小水均險

二里 流石
十里 西瀼口
十里 火焰石
五里 野狐三背
二里 宮內崎
二里 排沱大水險
五里 白石路
五里 小木灘
五里 三峽厦大水險
三里 金盔銀鎧峽
五里 橫石溪
五里 跳石大水險
三里 鷄翅膀
二里 炭廠灣
五里 母猪灘小水險

五里 楊家棚
六里 楠木園
六里 冷水蹟
一里 棺材峽
五里 黃草坡
三里 大木灘大水險
三里 霸王楚
三里 野蟒洞
五里 刀背石
七里 梅湖子
一里 巫山縣對城爲側小子灘
五里 紅石梁
五里 巫蹟
五里 三流子
七里 焦灘小水險

五里　升子岩
五里　軍營河小水險
二里　峽門口
二里　白黑石
四里　孟良梯
一里　白帝城
三里　奉節縣即清夔州
六里　將軍灘
五里　拖肚子小水險

八里　寶子灘大水險
八里　油札崎
一里　餓谷堆
三里　白骨背大水險
六里　風箱峽
一里　閻王⿰土扁大水險
一里　下關城即古夔州
三里　魚鬃老

五里　龍寶子
五里　荒張壩大水險
三里　曹家沱
二里　大溪口
五里　小南黑石
一里　倒弔和尚大水險
三里　灩澦堆大水險
三里　臭鹽蹟

右三峽灘，大要略具。昔杜子美稱：「西蜀地形天下險」。李太白亦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之歎。即此三峽一隅，已足概見。惜篋中未携范石湖（成大）、陸放翁（游）、王漁洋（士禛）諸家之書，不克一一比對之也。獻唐先生於峽中得詩二十餘首，輯爲峽江行卷。予亦得絕句三什，茲記其二。西陵峽云：「西陵深峽晝猶冥，急湍掀舟不暫寧。山似濃雲江似電，劃然闢斷萬峯青。」巴東夜泊云：「峽裏荒城氣凜森，孤舟江上旅人心。愁腸九折難成寐，臥聽波聲到夜深。」峽中獨未聞猿啼，疑今已絕跡。詢之舟子，云：「帆船尚時遇之，遇即投食以飼，

否則猿往往拋石擊舟。」亦趣聞也。薄暮過雲陽，對岸山坳有桓侯廟，甚壯麗。是夜泊盤沱鎮，次日而達萬縣。江中險灘仍多。蓋自蜀西，下迄荆門，江行山中者三千餘里，曲折夾持，如束水長閘。及放乎平原，奔流而東，故能浩浩瀚瀚，永無枯竭之虞，遂滙為東亞第一大川也。

萬縣周之巴國，漢之朐忍，六朝爲南浦。宋初亦名南浦，後改萬州，以至遜清。今闢爲商埠，城郭已毀。居民繁密，尤饒江山之勝。宋范石湖萬州詩：「晨炊維下巖，晚酌艤南浦。波心照州榜，雲腳響衙鼓。前山如屛牆，得得正當戶。西江朝宗來，循屛復東去。官曹依岩棲，市井喚船渡。瓦屋仄石磴，猿啼鬧人語。……」最足以道其形勝。前後如寇萊公、蘇東坡、王漁洋諸作，皆不及也。邑中名勝，以太白巖、岑公洞、使君灘、西山公園等爲最。太白巖，在西山峭壁中，因巖造屋，下瞰江城，歷歷在目，相傳李太白曾讀書於此。其下有流杯池，爲宋郡守東莊所鑿。池旁有黃魯直書西山留題，及宋孫鑑刻劉公儀西亭記，均尙完好。岑公洞者，在江南岸，隋唐間江陵岑道願隱居於此，因以得名。洞廣約半畝，中有灌芝泉，水注於池，聲淸冷如琴。洞內外宋明以來碑刻甚多，而以宋紹興時郡守何㮚書岑公洞三大字爲最著。洞內諸宋人題記，縣志多未著錄。影暗字蝕，不得盡讀之也。使君灘，卽水經注之羊腸虎臂灘，在城東二里，昔楊亮爲益州，過此覆舟處也。西山公園，爲近年新闢，在西山望鄉臺下，因山就壑，景物天然。予至萬時，園中梅花正盛，爛縵山谷，如入香國。梅叢中時有修竹數竿，嫋嫋迎風，益饒幽致。因與獻唐先生，合攝影於梅竹深處，資紀念焉。

予等居市內三日，卽移入山中，於閻洞子西馬超灣山村中，僦一椽居焉。環村巖壑幽邃，竹

樹葱龍。窗外老梅一株，幹可合抱。其旁桂花兩樹，徑亦盈尺。又有枇杷橘柚及婆羅樹之屬，皆吾鄉所不經見。予與獻唐先生，或靜對治學，或登峯遠眺，幾忘身世之痛。先生繪爲山居圖贈予，且繫三絕句曰：「連朝陰雨趁新晴，屋後青山只半程。睡起平明無個事，蕭然一枚踏雲行。」「薄有詩書便不貧，數間茅屋竹爲鄰。彌天曠劫風輪轉，小住林泉得幾人？」「茅堂靜對日爲僧，伏案攤書冷似冰。我已無家君亦爾，空山風雨老行縢。」惟是吾身已安，吾志亦得，而不知行將淪入異域之故鄉何如，更不知已陷於水深火熱中之師友何如。引領河嶽，淚潸潸落，腸寸寸斷矣。得憶家一絕曰：「家在湖陵傍水涯。東望烽火淚如絲。昨宵夢到鳧山下，猶見烟波似舊時。」噫！公私塗炭，竄身荒谷。日暮途遠，人間何世！丁滋陽九之會，哀江南賦眞不堪卒讀矣。

此間氣候，較吾鄉大暖。舊曆二月之初，麥已抽穗。而菜花滿山，雜以桃李，儼如故鄉暮春時節。山中頗多稻畦，引泉灌之，夜來蛙鳴閣閣，與枝頭杜鵑啼聲相應。青燈悄對，惹人愁思。緬懷昔日之樂，不覺黯然。予執役山東圖書館，於茲六年。館在大明湖畔，南望歷山，北挹鵲華，水木明瑟，擅稷下風景之勝。館中花木繁茂，幽徑竹籬，布置亦具匠心。春來海棠盛開，覆掩廻廊。侵晨人靜，坐金絲樹上，瞰曲池倒影，游魚往來，如戲枝頭，使人生濠梁間想。入夏，明湖中蒲荷昌茂，當夕陽西下，登浩然亭東望，則見畫舸穿綠，菡萏颭紅。而歷下亭、鐵公祠諸勝，半爲蒼萃蘷薇，益饒逸致。深秋而衰柳拂塘，嚴冬而瑩雪壓柏。靜言思之，並入畫境。同人等或喜考據，或耽吟咏，退食之暇，各稽所業。仕流譏爲書蠹，學人羡其登仙。私心竊幸，擬終

吾生於斯矣。乃曾幾何時，舉目已有山河之異。回首前塵，都如夢寐。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情其何以堪耶？

山居月餘，乃得家書，悉寇軍尚未侵至。惟匪盜如毛，一夕數驚。聞彼輩但掠財糧，尚不刼質。吾家既無存款，食糧亦盡，當無大慮，惟家人糊口堪虞耳。旋又得友人沛縣黃君通甫元亨覆書，黃君惇厚恭謹，天性過人。其學類顏習齋、李恕谷，其行類東漢獨行之士。平生與予及寶君海渟最契，前歲海渟病歿，君哭之三日不食。客冬予離曲阜南下，倉卒未即報聞。比曲阜既陷，君訊予無耗，恐死賊中，乃日跪禱於孔子像前，爲予祈命。或笑其迂，而不知季子掛劍，非侫鬼神，中懷隱痛，固未足爲常人道。吁！如此深情，吾將何以報耶？

山中無多書可讀，日長惟讀楚辭，間閱稗史遣悶。然以日聆獻唐先生講述古音韻文字及古物板本之學，獲益良多。先生時方清理舊作釋璽印諸文，每釋一字，必求其音之源，與義之始，然後究其字形，推及形音義之演變。融會貫通，如理絲，如剝筍。其精處石破天驚，令人擊節歎絕。予治考據，平庸無奇思。一日方食，先生忽投箸謂曰：「一言君須牢記：予之學，齊派也；君之學，魯派也。」予深韙其言。蓋以漢儒學風，齊人多瑋奇之說，魯人則硜硜墨守也。

方吾輩之離魯也，南京既陷，韓氏復節節竄退。倭寇挾其戰勝餘威，南北夾攻，徐州已岌岌可危。三月杪，我軍在臺莊大勝，殲敵近萬。一時人心大振，倭氣漸餒。四月上旬，館中書物，始由太古渝公司運到。爾時山東大學，已奉部令結束。吾輩則決意留萬，暫不他移。交運書物，附有參考書少許，既已到達，取而讀之，遂不似前此之寂寞。獻唐先生，肆力箸述，晨興握管，

恒至中宵不輟。每得新義，輒喜相告語，余或未達，則呶呶致辯。有時互爭，至於聲色俱厲。結習難空，滄桑都忘矣。是月中旬，得濟南消息，乃悉韓復榘退卻時，將濟南公廨，太半焚燬，本館亦付諸一炬。（獻唐先生，於本書題辭中，所深致慨歎者，即為此消息而發。後得確耗，知本館為軍民所掠，非被焚也。）予等聞而悲憤，累日不懌。予擬編為館史，以資紀念。獻唐先生忿然曰：「休，休！復胡為者？是徒亂人意耳！」其悲愴之情，可想見矣。

其後銅山失陷，魯省淪入敵人後方。私念吾輩生活費用，殆不能繼續發放；而館中存款無多，為持久計，勢須節省，因相商為予別謀枝棲。初擬薦余為某君私人秘書，後復欲薦予任某報編輯，予恐不能勝任，未敢應命。獻唐先生，復致傅孟眞（斯年）先生一函，託其說項，欲於學術機關，謀一噉飯之地，其函略云：「敝館同事，屈翼鵬（萬里）兄，為吾東魚臺縣人，郁大畢業，任館中編藏部主任多年，品粹學優，弟恃為左右手。目錄版本之學，固其所長，少邃於經，治易十數年。近隨弟押運館中文物來萬縣，同居一室，以暇寫成周易彖象傳述例一書，仰兄碩學，特囑呈教。其書實事求是，綜合全經文句，比對詳究，求得義例。其方法似成蓉鏡，而精密過之；又近焦里堂，而無其牽就之失。昔人恍惚幽眇之談，一掃而空，殆以近代科學方法治之。雖易學不為時賢所喜，然鴻識博學廣羅萬象如兄者，必不以其不合時宜擯之也。翼鵬在館中季刊，及齊大季刊，並報章雜誌，發表之文字尙多，以非近作，不欲呈覽。此君青年幹練，治學治事，皆極謹嚴。隨弟閒居，久非所宜，以激於愛國熱誠，欲旋里辦游擊隊，弟力止之，仍欲其服務文化界也。」然苦乏機緣，迄無成就。旋聞駐陝某師長，招聘記室，曾囑宋梅村兄，代為延

攬。予乃決意北行，將以梅村之介，一度戎馬生活。爾時獻唐先生，已受中英庚欵委員會之約，擔任史學研究員。惟指派於何處工作，尙未發表。因相約當局如准撥經費，俾書物能隨其運移，則事畢後予即另謀工作；否則，予將留萬邑守書。蓋研究員例須在大學中工作，而萬邑無之，故獻唐先生必將派赴他處也。至十月，得會中通知，被派於樂山武漢大學。館中書物，當局亦准移樂山保存。於是乃準備西上，西安之行，遂作罷論。

十月杪，予率李僕，下山入城，辦理移運事宜。時我軍初由武漢撤退，江中軍運頻繁，客貨運輸已停。賴是公物，幾費周章，始得附民生公司之民憲輪西行。十一月三日抵重慶，繼辦轉運手續。當予以小舟運書箱入輪時，雨滑舷窄，於駁船上失足，幸余身健捷，得攀纜以免，然一股已沒及膝上。是時四周舟子熟視不救。以彼處江流之急，脫非迅執船纜，吾爲魚矣。因念此次避難入川之魯籍同鄉，在長江及漢水溺斃者，已達二十餘人。倘觀眾肯仗義營救，必得半數不死。後聞人言：「如船危時，亟呼救得一人者，當以若干元爲酬，則拯溺者必紛紛至。」嗟乎！見死不救，民情之薄可見，杜工部詩云：「形勝有餘風土惡。」其信然矣。

十一月十一日，離渝西行。當日宿江津，次日泊合江，又次日駐瀘縣，十四日抵宜賓。計程約九百里，羣山夾江，略似萬渝間航程；惟間有平壩，則與川東稍異耳。在宜賓居停三日，換木船溯岷江北上。江水雖涸，其流猶急。每遇險灘，則挽纜者皆匐匍而行，欵乃邪許，聲震山谷。最險處若叉魚寺、道士罐諸灘，覆舟者蓋比比焉。江岸雖無大山，然皆秀麗可愛。每當風雨之夕，繫舟江村，細味「船底江聲篷背雨，旅人聽得最分明」之句，耿耿不寐，覺閒愁萬鍾，恰似

滔滔江水矣。船行八日，於二十四日抵樂山，旋僦居於城內天后宮中。自載書離稷下，流徙至此，計程凡七千餘里，爾後館中文物，當不至再播遷矣。

樂山古屬大夜郎國，漢爲武揚，唐爲嘉州，後世爲嘉定府治。城當大渡河及岷江之交，山川廻護，風物清幽。而凌雲九峯，峭峙岷江東岸，竹林蓊鬱，尤爲秀絕。昔人有「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嘉之山水在凌雲」之語，雖不免浮誇，然以較桂林諸山，或亦伯仲之間耳。境內古蹟，今存者以爾雅臺爲最早。所謂子雲亭鄧通宅，皆已無蹤跡可尋。爾雅臺在烏尤寺旁，爲犍爲郭舍人注爾雅處，俗謂郭景純者，非也。岷江上游距城十餘里處又名平羌江，太白詩：「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即謂此。城東隔江舊有廙公樓，供揚子雲、岑嘉州、李太白、蘇東坡諸像，在今龍泓寺左近，蘇長公曾於此結廬讀書。今凌雲寺旁之坡公讀書樓，非故迹也。龍泓寺有洞四五，中多宋元人題刻，惜石質鬆劣，剝蝕殆盡。聞程公洞唐宋以來刻辭頗多，蓋亦猶是矣。凌雲寺在凌雲山巔，始建於唐時，又名大佛寺，因其旁石佛得名。石佛者，就凌雲山峭壁鑿成，創始於初唐沙門海通，後世繼續修造，至晚唐建南節度使韋皐始竟全工。佛身高三百六十尺，濯足於江，露頂於山，莊嚴偉大，迨無匹儔。寺右有治易洞，爲明時邑人安磐治易之所，尚存卦圖碑四，太半剝落。稍後又有讀易洞，則宋州守吳秘故迹，有蘇東坡題十二大字，亦皆漫漶難辨。讀易必於洞，宋以來之易學可知。而依附名勝，嘯傲烟霞，以終南山爲捷徑者，宋以來亦數數見矣。岷江及大渡河沿岸多漢墓，鑿崖爲穴，俗呼蠻子洞，謂是六朝時夷人穴居之遺址，非也。大者門內寬敞如堂，再進爲室二間，室濶約五六尺，深至十餘丈，堂壁及洞口，間刻有人

王獻唐先生爲「載書播遷記」題詞
（本文原名載書飄流記）

物或鳥獸圖飾，頗古拙可愛。今貧民尚有居之者，儼然太古之俗，重見於今日也。

在樂山停居五月，日長多暇，惟假讀書遊覽遣悶。每日晨間以兩時治易，午後以兩時遨遊，餘時則溫習經子。計五閱月中，凡治周易一過，簽出新得四十餘條。經子之類，若周禮、公羊傳、穀梁傳、爾雅、孝經、國語、國策、管子、墨子、莊子、荀子、列子、孫子、吳子、尹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賈子、春秋繁露、淮南子、大戴禮、說苑、白虎通、論衡等書，或重閱，或新讀，皆粗覽一過，得劄記二册。蓋他日擬述爲先秦兩漢五行學說流變史一書，劄記所錄，多此類材料也。然邊陲致書不易，尚多要籍，不得入覽，是可憾焉。

當書物妥存之後，卽擬踐萬邑之約，值教育部有介紹教育界失業人員之舉，因具函聲請登記。部中審查證件，歷兩月畢事。旋派予赴江津國立安徽中學，教授國文。予以任教之經歷甚淺，恐難勝任，因未應命。適渝中另有機緣，余乃決計南下。遂與獻唐先生，訂後約而別，時五月十一日也。

附：山東省立圖書館第一次運往曲阜金石典籍書畫目錄

金石類（陶磁玉器甲骨等坿）

商父乙鼎一　商羊鼎一　商韋鼎一
商鼎一　商五戈足形鼎一　商父丁鼎一
商鬼酉形鼎一　商父己敦一　商鳳爵一
商父辛爵三　商父己爵一　商祖癸爵一
商父丙爵一　商父壬爵一　商父癸爵一
商兄癸爵一　商乙爵一　商子爵一
商子每爵一　商[illegible]爵一　商父辛觶一
商父乙觶一　商鬼酉形觶一　商無字戈一
商鉤兵二　商亞形鋢一　周彧伯鼎一
周明我鼎一　周此贏鼎一　周珙從鼎一
周五敦一　周孟峙敦四　周杞伯父敦一
周䍙敦一　周員父敦一　周靈敦一
周史宂簠一　周長湯匜一　周鑄子撫匜一

周孟姜匜一　周孟嬴盤一　周日壬卣一
周寺伯鬲四　周壺一　周珙從盉一
周珙從觚三　周無字殘觚一　周從角三
周小銅勺一　周銅鏃二　周司徒戈一
周鄲王戢戈一　周武戈一　周子戈一
周鹽右戈一　周就戈一　周白祈戈一
周亜戈一　周丘戈一　周利戈一
周成享戈一　周高肖瘖戈一　周目戈一
周⋇戈一　周劍一　秦子戈一
秦平陽矛一　秦二世元年詔版一　秦愁思鏡一
漢南皮侯家鼎一　漢衞少主管邑家鼎一　漢永初鍾一
漢龐氏量一　漢千秋量一　漢汲縣家鋗一
漢子孫鹿盧鐙一　漢昭明鏡一　漢佳人鏡一
漢四門方鑑一　漢鉛華鏡一　漢見日之光鏡一
漢家常富貴鏡一　漢大吉銅器一　漢厭勝鉛人二
漢王□鐵犂一　漢半兩泉銅范一　新莽大泉五十銅范二
新莽貨泉銅范一　新莽布泉銅范一　六朝海獸葡萄鏡一

北魏永安二年鎏金像光一　北齊武平鎏金造像一　隋開皇十七年銅造像一
漢熹平石經殘石百十二　魏三體石經殘石二十一四　商有字卜骨九片
周髑士陶罍一　秦詔瓦量一　周秦漢封泥四百九十二〇
宋青磁盤一　宋哥窰白磁盤一　宋磁香爐一
宋龍泉爐一　明成化彩花大盌二　明成化素黃大盤八
明萬曆五彩盤一　清康熙朱龍大盤七　清康熙青花盌二
清康熙仿哥窰加彩盌三　清雍正五彩盌二　清雍正梅雀瓶一
舊玉彝六　舊玉觥一　舊玉連環杯一
舊玉鶯一　舊玉瓶三　舊玉透花杯一
舊玉花插二　舊玉人一　舊玉鴨一
漢玉璲一

右金石器物都凡七百三十四品

書籍類

易學啟蒙通釋二卷圖略一卷十二冊　宋胡方平撰　元刊本
玩易意見二卷一冊　明王恕撰　明正德元年刊本

周易本義析疑不分卷十二册　清劉以貴撰　清稿本

周易研翼不分卷十六册　清王蕙蘭撰　清稿本

周易要義十卷八册　宋魏了翁撰　舊鈔本

周易函書不分卷存二册　清胡煦撰　舊鈔本

周易示掌不分卷四册　清袁樸撰　清稿本

易學宗翼三十卷十二册　清吳應瑞撰　清寫進呈本

尙書注疏二十卷八册　李元陽刋本　許印林手校

尙書要義不分卷十二册　清宋書升撰　稿本

子貢言詩一卷一册　明天啓刋本

詩地理考六卷二册　宋王應麟撰　元刋本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十四册　明李元陽刋本　許印林手校

儀禮集說存十二卷十八册　元敖繼公撰　元刋本

禮說集說十六卷十六册　元陳澔撰　清乾隆刋本　柳塘手校

夏小正釋義二卷二册　清宋書升撰　稿本

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十册 明李元陽刋本 許印林等校
續春秋三界考一卷一册 清宋書升撰 稿本
孝經外傳二卷二册 清錢大年撰 舊鈔本
刋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一册 宋岳珂撰 影宋抄本
古文尚書考二卷二册 清惠棟撰 益都李氏抄本 戴東原等手校
禹貢說義稿不分卷一册 清宋書升撰 稿本
歐陽毛詩本義十六卷六册 宋歐陽修撰 明影宋寫本
詩略說八卷五册 清宋書升撰 稿本
周禮讀本六卷四册 清周樽注 原刋本 王菉友手批
禮記注疏六十三卷二十册 明李元陽刋本 許印林手校
禮記讀賸稿存九卷二册 清王筠撰 稿本
禮書百五十卷二十四册 宋陳祥道撰 元刋鈔補本
左傳注疏六十卷二十二册 明李元陽刋本 許印林等手校
孝經一卷一册 通行刋本 宋書升手批

經典釋文三十卷十四册 明影宋寫本

經義雜記三十一卷六册 清臧琳撰 王菉友手批 原刋本

經義述聞存二十一卷八册 清王引之撰 王菉友手批

拜經樓抄書七種不分卷二册 清吳騫輯 底本

孟子輯釋通考存二卷二册 明初刋本

孟子集注大全存四卷四册 明胡廣等撰 明初刋本

四書故述不分卷十一册 清邵大緯撰 稿本

論語五卷二册 清宋書升注 稿本

苑洛志樂二十卷八册 明韓邦奇撰 明嘉靖刋本

爾雅一卷 卷子本

爾雅翼三十二卷六册 宋羅願撰 明正德李氏刋本

說文解字存七卷四册 明汲古閣刋本 桂未谷錄惠定宇校語

說文繫傳考異不分卷一册 清朱文藻撰 王菉友手校 稿本

古文四聲韻五卷五册 宋夏竦撰 清乾隆刋本 桂未谷手校

讀經劄記四卷五册 清單爲總撰 稿本

中庸章句章圖纂釋一卷一册元刋本
孟子節文七卷一册明劉三吾節錄 明洪武刋本
同上存五卷四册
四書故逑補不分卷十一册同上 稿本
樂書存四册宋陳暘撰 元至治覆宋刋本
律呂新義六卷四册清江永撰 稿本
埤雅二十卷十册宋陸佃撰 明翻宋本
腜鯖小記不分卷二册清顏崇槼撰 稿本
說文解字十五卷十册清廣州局本 陳簠齋手校
說文解字注三十卷十八册清段玉裁撰 崇文局本 吳廣汴手校
隸釋二十七卷十四册宋洪适撰 清汪氏刋本 桂未谷陸繩夫批校
字鑑五卷五册元李文仲撰 舊抄本 方成珪手校
六書總要五卷二册明吳元滿編 明萬曆刋本 趙凡夫手批
韻書坿免疑雜字不分卷一册不著撰人 元抄本
揅經室十七部古韻譜不分卷一册清阮元撰 底本

字母反切指蒙一卷一冊 清畢履謙撰 稿本

六書本義十二卷三冊 明趙撝謙撰 明正德刊本

莊氏心法不分卷一冊 清莊述祖撰 陳簠齋手校 抄本

洪武正韻五卷五冊 明樂韶鳳等撰 明高唐王篆書刊本

說文諧聲孳生述不分卷二冊 清陳立撰 底本

右經部凡六十五種四百二十冊又一卷

史記百三十卷二十四冊 明刊本 李南澗手批

漢書地理志目一卷一冊 陳簠齋校抄本

後漢書補注二十五卷三十二冊 清惠棟撰 朱氏編抄底本

晉書存一卷一冊 元大德刊本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六冊 宋吳縝撰 大雲山房抄本 邵二雲手校

資治通鑑存六冊 元至元興文署刊本

漢書存二冊 宋刊本

後漢書存二冊 宋刊本

三國志存六十一卷十五冊 宋刊元明修補本

北史存八册元大德刊本

金史存三册元至正刊本

同上存四册

增入名儒講義續資治通鑑長編存一卷一册宋李燾撰 元刊本

資治通鑑綱目集覽五十九卷二十册元王幼學撰 明永樂經廠本

通鑑紀事本末存六册宋袁樞撰 宋寶祐刊本

鴻猷錄十六卷八册明高岱撰 明嘉靖刊本

圍城日錄不分卷二册清徐從治撰 清初抄本

建文年譜二卷二册明趙士喆撰 明刊本

戰國策十卷四册宋鮑彪注 元至正刊抄補本

南渡錄四卷四册舊題宋辛棄疾撰 清初抄本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二册宋范仲淹撰 清初影元抄本

甲寅年譜二卷二册清牛運震撰 稿本

恭賀徐大中丞開府江南序一卷一册清楊繩武撰 膠礬寫本

殷頑錄六卷六册清楊錫棨撰 清初抄本

資治通鑑綱目存一卷二册宋朱熹撰 元至順刋本
偏安排日事蹟十四卷八册不著撰人 清初抄本
同上存一册宋嚴州刋本
行朝錄三卷二册清黃宗羲撰 舊抄本
明太宗實錄百二十一卷九册明抄本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存三卷一册舊鈔本
貞觀政要十卷八册唐吳兢撰 明成化刋本
英傑歸眞不分卷二册清何春發等撰 抄本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三十二册明蔡復賞輯 明萬曆刋本
蘭省東歸記一卷坿漢牘抄二册清牛運震撰 稿本
顧亭林年譜校錄一卷一册清王筠撰 稿本
書林雁塔不分卷一册清孔尚任撰 舊抄本
古今氏族紀里二十六卷十四册清邵大緯撰 稿本
恩平程記不分卷一册清李文藻撰 稿本

丁巳赴百色軍營日記不分卷三册 清李憲喬撰 稿本

粤遊紀程不分卷一册 清晏端書撰 稿本

安祿山事蹟三卷二册 唐姚汝能撰 清道光抄本

先秦宮殿考一卷一册 清牟庭相撰 稿本

蘇州府纂修識略六卷二册 明楊循吉纂 明刊本

續歷城縣志十五卷八册 清成瓘撰 高翰生手批

邊略存四卷四册 明高拱撰 明刊本

古今名勝紀里三十一卷十五册 清邵大緯撰 稿本

方輿叢錄不分卷十二册 清許鴻磐輯 稿本

唐六典三十卷三册 影明正德寫本 劉履芬手校

晉遊日記略不分卷二册 清畢際有撰 底本

赴岑溪日記不分卷二册 清李懷民撰 稿本

使滇紀程不分卷一册 清晏端書撰 稿本

西江軺程記不分卷一册 同上 稿本

三輔黃圖六卷四册 孔則君手抄本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十册 唐李吉甫撰 影宋抄本

安邱縣志二十八卷續志六册 明馬文煒撰 高翰生手跋 影明寫本

修攘通考七卷六册 明何鏜輯 影明寫本

三雲籌俎考存三卷三册 明王士琦撰 明刊本

增補武林舊事八卷一册 明朱廷煥增補 清康熙刊本

泗州考古錄一卷一册 清許鴻磐撰 稿本

通志存三卷六册 元至治刊本

通志存一卷一册 元至治刊本

同上三百八十四卷二百册 明嘉靖司禮監刊本

絳雲樓書目不分卷一册 清錢謙益編 王芑孫手跋 抄本

讀書敏求記四卷四册 清錢曾撰 清乾隆刊 過錄許蒿菴評校

清閨秀藝文志五卷一册 單士釐撰 稿本

簠齋金石墨拓釋存不分卷一册 清陳介祺釋 原拓手釋本

金石碎墨不分卷四册 清陳介祺藏器 拓本

金石彙目分編不分卷十四册 清吳式芬編 稿本

歷代鐘鼎彝器欵識法帖二十卷八册宋薛尚功撰 明影寫薛氏稿本

西清古鑑坿錢錄五十六卷三十二册清梁詩正等編 殿本

攈古小廬金文集釋一卷一册清許瀚撰 稿本

十鐘山房金文不分卷四册清陳介祺藏器 拓本

文獻通考存二册元至元刊本

玉軒新纂古今書目二卷二册明劉元亮撰 稿本

天一閣進呈書目標注不分卷四册清范懋柱等編 抄本

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不分卷一册清楊保彝編 底本

金石苑不分卷八册清劉喜海編 底本

寶簠齋藏古目不分卷一册清陳介祺編 底本

彝器欵識僞彙編刻不分卷四册拓本 陳簠齋等題記

增廣金石名著彙目一卷一册田士懿撰 稿本

同上三册清初精抄本

刻鵠軒集古錄一卷一册清王筠撰 稿本

金文釋存不分卷一册清陳介祺釋 清抄本

二百鏡齋鏡文不分卷四册 清陳介祺藏器拓本

攈古錄金文三卷九册 清吳式芬編 丁少山批校

同上十卷六册 清稿本

觀古閣泉拓不分卷二十四册 清鮑康編 拓本

攀古樓鏟布譜一卷一册 清潘祖蔭編並手跋 拓本

簠齋藏古之十鐘山房印舉不分卷十册 清陳介祺藏 鈐本

萬印樓璽印零拾不分卷十册 清陳介祺藏 鈐本

集古官印考存十三卷七册 清瞿中溶撰 陳簠齋手批 原刊本

稽菴古印箋四卷四册 孫文楷撰 稿本

簠齋封泥彙存不分卷四册 清陳介祺藏 拓本

攀古樓疑識目不分卷三册 清潘祖蔭編 陳簠齋手校 抄本

金薤琳琅二十卷四册 明都穆撰 吳子苾錄 清乾隆刊本 何義門校語

姚柳屏先生遺著不分卷七册 姚鵬圖撰 稿本

泉緣滙珍記十一卷十册 清張兆蘭撰 稿本

古泉彙考不分卷八冊 清翁樹培撰 抄本

選青閣八家泉譜十五卷十五冊 清鍾淦輯 彙拓本

南海李氏寶彝堂泉譜一卷一冊 清李宗岱編 稿本

古印朱墨合拓七卷七冊 清陳介祺藏 鈐本

雙虞壺齋印存七卷五冊 清吳式芬編 陳簠齋手跋

頤素齋印景不分卷四冊 清何慶涵輯 鈐本

鑑古齋印存一卷一冊 同上 底本

二百笵齋笵文彙編不分卷六冊 清陳介祺撰 拓本

石刻鋪敍二卷一冊 宋曾宏父撰 許印林手跋 抄本

歷代石經略二卷二冊 清桂馥撰 稿本

簠齋陶文釋存不分卷十六冊 清陳介祺撰 底本

齊魯陶文不分卷百十二冊 清陳介祺藏 拓本

天壤閣瓦文不分卷四冊 清吳式芬編 拓本

輿地碑目四卷一冊 宋王象之撰 寶芸齋抄本

濟寧漢碑釋文一卷一册清張　弨撰 顧藹吉校抄本

山左金石約錄不分卷二册清宋書升撰 稿本

齊乘六卷二册元于欽撰 清乾隆楊書岩抄本

攀古小廬磚瓦文字不分卷四册清許瀚撰 底本

山左瓦當文字不分卷二册清吳大澂摹釋 初刻本

金石志不分卷二册明于奕正撰 明抄本

長安獲古編六卷六册清劉喜海編 陳簠齋等考釋 稿本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存二卷二册元胡一桂撰 元大德刊本

海廟集四卷四册明任萬里等撰 清初毛扆手抄本

右史部凡百二十種九百四十六册

荀子二十卷十册明世德堂刊本

新書二卷二册明正德刊本

說苑存二册元刊本

文中子十卷四册明刊本 方柳橋手校

同上存十二卷八册宋刊明修補本

賈子十卷四册明正德刊本

五臣音注揚子法言十卷八册明世德堂刊本

說苑存四卷二册明洪武刊本

眞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存一卷二册明刊本

黄氏日鈔存二十三册宋刊配元至元刊本

事親述見不分卷五册明朱厚煐撰 明嘉靖衡藩刊本

諸葛武侯兵要九卷四册宋刊本 郭青螺手批

黄帝素問靈樞集註十二卷一册明初刊本

東醫寶鑑二十五卷二十五册明許浚撰 明高麗刊本

嘉靖二十六年大統曆一册明欽天監刊本

陳氏天文算學叢書廿三卷廿三册清陳希齡撰 底本

內臺星象秘占不分卷五册明抄本

焦氏易林二卷八册明仿宋刊本

圖書說一卷一册王筠輯 王氏手寫本

黄山谷題跋三卷二册茅藕亭手寫本

圖繪寶鑑六卷四册 元夏文彥撰 元至正刊本

畫雜俎三十二卷三十二册 清袁樹撰 稿本

經書性理類輯精要錄六卷十二册 清王士陵撰 四庫底本

虎鈐經十六卷五册 宋許洞撰 明抄本

重校聖濟總錄二百卷二十册 明抄本

成化八年大統曆一册 明欽天監刊本

大統靈錦經二卷一册 不著撰人 舊抄本 李尚之等手跋

中菴籤易不分卷三册 明盧翰撰 稿本

乾隆寶典不分卷十六册 明抄本

六壬神定經存一卷一册 宋楊維億撰 明抄本

東坡題跋一卷一册 茅藕亭手寫本

書錄三卷一册 宋董庚撰 八千卷樓抄本

微波榭抄書三種三卷一册 清孔繼涵輯 底本

桑梓之遺書畫册目錄五卷一册 清陳介錫編 稿本

同上三卷桑梓之遺一卷二册陳氏手定底本

鏡鏡詅癡五卷二册清鄭復光撰 王十友手批 道光刊本

鷃冠子一卷卷子本

淮南鴻烈解存十九卷九册明嘉靖刊本

日知錄三十二卷八册清顧炎武撰 清初抄足本

風俗通義存五卷一册明翻元刊本

老學庵筆記十卷四册宋陸游撰 汲古閣本 繆小山錄黃蕘圃批校

習學記言存二卷一册宋葉適撰 明影宋寫本

少室山房筆談四十九卷十六册明胡應麟撰 明刊本

古歡堂筆記不分卷一册清田雯撰 稿本

棗林外索不分卷二册清談遷編 舊抄本

王菉友雜稿不分卷一册稿本

印典八卷二册清朱象賢撰 辨嫭居校抄本

蟹略四卷續一卷二册宋高似孫撰 明抄本

墨子三卷一册影攝明正德俞氏抄本

同上二十一卷十冊明閔刻本
倦遊菴槧記三十卷十四冊清周悅讓撰底本
封氏聞見記十卷二冊唐封演撰　清乾隆刊黃蕘圃手校
霏雪錄一卷一冊明鎦績撰　清初抄本黃蕘　手校
瀛南子二卷二冊明張　松撰明刊本
國憲家猷存七卷七冊明王可大撰明刊本
長途備忘錄不分卷一冊清李文藻撰稿本
一枝集四卷四冊清邵大緯撰稿本
自警編存七卷十冊宋趙善璙編元刊本
爲善陰隲十卷四冊明成祖撰明刊本
焦氏類林八卷四冊明焦竑撰明刊本
儼山外集四十卷十二冊明陸深撰明刊本
北堂書鈔存三十一卷四冊清仁和王氏抄本嚴鐵橋校
古今事文類聚存四十四卷二十冊元刊本
玉海校勘記不分卷一冊清劉寶楠撰稿本

王氏族譜存三卷一册 明王象晉修 汲古閣刊本

虞初志八卷八册 明如隱草堂刊本

五霸七雄列國志傳存四卷四册 明刊本

粧鈿鏟傳四卷四册 清襱樴道人撰 稿本

山海經箋疏存十五卷三册 清郝懿行撰 王棻友等批 原刊本

大般涅槃經一卷 卷子本

便於蒐檢四卷四册 明朱右禪撰 明刊本

焦螟集八卷八册 不著撰人 朱竹垞校抄本

藝文類聚百卷十二册 明張松刊本

太平御覽存六十一卷八册 明抄本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存十九卷六册 元延祐刊本

新編翰苑新書存三卷一册 劉子實撰 明抄本

唐摭言十五卷四册 唐王定保撰 清道光方氏抄本

何氏語林三十卷二十四册 明何良俊撰 明刊本

楊家將不分卷四册 不著撰人 明抄本

李闖賊史十卷十冊清無氏撰 清初抄本
江淮異人錄不分卷一冊宋吳淑撰 清吳枚菴 手抄本 黃蕘圃手校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一卷卷子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卷子本
同上一卷卷子本
同上七卷一冊元刊小字本
維摩詰所說經一卷卷子本
金光明最勝王經一卷卷子本
華嚴懸談會玄記存五卷五冊元刊本
五燈會元存四卷四冊宋寶祐刊本
列子八卷六冊明世德堂刊本
莊子南華眞經十卷六冊明刊中立四子集本
南華指月五卷六冊清張士保撰 稿本
三子口義存十三卷六冊明萬曆刊本
妙法蓮華經一卷卷子本
同上六卷六冊元刊本

同上七卷七册明刊本三色批校

賢護菩薩所問經一卷卷子本

寶篋印陀羅尼經一卷宋初吳越國王刊本

大唐後三藏聖教序一卷卷子本

沖虛至德眞經存二卷坿南華經存二卷二册元刊本

莊子鬳齋口義存三册元刊三子口義本

南華眞經副墨八卷六册明陸西星撰明刊本

古文周易參同契發揮訂正七卷二册明高時明訂正抄本

有是齋老莊合牋三卷四册清蘇質民撰稿本

右子部凡百又四種六百五十三册又十一卷

楚辭集注八卷坿錄八卷八册宋朱熹注明嘉靖刊本

三都賦一卷卷子本

庾子山集十六卷坿錄二卷六册清康熙刊本孔顨軒手批

杜律五言注三卷三册清查弘道等補注康熙刊本　查愼行手批

韋蘇州集四卷二册宋刋本

同上存八卷四册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十六册明永懷堂本丁壽昌手批

呂和叔文集十卷二册唐呂溫撰清初抄本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十册唐崔致遠撰明高麗活字本

范文正公集存一卷一册宋乾道刋本

鄱陽集十二卷二册宋彭汝礪撰微波榭抄本

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存四卷六册元刋本

嵇中散集十卷四册明南星精舍刋本

陰常侍集一卷坿集二種一册梁陰鏗撰抄本莫棠手跋

張曲江集二卷一册明嘉靖刋本

杜詩通解提要十四卷六册清吳瞻泰選許印林手批

朱文公校昌黎集四十卷坿錄二卷十六册元刋本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集四十卷十二册清乾隆刋本吳摯甫手校

韓集箋正五卷年譜一卷八册清方成珪撰稿本

歐陽行周文集八卷二冊 唐歐陽詹撰 明萬曆刊本

武夷新集二十卷六冊 宋楊　億撰 明嘉靖刊本

同上存一冊 元歲寒堂刊本

六一先生文鈔不分卷一冊 抄本

龜父集二卷二冊 宋洪朋撰 清長洲顧氏抄本

西渡集不分卷二冊 宋洪炎撰 清長洲顧氏抄本

浮溪文粹十五卷四冊 宋汪藻撰 明正德刊本

晦菴先生文集存七冊 宋浙江刊本

誠齋集存二十七卷十冊 宋楊萬里撰 明影宋抄本

汪水雲詩不分卷二冊 宋汪元量撰 清初抄本

滏水文集二十卷四冊 金趙秉文撰 明抄本

月屋樵吟四卷二冊 元黃庚撰 趙清常校 明抄本

范德機詩集七卷四冊 元范梈撰 元刊本

文翰林甫田詩選二卷二冊 明文徵明撰 丁少山等手跋 明刊本

燕喜堂集十五卷十四冊 明劉一相撰 清初抄本

小築邇言八卷六册 明徐〻標撰 清道光丁氏輯編底本

濟南百詠不分卷一册 清王象春撰 抄本

老圃集二卷二册 宋洪芻撰 清長洲顧氏抄本

北海集存三十四卷三册 宋綦崇禮撰 舊抄四庫底本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十二册 宋陳傅良撰 明弘治刋本

南岳詩稿二卷坿集二種二册 宋劉克莊撰 徽波榭抄本

心史七卷四册 宋鄭思肖撰 明刋本

許白雲先生文集四卷四册 元許謙撰 明嘉靖刋本

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十册 元虞　集撰 元刋抄補本

東林外集七卷一册 元袁士元撰 知不足齋抄本

焦氏澹園集四十九卷十六册 明焦竑撰 明刋本

岱宗藏稿五十卷十二册 明楊夢衮撰 明刋本

唾餘集不分卷二册 明呂懋修撰 抄本

王孟津詩文集不分卷一册 清王　鐸撰 稿本

雲門全集不分卷三册清雲和尙撰 清初抄本

丁野鶴詩集九卷六册清丁耀亢撰 原刊本

揖雲齋集不分卷三册清鈕銹撰 底本

麗則集不分卷一册清孔毓埏撰 稿本

西圃近稿一卷一册清田同之撰 底本

南阜山人全集六十卷十册清高鳳翰撰 底本

南澗文稿不分卷八册清李文藻撰 稿本

南澗文集一卷一册同上 閻湘慧編 閻氏編定底本

子梅詩穩六卷六册清王鴻撰 稿本

晚學集七卷二册清桂馥撰 稿本

李少鶴詩草不分卷二册清李憲喬撰 稿本

卷施閣近詩不分卷一册同上 稿本 張船山題記

匪石齋詩草不分卷二册清李復泰撰 稿本

織齋文集八卷八册清李煥章撰 底本

潤堂詩草一卷一册　清畢海珖撰　稿本　趙秋谷手批

他山詩鈔不分卷一册　清查愼行撰　查氏改定底本

歸雲集不分卷二册　清高鳳翰撰　稿本

宋潛虛先生文集十四卷十册　清戴名世撰　舊抄本

李南澗文稿二卷二册　同上　底本

南澗文集不分卷四册　同上　本館抄本

小倉山房詩鈔三十二卷十册　清趙賡颺注　底本

未谷詩集二卷一册　清桂　馥撰　顏崇槼編定底本

更生齋詩存二卷二册　清洪亮吉撰　稿本

松露書屋詩不分卷四册　清郝允秀撰　稿本

種李圈近稿二卷二册　清顏崇槼撰　稿本　阮芸臺手書序

李湘浦詩稿不分卷二册　同上　稿本　吳山尊等手批

揚州過客集一卷一册　清田　滋撰　底本

柳韻樓詩選一卷一册　同上　底本

蒓友書問不分卷一册集裝手札本
髯金山館咏人集一卷一册深牟房撰稿本
文選存二卷二册宋刋本
九僧詩不分卷一册宋陳充編抄本
皇朝文鑑存十卷六册宋呂祖謙編宋嘉泰刋本
十家宫詞不分卷二册不著輯人孔葒谷手抄本
海岱會集十二卷一册胡馮琦編抄本
皇華集六卷六册明劉鴻訓等撰明高麗刋本
李湘浦先生詩稿不分卷四册清李廷芳撰稿本錄紀曉嵐評語
袁江于役草一卷一册同上稿本
柳韻樓泉上吟一卷一册同上底本
劉孟瞻文集不分卷二册清劉文淇撰底本
石笥山房集十八卷十二册清胡天游撰高均儒手校　原刋本
至堂先生手札不分卷一册清楊以增撰許印林集裝手札本
六家文選六十卷四十册明嘉靖袁氏刋本

萬首唐人絕句百一卷 宋洪邁編 明嘉靖刋本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存二卷四册 元刋本
麟溪集存九卷三册 元鄭大和編 元至正刋本
詩所五十六卷十二册 明臧懋循編 毛西河手批
扶輪廣集十二卷十一册 清黃傳祖選 曹貞吉手批 順治刋本
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甲集八卷六册 清金喟選 馮文炌批 原刋本
閨閣語林存一卷一册 清王士祿撰 稿本
清初四家七言古詩選不分卷一册 清田肇麗編 底本
海岱人文四十卷十册 清王懿榮輯 彙輯微波榭抄本
漁隱後話四十卷二十册 宋胡仔撰 舊抄本
種李園詩話四卷一册 清顏崇椝撰 稿本
傚樂府補題五詠不分卷一册 清孔繼涵輯 孔氏手寫本
西圃詞說一卷一册 清田同之撰 底本
白雪齋選訂樂府吳騷合編四卷四册 明張楚叔等編 明刋本

軟錕語二卷二册 清孔傳鋕撰 抄本

覆瓿社燈謎一卷一册 清王筠撰 稿本

燃脂集存三卷二册 清王士祿撰 底本

同上存一卷一册 王子邕清抄本

高密三李文抄不分卷一册 清劉鴻翱編 底本

王氏殊卷不分卷二册 明王重光等撰 明清分刊合訂本

西圃文說一卷一册 清田同之撰 底本

詩竹詞一卷一册 清田同之撰 底本

漁父詞一册坿錄一卷一册 清孔繼涵輯 孔氏手寫本

金山雅調二卷一册 明薛崗撰 底本

六觀樓北曲六種存二卷二册 清許鴻磐撰 稿本

石破天驚不分卷二册 清王筠輯 王氏手寫本

清詒堂燈謎不分卷一册 同上 稿本

右集部凡百十八種五百三十九册又一卷

百川學海存二十四卷 宋左圭輯 明弘治刊本

微波榭叢鈔六卷二冊清孔繼涵輯孔氏抄本
玉海坿刻五十五卷十八冊宋王應麟撰元刊明修補本
同上存十二冊
魚臺馬氏叢書九十五卷三十四冊馬維騏輯抄本
五峯遺書不分卷十冊清范維新撰稿本

右叢書部六種百冊

易數鉤隱圖及遺論九事四卷
漢武帝內傳一卷外傳一卷
續仙傳三卷
道德經古本篇二卷
唐玄宗御注道德眞經疏十卷
宋徽宗道德眞經解義十卷
道德眞經指歸七卷
文始眞經言外旨九卷
穆天子傳六卷

列仙傳二卷
道德眞經二卷
無上妙道文始眞經一卷
同上四卷
道德眞經注四卷蘇轍撰
道德眞經注疏八卷
沖虛至德眞經解十九卷
沖虛至德眞經義解六卷
通玄眞經注十二卷
周易參同契發揮九卷
韓非子十二卷
長春眞人西遊記一卷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十四卷
洞虛眞經注三卷
化書六卷
太玄經集注六卷

右自早刊道藏抽出本凡二十五種百七十卷
右書籍類都計凡四百三十八種二千六百五十九册又百八十三卷

書畫類

王漁洋行書詩箋一軸紙本
房可壯草書立幅一軸綾本
王覺斯行書立幅一軸綾本
王覺斯行書立幅一軸綾本
戴醇士行書横幅一軸箋本
王夢樓行書立幅一軸紙本
翁覃溪行書横幅一軸箋紙本
冒巢民行書立幅一軸畫綾本
高南阜行書立幅一軸宣紙本
劉石菴行書堂幅一軸箋紙本
何子貞行書横幅一軸冷金箋紙本
紀之行行書立幅一軸綾本
陳章侯行書立幅一軸紙本

張石民行書橫幅一軸紙本

劉石菴行書堂幅一軸畫箋本

李南澗行書橫幅一軸紙本

翁覃溪風雨對床橫幅一軸紙本

吳讓之隸書八言聯一付箋紙本

色愼伯草書堂幅一軸箋紙本

又一軸宣㡿本

又一軸宣紙本

鄭板橋行書堂幅一軸宣紙本

劉正崇行書立幅一軸綾本

法黃山書畫集錦堂幅一軸書紙本畫綾本

伊墨卿王鐵夫等題石帆拓本一軸紙本

明成化賣地卷立幅一軸紙本

馬竹五楷書立幅一軸高麗紙本

鄧東岳行書立幅一軸㡿本

郭頻伽行書立幅一軸紙本

翁叔平八言楹聯一付箋紙本

趙撝叔隸書八言聯一付宣紙本
張船山行書八言聯一付宣紙本
翁叔平行書七言聯一付箋紙本
吳窓齋篆書七言聯一付箋紙本
沈歸愚行書聯一付箋紙本
孫淵如篆書七言聯一付箋紙本
阮芸臺行書八言聯一付宣紙本
曾劼剛草書屏四幅宣紙本
陳香泉行書洛神賦卷一卷綾本
劉正宗詩札卷一卷紙本
劉石菴臨帖行書卷一卷高麗紙本
董華亭撫四家書卷一卷綾本
吳穀人行書七言聯一付箋紙本
鄭板橋行書七言聯一付宣紙本
翁覃溪行書七言聯一付箋紙本
丁龍泓隸書聯一付箋紙本
王廉生正書七言聯一付虎皮宣紙本

金侃行書七言聯一付箋紙本
高南阜右手書畫屛四幅紙本八開裝
王夢樓行書屛四幅箋紙本
董思白行書卷一卷綾本
高松軒詩稿卷一卷紙本
王漁洋等詩卷一卷綾本
何子貞字卷一卷紙本
陳眉公墨蹟卷一卷紙本
金石名家翰墨集一册紙本
王蓀友道墨一册紙本
李南澗遺墨一册紙本
文衡山小楷桃花源記一册紙本
劉武仲昆季合書字册一册紙本
巴慰祖篆隸字册一册絹本
劉石菴小楷五福頌一册箋紙本

右書之屬

蘇賀臣貨郎圖堂幅一軸絹本明仿精本
諸曦菴墨竹堂幅一軸絹本
羅兩峯墨梅立幅一軸紙本
宋人山水堂幅一軸絹本
石濤山水堂幅一軸絹本
徐俟齋花卉堂幅一軸紙本
周介存山水立幅一軸紙本
袁耀盤車圖堂幅一軸絹本
李復堂歲寒圖堂幅一軸紙本
姜穎生花卉堂幅一軸絹本
童二樹墨梅立幅一軸紙本
趙伊山水堂幅一軸絹本
高其佩山水堂幅一軸紙本
羅飯牛花卉堂幅一軸綾本
彭雪琴墨梅堂幅一軸紙本
張雪鴻人物立幅一軸紙本
藍次公山水立幅一軸絹本

劉叔憲雪山行旅立幅一軸絹本
蕭九成山水立幅一軸絹本
屠琴塢山水堂幅一軸紙本
湯雨生山水立幅一軸紙本
匡鶴泉山水堂幅一軸呑本
黃山壽人物立幅一軸紙本
黃穀原山水立幅一軸紙本
方以智山水立幅一軸絹本
項文彥畫藥師王佛堂幅一軸紙本
陳道山梅花堂幅一軸紙本
乾隆繡蓬島祥禧圖堂幅一軸綾本
李梅生牧羊圖立幅一軸紙本
何詩孫山水堂幅一軸絹本
孔蘭堂墨蘭立幅一軸絹本
朱漢文墨竹堂幅一軸紙本
毛何摹繪貫休羅漢屛四幅絹本
吳行先山水立幅一軸絹本

顯若波山水立幅一軸絹本
張子青山水堂幅一軸紙本
焦春山水立幅一軸紙本
童二樹墨梅立幅一軸紙本
王雲谷山水堂幅一軸紙本
惲南田山水立幅一軸絹本
徐比玉摹說文系統圖堂幅一軸絹本
陳眉公山水立幅一軸絹本
郭賦梅山水立幅一軸絹本
黃癭瓢人物立幅一軸紙本
查聲庭山水卷一卷紙本
禹之鼎繪漁洋爇篪唱和圖卷一卷絹本
陳眉公墨梅卷一卷絹本
黃癭瓢花卉册一册紙本
方歐餘山水册一册絹本
查集堂山水花卉册一册絹本
尤水村山水立幅一軸綾本

李昰應墨蘭屏四幅絹本
李頑石山水堂幅一軸絹本
畢蕉麓山水立幅一軸紙本
李南澗遺像堂幅一軸紙本
姚伯昂花卉聯一付絹本
飯牛圖卷一卷紙本
禹之鼎繪漁洋幽篁坐嘯圖卷一卷絹本
浙江海防圖卷一卷綾本
閔正齋墨蘭册一册紙本
董思白山水卷一卷絹本

右畫之屬

魏曹王僖造像碑拓本一軸
翁覃溪摹補磚塔銘拓本一軸
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整幅拓本二軸
寒金冷陶文字屏四幅僧六舟張叔未等題
周毛公鼎器文拓本一軸

秦詔瓦量拓本四軸陳簠齋題
周曾伯霥簠器文拓本一軸張叔未徐同柏題
周格伯敔新莽六泉拓本一軸陳簠齋題
漢陽三老刻拓本一軸丁少山題
周虢季子白盤拓本一軸劉燕庭題
齊侯皿器器文拓本一軸王廉生題
又墨拓本一軸姚柳屏等題
舊拓怡亭銘一軸楊翰題
周杞伯敔器文拓本一軸張菊如題
周散氏盤銘拓本一軸何子貞題
六朝泥造像 唐善業泥造像拓本二軸陳簠齋題
嘉慶拓本鄭固殘石一軸畢康侯題
周賢敔器文拓本一軸吳清卿潘伯寅等題
魏曹眞碑拓本（諸葛亮字未毀）一軸王錫棨題
新莽六泉拓本一軸陳簠齋題
周季良父壺拓本一軸宋晉之題

漢晉磚文拓本四軸吳庭康題

右金石拓本之屬

原載「山東文獻」，二卷三、四期（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六十六年三月），頁六——二四；頁一三三——一五二



故總統　蔣公對於圖書文物的維護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這個不祥的日子，為億萬民眾所愛戴的總統蔣公，竟離開我們而去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傳出後，眞像地坼天崩一樣。十多天來，每日數以十萬計的民眾，或含着眼淚，或涕泗交流，日夜排隊等候瞻仰蔣公遺容。擁擠的人潮，長達數公里；很多人忍渴忍飢地站上七八小時乃至十二個小時，才能進入靈堂——國父紀念館。安厝的那天，在六十公里的長途中民眾野哭巷祭，連綿不絕。這眞正是「百姓如喪考妣」！看到這種動人的偉大場面，就是鐵石的心腸，也不能不潸然淚下。

蔣公的豐功偉業，如領導北伐，完成了統一大業；領導八年抗戰，使頑敵投降；取消不平等條約，躋我國於四強之列；來臺後二十餘年，使臺灣康樂富庶，成為反共復國的燈塔。這些偉大的勳績，都昭昭在人耳目，無庸筆者再說。現在只就　蔣公對於圖書文物的維護一點，略述個人所知道的點滴。

民國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山樓落成的時候，蔣公發表了「國父一百晋辰暨中山樓落成

紀念文」，並定這天爲中華文化復興節，接着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自任會長。十年以來，風起雲湧，全國都熱烈響應。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自然也不須筆者多說。這裏所要說的，只是一般青年所沒有注意到、而和復興中華文化有重大關係的圖書文物遷移的往事。

民國二十一年，日本軍閥，已佔領了我東三省，成立僞滿洲國，而且蓄意南侵的時候，北平的局勢，岌岌可危。這時，蔣公下令撥了二百節火車，支援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圖書文物南遷。二十六年，全面抗戰軍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的古物和圖書，初遷昆明，後來又遷到四川南溪縣的李莊。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也由南京遷到四川西部的樂山。這兩事，是否由於蔣公的指示，筆者雖不知道；但這些大量的文物，遷到遙遠的地區，經費、交通等問題，政府如不給予大力支助，是無法達到願望的。三十七年冬，共匪益形猖獗，史語所全部的圖書和古物，故宮博物院所藏圖書文物的菁華，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的十二萬多册善本書，在兵馬倥傯之際，通通運來臺灣。這次大規模的文物遷移工作，主持者雖然是傅斯年先生；而大力支持的，乃是　蔣公。遷移的費用，不必說了；而那時海上交通的困難，更不堪想像。如果不是蔣公命令海軍部撥給登陸艇多次的運輸，這些對於我民族文化關係巨大的圖書文物，不可能都運到臺灣來。

史語所運來臺灣的圖書，約二十一萬册（現已達二十五萬餘册）；明清檔案，三十一萬多件；金石拓片，三萬三千多幅；有文字的甲骨，二萬五千多片；在殷墟、濬縣等地，發掘所得的古器物（銅器、骨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在十萬件以上；邊疆民族的文物，一千五百多

件；殷代人頭骨骼，四百多具；方言調查的資料，達百多個地區。（另有居延漢簡一萬多枚，是後來從美國運回的。）除了圖書之外，其餘全是原始資料。它們的學術價值——也就是藉以發揚我民族文化的價值，自然是無法估計的。

故宮博物院運來臺灣的圖書，計文淵閣四庫全書一部，三六一九九册；四庫薈要三四四六册；觀海堂舊藏及殿版書，合計約八萬多册。檔案方面，計清代宮中檔和軍機處奏摺共達三十七萬多件。而尤以古物及名人書畫最為豐富。古物方面，計有銅器二千三百多件，瓷器約一萬八千件，玉器三千八百多件，此外還有漆器、琺瑯等。字畫方面，計六朝以來名家的字畫，多達一萬七千九百多件。四庫全書中，有很多在別處無法見到的典籍，這是人所共知的。清代檔案，自然是研究清代史的直接文獻。古物書畫，更是研究我國美術史的絕好資料。

中央圖書館，運來臺灣的善本書已達十二萬多册；再加上抗戰期間北平圖書館寄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後來運回臺灣、而由中央圖書館所保管的善本書二萬多册，合計已達十四萬册以上。這些書，除了版本學方面的價值以外，尤其在明代史料方面的價值，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書中，有很多罕見的關於明代史料的著作，以及大量的沒見於別家書目著錄過的明人詩文集。

以上三機關在臺的圖書文物，都是由於蔣公的大力支持，才能運來臺灣的。這些文物和圖書，不單是我民族文化的菁華，也可說是我民族文化的總滙。它們使臺灣成為保持我中華文化的大本營，也成為世界研究漢學的學人所嚮往的漢學中心。

由於臺灣有這些珍貴而又豐富的學術資料，再加上國史館、黨史編纂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等機關所藏的近代檔案；以及臺灣大學所藏比較豐富的圖書，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的南洋史料，對於本國從事研究工作的學者來說，自然可以取之左右而逢其源；在國外來說，也吸引了不少的學人來我國留學、或從事漢學研究工作。

就外國來華從事漢學研究的留學生來說，以我所知的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爲例，近些年來，在該所的研究生中，外籍學生，每年都佔一半左右。上學年（六十二年秋六十三年夏），是外籍學生較少的一年；但碩士班四十七個人中，也還有外籍學生二十一名；博士班十九人中，也還有外籍學生七名。

就專誠來華從事漢學研究的外國學人來說，以我所知的史語所爲例：史語所的圖書館，本爲該所的研究人員而設，原不對外開放。但，因爲近二十年來，許多大學已成立了中文研究所；而大學的圖書設備，多不敷用；臺灣大學所藏的國學圖書雖遠比他校爲多，但也不如史語所的完備。由於許多從事研究工作的教授和研究生、以及一些社會人士的要求，從民國四十七年起，史語所圖書館也允許這些人們來看書。十六七年來，助成了數以百計的碩士及博士論文，也幫助教授們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著作。在發揚本國文化方面，所收的效果，不可謂不大。尤其外國學者，以史語所的圖書設備爲對象，而申請來華從事漢學研究的，十多年來，每年少則二三人，多則五六人。他們大多數是來自美國、韓國和日本，也有些是來自歐洲。他們有的住在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館（單身的），有的在外面賃屋而居（有眷屬的）。居留的時間，少則二三個月，多達一年以上。此外，各大學文、史研究所的外籍學生，居留在臺北的外籍人士，不定期來史語所

圖書館閱書的也很多，去年一年中（元月至十二月），計有三百二十九人次。其中以美國及西德籍的爲最多，次則爲日本及韓國。這些外籍人士，所閱覽的既是我們傳統的典籍，所接觸的都是我國國學界的巨子；他們會得到些什麼成果，是可以想到的。從而，他們回國之後，對於我國文化的傳播，一定具有相當大的效果，也是可以想見的。

故宮博物院，自從在外雙溪開放以來，本國人士來參觀的，固多如過江之鯽；外國人士專意來參觀的，也不可勝計。對本國人士來說，他們看到那些豐富而精美的祖先遺產，自然會激起了對本國文化的愛慕之情，而堅強了民族自信心。對外國人士來說，他們看到數千年前，我們已有了那麼精緻的工藝品，也不能不歡喜讚歎，再也不會把我們看成是不如他們優秀的民族。別的姑且不談，即此兩點，對我國家的裨益就够大的了。

中央圖書館的善本圖書，也發揮了不少的效用。近二十年來，臺北書商影印的古書，很多是以中國的藏書爲底本，在古籍流傳方面，頗有貢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曾就該館的藏書（主要的是明人詩文集），照了微影膠捲二百多部；這在文化傳播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而圖書文物乃是民族文化的結晶。蓄意滅人之國的，必定要毀滅它的文化。因爲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果還能保存，即使國家滅亡，也還有復興之日；元清兩代，便是顯例。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果被毀滅掉，這民族則將陷於萬刼不復的境地。方今毛共正瘋狂地毀滅我固有文化，幸賴　蔣公高瞻遠矚，在國家極度艱難的情況下，策劃支持，把這些民族文化遺產，運來臺灣，成爲復興我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資本。這些圖書和文物所產生的力量，當不亞於百

萬雄師。

為億萬民眾所愛戴的蔣公，離開我們長逝了！我們文史界的人士，應該擦乾眼淚，更奮勉地守着自己的崗位，努力於復興民族文化的工作。這樣，才不至於辜負了蔣公維護這些圖書文物的苦心。

編者按：本文依先生之原稿排印，發表之刊物、日期待查。

關於「九廿二水災與中央研究院史料文物的損失」敬覆沈雲龍先生

中華雜誌一七二期（十五卷十一月號），刊登了沈雲龍先生的大作「九廿二水災與中央研究院史料文物的損失」一文。此文標題雖是「中央研究院」云云，但所謂史料文物的「損失」，皆指史語所的藏品而言。經沈先生向某記者詢問和向中央研究院朋友們求證的結果，說有以下的損失：

一、與考古人類學有關的骷髏人頭骨、及人體測量儀器紀錄等，都被水「沖毀」。

二、考古館中所藏殷墟甲骨、居延漢簡、以及手抄麼些經文，都已混入泥沙，無從辨識。

三、明清大庫檔案一百數十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泡在水中；「取出晾曬或設法吹乾，紙張黏結，字跡模糊，是『可想』而知的。」

沈先生舉出了這些所謂損失之後，於是認為這些國寶，都變成了「垃圾」。他認為「尤其人頭骨、龜甲獸骨、木簡，年代已久，本已風化，經過水淹，再混入泥沙，『必然』支離破碎。」認為「經過洗滌後，已恢復原來面目」，「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現在，我對於沈先生所舉的這些所謂損失，逐條說明如下，看我們是不是自欺欺人。

一、人骨頭因絕大部分存在上層木櫥內，並未淹及，只有一櫥被淹。就被淹的一櫥來說，有沒有被「洪水沖毁」？可以一望而知。測量紀錄，放在辦公樓的二樓，沾不到水邊，自不會被沖毁。肢體骨骼和測量儀器，確被水淹。但骨骼經洗滌後，確已恢復原來面目；儀器俟送廠保養後，仍可照常使用。原物俱在，可以覆驗。

二、漢簡全部存放在考古館二樓，泥水無法淹到，自不待言。甲骨文（並不在考古館），有一部被水淹。裝甲骨文的木匣（每匣裝一片大型甲骨），被淹壞的約二百餘個，甲骨則絕無損失，麼些文資料，（也不在考古館）經晾擦後，也毫無損傷。以上二者，是否「混入泥沙，不可辨識」，也可以一望而知。

三、明清檔案共九十七箱（並非百數十箱），其中四十七箱，距水甚遠，自不能淹及。已開過的三十箱，直接淹水和間接浸濕的約五分之一。另外未開的二十箱，從鉛皮（木箱內的鉛皮）罅縫中滲進了水。直接淹濕和間接浸濕的，約五分之二。這些被淹水或被浸濕的檔案，經過晾曬翻揭之後，紙張已不黏結，更沒有「字跡模糊」；並非沈先生「可想而知」的那樣嚴重。

總之，沈先生所說這些國寶，不但沒變成「垃圾」；而且字跡也沒有「模糊」，還都可以「辨識」。這，雖然和沈先生的想像不合，但確屬實情。

此外，沈先生說明清檔案，自從運到南港後，「二十餘年來，始終堆放在該所辦公大樓後面

平房，原地原封不動，從無研究人員開箱整理，幾同廢棄。」這些話也完全不合事實。明清檔案運到南港後，曾開了三十箱，前面已經說過。整理的成果，我們已出版了明清史料六十冊（自戊集至癸集，每集十冊），並出版了明清檔案存眞選輯三巨冊；此外，由於國科會的資助，我們整理裝裱了三法司檔案二千二百八十七件。這些事實，都是有目共睹的。沈先生這些指斥，不知道有什麼根據？

十月七日，聯合報記者打電話問我，說：有人從南港打電話到報館，說史語所的文物和重要古書損失很重。記者問他尊姓大名，他不肯說；問他的住址，他仍不肯說。記者感到奇怪，所以打電話向我求證。我把淹水的實際情形告訴了記者。並且說重要古書在圖書館四樓，絕不會淹水。記者根據我的話，作了簡略的報導（如沈先生大文所引）。沈先生於是引述某報一位年輕記者的話說：「連受人崇敬的學者專家及新聞界都犯了矇上欺下的虛僞作風，未免太使人失望！」我竭誠地歡迎沈先生和那位年輕記者，到史語所仔細參觀一番，看看聯合報所載我的談話，是否屬實；然後是誰「矇上欺下」，誰的作風「虛僞」，就判然分明了。

沈先生說到明清檔案的重要性之後，接着說：「在祇知道研究版本或所謂漢學的人」，對於這些檔案，「就覺得毫不足惜了！」我不瞭解沈先生這話的意思，難道明清檔案，不屬於所謂漢學的範圍？至於版本學的功用，除了可以鑒別被淹的是否爲貴重的古書之外，還可以拿出確實的證據，來證明某機關的某種古書確爲某出版商所盜印。這點，似乎沈先生沒有想到。

本所遭受水災損失的情形，早已清點完畢，報請本院（連同他所的報告）彙報有關機關。既

未曚上，也沒歎下。沈先生建議舉行一次公開的展覽會，我很贊成。其實，明年夏天，本院成立已滿五十週年，本所將舉行較大規模的展覽，現已開始籌備。沈先生大文中所說被淹的史料文物，將都在展覽之列。屆時人頭骨骼等有沒有被沖毀？甲骨、漢簡、麼些文等，是否已不可辨識？明清檔案，是否已字跡模糊？在眾目睽睽之下，自然可以得到確切的證明。但如沈先生不願意等那麼久，而希望趁着來院工作時，就便賁臨本所參觀災後的情形，我們隨時都歡迎。

我非常欣賞沈先生大文中的一段話：

如果讀書人都不肯講老實話，閃爍其辭，則所做的學問功夫，必定也是野狐禪，鬼話連篇比

沈先生是讀書人，所以能說得這麼中肯。欽佩之至！

六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寫訖

原載「中華雜誌」，十五卷十二月號（一七三期）（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頁五八

編者按：本文爲先生答覆沈雲龍先生「九廿二水災與中央研究院史料文物的損失」（中華雜誌十五卷十一月號，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頁三七——三八。）一文而作。先生此文刊布後，沈先生另有「讀了屈萬里先生敬覆拙文以後」，載於中華雜誌十六卷一月號（一七四期）（民國六十七年一月），頁五七——五八。